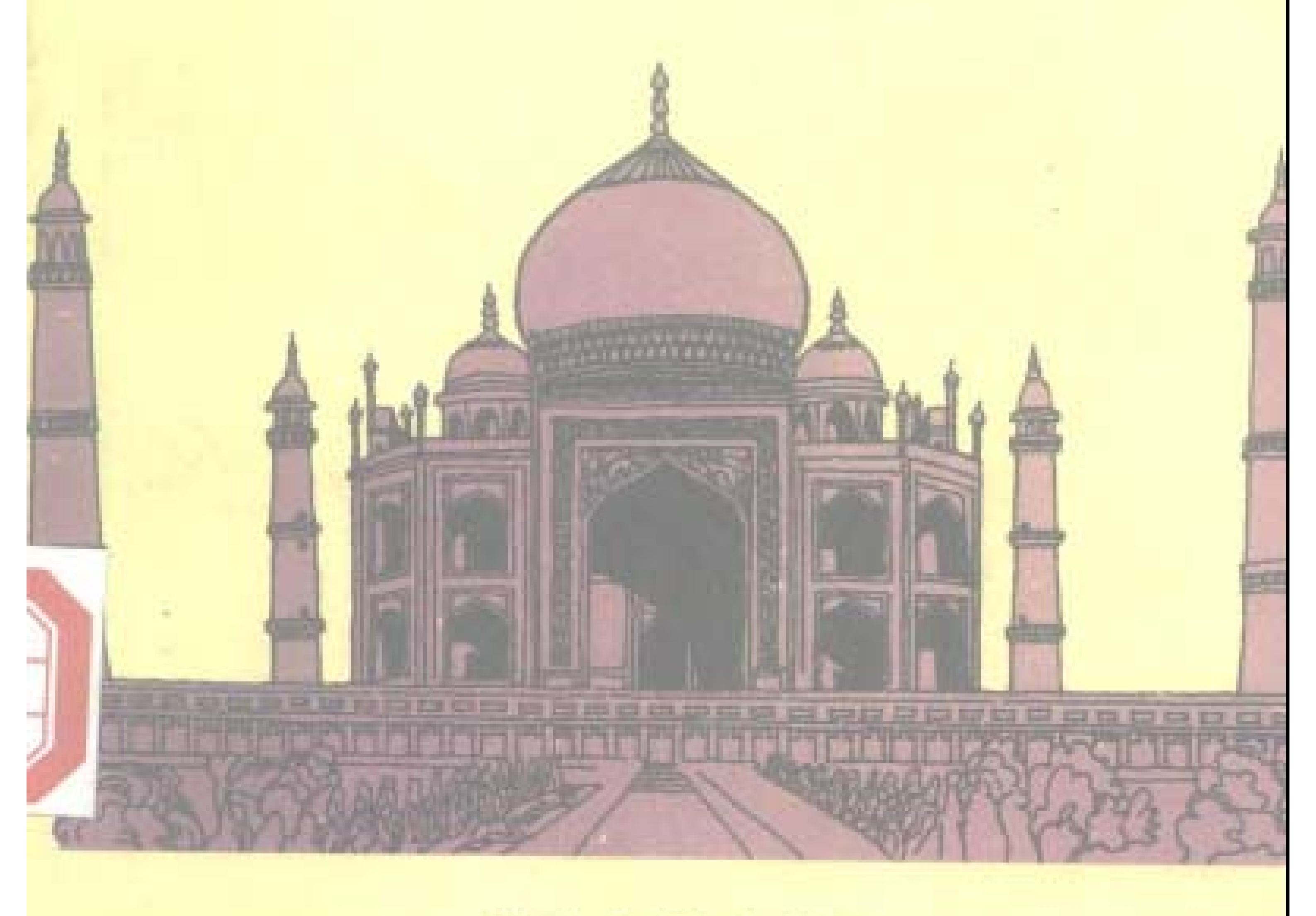
印度史

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

李文业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印 度 史

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

李文业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史：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李文业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5
ISBN 7-5610-3628-0

Ⅰ．印…　Ⅱ．李…　Ⅲ．历史-印度-1526～1947　Ⅳ．K3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371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3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0 千字　印张：12　插页：2
印数：1—2000 册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靳方前　　责任校对：杨　沈
封面设计：于　君　　版式设计：贾　莉

定价：20.00 元

前　　言

印度是亚洲的大国之一，是我国的西南部邻邦。它位于亚洲南部，是一个地广人众、河山壮丽、资源丰富的大国。其面积为297万余平方公里，超过西欧国家面积的总和。印度人口1996年底已达9.45亿，为世界上第二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印度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几千年以前，勤劳勇敢而富有智慧的印度人民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长期以来，印度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进行文化交流，使古老文明的内容不断丰富。在印度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曾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们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要民族有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马拉塔族、古吉拉特族、旁遮普族、阿萨姆族、奥里萨族等等。据统计，印度境内5万人以上通用的语言，即达118种之多，可见其民族复杂众多。英帝国主义者在印度统治时期，又把英语作为殖民地语言，强行推广，使之成为官方语言。在印度操印地语的人口约有1.5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4。印度人口中主要是农业人口，80%以上的印度人居住在农村。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许多有各自语言、传统与风俗习惯的民族组成为印度民族。

16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开始侵入印度。19世纪中叶，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但印度人民始终珍惜独立和自由，他们对剥

削阶级及其反动的制度，特别是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历史上发生过许多为推翻当时残暴制度的人民起义。在这些起义中，许多革命领袖和英雄涌现出来，为民族的自由与独立流血牺牲。几百年来，印度人民以从未屈服的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于 1947 年获得了民族独立。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以及世界的革命运动，有着重大的关系。列宁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①]印度的独立与解放，意味着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给予殖民主义制度以沉重打击。

印度独立后执政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它部分的在实行企业"国有化"。它宣布实行的"土地改革"也是不彻底的，全国土地的 85%仍然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里。印度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过着贫苦的生活。印度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至今还存在着几千万"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印度独立后，在对外政策上，国大党政府曾执行过"不结盟政策"，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威望，但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又决定它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一面。

在历史上，印度也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世界历史从 17 世纪中叶进入近代史时期，具体地说以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确立的时期，也是东方各国（包括印度在内）开始殖民地化的时期。这个期间，印度正处于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1526 年莫卧儿帝国建立，到 1857 年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中间经历了封建王朝的统一、全盛时期的封建帝国，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莫卧儿帝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710 页。

国的衰落，以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入侵等各个历史阶段。为了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关于印度的近代史，我们从莫卧儿帝国的历史讲起。

关于印度近代史分期问题，史学界争论日久。早在50年代我国建国初期，包括印度史在内的亚洲历史的分期的研究即为我国史学界所注目。原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先生写道："亚洲近代史的上限问题是存在的，在苏联东方学者中，就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列斯涅尔和鲁布索夫等主编的《东方各国近代史》，以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亚洲近代史的上限，此说见该书卷一第9页。而叶菲莫夫和彼德鲁谢夫斯基则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波斯、阿富汗、中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不能用为亚洲近代史的上限。叶、彼二氏更认为亚洲近代史分期应以亚洲各国本身历史发展的特征为标准，此说见二氏所作《评东方各国近代史》一文，载《苏维埃图书》1953年第6期。我认为叶、彼二氏的提法很有见地，值得重视，中国史学界也应当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① 作为一位印度史学者，丁则良先生只提出了问题，还未及研究得出结论，后来他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不幸于1957年谢世。

丁先生提出的问题对后来人是有启迪的。近来关于印度近代史分期的问题，许多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②，但还需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使此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历史上，我国和印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两国以喜马拉雅山为界，毗邻国界绵亘几千里。除了短暂的时期外，

---

① 丁则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涨与中国》，《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② 关于印度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可参阅《关于印度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作者：李茂梓，1984年第5期《湖南师范学院学报》）、《普拉西战役对印度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李文业1984年第6期《辽宁大学学报》）等文章。

两国一向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我国古典文籍有着关于印度的多方面记载。《史记》称其为"身毒"，《汉书》称为"天竺"。"印度"之称始于唐代玄奘，他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至，今从正音，宜云印度。"[①] 可见中印往来的历史多么悠久。

毛泽东同志说过："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②] 我们学习和研究印度历史特别是印度近现代史，对于了解印度社会的发展和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独立后的印度，以尼赫鲁为总理的政府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49 年 12 月中印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54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中印发表共同声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概括了国际关系中，首先是双边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产物，具有这一历史潮流的鲜明特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崭新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中印关系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其后，中印两国总理进行了多次互访，把中印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6 年 1 月，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继任总理，2 月即宣称：如有适当的时机印度准备与中国举行边界问题谈判。1984 年 10 月 31 日英·甘地遇刺逝世。英·甘地是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为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自己的国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改善和

① 《大唐西域记》第 3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② 毛泽东主席致印度共产党的电报，1949 年 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

发展中印两国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政府特派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特使，赴新德里参加英迪拉·甘地夫人的葬礼。印度继任总理拉吉夫·甘地接见了姚依林，表示了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于1996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在出席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应邀对菲律宾与南亚三个邻邦进行了友好访问。南亚各国是中国近邻，江主席在访问印度时说："同印度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是我们的既定方针。"11月29日江主席与印度总理德韦·高达一起出席了四项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这四项合作协定是：《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中印海运协定》、印度在香港保留总领事馆的协定和中印合作打击贩运毒品及其他犯罪的协议。

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江泽民说："我们对解决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一贯持积极态度。我们相信，中印两大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希望双方继续本着已达成的谅解精神，通过谈判尽快找到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江主席在谈到《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时说，这是中印两国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的重大举措。这项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有助于进一步维护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11月29日同印度总理高达会谈时说，中印双方建立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们真诚希望与贵国长期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互惠合作，互助发展。

中国印度两个大国的睦邻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我们希望与相信，中

印两国政府和人民能继续共同努力，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的睦邻关系作出贡献。为此目的，我们要了解和研究印度的历史。这部印度近现代史，正是献给中印友好关系史花环上的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花朵。

目　录

第一章　莫卧儿帝国的统治

第一节　莫卧儿帝国的建立

16 世纪初期，印度是一个分裂为许多小公国的国家。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部广大地区为伊斯兰教外族封建主所统治，历史上称为德里苏丹国。当时的统治王朝为劳迪王朝（1451—1526），是阿富汗人所建。它的统治范围比过去的王朝更为狭小，名据德里，形同地方王公，完全没有力量统治全国。劳迪王朝没有鞭及印度南部领域；北印度分裂为孟加拉、马尔瓦、古吉拉特和克什米尔 4 个独立的部分，4 个部分之间长期混战。

印度北边为喜马拉雅山脉，极难跨越。东西两边也有山脉与外界隔离。南印度是一个伸入印度洋的大半岛，东为孟加拉湾，西为阿拉伯海。除西北的开伯尔等山口可与中亚相通外，印度很难与外界接触。开伯尔山口，坐落在兴都库什山脉，山口海拔为 1000 多米，隘道狭窄，最窄处只有 12 米宽，它是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以至同欧洲陆上交通的捷径。印度内部的地理形势也十分复杂，温德亚山陡险峻峭、林莽丛生，把印度截成南北两半。北印度被塔尔沙漠及其附近的广大半沙漠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南印度又形成为中央的德干高原和沿海平原两部分。各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很大，这对印度各地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起了一定的影响。

印度的居民同样很复杂。印度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公元前二千纪初就居住在这里，在印度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后，雅利安人从西北方侵入印度河流域，接踵而来的是马其顿人、

贵霜人、匈奴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外族人，在不断的外来人入侵和内部居民迁徙的过程中，形成印度民族复杂的现象。

1517年，劳迪王朝内乱，占领阿富汗的帖木儿帝国统治者的后裔巴布尔乘机入侵，几年以后占领了德里。历时三百多年的德里苏丹王国从此结束。印度历史开始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时期。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持续了三百年之久的统治，是印度历史上版图最广大的一个帝国。

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是巴布尔。他的父亲乌玛尔·谢赫·米尔扎是大宛的统治者阿米尔·帖木儿的第四代孙子。他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汗国汗王的直系后裔。巴布尔于1482年2月14日出生于大宛，1494年，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拔汗那的统治权，信奉伊斯兰教。他具有突厥血统，为了标榜蒙古征服者的显赫战功，他自称为莫卧儿。

巴布尔的统治所在地拔汗那，位于俄罗斯土耳其斯坦的浩罕。野心勃勃的巴布尔企图占有帖木儿王朝祖先的发祥地撒马尔罕。这座象征帖木儿王朝昔日的权力和荣耀的城市，深深吸引着他。经过几度征战后，1497年他攻占了撒马尔罕。但只占领了一百余天，因拔汗那发生了叛乱，他不得不撤离撒马尔罕。在他的撤退途中，拔汗那已经丢失。此后一年中，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四处移动。1500年，他再次占领撒马尔罕，但在次年被乌兹别克人驱逐出去。他又一次成为无国之君，经过多次辗转和征战之后，于1504年10月占领了喀布尔。1507年他采取了“帕德沙”的称号，即波斯语“大王”之意，同时他取得了对帖木儿汗国诸王公的领导权。他将喀布尔作为重新进行组织攻城掠地的根据地，这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侵略成性的巴布尔，致力于建立他在喀布尔的统治后，把侵略目标转向南方和东方，以图新的扩张。腐败无能的德里苏丹王国，就成为巴布尔当然的猎取物了。“巴布尔的入侵，给印度历史带来了新的变化。”①

1518年巴布尔率莫卧儿军通过开伯尔山口攻占了巴焦尔，接着向杰卢姆河畔推进。在进军过程中他采取了十分谨慎和狡狯的态度，他把该地居民视为自己的臣民，因为他的祖先帖木儿曾经征服过这里。他同时采取外交上的怀柔政策，派出使节前往德里晋谒苏丹王国的统治者伊卜拉欣·劳迪和旁遮普的总督道拉特汗·劳迪。巴布尔利用这些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坐收渔利。他深知阿富汗统治阶级的内部不和，借支持道拉特汗之机，打击伊卜拉欣。后又将道拉特汗的领地，擅自给予他的儿子，制造父子不和，最终道拉特汗的儿子阿拉姆汗逃往喀布尔，投顺了巴布尔。

经过长期备战后，巴布尔于1525年12月初，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向印度斯坦进发，一举击败了道拉特汗。道拉特汗投降而幸免于死。1526年2月26日，巴布尔的长子胡马雍击溃了伊卜拉欣的一支前锋部队。巴布尔率部于1526年4月12日到达了德里北部的帕尼帕特，在此发动了著名的帕尼帕特战役。

德里苏丹国王伊卜拉欣·劳迪闻讯后率领十万大军迎击巴布尔，这支庞大的臃肿之师，行动滞缓，调动不便，但对只有1.2万兵力的巴布尔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巴布尔根据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部署了他在战场上的兵力。他把军队的一翼布置在帕尼帕特城及其郊区，利用城区的掩护，便于进攻和退守；另一翼利用朱木拿河的旧河床为屏障，以砍倒的树木和荆棘丛林为障碍，阻挡敌军骑兵的袭击。主军的前面掩护以连结起来的大车，每隔两

① 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第422页，伦敦1958年版。

车设有移动的雉堞，其后布以火枪手。两车之间留有空隙，方便骑兵自由驱驰，散开作战。两翼都配备了机动的轻骑兵，以便在交锋后可以迂回到敌后进行袭击。巴布尔颇费心机，做了认真、可行的切实准备。

两军对峙了一个多星期。巴布尔以小股部队突击骚扰，以便迫使伊卜拉欣离开阵地发动进攻，借机歼灭敌军。傲慢自负的伊卜拉欣，终于被激怒而上了圈套。他于4月21日向巴布尔精心部署和严密防卫的军队发动了正面进攻。巴布尔有意让出一段狭小的正面阵地，众多的军队拥到这里施展不开，反而抵销了德里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伊卜拉欣的军队在行进中遇到阻击，阵形大乱，拥挤成混乱的一团，正好遭受对面配备着大炮、火枪和弓箭的莫卧儿军队的袭击。同时，巴布尔军队的两翼则迂回袭击了德里军队的后卫，进行包抄合击。战斗到中午，德里军队就全部被击溃了，巴布尔的军队乘胜追击。这次战役使德里苏丹国军队阵亡四五万人，成群的战象和其他辎重被莫卧儿军队所缴获。伊卜拉欣在这次战役中战死，他的头颅被割下送给巴布尔成为他的战利品。"帕尼帕特战役具有重大意义，它是莫卧儿在印度建立统治的标志。"[①] 巴布尔随即向德里进军。1526年4月，德里苏丹王国在巴布尔的攻击下屈服了。巴布尔坐上了德里的皇位，建立了莫卧儿王朝。他任命了财政和税务官员，在占领德里的同时他获得了旁遮普省，并派兵向其他地区进占。巴布尔以占领的土地对部下进行了封赠。在帕尼帕特战役后的八个月内，巴布尔的势力由阿托克扩张到了比哈尔。木尔坦也并入了他的版图。在南部，巴布尔的领土扩张到了卡尔皮和瓜廖尔。在击溃拉其普特人的军队后，巴布尔取道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和加济帕尔，向东方进军，

① 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第427页，伦敦1958年版。

前来增援的孟加拉苏丹的军队也被击散。1529年5月6日的阿格拉战役，给了德里苏丹的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拉迪王朝彻底覆灭了。

巴布尔死于1530年12月26日。他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新的制度。他所建立的莫卧儿帝国仍沿用原有的紊乱的行政制度。他给他的后代遗留下的庞大的帝国，也是极不巩固的，只是依靠军事机关的效能才不致于分裂。斯大林同志说过："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①] 莫卧儿帝国，正是这种状况的封建王朝。

巴布尔死后，儿子胡马雍继位。当时极其严重的局面，威胁着他的统治。对印度斯坦的征服还没有完成，他的军队又是外籍人组成，战斗力削弱。比哈尔的统治者舍尔汗起兵叛乱，把胡马雍逐出德里。胡马雍逃往波斯，得到萨非王朝的援助，后攻占喀布尔。舍尔汗统治印度的5年（1540—1545）期间，几乎征服了整个北印度，但他的后裔内讧不已。1555年，胡马雍从喀布尔重返德里，恢复了统治。在他的儿子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莫卧儿帝国的领土又大为扩张，除南印度外，整个半岛几乎完全统一。莫卧儿帝国逐步合并了摩拉瓦、拉其普特、古吉拉特、孟加拉、奥德、信德、克什米尔及其他各公国。此时，莫卧儿帝国统治着东起阿萨姆，西到喀布尔和堪达哈，北至克什米尔，南达德干高原这一广大地区。南方的边境尚不固定，帝国曾不断向半岛南端扩展。

阿克巴生于1542年10月15日。1555年6月22日，胡马雍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3页。

于西尔兴得胜之后，宣布阿克巴为他的继承人。1556年2月阿克巴登上皇位以后，继续进行着侵略性的远征。阿克巴是莫卧儿帝国最有影响的皇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内采取镇压和怀柔兼施的政策。他在国家管理、司法和税收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如调整税收制度，丈量全国土地，根据土地的质量来规定不同的税收。他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省，即孟加拉（包括奥里萨）、比哈尔、阿拉哈巴德、奥德、阿格拉、德里、阿季米尔，木尔坦（包括信德）、拉合尔（包括克什米尔）、喀布尔、阿默达巴德（古吉拉特）、马尔瓦、坎德什、贝剌尔、阿马德纳加尔。每省由皇帝委派的总督管理。他还恢复和增修了许多灌溉工程。他对异教徒主要是印度教徒采取了容忍和拉拢的政策，废除了印度教徒的人头税，并允许印度教的贵族在朝中担任某些职务，得到较高的地位。"阿克巴明白，印度教徒构成了国家人力的四分之三以上，他们的智慧、组织和经济资源都不容许遭到破坏。"[①] 在阿克巴统治时期，经过长期战争灾难的劳动人民，获得了暂息的机会，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形势的稳定，减少了封建内乱，贸易和交换也有一定的进展。在这个时期，印度北部的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融合和发展，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至17世纪中叶，印度大部分领土都处在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之下。莫卧儿帝国北面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西部据有阿富汗的喀布尔一带；东边则达到阿萨姆的边境。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向德干高原和半岛南部继续扩张。莫卧儿帝国在南方的边境是不固定的，它是印度历史上深入南部领土最广大的政权。莫卧儿帝国的版图除整个北印度外，还包括克什米尔、东俾路支和阿富汗领土的一部分。到18世纪初，除印度次大陆的极南端即科佛里河以

① 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印度通史》第3册第614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南外，整个印度都并入了莫卧儿帝国的版图。

经过最初几代皇帝的征战，莫卧儿帝国兼并了印度境内的主要王国。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在广泛征服的基础上，莫卧儿帝国划分成二十一个苏巴，即行政区划的省。其首脑为苏巴达尔，即省督。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行政机关。税收机关则由帝国的中央税务署任命的官员管辖。地方政权自行另加赋税，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莫卧儿省督管辖的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各自独立的土邦。

莫卧儿帝国从来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只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皇帝和封建主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而封建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更处于异常尖锐的状态，民族矛盾也非常复杂。因此，至17世纪中叶以后，莫卧儿帝国便逐渐走向衰落。当阿克巴死后不到三四十年，莫卧儿帝国便暴露出衰亡的征兆。

第二节　印度社会经济制度

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和历代外族入侵者一样，把印度自古以来沿袭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莫卧儿帝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国家有权在政治统治的地域内向全体农民征收租税。财政机关对全部耕地和这些土地的征税额都进行了登记。国家把征税的权力交给地方封建主。封建主在法律上既不占有土地，也不占有农民，他们只有征收土地租税的权力。马克思指出："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

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①] 莫卧儿皇帝实际上是国家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从土地上征收租税，便是皇室收入的基础。

印度农村的广大农民，生活的组合形式是古代留存下来的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是一种农业和手工业相互间以宗法联系的、彼此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社会机构。在印度，下面是农村原始共产制的残余，上面是专制的封建统治。因此，研究农村公社制度就成为了解印度社会经济制度的钥匙。

马克思说："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②]

关于印度农村公社的情况，马克思引述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官方报告，作了如下的描写：

"以地理上来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以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通常设有以下一些官员和职员：帕特尔或村社首脑一般是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

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报，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比较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卫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水库水道管理员负责分配农业用水量。有专门的婆罗门主管村社的祭神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上念书和写字，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并没有这么多，上述的各种职务有些由一人兼任；反之，另外也有些地方又超过上述人数。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成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帕特尔仍然是村社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裁判官和税吏。”①

印度的许多地区，在近代史开端时，还保留着这种村社制。每个农村公社都是以已经成为传统的分工形式为基础，这种形式直接地把农业同家庭手工业联结起来。村社内的产品除课税外，主要供村社内部的直接消费。农村公社阻碍了城市和乡村进一步实行分工，也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村社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的“卡斯特”，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种职业固定不变，代代相传。村社的手工业者是用订货人的材料来工作的，不计算工资，只取为数不大的一份特定的实物。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

社的农民，只有耕种一定数量土地的权利。而所有农民占有的土地是公社土地的组成部分。公社中的多余土地和荒地为公社成员所共有，大家都有耕种的权利。

公社成员所占有的土地有着复杂的继承条例，由父传子。因此，每个农民的份额土地被分割得非常零散。在公社里，能出卖的土地只是份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地段的土地。出卖土地必须征得全体公社成员或最主要成员的同意。土地的买卖是极难扩展的。

在公社内部，财产和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村长和文书据有特权地位，这种地位是世袭的，他们的职责是征税和管理各种文件。

公社的农民分为两个等级，即有充分权利的公社社员和无权的农民。各个等级的人也不完全平等，他们之间的处境相差很大。事实上，不少人是以半奴隶、半农奴身份，受公社上层分子剥削的。

公社也是国家征税的工具，它以联保的形式向国家负责纳税。

每个农村公社都是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很少和外界发生经济联系。马克思写道："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1] 印度农村公社的经济制度，大大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2页。

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

在莫卧儿帝国统治的后期，由于贸易的发展和高利贷剥削的加强，农村公社自给自足性质的经济逐渐破坏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特别是纺织业，由于为市场进行生产而发展起来了。

在印度的个别地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之外，总的说来，莫卧儿帝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它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

“哈里萨”：在印度，称皇室的直接领地为哈里，所有新征服的土地都列为哈里，在这种土地上国家委派官员征收租税。这种领地大约占全部土地的 1/8。以后统治者又把这种土地作为军人采邑和教堂采邑分配给各个伊斯兰教族长或者把它当作免税土地。有些统治者也把没收来的一定种类的土地和某些人的领地列入“哈里萨”。这样领地的增减幅度很大，面积时大时小。收税人从哈里萨土地上征得的全部税款都直接送交莫卧儿帝国的财政机关。大型灌溉工程（水渠、水库）也归国家所有。这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雏型，也反映了莫卧儿帝国封建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

“扎吉尔”：莫卧儿帝国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基本形式是“扎吉尔”，即军事采邑制。皇帝把土地以“扎吉尔”的形式分给封建贵族。“扎吉达尔”是“扎吉尔”的占有者，名义上他们只有从分给的土地上收税的责任，但实际上他们却几乎成了所管辖的农民的全权统治者。扎吉达尔有收税的权利，也有供养军事骑兵的义务。骑兵的数目由所得土地税的多少来决定。例如，一年内能够得到一百万卢比的税收，就要装备和供应五千骑兵。扎吉达尔把税收的大部攫为己有，并力图把占有的领地变为世袭领地。

作为土地的占有者扎吉达尔剥削农民的方式有：征收皇帝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7 页。

定的租税和各种不合法的杂税；使用农民的无偿劳动进行公共建设和私人建筑。根据法律，农民对扎吉达尔并无农奴依附关系，只有涉及租税问题时，扎吉达尔才有审判和处罚农民的权力。扎吉达尔只关心该地区农民所缴的租税总额，至于其他方面则管得很少。在其职务发生调动时，他们管辖的土地面积与位置也要随着变更和调动。扎吉达尔与土地的关系，比欧洲的封建主要弱得多。

扎吉达尔也是雇佣兵的长官，奉到皇帝的召唤，便要率领士兵出征。莫卧儿帝国的扎吉达尔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等级制度，每个扎吉达尔不论其大小，都直属于宫廷王室。

扎吉达尔从缴纳保证金取得"扎吉尔"以后，就毫无限制地在自己领地内征收租税。他们还把灌溉系统的控制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向农村公社征收新税。收入的增多和统治农民权力的巩固，促进了封建主经济和地主权力的加强。而他们权力的增长，就成为滋长独立性的土壤，增加了莫卧儿帝国的分裂因素。

"柴明达尔"：这是封建主保留了土地的世袭占有权利的一种形式。这种占有形式主要存在于某些边疆地区或莫卧儿帝国势力不易达到的地区。这里仍为各印度王公的王朝所统治。他们是莫卧儿帝国的属国，向皇帝纳贡，但在内政上他们却保持着独立。

在印度的许多省份，充当租税包税人的官吏、商人和高利贷者，竭力使自己的包税权变成世袭的权利。他们成为世袭的土地占有者后，往往拒绝服从中央政权。大封建主对国家机构和国家监督的斗争，实质上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

以性质上看，柴明达尔的领地与扎吉达尔有很大不同。柴明达尔领地可以世袭，他们是藩属的王公，不仅向他们领地的居民征收实物地租，而且还强迫农民在他的土地上服劳役，以及要农民服兵役，并对农民随意审判和惩办。

柴明达尔土地占有制在阿克巴统治时，还不是最主要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它大多存在于拉其普特、奥里萨、贝剌尔、喀布尔、孟加拉和比哈尔等省。但后来，柴明达尔制度逐渐变成印度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制形态了，并且带有扎吉达尔的许多特点。许多柴明达尔为莫卧儿帝国服务，并以扎吉达尔补充了自己的柴明达尔领地，到莫卧儿帝国末期，柴明达尔和扎吉达尔的区别渐渐消失了。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僧侣也掌握了一部分土地。同时也存在着人数较多的中小地主阶层的土地所有者。

印度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制，使印度的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土地国有制的特点表现在租、税合一，它的税率不是由个别封建主来规定，而是由国家来规定。马克思指出印度的特点是："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1] 印度地主——封建主为国家征收捐税，并征收他们非法制定的那些苛捐杂税，致使广大农民遭受国家和当地封建主的双重压迫。

土地不属于生产者，农民的生活一代比一代更加困难。封建剥削的重担造成千百万农民破产，印度农业日趋衰落。

在农村公社里，每家都占有一份土地，份地都含有经过灌溉和未经灌溉，好的和坏的土地，耕种的土地处于非常零乱的状态。由于复杂的继承制度，土地重分进行的非常频繁。份地的不平等现象的增长，必然引起实际拥有特权的人想要变成土地私有的企图。

公社内部财产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公社内有职务的人员，如村长、文书等，盘踞在特权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5页。

位上，他们掌管和征收全部税收，而他们照例不纳任何税，把他们的税额分摊在所有其他社员头上，他们这种特权地位又是世袭的。

公社里的手工业者或商人的职业也都是世袭的，即使他们在几年的过程中没有从事这种职业，他们的职业也不会失掉。手工业者无报酬地为公社社员工作，使用订货人的材料加工。他们从公社那里得到一部分收成或一小块免税的土地，这块土地主要是由其他一些没有充分社员权利的人来耕种。

手工业者被束缚在一定的公社和土地上以及手工业的继承性，致使手工业的停滞不前和在简陋的生产形式进行，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印度手工业者和工匠也曾创作了一些艺术杰作，但却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劳动。

公社的农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般分为有权利的社员和没有权利的社员。前者所缴纳的税额占他的收获量的40—50%，有时还要多些；后者受的剥削就更惨重了，他们大都是些外来人。

印度农村还有雇农，他们通常在村长的土地上和其他有职位人员的土地上劳动，而印度的南方，还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

"卡斯特"等级种姓制度，在农村公社很盛行，所有的人都被划分为一定的等级，这是按一定职业和共同出身结合在一起的闭塞的社会集团。最卑贱、最无权的卡斯特是"不可接触者"。这些人在公社处于半奴隶、半农奴的地位，他们承担着手工业和仆役的工作，他们是农村里的上层分子进行超经济剥削的主要对象。

卡斯特的区分在捐税的分担上起着极大的作用。同样面积的土地，婆罗门就比下等卡斯特的农民少纳税。农民中的这种卡斯特制度使印度农村中的土地关系愈加复杂，使农民的等级划分的情况愈益严重。

公社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莫卧儿帝国时的印度农民在人身

上被认为是自由的，但他们只是在本公社的范围内，才对土地享有一定的权利，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通常兼作包税人和钱庄主的高利贷者，在公社中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在16世纪农村由实物地租开始转化为货币地租之后，高利贷者的作用更加扩大了。印度各地的货币是不同的，高利贷者利用这种差别来欺骗和剥削农民。18世纪，印度的高利贷者具有更大的势力，他们常常变成封建主兼包税人，他们促进了公社的解体，但他不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代表者。

由于对内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对各种商品的大量需要，城市的生产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商人和城市的包买商便开始向农村手工业者和织工订货。印度很早以来就以生产棉织品而享盛名。印度的棉织品曾行销世界各国。17世纪中期，从事于生产出口的纺织品的农民有几十万户之多。

印度部分手工业者不只是为公社而且还为市场工作，但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出卖而得到利益的人当然不是手工业者本身，仍是那些和高利贷、商人有密切联系的农村上层分子。农村公社中的不平等现象增长了。农村手工业者受到了公社上层和商人或包买商的双重压迫。公社上层分子随着权利的加强而越来越想夺取公社的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样，在国内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印度的经济有了一定的进展。由于交换、贸易以及手工业发展的结果，封建制度不断受到破坏，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残酷的封建剥削同高利贷的结合，使农民陷入完全破产的境地。马克思指出：高利贷“实际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但不改变生产方式；……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

化。"[①]

高利贷不仅使农民破产，而且也使封建贵族遭到破产。扎吉达尔为了保住自己的采邑，需向皇室缴纳大量的贡品和贿赂，不得不从高利贷者手中借贷大量金钱。当他们失去偿还能力时，不得不允许高利贷者去征收租税。由于出卖官职以及扎吉达尔把租税包给高利贷者，农民的负担更加重了，农民日益破产。莫卧儿帝国的军事采邑制度，发生了危机。

17 至 18 世纪，印度封建制度的特点仍保持着国家土地所有制。莫卧儿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从土地上征收赋税是帝国收入的基础。这些领地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皇室家族、宫廷官员和宫廷禁卫军的费用。其余土地，则大部分作为采邑，赐与封建贵族，这种采邑主要是分封给有功的军人，在供职期间才可颁赐，通例是不能世袭的。

莫卧儿帝国的封建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是扎吉达尔制。他们对统治下的农民具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任意向农民派役增税，归自己享受。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扎吉达尔征收的赋税比皇帝直接掌握的土地税收多四倍。大的扎吉达尔通常是穆斯林，主要是以前征服印度的从西北边境迁入印度的移民的后裔。他们是印度封建主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一部分，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扎吉达尔依据其品级及其赐用和采邑的收入，雇佣和赡养骑兵，为莫卧儿皇帝效力。扎吉达尔本人就是这种雇佣骑兵的长官，他一得到皇帝的诏令，就率军士出征。帝国政府虽然采用种种监督办法，而他们始终不曾供养过足够的规定的骑兵，把大量减员人数的费用，中饱私囊。

按规定，扎吉达尔死后，他在世时所积累的一切财富都要归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674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入国库。这种制度往往也是行不通的。

采邑是印度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形式，虽然它不占重要地位。在莫卧儿帝国统治阶级中除伊斯兰教贵族外，还保存着信奉印度教的封建主。一切土邦王公，在内政方面还享有事实上的独立，并以世袭权力保有土地。相当大的土地面积仍保留在印度教寺院的控制之下。

莫卧儿帝国从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只是一个封建独裁国家。它的统治权力主要表现在税收机关仍归帝国政府节制方面。这种税收机关的统一是莫卧儿帝国保持全印度统治的标志和重要基础。在莫卧儿帝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帝国政权与大封建主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大封建主力图把他们的采邑领地转变为世袭的独立私产。在莫卧儿帝国鼎盛时期，封建主企图分立的暴乱和他们之间互相争夺而酿成的武装冲突，也没有完全停止过。

在17世纪，莫卧儿帝国为了支付进行侵略战争的经费；镇压日益兴起的农民运动、部族起义所需要的巨大军饷，对货币的需求增加了。因此，莫卧儿帝国逐渐广泛地对土地采取包税的办法。包收土地税的人通常是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除向国家缴纳规定的金额外，竭力增加征收的土地税率，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后的一滴血汗。包税制度变成商业高利贷积累货币资本的来源。

包税人即柴明达尔，是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最富裕的代表，他们使自己的保税权变成了世袭的权力。包税制度逐渐渗入扎吉尔体系。

大封建主成了世袭的土地占有者之后，往往对抗中央政权，不向国库缴纳应征的捐税。世袭包税者和大扎吉达尔占有统治地位，同时也有人数较多的中小地方封建主阶层存在。这些封建主中，虽然有穆斯林，而印度教徒则占绝大多数。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封

建土地占有的体系中，印度教徒继续占据着中、下层的优势。

农村公社的存在是印度历史沿革的产物。印度的农村公社在经济方面具有很大的闭塞性，公社成员包括农民和其他行业的手工业者。马克思写道："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铁匠、木匠等等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①] 公社集体分成许多集团，是不同财产和社会地位的某些种姓的结合。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属于公社上层，他们拥有世袭的土地占有权和对土地的经营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必须缴纳国家赋税和其他封建捐税。

各村社都有所谓"外来"农民阶层，他们向村社以整体的名义或个别农民租种土地。村社的奴仆和手工业者是不享有充分权利的社员，他们为社员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服务。一部分村社奴仆属于不可接触的种姓，处于村社奴隶或农奴的地位。

印度差不多到处都种植棉花，使农民取得纺纱原料，解决他们的穿衣问题。织工承担纺织工作，他们所完成的工作是由村社的需要决定的。他们工资的数量则是依照习惯固定下来的。

17至18世纪，农村公社解体的缓慢过程加剧了，它逐渐地进行瓦解。在印度的一些省份中，公社分化出把土地据为私有的上层剥削阶级。这个阶级变成封建地主，他们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巩固他们的封建私有制。同时，大批的农民，纷纷改行，以纺织为主要职业。他们通常从村社分化出来，建立自己的居民点。在许多地区，村社手工业者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农村手工业者有时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一部分产品，他们开始领取计件工资。村社的闭塞状态被逐渐打破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印度以精巧的手工业闻名于世。纺织业是手工业生产人数最多的部门。印度的手工业基本上仍然是种姓的行业。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传统联系被破坏了，纺织脱离农业成为一些特殊种姓的职业。某些地区村社手工业者有变成小商品生产者的倾向，他们和农民之间出现了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趋势。同时，手工业者的财产分化过程也加剧了。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由于破产丧失了生产资料，被迫从事雇佣劳动。也有一些手工业者发财致富，依靠雇佣工人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乡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国内许多地方运销。但是，封建割据和税卡林立、名目繁多的捐税，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从农业分化的过程，促进了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的发展。17 世纪后半期到 18 世纪中期，印度许多城市仍具有农村的一些特点，和乡村一样，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也适用于城市的土地，也要向政府缴纳极重的税捐。许多封建主不但要剥削农民，也同样剥削着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完全依附封建主。掌管城市政权的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印度的城市没有自治权，市民、商业和手工业阶层对封建压迫的反抗，主要表现为市民的各种宗教教派的运动上。

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在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实物地租是剥削印度农民的传统形式，它还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农村公社体制的作用。农村公社是印度封建经济的基层生产组织，是印度封建专制的牢固基础，是封建主的税收单位，是它们封建统治的基层组织。

莫卧儿帝国的税收有所增长。根据《阿克巴法典》中记载 1594 年的数字，国家收入为 13.213 万卢比，18 世纪初增为 33.681 万

卢比。[1] 自然，随着版图的扩大，税收范围也扩大是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扩大耕地面积也是增加税收的主要因素。1594 年耕地面积为 12.700 万比卡，1720 年增加到 27，800 万比卡。[2] 同时，极高的税收率，使农民遭到惨重的剥削，占收获量的 1/4 到 1/2，有的地区超过 1/2。封建剥削和掠夺，造成农民的破产。连年不断的叛乱和战争使农民遭受到极大的痛苦。莫卧儿帝国一开始即处于严重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对立之中。

17 世纪后半期，印度爆发了多次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的起义。许多教派运动也发展起来，在印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反封建斗争中，教派运动成为他们思想的表达者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些印度部族也进行了反莫卧儿帝国的武装起义，这种起义是为了建立本部族的国家，为了争取本民族的政治统一。

第三节 阿克巴的改革

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巴布尔，于 1530 年 12 月 26 日病逝。巴布尔为他的继承人奠定了帝国统治的基础。他的儿子胡马雍于 1530 年 12 月 30 日在亚格拉即位，继承了王位。

胡马雍首先着手进行控制帝国各省的工作。德里的苏丹王国虽以帝国自居，却从未在两河地区以外行使有效权力。胡马雍首先向印度教君主统治达八百多年的羯陵迦进攻，战争很费气力，最终和这位印度教君主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条约，这个印度国家成为莫卧儿帝国的一个公国。印度教的君主成为伊斯兰教国家的贵族，反映了莫卧儿帝国的宗教政策是服从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比

① 见贾·抄卡尔：《奥朗则布时期的印度》第 32 页，加尔各答 1921 年版。

② 比卡为印亩，1 比卡约含 2/3 英亩。

阿富汗人的统治时的政策是大有改变。以后的莫卧儿皇帝又发展了这种政策。

莫卧儿帝国在东方各省的统治是不巩固的，孟加拉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印度斯坦的征服还远没有完成。胡马雍率领的军队是由察合台的突厥人、莫卧儿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和印度人的亡命者组成的混合体。东方的阿富汗酋长仍然为数很多，随时准备攻击莫卧儿政权。南比哈尔的阿富汗酋长舍尔汗，在其他酋长的支持下，打败了胡马雍。胡马雍不得不逃亡在外，过着流亡生涯。胡马雍经过15年的流亡生活后，终于在波斯人的支持下，于1555年打回德里，这时舍尔汗已死去两年。胡马雍在波斯居住的15年，受到波斯文化的深刻影响，莫卧儿帝国也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

在胡马雍流亡时出生的阿克巴，于1556年继承了王位。这个只有16岁的新皇帝，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他所承袭的帝国，在面积、人力和资源方面，都小于南部的印度教王国维查耶纳伽尔，人口也少于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的苏丹领地。帝国的矛盾重重，外部王公林立，处处敌对；帝国内部贵族和官员结党营私，野心勃勃，统治阶级内部的猜忌异常强烈。阿克巴唯一依靠的是一支数量不大的军队和他父亲的忠实臣仆贝拉姆汗。阿克巴即位后的头四年，由摄政贝拉姆汗辅佐，挥师直指僭号称王的旧王朝的余族，同时进兵旁遮普，围攻曼科特，控制瓜廖尔，并且合并了江普尔。1560年阿克巴亲理国政的时候，莫卧儿帝国的版图包括了旁遮普和恒河流域，直到孟加拉的苏丹领地的边境。又经过一系列的战役，马尔瓦及其以南的地区被占领。冈达瓦那也被征服了，兰桑波尔和齐图尔也被攻取了。1573年占领古吉拉特和它的海港苏拉特。两年以后，孟加拉的苏丹领土被征服与吞并了。阿克巴在即位后的20年，莫卧儿帝国的版图大大扩展。帝国的疆土，由

中亚细亚的边界，向东伸延到阿萨姆，向南扩展到温德亚山。古吉拉特和孟加拉的巨大港口，包括在帝国范围以内。莫卧儿帝国成为印度历史上领土最广的国家。

阿克巴作为帝国的皇帝，以坚强的性格和巨大的勇气，克服了包围他的重重困难，成功地建立了次大陆上拥有最高权力的王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他精心制定了新的政策，实行了一些重大改革，以民族融合与和睦为目标的革新措施得以贯彻。他建立了伊斯兰教、印度教贵族联合专政的行政体制，改组了军队，创办了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革新事业。并提出了神赋君权的概念，以强化其统治权力。他是印度历史上有影响的一个明智和勇敢的皇帝。

早在1562年，当他只有22岁的时候，他就隆重地同一位信奉印度教的拉其普特公主结婚。拉其普特是北印度最强大的公国，这种政治婚姻为与拉其普特建立持久的同盟奠定了基础。同时将公主的侄子曼·辛格委以重任，给以极高的荣誉。这一政策是有深远影响的，它使印度教中有权势的部分，归附了莫卧儿帝国，因而在印度减轻了它的统治的外来性质。接着，阿克巴在他的整个广大的领域内，废除了前往圣地朝拜的印度教徒的香客税。一些印度教的宗教圣地如贝拿勒斯、马土腊、哈德瓦、加雅和阿季米尔等，全都位于阿克巴统治的疆域之内。对朝拜的印度教徒课以税捐，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宗教迫害。阿克巴这一措施极大地缓和了莫卧儿帝国统治集团与广大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此后，于1564年他废除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家，传统的政策是对非穆斯林课以人头税。这种宗教歧视政策，当时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是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感觉他们只是纳税人，而操纵朝廷大权的只是外国人。这两项改革——废除朝拜香客税和人头税，使国家财政每年减少几千万卢比的收入，但是它的政治

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只是由于阿克巴认识到，他心目中的政策——创造一个民族的国家——只能用这样的牺牲来获得，所以才实行这一影响远大的决定。”[①]

阿克巴同时任用印度教徒担任高级职位。曼·辛格担任要职就是这一政策的开端，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延续下去。曼·辛格后被任命为孟加拉的总督，继而被任命担负治理喀布尔的重职。喀布尔这样一个纯粹伊斯兰地区的事务也是由一个印度教徒去处理，在过去则是少见的。帝国官僚组织的下层，主要是印度教徒担任。但高级职位对印度教徒开门，却是阿克巴改革政策的结果。帝国对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打开了进取的大门，给他们以适当的荣誉和显耀地位的机会，目的是为了拉拢和驱使他们为帝国效力。阿克巴的朝廷的印度教官吏，并非全是如曼·辛格一样属于皇亲国戚的子弟。曾任财政大臣的托达尔·马尔则出身于中产阶级。他们提出“事业对才能开门”的政策，使莫卧儿帝国于一个世纪之内，广罗人才，同时缓和了对印度教徒上层的矛盾。这对莫卧儿帝国，由一个外来人的政权而变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的作用。

阿克巴的宗教政策，也体现在对各种宗教的相等态度上。他所建造的举行宗教讨论的教堂，最初只允许伊斯兰教的阿訇进去。但到1578年，宣扬别的教义的人也准许进去。各种宗教的讨论，常常在皇帝私觐的殿堂里举行。阿克巴对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同样以礼相待，并赐予他们各种称号。

关于阿克巴企图创建新宗教的揣测，只是反映了一些正统的伊斯兰教徒由于不满而对他的诬陷。阿克巴当然从未与伊斯兰公开绝裂，一直到死的时候他也是遵守伊斯兰教义的。他只是容纳

---

① 潘尼迦：《印度史纲》第153页，孟买1956年版。

了印度教、耆那教、祇教、耶稣教等的活动而已。《巴基斯坦简史》的作者拉希德写道："事实不难证明，阿克巴并没有摒弃伊斯兰教。他一直相信自己是一个穆斯林，并自信对于伊斯兰教的理解较之正统派和墨守成规的穆斯林更为深刻和真切。"[1] 但作者接着指责阿克巴容纳非穆斯林的力量，并据此武断地认为，这是莫卧儿帝国衰落的根源。他写道："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假若穆斯林忘掉了他们的独特性，而像阿克巴那样地去吸取其他宗教的对立的倾向和信条，那末，穆斯林国家还能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继续存在吗？阿克巴的政策不仅给穆斯林帝国带来了危险，而且也给穆斯林国家在次大陆上的继续生存带来了危险。"[2] 这种评价显然是带有宗教的偏见，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阿克巴在位时的莫卧儿帝国的扩展和巩固，是和他推行的政策有着重大的直接关系。当莫卧儿帝国从国外受到威胁时，阿克巴的怀柔政策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在喀布尔的君主穆罕默德·哈吉姆发动叛乱，并向莫卧儿帝国进攻时，它的威胁确实来自伊斯兰教徒。与此同时，孟加拉和比哈尔也发生了叛变，其领导者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苏丹王。但在反击这些叛乱者的军事行动中，阿克巴的新的同盟者没有动摇。拉其普特的军队不受收买，继续站在阿克巴一边。得到初步安定、休生养息的众多的印度教徒农民和其他教派的信奉者是支持阿克巴的。在这种情况下，"阿克巴毫不困难地打败了他的敌人。"[3]

喀布尔叛变平息后，莫卧儿帝国的发展不再受到威胁。帝国具有印度历史上一个王朝最广阔的领土。阿富汗是帝国的一部分，

---

① 拉希德：《巴基斯坦简史》第3卷第67页，卡拉奇大学出版部1967年版。
② 拉希德：《巴基斯坦简史》第3卷第67—68页。
③ 潘尼迦：《印度史纲》第155页。

它拥有温德亚山以北的全部领土。古吉拉特和孟加拉已被巩固地占领了；脱离印度王朝多年的信德也被合并了；克什米尔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北印度的全部领土，都包括在它的版图。它成为一个安定的国家，国库是充实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

在1605年阿克巴逝世后，印度历史学家潘尼迦对形势这样分析并作出结论，他写道：

“阿克巴留给他的继承者们三条主要的政策路线：维持民族的国家、对印度教人的怀柔和印度的统一。紧接其后的三代继承者的历史，只能在这些政策的观点上得到了解。查罕杰和沙·贾汉所执行的前两条原则，可能不是全心全意的，而奥朗则布则有意违反这些政策，其所得的结果如下所述。最后一条，就是印度的统一，是他们所从未背弃并从未完全获得成功的唯一的大原则。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并使伟大的奥朗则布丧命的无休止的德干战争，是印度统一原则的直接结果。”①

阿克巴死后，他的儿子查罕杰继承了王位。他执行了他父亲的政策，他虽然是一个正统的伊斯兰教徒，却时常访问印度教的教徒，并对他们表示尊重，他在回忆录中一再谈到这些情景。他和拉其普特人的同盟，更加巩固了。征服德干的政策，继续进行着。在他统治时期，朝廷的波斯化更加显著了。由于他的王妃努力·贾汉的父母是波斯人，她和王子所组成的集团在十几年中控制了朝廷，她的家庭对帝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1627年，沙·贾汉继承了查罕杰的王位。他更有力地继续推行统一德干的政策。德干的苏丹领地，曾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莫卧儿王朝。1633年，沙·贾汉开始了南方战事，夺取了道拉塔巴德，并俘虏了胡塞因·沙，他是这一苏丹王国的最后的国王。比

① 潘尼迦：《印度史纲》第155页。

贾普尔和高康达的苏丹依然存在，莫卧儿皇帝亲自来到德干，对这两个苏丹同时进攻。高康达的苏丹，承认了莫卧儿皇帝的最高地位。比贾普尔的苏丹继续进行抵抗，最后还是向莫卧儿帝国皇帝投降。沙·贾汉对这些地区逐渐地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宗主权。在对国外属地的关系上，他受到了挫折，他借口巴尔克是他世袭领土的一部分而进行干涉，但没有成功，经过一场消耗战之后，他不得不退回喀布尔。同时，坎大哈是印度的门户，却被波斯人夺去了。这两项事件，并没有影响他在继承的王朝疆土上的权力。

一百年的安定的政治生活和繁荣，使莫卧儿帝国成为很富有的国家。莫卧儿皇帝沙·贾汉统治时期（1627—1658年）人民生活反而异常痛苦。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榨，农民和手工业者经常失去生活资料。维持庞大官僚机构和供养军队的重担，全部落在他们的身上。皇帝大兴土木、建筑豪华的宫殿、寺院和陵墓，使他们的负担愈来愈沉重。与埃及金字塔，中国万里长城、巴比伦空中花园并列为世界建筑奇迹的印度太姬陵，就是沙·贾汉耗尽民脂民膏而建造的。它位于德里200多公里的古城阿格拉。陵园占地17公顷，是王后太姬和沙·贾汉的葬身地。陵园位于朱木拿河畔，动用了2万名工匠，耗费4千万卢比，历时20年才完成了这一壮丽的建筑。整个建筑以质量最好的磨光的白色大理石砌成。后两侧，建有长的平台，一座清真寺和供休息的殿台，显得协调、和谐。但在太姬陵建成不久，沙·贾汉国王被他的儿子篡了王位，囚禁于阿格拉古堡中。关于德里皇帝宫殿的奢侈豪华情景，尼赫鲁曾写道："拥有孔雀宝座的德里宫庭比凡尔赛宫更壮丽、更豪华，可是他和凡尔赛一样是建立在被贫穷打击着的、被剥削的人民身上的。古吉拉特和德干当时正流行着可怕的饥馑。"[1]

---

[1]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34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富丽堂皇的太姬陵和其他一些著名建筑物如德里的红堡、朱木拿寺院、莫迪寺院等众多的宏伟建筑物，体现了印度人民的高度智慧，是印度历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的辉煌壮丽为众多的外国游人所赞美。

第四节　印度封建关系的政治危机

印度封建制度的危机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上。这也反映了印度社会的尖锐矛盾。

沙·贾汉的继承者在他在世时即展开了争夺王位的火并。1657 年 9 月，沙·贾汉突然患病，争夺王位的战争就发生了。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的长子达拉·舒库，曾受命连任好几个省的总督，但他一直留居京都。德干总督、皇子奥朗则布握有重要的兵权，同时具有杰出的才能。这场冲突主要是在他们两人之间展开的。内战并非两人的个人冲突，而是两个有势力的封建集团的冲突。这场斗争的结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莫卧儿王朝上层分子半个世纪中的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

达拉·舒库得到印度教的祭司、官僚和富商等剥削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他的直接的军事支柱，则是莫卧儿帝国军队中的拉其普特士兵。他公开庇护传道讲学的婆罗门，提倡把印度教圣书翻译为乌尔都文。他又称是阿克巴的事业及其宽容异教政策的继承人。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主张莫卧儿帝国必须向西北方面开辟疆土，而侵入波斯、阿富汗和中亚细亚方面。这个扩张方向显然符合印度教大富商的利益。这些商人在这些国土间转运货物而获得优厚利润。他们希望保持这里的贸易权和进一步控制这些地区。

在伊斯兰教的权贵中只有少数人拥护他。他们的大多数则站在奥朗则布一边。在军人采邑制度遭受危机的情况下，占统治地

位的伊斯兰教贵族为了扩大他们的收入和地产，竟不惜掠夺印度教徒中的剥削阶层。奥朗则布则代表了他们的这种愿望，他以拥护伊斯兰教正统的招牌，保护宗教封建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他表现枉信宗教，拉拢伊斯兰教阿訇，利用宗教为其政治谋划服务。在对外扩张方面的政策，也与达拉·舒库相左，主张向德干高原和半岛南部扩张，为莫卧儿王朝贵族扩大采邑地区。奥朗则布挺身而出，拥护彻底征服德干高原，并继续了对比贾普尔和高康达的战争。

两者的矛盾，一触即发。在沙·贾汉重病时斗争便借机爆发了。在经过两次决定性的战役后，军事实力雄厚的奥朗则布把达拉·舒库彻底击溃了。伊斯兰教的封臣们几乎都转到奥朗则布一边。拉其普特的骑兵抵挡不住奥朗则布的火器和大炮。达拉逃到旁遮普企图组织抵抗。但被叛徒出卖，落在奥朗则布手里而遭到杀害。他的其余兄弟和男性亲属，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奥朗则布把他父亲囚禁在阿格拉堡垒中，一直等他死在那里。1658年，奥朗则布自立为皇帝，称号为“阿拉姆吉尔”，意为世界的征服者。

奥朗则布在位50年的统治期间，作为伊斯兰教大封建主的代表人物，极力为保存莫卧儿贵族的特权，挽救莫卧儿帝国的危机而施尽权计和暴力。奥朗则布首先企图把伊斯兰教贵族从他们对商业、高利贷资本所负的沉重债务中解脱出来，这是一条带有宗教动机的措施，因为债主几乎都是印度教徒，这本身带有迫害印度教徒的性质。奥朗则布不久又于1665年发布敕令，规定在内地关卡向印度教徒商人征收5%的关卡税，超过了伊斯兰教徒税收率的一倍。两年以后，伊斯兰教商人又完全豁免了这种关税。这些措施既没有增加国库收入，也没有阻止伊斯兰教贵族的腐化和破产。于是奥朗则布决定没收印度教寺院的大批财富，并把他们的土地没收为分封新采邑的土地。奥朗则布在1669年的敕令规

定："拆毁异教徒所有的学校和寺院。"同时，凡婆罗门依权享有的朝廷赐与的世田也都被剥夺了。

1679年，奥朗则布又恢复了阿克巴已经废除了的异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收使他的王朝增加了一大宗税款，仅古吉拉特省一年就收入500万卢比。这项课税使莫卧儿帝国全部农村人口中占80%的印度教徒增加了30%以上的负担。

奥朗则布在1671年下令，把大部分印度教官吏驱逐出国家衙署和税收机关，担任书记和会计员职务的必须是穆斯林。最后，印度教徒又被禁止穿戴丝绸，禁止坐轿、骑象和纯种马，并禁止携带武器。否则，即予以没收。只有王公们才被恩许例外骑乘。莫卧儿王朝这些蛮横措施，等于干脆抢劫，其目的是任意强夺印度教徒的资产。

奥朗则布为谋求伊斯兰教大封建主的利益，并企图巩固自己的政权，他的反印度教徒的措施不只是追求着经济目的，而且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但是结果都适得其反，被压迫的民族和受迫害的异教徒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纷纷起来反抗，农民起义、民族运动和教派活动，汹涌地开展起来，此起彼伏，接连发生。在这些起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印度教徒，他们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奥朗则布的政策，使伊斯兰教大封建主阶层与印度广大人民更加对立起来。同时，由于他对印度教僧侣、王公、官僚、商人和高利贷者采取了高压手段，把印度教徒的剥削阶层转化为他的敌人，迫使他们走上了反莫卧儿王朝的斗争道路。

莫卧儿帝国的政策使它同地方封建贵族，尤其是非伊斯兰教贵族的利益发生了深刻冲突，奥朗则布的统治使这种矛盾更加尖锐。莫卧儿王朝曾将很大一部分国有土地分封给扎吉达尔。帝国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受到削弱。奥朗则布不仅进行新的征服，而且通过削减封建的私有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国有

土地的面积。莫卧儿王朝为了彻底征服德干高原和南印度，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德干战争，消耗了极大的军事和财政实力。比贾普尔、高康达，于1686年、1687年先后并入莫卧儿帝国的版图。至此，除印度半岛南端外，莫卧儿帝国已扩张到印度全境。

伊斯兰教大封建主的地位，在奥朗则布执政时期更加显赫。依靠没收印度教封建主的土地，扎吉尔地产有了进一步扩大。而扎吉尔势力的加强，又助长了孟加拉、奥德、罗希尔坎德和海得拉巴各省的伊斯兰教大封建主的割据意图。结果，这些省份在18世纪前半期，实际上已脱离了莫卧儿帝国范围。

奥朗则布推行的土地政策，严重地侵害了非伊斯兰教中小封建主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马拉塔封建贵族、旁遮普的锡克封建主和首都附近的查特人封建主等，为了自身利益，就先后同莫卧儿王朝展开了斗争，并企图脱离莫卧儿帝国。

奥朗则布对农民的繁重剥削，使农民生活朝不保夕。奥朗则布统治时期征收的田赋已达收成的1/2。货币地租的实行，又加重了高利贷的盘剥。奥朗则布恢复了人头税，农民又增加了1/3的负担。莫卧儿军队在调往德干高原和西北边境时，沿途对农民大肆掠夺破坏，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了反抗不堪忍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伊斯兰教封建主的宗教迫害，马哈拉施特拉、旁遮普和德里—阿格拉地区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莫卧儿王朝的农民起义。许多出身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人物，领导了这些反莫卧儿帝国的起义。

奥朗则布实行的这些反动措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有害的恶果，也必然大大削弱莫卧儿帝国的政权。煽动宗教敌对的活动，不仅使印度教的农民群众，也使印度教的统治阶层，处在反对莫卧儿王室的敌对地位。奥朗则布的所有这些措施，在本质上反映了以伊斯兰教封建贵族为统治者的莫卧儿帝国在封建

制度严重危机面前的极力挣扎。

印度教徒不是奥朗则布反动措施的唯一牺牲者。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也为他的正统的逊尼派所排斥。同时对布赫拉人、查特人、拉其普特人和马拉塔人、锡克教徒进行迫害。

尼赫鲁写道："在一次内战并且在幽禁他自己的父亲沙·贾汉之后，奥朗则布继承了莫卧儿的皇位，……他是一个开倒车的人物，他尽管很有能力，很认真，他试图废止先王的施政。他是一个执拗的人，一个严肃的清教徒，并非是艺术或文学的爱好者。他向印度教徒征收那一向受人憎恨的吉滋雅（jlzriga）即人头税，毁坏他们很多的庙宇而引起他的大多数人民的愤怒。曾为莫卧儿帝国台柱的骄傲的拉其普特人也被得罪了。在北方，他刺激了锡克人……在接近印度西海岸的地方，他激怒了马拉特人。"[①]可见，奥朗则布实施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加深了莫卧儿帝国的危机，激起了印度各族人民反莫卧儿帝国的起义。

17世纪后半期，爆发了多次反莫卧儿帝国的起义。这些起义就阶级成分和性质而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反抗外族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争取本部族独立的起义。领导这些起义的主要是本部族的上层分子。属于这类起义的主要有1656年开始的马拉塔人起义；1666年至1678年的阿富汗人起义和1679年开始的拉其普特人起义。奥朗则布利用这些起义在政治上和组织领导上的软弱性和落后性，先后镇压了阿富汗人和拉其普特人的起义。可是，他对马拉塔人的起义却束手无策，最终导致了莫卧儿帝国的崩溃。

另一类起义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反封建斗争。

1669年阿格拉与德里地区爆发了查特人的起义。查特人是印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349页。

度西北部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民种姓。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时间。1671—1672年发展为最大的一次起义，起义队伍已经进攻到德里附近，宫廷大为震恐，竭力组织军队“围剿”，这次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起义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仍占领了许多地区，把它作为继续进行斗争的据点。

旁遮普的农民在锡克教的旗帜下爆发了起义。锡克教兴起于16世纪初的印度西北部，是印度教的一个异端。到17世纪末期，在锡克教派中占多数的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已成为锡克教运动中反莫卧儿王朝的重要力量。锡克教派的普通教徒希望保持早期锡克教的平等传统。受到莫卧儿王朝威胁的锡克教古鲁（宗教首领）哥宾德·辛格，在旁遮普教徒的推动下，大力改组了锡克教派，采取了更为坚决的斗争手段。他严厉批判了他的前几任所宣扬的“非暴力”教义，号召锡克教徒对莫卧儿帝国展开武装斗争。他在一个文告中说：“我们要粉碎压迫者莫卧儿帝国，那时我将把全国从白沙瓦到拉合尔交给我的锡克教徒们。”[①]

哥宾德·辛格（1675—1708）作为锡克教一位重要宗教领袖，唤醒教徒实行一种新的生活。辛格与印度教断绝了关系，实行内部的民主政策，废除卡斯特等级制度，并把权利交给锡克教徒，他们成为土地的主人，互相平等，以建立“真理的王国”。锡克教成为旁遮普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莫卧儿帝国的斗争。锡克教徒不但反对莫卧儿王朝，而且反对伊斯兰教封建主和印度教封建主。哥宾德·辛格领导锡克教徒屡次打退了莫卧儿王朝和印度教罗阇的联军。1708年哥宾德遇刺身死，他的继任者班达继续领导锡克教徒的斗争。

---

① M·A·马考利夫：《锡克族人的宗教及其古鲁、圣书及作者》第5卷第13—14页，牛津1907年版。

锡克教徒的起义对莫卧儿帝国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奥朗则布的继任者巴哈杜尔沙一世，联合德里、奥德、阿拉哈巴德等省的省督和中央大臣，临驾亲征。1710 年 12 月 5 日在萨杜拉附近展开决战，锡克教徒遭到失败。班达率余部退居到喜马拉雅山前地带活动。

1712 年，皇帝巴哈杜尔沙死去，他的几个儿子在德里忙于进行争夺王位的激烈内争。莫卧儿王朝无暇顾及锡克教徒，班达又出现在旁遮普，占领了萨杜拉。莫卧儿军队又于 1715 年间对锡克教徒进行了残酷镇压。班达和其他锡克教军事将领被俘而处死。但到 18 世纪 30 年代，旁遮普又掀起了反封建压迫的农民运动，他们逐步占领了旁遮普各重要地区，并建立了政权。1765 年锡克教军事领袖会议，宣布旁遮普独立，由锡克教徒管辖。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的查特人的起义，是发生在莫卧儿帝国心脏地区——德里和阿格拉地区的人民运动。查特人是印度西北部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民种姓。德里、阿格拉地区的查特人信奉印度教。查特人第一次起义是在 1669 年，开始于朱木拿河岸的木特腊县，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三年后又爆发了新的大起义。参加这次起义不仅有查特人，还有农村中最下层的“不可接触者”。他们掌握了地方政权，并组织向德里进军。莫卧儿王朝恐慌万状，配备了大炮等火器装备的军队前往镇压。1686 年查特人又举行了第三次起义。起义者切断了德里和阿格拉间的通道，袭击了这两座城市，消灭了驻军和收税官。莫卧儿王朝竭尽全力，予以镇压。在 1720 年王朝争夺王位之际，查特人又乘机袭击了皇帝穆罕默德沙的军营，缴获了一部分御用辎重。查特人不断地对莫卧儿帝国当局和扎吉达尔进行斗争，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朱木拿河右岸很大一部分地区，成为莫卧儿帝国的心腹之患。

马拉塔、锡克教徒和查特人的起义，使莫卧儿帝国在德干高

原和旁遮普以及腹地的战争常年连绵不断，耗尽了王国的财政和军用资源。各地的起义，使整片整片的国土脱离了莫卧儿帝国，国库收入减少，赐给扎吉达尔的国有土地锐减。封建主们也离心离德了。人民运动和各地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第五节 马拉塔族的人民起义

在反莫卧儿帝国的斗争中，英勇顽强的马拉塔族的人民起义在削弱和瓦解莫卧儿帝国的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马拉塔人居住在印度西海岸以浦那为中心的一带地区，他们的国家称为摩诃剌佗。这里是以印度斯坦和德干到阿拉伯海的重要商道和军事要冲。17 世纪初期，摩诃剌佗被莫卧儿帝国和比加浦尔的封建主所瓜分。人民处在外族封建主和本族封建主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

在公社逐渐解体和贸易初步发展的基础上，马拉特人的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开始走向统一，产生了形成近代民族的前提条件。17 世纪中叶，马拉塔人掀起了反对外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主力是马拉塔农民。而起义的领导权则掌握在当地封建主之手。

西瓦吉是马拉塔政权的奠基人，在马拉塔人的政治统一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627 年 4 月 6 日他出生于浦那附近的一个山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巴特勒（马拉塔农村公社的首长）的职位和大批财产。他的目的是尽量扩大自己的领地，他利用收买手段和军事进攻等方式，夺取了邻近的一些要塞，扩大了自己的土地。

1657 年，西瓦吉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他力图把摩诃剌佗统一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从 1657 年起他领导了马拉塔人民反对

莫卧儿和比加浦尔压迫的斗争。马拉塔广大农民积极地参加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以西瓦吉为领导的马拉塔人的起义获得了重大胜利。

当1657年奥朗则布开始向比加浦尔进军时，他以莫卧儿王朝的德干总督的名义，企图拉拢西瓦吉共同打击比加浦尔。西瓦吉识破了奥朗则布的策略，打击比加浦尔就是援助了莫卧儿王朝而削弱了自己。他拒绝了奥朗则布的拉拢。

当奥朗则布进攻比加浦尔时，西瓦吉袭击了莫卧儿帝国的德干辖地的西南部。奥朗则布闻讯后派兵攻打西瓦吉，但是没有取胜。西瓦吉则在此后的战争中征服了比加浦尔的一些地区。奥朗则布返回德里参与夺取王位的内讧，暂时中止了与比加浦尔的战争。比加浦尔利用时机进攻西瓦吉。西瓦吉利用外交谈判的计谋，在谈判的时候，非常迅速地对比加浦尔军队的要冲进行突然的袭击，他亲自杀死了比加浦尔的司令官，击溃了它的军队，进而取得了对比加浦尔战争的胜利。

奥朗则布即位后，立即派他的叔父为德干总督，继续对马拉塔人作战。莫卧儿军队于1660年初占领了浦那以及另外一些要塞。西瓦吉又利用时机同比加浦尔订立了休战协定，从而使他可以放手同莫卧儿帝国作战。

西瓦吉以勇敢、神速的战术，粉碎了前来征剿的莫卧儿王朝军队。1663年4月的一个夜晚，西瓦吉袭击莫卧儿总督兵营的中心，刺伤总督本人，然后撤退。这次夜袭，大大鼓舞了马拉塔军队的斗志。1664年1月，西瓦吉又袭击了富饶的苏拉特港，夺取了大量的战利品。

西瓦吉的斗争也遭受到挫折。1664年他的主力被王朝军队包围，突围失败，西瓦吉被迫进行和谈，结果签订了和约，西瓦吉被迫让出23处要塞和税收达1600万卢比的土地。他仅保留13座

要塞。西瓦吉被王室军队监禁，奥朗则布准备把他解往西北边境，暗中杀害。

西瓦吉在途中逃跑，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养精蓄锐，在三年恢复期间，巩固和加强了自己国家的力量，积蓄了同莫卧儿王朝进行斗争的新的力量。

1670年西瓦吉重新对莫卧儿王朝发动了战争，收复了一些要塞，并再次攻破苏拉特港，得到了大批战利品，他依靠这些物资继续进行战争，又多次挫败了莫卧儿军队，把相当大的一片领土重新收归在自己的政权之下。1671—1673年间西瓦吉反抗莫卧儿的战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于1674年6月在拉其加尔举行了隆重的典礼，自行加冕，僭用了“查特拉巴蒂”即独立的国王的称号。“这样一来马拉塔人便成了一个由独立君主治理的民族了。”[①]

处于危机的莫卧儿王朝，由于西北边防告急，不得不与西瓦吉达成停战协议。西瓦吉则利用时机控制邻近的公国。他与高康达的苏丹缔结了联盟，后者每月向他支付45万卢比，并派出5000人的军队归西瓦吉驱使。西瓦吉并在南方进行掠夺战争。他于1677年占领了金吉、维洛尔和其他一些重要地方，一直推进到了卡达洛尔。1677年和1678年的作战使他在加尔那迪获得了年产值达800万卢比的领土，还包括一百多个要塞。西瓦吉于1678年4月取道迈索尔回到了潘哈拉，途中他攻克了迈索尔的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

马拉塔人在反莫卧儿和比加浦尔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西瓦吉的军队主要是由马拉塔农民组成，并加强了军队的组织和训练。西瓦吉以义务兵役制为建军的基础，从而废除了雇佣兵役制。征兵时，西瓦吉亲自检查新兵，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他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的军队主要是由轻装步兵和轻装骑兵组成，极其适合进行游击战争和山地军事行动。部队所需要的一切用品全由公社供给，只有西瓦吉的近卫军才由国家负责装备。贫苦的农民，艰苦耐劳，富有战斗力。他的军队不为沉重的武器和大量辎重所拖累。西瓦吉的军队有着非常严格的纪律，任何人都不准带妇女到军营来，违者处死。每个军人的军事缴获物必须上缴国家。一般战士和军官在生活上的差别也不大，休息时都是以马鞍作枕头。一个在1677年曾目睹西瓦吉军队的人描写道："西瓦吉的军营里没有任何一点华丽的地方，也没有行李和妇女的累赘。整个军营只有两顶帐幕，而且还都是很薄的；其中一顶是西瓦吉本人用的，另一顶是给他的大臣用的。"这样的军队行动迅速，富有战斗力的。相反，莫卧儿帝国的军队，却异常庞杂，除了正式的骑兵和步兵之外，还有"堆积如山的天幕、烹具、衣服、器具，甚至还有妇女，因此有象、骆驼、牛、马、挑夫、搜索粮草者，随军卖酒食的人，各种商人和仆从，都是跟随军队的。"①

西瓦吉非常重视侦察工作，及时了解敌军动向，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他措施得当，增强现有的240个要塞的防御能力，这些要塞控制着一切重要的山口并监视着最重要的干路。西瓦吉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海军舰队，这支舰队拥有大小船只400艘。

西瓦吉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他在内政方面的进步政策所取得的成果的反响与保证。他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巩固中央政权，废弃扎吉尔制度而代之以官俸，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等等。这些政策促进了马拉塔人国家的强盛，并在政治上统一了马拉塔部族。

西瓦吉的军队是以马拉塔农民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实行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状况的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542页。

面：

第一，他取消了各区世袭统治者对农民的收税权，而把这种权力委托给自己的官吏，这些官吏的薪俸是由国库开支的。这样便杜绝了收税时的舞弊行为。同时实行土地台帐制度，促使了舞弊行为的减少和一时的杜绝。所有这些措施使农民的地租从莫卧儿统治时占收成的50—60%，缩减到30—40%。由于中介人的减少，国家的收入并没有减少。

第二，他建立了举国的中央政权，因而停止了国家的内乱，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好转。

第三，西瓦吉停止分封采邑，而给自己的军官和官吏发放薪金。

第四，西瓦吉是一个印度教徒，他对其他各种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态度，基本上一视同仁，对妇女也不采取歧视态度。

马拉塔人在西瓦吉的治理下，恢复并保卫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也沉重地打击了莫卧儿帝国。

马拉塔国家的强大是与西瓦吉的生平和成就分不开的。《印度通史》的作者写道："他一生不可磨灭的成就是把马拉塔人连结成一个国家和他所灌输给他的人民的新精神。用他同时代的一个人的话来说，他把由九十六个部族所组织的马拉塔国家提升到了前所未闻的崇高地位。他创造了一个行政效力极强的团结的军事国家。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但却容忍一切教派，以骑士风度对待妇女，并在军营中实行一种严格的道德强制，这甚至连敌对的评论家都赞扬他。"①

马拉塔人的国家给予处于极盛时代的莫卧儿帝国以沉重的打击。此后，马拉塔人曾给英国殖民者的侵略以有力的反击。

---

① 《印度通史》第3册第654页。

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发动了对马拉塔的多次进攻，但他改变不了马拉塔人国家的存在，只能是瓦解了莫卧儿帝国本身的统治。1707 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已不再是一个政治统一体了。许多邦如奥德、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海德拉巴、拉其普特等地区，都先后宣布独立。来自阿富汗的罗希人，在德里附近占领了一块地方，建立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公国。查特人起义的结果，也建立了几乎独立的国家。

西瓦吉死于 1680 年 4 月 3 日。西瓦吉的继承者，破坏了西瓦吉的改革措施，也建立了扎吉尔军事采邑制度。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马拉塔人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战争中发了财的军事领袖和公社上层分子，变成了封建主，他们占有大片土地，马拉塔国家终于陷入了封建混乱局面。逐渐地，最大的封建主在管理国家方面控制了大权，他们把马拉塔封建主的掠夺野心转移到对外侵略上去了。这样，便开始了马拉塔封建主的侵略战争。腐朽的莫卧儿帝国抵抗不住马拉塔封建主的掠夺和打击，许多土地被马拉塔封建主所兼并。1717 年以后，整个德干的贡物已为马拉塔国家所有了。

第六节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帝国的衰落

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在危机面前，力图以发动新战争和掠夺新的土地来挽救已经显露出来的国家衰落和瓦解的情势。奥朗则布执政的后期，像他当皇帝的初衷一样，始终把他的扩张政策的矛头指向南方，他顽固地想占领整个印度半岛的南端。他曾吞并了比加浦尔和高康达，把自己的疆域大大地推向南方。

奥朗则布的势力在 1689 年达到了顶点，北印度和印度半岛都归他管辖。奥朗则布似乎征服了一切，但实际上他却丧失了一切。

他的顶点也是他崩溃的开始。莫卧儿帝国这样一个松散的政体，一个人或一个中央机构已经无法统治了，边远的地方他鞭长莫及，而反对他的战火，又从四面八方烧起。德干高原无休止的战争耗尽了帝国的国库，士兵因欠饷而骚动。德干的不祥局势，像溃疡一样成为断送奥朗则布的致命伤。

整个德干在形式上是处在莫卧儿的政权之下，但是1700年后，许多德干地区的莫卧儿省份实际上已成为马拉塔的附庸。奥朗则布发动了所有的力量向马拉塔进攻，进行报复。马拉塔人却开始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每一个马拉塔人的将领带着自己部队，不断袭击莫卧儿王朝的军队，致使王朝军队穷于应付，一筹莫展。奥朗则布到处都碰见敌人，像一个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横过印度半岛，从孟买到马德拉斯，他们像风一样不可捉摸，任何头目的被俘或据点被占都不能使这种抵抗的力量陷于枯竭。"[①]奥朗则布一个又一个地包围了马拉塔人的要塞。为了占领一个要塞，他耗费了许多时间、人马和金钱，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占领了一切要塞，并不等于占领整个国家，不意味着马拉塔人已被征服，而且不消几天这些要塞又被马拉塔人重新夺回。懦弱的莫卧儿军队围攻要塞的战役，把自己死死拖住，它在围攻八个要塞时，竟花费了五年半的时间。这对莫卧儿王朝来说，简直成了一场愚蠢和毫无希望的战争。

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之后，马拉塔人转入了对莫卧儿的反攻。马拉塔人不仅进攻莫卧儿在德干的领地，而且还占领了莫卧儿帝国的马尔瓦和古吉拉特。奥朗则布被无法取胜的马拉塔战争拖得精疲力尽，并且患了重病。莫卧儿的疲惫不堪和士气沮丧的军队，终于开始撤退了。马拉塔人紧紧追赶。在极度紊乱和紧张痛苦之

① 转引自：《印度通史》第3册第692页。

中，他感到自己完全失败了。马拉塔人集结的反攻力量占有绝对优势，莫卧儿已无力阻挡。1705年奥朗则布撤到了阿马德纳加尔，沮丧失败的情绪笼罩着他，他自己唉叹："我在各处所进行的战争都充满了茫然无措、惶慌无已的情绪，正如像水银一样动荡不定、行将踏上最后旅程的我本人一样。"这位显赫一世的人物，就这样"孤身而来，孑然而去"，死于1707年2月20日。

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已不复为一个政治统一的实体了。许多强大的总督宣告独立。奥德、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却宣布脱离莫卧儿帝国，拉其普特公国也宣布独立。

由阿富汗来的查特人在距离德里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国。莫卧儿帝国历代皇帝都把在山地勇猛好战的查特人招来服军役。他们因服军役取得了德里东北的大片土地。后来查特人靠剥削印度农民，逐渐变成了封建主。他们利用莫卧儿国家衰弱的时机，在阿富汗同族人的帮助下，全部占领和统治了这个地区。

在奥朗则布的继承者当政时，锡克教徒继续同莫卧儿王朝进行着激烈地斗争。战争在1710——1716年间具有特别巨大的规模。起义由农民出身的班达领导，他善于把农民团结在反对剥削、争取实现理想王国的旗帜之下。起义席卷了从德里到拉合尔的广大地区。

起义取得重大胜利的原因，除了莫卧儿王朝的腐朽统治，引起矛盾的激化外，在发生起义的地区，有着浓厚的农村公社的残余。热爱自由和勤劳的旁遮普农民，勇敢地反抗封建主的残酷压榨。这个地区的农民，一般都掌握武器，同时他们也熟悉军事技术，他们常常被迫起来反抗外来的侵略，保卫自己的权利。手工业者受到沉重打击，他们同农民一起投入起义的队伍，壮大了起义的规模。

这次孤立的起义，没有得到其他地区农民的支持，他们分散

的，以宗教信仰为目的的起义，最终是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失败了，但旁遮普实际上脱离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起义的讨伐者也乘机独立于莫卧儿帝国。

貌似强大的莫卧儿帝国，到奥朗则布死后，已呈现着矛盾重重、趋于解体的状态。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内各方面的反王朝起义，产生了极重大的后果。各省的苏巴达尔形成日益严重的离心力，他们的辖区成为实际上脱离莫卧儿帝国的独立王国。莫卧儿帝国的解体，表现在自奥朗则布死起，到波斯纳迪尔沙入侵（1738—1739）止的30年间，更为严重。

奥朗则布死后，他的几个儿子经过两年内战的残杀，由巴哈杜尔沙登上了王位（1707—1712）。这个皇帝为了酬谢支持他争夺王位的人和进一步争取他们的支持，把莫卧儿帝国在全盛时代所积累的一部分珍宝，分赠给伊斯兰教大封建主，并从皇室地产中划出一部分土地赠给他们。巴哈杜尔沙这一政策的后果，造成国库空虚，维持军队和机关的经费枯竭。大封建主的实力反而加强。巴哈杜尔沙死后，莫卧儿王室的倾轧争夺更为激烈。新皇帝是一个无能的贾汉达尔沙，他成为首相集团的傀儡。后来贾汉达尔沙被推翻，傀儡皇帝法鲁克·西耶尔被扶上王位（1713—1719)。王朝的内讧有增无已。

马拉塔人国家的兴起，是莫卧儿王朝的严重威胁。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是马拉塔大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军人采邑制度形成的过程。西瓦吉的反莫卧儿的斗争和国内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同时也成为1680年西瓦吉死后发生内讧的根源。早在奥朗则布征服了比加浦尔和高康达以后，便倾其全力对付马拉塔人，利用马拉塔人的内讧，占领了它的大部分土地。但莫卧儿王朝并不能征服马拉塔。18世纪初期，马拉塔人封建内讧已告结束。在莫卧儿帝国日益衰落，它的边陲形成的一些新国家还不强盛的时

候，造成了马拉塔向外扩张的时机和条件。马拉塔人的武力扩展到了德干高原和印度斯坦很大一部分地区。马拉塔人几次战败了海得拉巴的省督，夺取了他的一部分领地，并在北方占领了古吉拉特、比哈尔和冈德瓦那，同时袭击了奥德。1737年，马拉塔骑兵在巴吉·劳亲自指挥下出现在德里城下，掠劫了京畿地区。

1738—1739年，波斯的纳迪尔沙入侵印度西北部。莫卧儿帝国由于必须反击马拉塔人的袭击，不得不撤回西北边境的大部分驻军。纳迪尔沙乘虚而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喀布尔的苏巴达尔的军队。随后，他的军队便兵不血刃地越过旁遮普，直逼帝国首都。莫卧儿宫廷各封建集团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内争，根本无力顾及外来的侵略，最后才勉强调动了8万军队。但在军队尚未全部集结完以前，就仓促地与纳迪尔沙交战。1739年2月24日发生了决定性的战役，印军遭到大败。莫卧儿帝国皇帝穆罕默德沙向纳迪尔沙投降，开门揖盗，甘为藩臣。1739年3月20日，纳迪尔沙的军队进入莫卧儿帝国首都。侵略军在德里大肆抢劫和屠杀，被害者达2万余人。珍奇宝物和大宗财物都落到外国侵略军之手。纳迪尔沙迫使莫卧儿帝国签订了屈辱性条约，吞并了喀布尔和印度河右岸地区。1739年6月，波斯军队由德里撤回，同时劫走数十名印度工匠。

纳迪尔沙的入侵和他对印度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打击和浩劫，使莫卧儿帝国濒于灭亡。莫卧儿帝国无力阻止各大封建主的割据。莫卧儿王朝的实际权力仅及德里、阿格拉、信德、旁遮普和克什米尔等省。许多人口众多的大省份、如孟加拉、奥德、海得拉巴和罗希尔坎德等，都脱离了帝国。

18世纪中期，北印度各国为最后分割莫卧儿帝国的剩余国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奥德和罗希尔坎德两国的统治者，是这一斗争的主要对手。由于相互兼并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使北

印度各国受到削弱。四分五裂的印度，成为阿富汗统治者艾哈迈德沙·阿卜达利最好的猎取对象。

在短短几年连续几次入侵印度之后，1757年艾哈迈德沙又长驱直入地征服了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和锡尔欣德。同年他又闯入了莫卧儿帝国的首都。他对德里的掳掠较之纳迪尔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国界已扩展到德里以西85公里的地区。

印度南部的政治局面是不统一的，有几个自行独立的国家和土邦，其中最大的是马拉塔联盟和海得拉巴邦。18世纪40—50年代，马拉塔人把扩张重心完全转到印度北部，对莫卧儿帝国的领土肆意进行征服。50年代下半期，马拉塔人开始对北印度发动新的进攻，这与以前的偶然性的袭击不同，它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进攻。

1758年，马拉塔人占领了德里，恣意劫掠了全城。马拉塔军队同旁遮普军队协同作战，把阿富汗军队赶到北印度河对岸。

艾哈迈德沙不甘心丧失比阿富汗各地区的税收大许多倍的印度领地。1759年底率四万大军再次侵入印度，在一些印度地方统治者的支持、协助下，他于1760年1月击溃了北印度各个马拉塔酋长的军队，再度占领了莫卧儿帝国的首都。阿富汗人又恢复了在信德、木尔坦、锡尔欣德和旁遮普的政权。

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频繁的浩劫式的外族入侵，使腐朽的莫卧儿帝国处于衰亡的前夜。

第七节 英国占领前夕的印度

莫卧儿帝国后期，马拉塔人还在继续扩张他们的势力。西瓦吉死后，马拉塔处于混战状态，马拉塔人却仍然在继续夺取莫卧儿国家的一些地区。18世纪初，西瓦吉的改革渐渐被破坏了。战

争中发了财的军事统帅，公社的首领等上层分子，由于西瓦吉的继承者采取了建立军事采邑制度而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整个国家被划分为许多封建主的领地。

马拉塔人虽然征服了许多地方，他们依然采取采邑制度，与莫卧儿王朝的扎吉尔制度没有什么区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没有改变被征服地区的社会制度，只是交替一下封建统治的上层分子而已，马拉塔的封建主和婆罗门官吏排斥了莫卧儿帝国的总督和扎吉尔。马拉搭封建主在这些地区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一般都是既不同种，又不同文，而各大封建主之间的联合，也是建立在对外侵略获得权益的基础上。实质上，各地的统治者与马拉塔的最高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分离主义。这就是马拉塔人的统一事业未能完成以至最后失败的基本原因。

1713 年巴拉吉·维斯万纳特成为西瓦吉之孙沙胡的首相，称为“帕什瓦”，而掌握了实际大权。经过 1689——1712 年的混乱、贫弱和完全无政府状态的骚乱之后，巴拉吉开始实施一个新的政策，他联合了很大一部分封建主，在新的掠夺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了马拉特联邦。他把马拉塔封建主间的相互倾轧的掠夺，引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去。

巴拉吉统治时期，马拉塔不仅兼并了很多土地，同时从莫卧儿帝国那里得到了在整个德干高原征领贡物的权力。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以马拉塔封建主为首的许多新公国，如中央印度和奥里萨的那格浦尔公国，马尔瓦的瓜廖尔公国和印度尔公国，古吉拉特的巴罗达公国等。各公国之间结成联盟，首领为“帕什瓦”，控制着军事和外交大权。

巴拉吉于 1720 年死去，他的儿子巴吉·劳继任“帕什瓦”。在他的统治下，马拉塔的占领区的规模特别广阔。巴吉·劳把他的

主要目标集中在征服莫卧儿帝国上。《印度通史》的作者写道："他的主张概括为下列的话：'让我们打击枯萎的树干，树枝就会自己掉下来。'马拉塔的国旗应当从克里希讷河飘扬到印度河。"[①]

巴吉·劳在占领了大片土地后，在1737年逼近德里，然而他没能攻克德里。马拉塔人转向东方，占领了大片土地并冲向孟加拉湾。在南方马拉塔人粉碎了海德拉巴王公的军队，并向他索取了巨额贡税。以巴吉·劳为首领的马拉塔公国空前扩大了，他以"帕什瓦"的名义，担任联军总司令并决定着对外政策。

巴吉·劳1740年4月去世。他在1721年以来的统治期间，表现出他是"最有才干的马拉塔人"。[②]《印度通史》作者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巴吉·劳不仅是个伟大战士，同时也是个了不起的将军。他曾被人恰当地描绘为'一个天生的骑兵统领'。从他的行动中，我们找到了一种速度与奇袭的稀有的结合。他具备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所有的一切品质——威望、顽强、精力、勇气、政治上的机敏。他的德干建立了马拉塔的霸权，并在北印度奠定了政治领导权的基础。可是他并没有努力制止危险的封建倾向，这在他们继承者们的手上终于毁灭了马拉塔人的事业。"[③]

正当马拉塔人沉重地打击莫卧儿帝国的时候，波斯国王纳迪尔沙由西北侵入印度。腐朽的莫卧儿帝国经不起波斯入侵军的一击。莫卧儿军队的组织弊病百出，一个骑兵要骑自己的马匹，如果这匹马被杀死，他的一切都光了，马是他的全部资本，为了保护马匹，常常从阵地逃走。军队的恶习、无纪律、不团结、奢侈、

① 《印度通史》第3册第739页。

②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54页。

③ 《印度通史》第3册第743页。

道德败坏等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1739年2月波斯入侵军大败莫卧儿军队，占领了德里，莫卧儿皇帝穆罕默德·沙(1719—1748)投降。波斯军队大肆抢掠德里。穆罕默德·沙被迫把印度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波斯。纳迪尔沙这次入侵对莫卧儿帝国是一次沉重打击。马克思写道："纳迪尔沙满载财宝回到故国，听任莫卧儿帝国濒于完全灭亡的边缘。"①

从1748年起，在印度北方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敌人阿富汗人。纳迪尔沙的波斯国家没有巩固的基础，他死后不久他的国家就崩溃了。阿富汗又成为独立的国家。阿富汗人开始兴起，不断侵入印度北方，经过几度会战，阿富汗人征服了整个旁遮普、克什米尔等地。后来又占领了德里，把德里抢劫一空，并把莫卧儿皇帝变成了自己的政治工具。

早在1751年，法国殖民者已将海德拉巴屈从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击溃过南征的马拉塔人。这样马拉塔人不得不把对外扩张的锋芒集中于印度斯坦，发动对德里和旁遮普的进攻。1758年，马拉塔人占领了德里，并向拉合尔进军；于是马拉塔人和阿富汗人便针锋相对地对峙起来。决战在他们之间展开了。

马拉塔人组织了对阿富汗人的进攻，对北方进行了两次远征。第一次是在1754—1756年。这次远征取得了恒河——朱木拿河地区的土地。第二次远征是在1757—1758年。这时阿富汗的艾哈迈德沙·阿卜达利已经第四次侵犯印度，并攻入了德里，割去了旁遮普和木尔坦两地。阿卜达利撤离之后，马拉塔人接踵而至。马拉塔军队一度推进到开伯尔山口。这次远征并无意义，财政上庞大的开支，造成880万卢比的赤字，并酿成对阿富汗的最后决战。

此时的印度已成为激烈混战的场所。一方面是阿富汗人和马

---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56页。

拉塔人的激战，另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之间即英国殖民者和法国殖民者之间的激烈争夺。

马拉塔人为了把阿富汗人驱逐出印度，恢复昔日马拉塔人的威望，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投入这次战役的人数之多和装备之庞大，是马拉塔人过去或以后所没有的。马拉塔军队约有30万之众，400头大象和大量的大炮。由帕什瓦的堂兄弟沙达西夫·罗·鲍统率。

可是，这时马拉塔军队的战斗素质，已远不如西瓦吉时代了。马拉塔军队几乎与昔日的笨重和行动迟缓的莫卧儿军队毫无区别。军队的纪律也非常松弛。马拉塔军队已丧失了往日的灵活性、善于进行小规模战斗、军民的同一民族成分等优点。部队虽然庞大，但不具备正规军的特点，是乌合之众的不同种族的雇佣兵。特别是它的军事统帅是一个庸碌无能的蠢才。

阿富汗人的军事指挥则较为灵活机动和巧妙。他们首先让出德里，军队退到朱木拿河畔，利用泛滥的河水阻挡敌人，而度过了1760年的雨季，同时起到了滞阻敌人的作用。在马拉塔军斗志松懈、供应庞大而紧张的情况下，阿富汗人寻机出击。1760年10月，艾哈迈德沙·阿卜达利亲自率领骑兵泅水渡过朱木拿河，向马拉塔军进击。沙达西夫·罗·鲍仓促应战而失利，被迫退却。他不向自己的根据地南方撤退，而向西退往帕尼帕特平原。马拉塔军在那里被阿卜达利包围，同自己的基地失去了联系，被挤压在无水的塔尔沙漠之中。

长达三个月的围困，马拉塔军队的粮食供应耗尽了，马匹与战象也缺乏饲料要饿死了，战斗力遭到巨大损失。被围困而饥饿的马拉塔军队决心要拚死一战，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沙达西夫·罗·鲍孤注一掷，冒险突围。

马拉塔人的军队，这时重蹈了莫卧儿军队的覆辙，军容华丽，

人孚众多，他们的战斗力远不及西瓦吉时代的马拉塔军队，却像莫卧儿军队一样的臃肿庞杂。马拉塔人在行军中带着自己的家属和大批的私用仆人，非作战人员众多，口粮消耗迅速增长。仆人和服务部队的数目超过战士的一两倍。军队携带许多重型辎重车，从而减低了军队的机动性。

1761年1月14日马拉塔军队实行突围，疲惫不堪的马拉塔军队除有众多的军队和大炮外，还有十个旅是按欧洲的方式训练和装备的。但是军队缺乏应有的训练和素质。军队的司令官沙达西夫・罗・鲍，是一名30岁的青年，曾在海德拉巴的战争中大显身手。但他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不仅军事指挥上拙劣，同时忽略了必要的外交活动，战争前夕没能把贾特人、拉其普特人以及奥德首领作为同盟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事前阿富汗军队强渡朱木拿河，并向前挺进与马拉塔人迎战，阿卜达利率军从侧面绕过了马拉塔的军队，沙达西夫・罗・鲍采取了错误的决定，把他的军队撤到西方，他想以此切断阿富汗军队的后路。而事实上，马拉塔军队被阿卜达利包围在帕尼帕特平原上，切断了他与南方基地的联系，全部被压制在干燥的塔尔沙漠上苦苦挣扎，马拉塔人由于饥饿弄得士气沮丧不堪。

激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参加战斗的兵力是非常庞大的。阿富汗方面有6万军队，马拉塔有30万人，但参加战斗的士兵只有4.5万人。14日拂晓突围开始，战斗打响，一直进行到下午三时，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只有极少数马拉塔人逃了出去外，约十万马拉塔人被击毙，1.8万人被俘，沙达西夫・罗・鲍也在战斗中丧命。阿富汗人夺取了几千只满载战利品的骆驼、大象，5万匹战马和20万匹役畜。

马拉塔人在帕尼帕特战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阿富汗军队的有效战斗人数，大大超过马拉塔，武

器装备有轻便的火炮，射击灵活，安装方便，军队有统一指挥和严格纪律。相反的，马拉塔军队战斗成员少，长期的粮食、饲料缺乏，许多马匹都死掉了，大大削弱了它的骑兵战斗力。马拉塔军队的指挥十分紊乱不堪，许多指挥官离开战场去德里保护家室，军官中经常发生争执，使整个指挥失灵。马拉塔没有准备后备力量，阿富汗一经压迫马拉塔骑兵队时，由于缺乏援军，而一击则全线崩溃。

"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对马拉塔产生了严重后果，马拉塔帝国的事业遭到重创，同时它丧失了大量人口和财富。"[1] 阿富汗人获得了胜利。帕尼帕特战役给了马拉塔人最沉重的打击，使他们陷入瘫痪状态达十年之久。

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是在印度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阿富汗人与马拉塔人的战争，给印度留下了严重后果。在印度面临着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时期，这场战争不仅使马拉塔人的军事实力受到严重损失，使参加这场战争的各公国的军事实力也受到严重的损失。直到 1769 年马拉塔人经过恢复后又一次进军印度斯坦，企图再度征服北印度，但为时已晚。英国人已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站住了脚根。这时英国人在印度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马拉塔人在帕尼帕特战役的失利，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更容易征服印度。莫卧儿帝国已解体，整个印度北部处于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向印度斯坦腹地扩张自己的统治势力，已经不存在大的障碍了。

"帕尼帕特的第三次战役[2] 必须当作印度史上最有决定意义

---

① 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第 552 页，1958 年伦敦版。

② 印度历史上在帕尼帕特发生过三次大的战役，第一次是 1526 年巴布尔对劳迪王朝；第二次是 1556 年阿克巴对阿富汗人喜穆的战争；第三次即是 1761 年的战役。

的事件之一。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使马拉塔帝国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帕什瓦的威信也猛烈动摇。马拉塔人丧失掉马尔瓦、拉其普特以及恒河与朱木拿河地区；在德干，乌德吉尔的胜利果实也失去了。”① 印度的史学家是这样评价的。事情却远不至如此。帕尼帕特战役的结果对印度具有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写道：“马拉塔人从未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② 阿富汗人虽然打败了马拉塔人，然而它自己无力反击英国殖民者；阿富汗人打击当时印度各公国中比较强大的足以反击英国殖民者的马拉塔，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并把它变成殖民地。马克思分析了印度历史上这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写道：“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打倒，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③

---

① 《印度通史》第3册第749页。

②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页。

第二章　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第一节　西欧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

印度自古以来就与西方和东方进行着大宗贸易。印度精致的手工业品、纺织品和名贵的香料，以及各方面的繁荣富庶，一直吸引着西方人。印度的商品，每年有大量出口。最初，把欧洲商人吸引来的是印度的香料和其他商品。自从 15 世纪末，由于通向印度的新航路发现了，于是物产丰盛的印度，立刻成为欧洲殖民者侵略的对象。

首先来到印度的西方殖民者，是发现新航路的葡萄牙人。1498 年 5 月 17 日，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水手们到达印度海岸，在卡利卡特登陆。发现一条由欧洲直接通往印度的海路是件大事，葡萄牙国王因而于 1502 年获得罗马教皇批准的“阿比西尼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航海、征服及通商之王”的称号。1510 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的果阿，葡萄牙人巩固了在这里的统治，提高了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并把它成为在印度侵略扩张的大本营。16 世纪初，他们已经在印度西部与南部沿海一带占领了许多地点，并掌握着西欧与印度之间的印度洋的贸易霸权。

这些海外来客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贸易。他们用武力打击与他们竞争的伊斯兰教商人的船只和乘客。葡萄牙人在印度虽然只拥有微不足道的兵力，但是印度在军事方面特别是海军力量上异常软弱，甚至在莫卧儿帝国全盛时期也没有能够把葡萄牙人从其海岸的强盗巢穴中驱逐出去，更谈不上夺取他们的海上霸权了。印

度的海军远不及欧洲海军。印度人造船不用铁钉而用木钉，那种战船一被炮弹命中便毁坏了。

葡萄牙人拥有强大的舰队，成了通往印度航路上的主人，他们实行海上封锁和贸易垄断。“禁止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海船进入这个国家，东方各国（其中包括印度本国）的商人，只有向葡萄牙人交纳巨额税款方得进行海上贸易。企图越过这种海上封锁的，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葡萄牙人夺走他们的船只，把商人和全体船员淹没在海洋里。”[①] 葡萄牙人的商业活动和海盗行径，使印度对外贸易受到损失，使印度经济的独立发展受到破坏。

16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葡萄牙丧失了控制通往印度的航路的霸权。打垮葡萄牙人的霸权不是印度人，而是 17 世纪新来的殖民主义——荷兰人和英国人。不久以后，法国人也出现在印度了。荷兰和英国先后夺得了海上霸权。他们这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

西欧各国在印度及东方各地的商业活动，不是商人单独的活动，而是以实力雄厚的东印度贸易公司为其代表的垄断经营。这些公司在其政府的支持下，拥有大量资本，大批职员，武装力量和整批船队。这些船队既能运输货物，也能进行海战。1602 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00 年建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 1664 年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都由本国授以全权，可以在东方宣战、媾和；对本国职员享有审判权，对臣属于它的当地居民享有审判权。

17 世纪后半期时，荷兰殖民者已经在印度和锡兰岛上的许多据点设防，建立基地。英国公司则极力设法向莫卧儿帝国取得贸易特权，抵销和排挤葡萄牙和荷兰竞争者。1608 年，霍金斯乘第一艘英国轮船到达苏拉特。1612 年英国人在苏拉特击溃了葡萄牙

① 安东诺娃等主编：《印度近代史》第 45 页，莫斯科 1961 年版。

的舰队，震慑了莫卧儿帝国皇帝，而取得了在苏拉特建立临时代理店的权利。随后，于 1668 年英国人又把代理店迁到孟买，这里的地理条件使他们得到较大的安全和优势。英国人同时把马德拉斯和孟加拉作为根据地。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690 年，在威逼奥朗则布发布命令的情况下，在孟加拉的土地上，建筑了设防城市加尔各答。

法国东印度公司也跻身于对印度殖民活动的行列，1674 年在印度东海岸建立了本地治里城，在其他地区也建立了设防的代理店。法国的专制政府和宫廷集团的专制统治和繁琐监督，阻碍着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和发展，但是王室宫廷的挥霍无度，又要求对印度的贸易和掠夺。由于法国军舰极少，航行性很差，士兵多是由监狱里的罪犯招募来的，缺乏战斗力。这一切使法国在印度的竞争力量很低，它在印度的殖民掠夺活动，远远落后于英国。

17 世纪，欧洲人在印度的领地上的人口迅速增加。连年战祸和异常加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迫使当地的印度的大批手工业者到欧洲的商馆寻求庇护。在欧洲人新建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例如孟买，在 18 世纪初，居民已有十万以上。

欧洲商人通过当地商人和中间人进行贸易。因为欧洲人当时既不懂当地语言，也不熟悉当地市场情况，如果没有中间人在印度内地替他们收购货物，他们是无法进行贸易活动的。这批印度中间人，从同欧洲人做买卖中获得巨利，他们包收城市税捐，控制为他们订货而劳动的织工。他们是印度大资本家阶级的前身，在为外国资本的买办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17 世纪到 18 世纪后半期，印度的土地占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变化，随着封建压迫的加深，村社农民中丧失土地所有权者日益增多，同时分化出村社的上层分子。国家土地所有制遭到削弱，私人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和加强。这个过程，促进了农业和

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而来的是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加强。作为商业和手工业中心的城市的经济作用，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省的市场逐步形成，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有了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欧洲殖民者大规模地入侵印度，他们的经营与掠夺，也促进了这个过程的发展。

到 18 世纪中期，欧洲人在印度的海上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一方面在某些程度上加速了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当地商业资本家活动的可能性，削弱了他们独立的经济地位。英国人和荷兰人把印度商人排挤出海外贸易之外，把印度商品垄断地运往欧洲和亚洲各国，从中获取厚利。同时，他们利用在印度洋上统治的优势进行海上抢劫和奴隶贸易。软弱无力的莫卧儿帝国曾经屡次企图制止这种海盗行径，却始终没有结果。西欧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和掠夺，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甚一日。

17 世纪的印度，还不是殖民地，也不是附属国，但是欧洲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已有足够的力量，盘踞在印度沿海一带，垄断了印度海外贸易，夺去了印度人从这种贸易和航运中所可获得的利润。西欧殖民者任意劫夺海上的印度船舶，劫掳沿岸印度居民，把他们变卖为奴隶。西欧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了严重威胁，可怕的殖民奴役的厄险，已降临在印度头上了。

第二节　英法争夺印度的斗争

17 世纪以来，荷兰、英国、法国也先后登上了争夺殖民地霸权的舞台。荷兰人企图取代葡萄牙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开始于 1595 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于 1602 年组成。经济制度落后的葡

萄牙，抵抗不了荷、英等国的竞争。1580 年以后，它先后败于荷兰和英国，它的海军力量被击溃，对东方海上的统治也就垮台了。荷兰人又一时掌握了对东方的贸易垄断权。欧洲殖民者在争夺印度的角逐过程中，英法殖民者，逐渐地把荷、葡的势力排挤了。从 17 世纪末期起，在印度主要是英法之间的斗争了。

1600 年在女王伊丽莎白的特许下，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161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莫卧儿皇帝那里，取得了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港设立临时代理店的权利，1686 年又把它迁到孟买。同时，英国又在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建立了殖民据点。

法国东印度公司活动的中心是本地治里。它在孟加拉的昌德纳戈尔也有设防的代理店。本地治里于 1673 年创建以来，一直成为法国殖民者的印度居留地的首府。

英法东印度公司最初的目的，是对印度的商品和产品进行独占贸易而获取利润，其主要目的不是为英国和法国的商品夺取销售市场，而是保证英、法市场上所需要的印度商品和产品不断流入，从而获得高额利润。

18 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莫卧儿帝国的瓦解和马拉塔及其他公国的削弱，给英、法殖民者的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英、法因而改变了它们的政策，由进行贸易的政策，走向直接掠夺和侵略的政策。英、法东印度公司开始拥有大量军队。印度籍的雇佣兵成了这些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殖民者利用“印度人打印度人”的政策，来实现他们的野心。他们按照欧洲方式加以训练和装备的印籍士兵，成为执行上述政策的工具。

法国驻本地治里总督杜布雷，1772 年来到印度，在本地治里任顾问，后升任总督。1740 年他建立了一支由法国军官指挥的土著雇佣兵部队。这样，早在 18 世纪中期创建了一支隶属于他的印

籍军队，成为采取这种方式的第一个欧洲殖民者。他利用所谓“资助条约”的形式，在保护土邦王公的借口下，把他的军队派到各个封建王公那里，参与内讧与争夺。法国殖民者一方面可以控制这些封建王公，一方面强迫封建王公负责供养这些军队，发给军队补助金。西方殖民者就是利用这些手段，让印度的许多封建王公，自缚于“资助条约”之下。法国殖民者在印度大肆扩张，在1746年占领了马德拉斯以后，极力排斥英国人的势力，接着统治了德干的东部和卡尔纳奇的全部。法国人从所征服的公国中榨取了大量的财富，杜布雷本人即从他统治下的王公那里获得了价值200万卢比的财富，并掌握了大片的土地。

法国殖民势力在印度的扩张，引起了英国殖民者的极大不安。于是、英、法在印度的殖民角逐便日益尖锐起来。英国殖民者千方百计地阻碍杜布雷侵略政策的推行，并企图取而代之。1746年英国人模仿法国也建立了土著雇佣兵部队。

1740年在欧洲爆发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国和法国参加了敌对的两方交战。战争很快从欧洲蔓延到印度。1746年战火波及印度。战场主要是在德干东部和卡那提克一带。起初，法国殖民者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法国殖民者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及时支持，因而未能把这些胜利巩固下来。根据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1748年的和约，法国人被迫以加拿大的路易斯堡为交换条件，把马德拉斯交给了英国。

英、法在印度的争夺并没有停止。1756年在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1756—1763），英、法展开了更激烈的厮杀，在印度的英、法殖民者也卷入了敌对的火并。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被战败，法国人在印度也遭到了失败。1757年英国占领了孟加拉。法国派舰队去夺取马德拉斯，也遇到英国援军的阻击。包围马德拉斯的法军，由于缺乏弹药和粮食，士气不断下降。同时，法国的海军和陆军

也没有配合起来。英国人无论在陆地或海洋上，都屡败法国。结果法国在科罗曼特海岸的最后几个堡垒，如本地治里、马埃等也都陷落了。七年战争，最后决定了英、法在印度争夺的胜负。七年战争表明，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比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国具有显著的优势。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遭到了惨败。根据1763年的和约规定，法国殖民者在印度只保留五个不设防的城市。

七年战争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具有重大意义。英国打败了殖民劲敌法国，使它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印度进行殖民侵略了。马克思写道："七年战争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正是那个时候，才奠定了现时的这个东方不列颠帝国的基础。"①

第三节 英国殖民者对孟加拉的占领和掠夺

1600年建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成为英国向印度侵略和掠夺的大本营。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富饶的孟加拉建立了第一批贸易站。1690年，英国在孟加拉修筑了殖民城市——加尔各答。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孟加拉建立了150多个贸易站和15个海外代理店。这些掠夺性的商业机构，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印度的纺织品和精细的手工业产品，而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并强迫数千名印度手工业者在这些贸易站和代理店里为东印度公司做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

孟加拉在印度居有极重要的地位。印度历史学家辛哈和班纳吉在1955年出版的《印度通史》一书中写道："孟加拉的出口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68页。

易在这时期内迅速发展。公元1681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出口的印度产品的总值计有一百八十五万卢比，当时卢比的购买力为现在的二十倍。英国、法国、荷兰每年在孟加拉的投资，在该地的经济上引起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年来，莫卧儿皇帝经常从孟加拉获得的贡品只是象和美术品。沙伊斯塔汗开始每年缴纳五十万卢比。在奥朗则布朝代的末年和十八世纪最初的四十年间，孟加拉的税收额就成了皇族生活的主要依靠。”①

贪婪的英国殖民者，对富庶的孟加拉觊觎已久。它并不限于商业掠夺，而且企图直接控制这块富饶的地区。他们利用孟加拉封建主的日益衰落和内讧，多方干涉孟加拉内政，积极策划进一步控制孟加拉，成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进而作为全部侵占印度的桥头堡和基地。

殖民者的蛮横无礼，激起了孟加拉的“纳瓦布”（王公）西拉吉—乌德—陶拉的反抗。1756年4月年仅19岁而有独立思想的西拉吉继承了他外祖父的职位。由于英国人一系列的侵略行径引起他的愤懑，他给英国人写信愤怒地指出：“我以万能的上帝和先哲的名义发誓，除非英国人同意填平堑壕，夷平防御工事，并根据与扎法尔汗纳瓦布时代相同的条件进行贸易，我将拒绝考虑英国人的利益，还要把他们完全驱逐出我的国家。”②

1756年6月初，西拉吉即位后两个月，就派兵占领了英国在卡西姆巴扎的代理店。6月16日又统率5万大军进军加尔各答并占领了该地。他将这里的英国殖民者都关在军事监狱的“黑洞”里。

殖民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英国从马德拉斯派遣海军远征队前往进攻。这支军队由罗伯特·克莱武指挥，他野心勃勃地于10

① 《印度通史》第3册第711页。

② 拉易乔达里：《印度近代史》第97页，新德里1981年版。

月11日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表示："我认为这次征讨不只以收复加尔各答为目标，而要永久性地巩固公司在那个地区的地位……我希望能够把法国人从昌德纳戈尔驱逐出去，使加尔各答成为设防城市。"①

克莱武指挥的远征军，于10月16日出发，12月才到达加尔各答。克莱武收买了守将，1757年1月2日占领了该城，并掠夺了胡格利城及其周围地区。英国远征军的强盗行径激怒了西拉吉。他调集了数万军队，向加尔各答进发，要把英国人永久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军事部署，1月30日英军向他发起了一次突然袭击，西拉吉手足无措而失利。

英、法七年战争开始后，西拉吉投靠法国反抗英国，但是他又担心阿富汗人从西部入侵，不敢和英国长期作战，以免两面受敌。克莱武则利用了这种局势，加强了军事行动，迫使西拉吉缔结了条约，承认英国人的特权，归还了从加尔各答俘获的物资，并承认殖民者在城市里设防和铸造货币的权利。

克莱武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收买的手段，拉拢了地方上最有势力的贵族米尔·贾法。西拉吉的军事长官米尔·贾法被英国收买。双方签订了密约：英国人支持他当上"纳瓦布"以后，他向英国人支付1770万英镑。这笔巨款超过了当时加尔各答居民的全部动产。米尔·贾法在英国人的支持下与西拉吉争权夺利。

1757年6月23日，爆发了有重大影响的普拉西战役。普拉西位于加尔各答北面巴吉拉蒂河畔。克莱武率军占领了位于河堤旁的纳瓦布猎舍。克莱武以3000人的部队，其中800名欧洲士兵和2200名印籍士兵，于凌晨一时开到普拉西。英军装备十门野战炮

① 亨利·贝费里奇：《印度通史》第1卷第698—699页，新德里1980年版。

和两门榴弹炮。克莱武的指挥部设立在用砖砌成比较坚固的猎舍，英军则在附近的芒果园露营。

由此往北约一里处，西拉吉设置了军事大营，他的军队有5万之众，包括步兵35000人和骑兵15000人，装备50余门野战炮。另有以圣弗莱为首的四五十名法国军人指挥印度炮兵作战。可是纳瓦布的军队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武器简陋，而他本人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有2000人，其余部队分别由米尔·贾法等4名军事长官指挥。除了米尔·马丹，其余3名都积极参与了推翻西拉吉的阴谋活动。

纳瓦布占领着有利的战略地形。军营前有战壕，向两侧延伸，并在附近较高的土丘架设大炮，距英军阵地只有半哩。几万部队布置在一个新月形阵地上，形成了对英军的包围阵势。克莱武在猎舍屋顶监视纳瓦布军队的调动，他看印军不仅占领了侧翼相对的阵地，还有抄他后路之势。他面临着人数众多的印军，也是惊慌不已。作为殖民主义冒险家的克莱武强作镇定，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图侥幸取胜。他命令军队从果园出动，一字排开，正面部署欧洲士兵，土著雇佣军分别布置在左翼和右翼，并派出一支炮兵小分队占领左前方200码的几孔砖窑。

上午8时，双方战斗准备都已完成。圣弗莱指挥的印军炮兵打响了第一炮，开始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英军炮兵开始还击。激烈的炮战进行了半小时。英军大炮的数量少，口径小，抵挡不住纳瓦布军队强大密集炮火的攻击，克莱武命令英军士兵撤退到芒果园的土墙后面隐蔽起来。印军把炮向前推进，更加猛烈地进行轰击。隐蔽在土墙后面的英军避免了伤亡，并在土墙上凿出炮孔，向印军开炮。印军伤亡众多，但火力没有减弱，阵地也未丢失。炮战连续进行了3个小时，已近中午，尚不分胜负。米尔·贾法等3个叛将自始至终一直按兵不动。在这种形势下，克

莱武也束手无策。11 时，他召开了主要军官参加的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坚守到天黑，夜半时分偷袭印军军营。

天有不测风云，军事会议刚开过，就下了瓢泼大雨，持续了一个小时。英军备有油布，把弹药藏好。印军却没有这样的准备，弹药被雨淋湿，随之炮声越来越稀。米尔·马丹以为英军的弹药也已潮湿，就率一支骑兵向芒果林冲来，英军报之以一阵猛烈的炮火，不仅击退了骑兵的冲锋，还使米尔·马丹受了致命的重伤，抬回军营后就死去了。马丹的战死，使西拉吉失去了忠诚的将官，是纳瓦布无法弥补的损失。军营中一片混乱。西拉吉请求米尔·贾法保护自己，米尔·贾法表面上鞠躬，表示竭尽全力，同时提出西拉吉撤退，把战场交给将官们处理。接着，米尔·贾法派人给克莱武通报纳瓦布军营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并要求他立刻发起攻击。西拉吉又征询另外两位军事长官拉易·杜尔拉帕和亚尔·拉蒂夫汗的意见，也同样劝说他撤退。西拉吉屈服了，给代替米尔·马丹指挥战斗的莫汗·拉尔下达了撤退命令。然后，带着自己的两千名士兵，向穆迟达巴德方向逃去。

在猎舍的屋顶上，克莱武被浇得犹如落汤鸡，下来进屋换衣服，并休息一下。英军基帕特里少校发现纳瓦布军队撤退，就集中炮火进行轰击。接着克莱武命令组织了三块炮火阵地，向印军猛烈的炮击。被出卖了的印军，遭到了极大的伤亡，再也抵挡不住英军的攻击。克莱武又组织了两支强大的小分队去占领圣弗莱据守的防御工事。圣弗莱看到其他印军都已撤退，自己又受到英军的威胁，也只好撤退了。6 月 23 日下午 5 时，英军占领了整个战壕和纳瓦布的军营。普拉西战役结束了。

普拉西战役时纳瓦布军队总数为 5 万人，只有米尔·马丹指挥的 1.2 万人和几十名法国士兵直接参加了战斗。三个叛将指挥的 3.6 万人始终没有参战，他们袖手旁观，然后即撤退逃走。英

军只以 18 人阵亡的代价，而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西拉吉遭到了失败，他逃跑时被俘。于 7 月 2 日被米尔·贾法的儿子米朗处死，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年轻统治者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年仅 20 岁。于 6 月 28 日在穆迟达巴德，克莱武扶持米尔·贾法上台，立为纳瓦布，任命他为孟加拉的统治者。

马克思指出："普拉西战役。莫卧儿军队完全失败。""紧接着普拉西战役后，克莱武被任命为加尔各答省督；这样一来，他现在成了在孟加拉的英国人的军事和民政首长了。"[1] 从而，开始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侵略与统治的一个新的阶段，东印度公司操纵了拥立傀儡的大权。克莱武本人也因之官运亨通。"克莱武在孟加拉的处境是飞黄腾达地发迹起来。他获得普拉西战役胜利之前，只是马德拉斯督府和总督的一个小职员。但在 1758 年 6 月，加尔各答督府就主动地选举他为孟加拉省督。这个职务在年底得到东印度公司的正式任命。"[2] 克莱武担任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的第一任省督（1758—1760），成为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英国殖民者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孟加拉。

1757 年 7 月 15 日，英国殖民者迫使米尔·贾法签订的条约承认："英国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不论他们是印度人还是欧洲人"，"不论何时当我要求英国人援助时，我将负责供养他们"。[3]米尔·贾法已完全成为英国的代理人，而孟加拉则成为英国的真正殖民地。英国殖民者首先控制了海运方便、地域富饶的孟加拉，从而进一步侵略和控制了印度全境。

腐败无能的莫卧儿帝国，处于四分五裂无力自持的状态。尼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 83、84 页。

② 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第 670 页。

③ 见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第 3 册第 809 页。

赫鲁写道："印度当时处于一种随着莫卧儿帝国的瓦解而形成的流动的无组织的状态之中；许多世纪以来，它从不曾这样削弱与孤立过。有组织的政权已经垮了，门户洞开，给冒险家们和新来的要求统治权力的人们以逐鹿中原的自由。在这些人当中有英国人，而当时只有英国人们才具备成功所必须的种种品质。"[①] 让人们看看英国人在普拉西战役前后的"种种品质"吧。

普拉西战役前，英国殖民者通过各种侵略手段，它的势力已渗透到孟加拉。收买、分化封建主，又使它获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普拉西战役后，英国殖民者接着攻占了孟加拉首府穆迟达巴德，把这个富庶的城市抢劫一空，国库全部被盗光，约有 6000 万英镑的财富被殖民者劫走。从此，这个城市一蹶不振。殖民者对孟加拉进行赤裸裸的残酷掠夺。米尔·贾法给英国陆军、海军和公司的官员有案可查的礼物和赠品，总数约 125 万英镑。克莱武的一份就达 23.4 万英镑之巨。1759 年，他又颁发给克莱武二十多个"封地"岁收的授予状。难怪克莱武后来在英国下院的一次演说中厚颜无耻地吹嘘，他说："想想由于普拉西战役的胜利给予我的地位吧。一个伟大的王公要巴结我。一个富裕的城市受我的支配。它的富裕和人口稠密都超过伦敦。其中最富有的银行家为了博得我的一笑而竞相出价。我出入于只为我敞开的金库，两手抓满了黄金和珠宝。主席先生，此刻，我对我自己那时的节制真是大为吃惊。"[②]

英国殖民者此后便对印度开始进行了经常的露骨性的掠夺，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东印度公司接管孟加拉税收的第一年（1765—1766）仅田赋一项，就由原来的 81.8 万英镑增加到

① 《印度的发现》第 360 页。

② 见《印度通史》第 810 页。

147 万英镑，到 1793 年竟达 340 万英镑。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1770 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 1000 万人，约占孟加拉和比哈尔居民的 1/3，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而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却因此大搞粮米投机，获得了惊人的利润。田赋税收，有增无已。1760 至 1780 年期间，东印度公司以税收方式，从印度掠运到英国的商品，即达 1200 万英镑。东印度公司不付任何代价从印度攫取了大量财富。克莱武还组织了一个出卖食盐和烟草的垄断组织。这种贸易的收入由高级官吏分享，克莱武本人每年就可赚得 1.7 万英镑。当 1767 年 2 月克莱武离开印度回英国时，他已由一个一文不名的恶棍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了。克莱武时期东印度公司理事会理事斯克拉夫顿曾直言不讳地承认，由于普拉西战役所开始的掠夺，使英国可以"不拿出一盎司黄金"而与印度进行贸易。殖民主义者用火和剑写在印度史册上的罪行，构成一幅英国殖民者劫取印度人民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英国对殖民地的掠夺，使其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予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①] 普拉西战役后，印度的财富开始与日俱增地大量流入英国，充实了英国的现金资本，促进了英国新的生产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7 页。

的实施，促进了工业设备的普遍采用，促进了英国各种发明的增多，也就是说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布鲁克·亚当斯写道："普拉西战役是1757年爆发的，战争之后发生了无可比拟的变化。1760年飞梭出现了，同时煤在冶炼中开始代替木材。1764年哈格雷夫发明了多轴转纱机，1779年克朗普顿发明了纺棉机，1785年卡特莱特获得机械织机专利权，而其中最主要的是1788年瓦特完成了蒸汽机。……但是，虽然这些机器为时代的加速发展打开了出路，它们却不是加速的原因。发明本身是被动的，许多最重要的发明被搁置了几个世纪之久，一直等待着积累起足够的储备力量来使它们投入使用。这种储备力量总是采取货币的形态，不是贮藏的而是流通的货币。"他接着强调："自有世界以来，也许没有任何投资会产生从印度掠夺物上所得到的那样的利润，因为大不列颠无敌手的独占统治近五十年之久。"[①] 18世纪后期，在掠夺印度的基础上，建成了工业化的英国。印度人民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所做的牺牲和贡献，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普拉西战役对印度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以后，印度的封建社会时代为殖民地时期所代替，印度开始逐步沦为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同时，印度人民也广泛地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英国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它是印度近代史的开端。尼赫鲁为此曾写道："在孟加拉，克莱武利用鼓励叛逆和伪造的手段，毫不费力地就于1757年在普拉西战役中取得胜利。这日子有时被人们认为是大英帝国在印度开始的标志。"[②]

普拉西战役的影响，已为印度史学界所承认。印度学者潘尼迦在《印度史纲》中，指出了1757年普拉西战役对印度历史所引

① 布鲁克·亚当斯：《文明法则及其衰退》第259—260页。

② 《印度的发现》第354页。

起的变化，“事变很快转向不大闻名的普拉西。人们都承认它是建立英帝国的标志。”[①] 他进一步分析了普拉西战役的影响，写道：“普拉西战役的影响在军事上并不重要，在政治上则是重大的。从此，东印度公司变成了二十四个‘帕尔加纳’[②]的柴明达尔，几乎控制了加尔各答南部九百平方英里的领土，而且成为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③] 印度史学界的权威著作《高级印度史》写道：“普拉西之战似乎是一次较小的战役，但是却产生了比世界上最大的战役更为重要的后果。它为英国征服孟加拉以至最终征服整个印度铺平了道路。”[④] 普拉西战役后，英国殖民者以孟加拉为基地，逐渐地向印度内地扩展，进一步蚕食和鲸吞印度的领土，实现其征服印度的野心。尼赫鲁写道：“1757 年普拉西战役的结果，首次控制了一块辽阔的地区。几年之内，孟加拉、比哈尔、奥利萨和东海岸都隶属于他们了。第二次又前进了一大步，是在大约四十年之后，也就是十九世纪初期，这样就把他们带到德里的城下了。第三次巨大的进展发生于 1818 年马拉塔人最后战败之后；第四次在 1849 年锡克战争之后，于是全功告成。”[⑤] 英国殖民者最后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征服，印度变成了它的完全殖民地。

---

① 〔印度〕潘尼迦：《印度史纲》1956 年孟买版第 198 页。

② “帕尔加纳”（Pargana）为印度区划单位。省下划为“希克”（Shiga），“希克”下划为“帕尔加纳。”它的包税人即柴明达尔，后来发展为新兴的地主。

③ 《印度史纲》第 198—199 页。

④ 《高级印度史》第 665 页。

⑤ 《印度的发现》第 383—384 页。

第四节 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进一步侵略和吞并

英国殖民者对孟加拉直接的强盗般的掠夺，使这个国家陷于崩溃的边缘。米尔·贾法的奴才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曾企图利用“外国同盟者”，来代替“外国主人”，秘密地同荷兰人进行谈判，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来赶走英国殖民者。但在陆地上和海洋上荷兰的军队都被英国所击溃。结果，米尔·贾法没有达到目的，还付出了100万卢比的巨额金钱来赔偿英国的损失。这个不得力的傀儡，随即于1760年被免去了王位。英国人则把他的女婿米尔·魁西扶上王位。“纳瓦布”的更换，给英国造成再次掠夺的口实，殖民者向新的统治者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米尔·魁西被迫在短期内付出了很大一笔金钱，即25万卢比的军费，支持了英国殖民者成功地击败了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二世。在沙·阿拉姆二世离开孟加拉以后，米尔·魁西自称为孟加拉皇帝。他随之加强了岁收制度，两年内所得的税收，几乎等于以前国家收入的两倍。

米尔·魁西企图摆脱英国傀儡的地位。他首先把首府从穆迟达巴德迁到远离英国人的孟吉尔；他聘请了一些欧洲冒险家按欧洲方式来训练他的军队。同时，停止了向印度商人征收内地关税，使印度商人获得了同欧洲商人相等的权利，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米尔·魁西还缩减了自己宫庭费用，作为扩大军队的军饷。他并对柴明达尔的权力加以限制。米尔·魁西向法国人和阿富汗人求援，以便壮大自己的反英力量。

反英起义在巴特那爆发了。这次起义具有广泛的性质，孟加拉许多城市中东印度公司的驻军被歼灭。英国殖民者慌忙凑集了

一支由1000名欧洲兵和400名印度兵组成的军队仓促应战。米尔·魁西的军队已发展近2万人。由于他的军队缺乏训练，毫无纪律，指挥员都是一些投机取巧的骗子。1763年间，起义军队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米尔·魁西逃回巴特那，接着出逃奥德，联合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二世共同反英。因缺乏周密的准备和果敢的行为，印军为英军所败。奥德被占领，遭到英国殖民者的蹂躏。沙·阿拉姆屈服成为英国的附庸。米尔·魁西作为亡命者，1777年死于德里。

英国殖民者于1763年7月，又把米尔·贾法扶上了傀儡“宝座”。他与英国人签订了一个新条约，大大限制了他的军队的数量；对英国人的食盐贸易只收2.5%的关税。他答应赔偿300万卢比的战费，同时赠给英国军队250万卢比，并补偿英国殖民者私人所遭受的损失。英国殖民者对此写道：“‘纳瓦布’不过成了公司职员的财东，职员可以随地向他支取任何数目的款项。”[①]

英国殖民者又强迫“纳瓦布”的继承者同意由英国人指定大臣，不得到英国人的同意不能免职，只能保留维持地方税收事务的军警，军事、行政等大权都掌握在英国殖民者手里。“纳瓦布”成为英国殖民者名副其实的傀儡。

1765年5月，克莱武第二次担任孟加拉总督。克莱武面临的政治上的问题是：确定英国人与莫卧儿皇帝、奥德的纳瓦布以及孟加拉纳瓦布的关系，需要解决的行政问题也同样困难。他必须巩固已经占领的土地和既得利益，决定暂时停止扩大领土，以便准备新的军事力量去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和侵占。

克莱武这时创立了所谓“双重管理”制度。即是克莱武把管理国家的一部分职权移交给“纳瓦布”，如对人民大众的有关刑事

① 见《印度通史》第3册第816页。

的职权等。公司则保持管理财政、军政和民政等权利。

同时，克莱武把他的占领区科拉和阿拉哈巴德作为皇室领地，交给了大莫卧儿帝国。并把奥德给予莫卧儿皇帝，使它成为一个从属的缓冲地带。

“双重管制”制度对英国殖民者极为有利。马克思指出：“双重管理制度的问题——这是英国人惯用的形式。”[①] 它解除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切责任，却授予公司以无限制的专权。英国人的抢掠、勒索和投机仍在毫无限制地进行。

殖民主义者的空前浩劫，使孟加拉许多城市杳无人烟；在农村，肥沃的良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人民忍饥挨饿。1770 年在孟加拉和比哈尔发生了大饥荒，殖民者则借机大搞粮食投机，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马克思写道：“在 1769—1770 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方法，制造了一次饥荒。”[②] 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孟加拉人口减少了 1/2。由于孟加拉的破产和东印度公司职员贪污发财，公司的收入大大减少。从 1767 年起，公司原应每年向政府支付的 40 万英镑，不仅无法上交，反而必须向政府举债。这种情况，激怒了英国议会，1773 年，议会通过了“改善管理东印度公司事务条例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原来东印度公司驻加尔各答总督升任为英属印度总督，由政府任命。并在印度设立英国最高法院，管辖公司的职员。1774 年瓦伦·哈斯丁斯被任命为英属印度第一任总督（1774—1785）。总督委员会决定一切大权，除总督外，还有四名委员，表决时以简单的多数决定，双方票数相等时，总督具有决定权。哈斯丁斯的委员会里有公司职员一人和三个政府委派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0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7 页。

哈斯丁斯的统治，表明克莱武的“双重管理”制度已告结束。东印度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自1774年起，孟加拉的首府由穆希达巴德迁到加尔各答，公司的英籍职员直接管理税收，并取得了审判权。

哈斯丁斯统治的最初几年，在行动上还受着政府委派的大多数委员的约束，不得不对大搞投机，抢劫勾当的公司职员加以制止。但当政府派的三个委员中的一个死掉后，他便有了决定性的表决权。他和克莱武没有什么两样，代表了公司内巨头的利益，他以残酷的手段扩大税收，增加公司的收入，完全是一幅殖民强盗的嘴脸。1775—1785年，被殖民者压榨得无家可归的孟加拉农民一再爆发反英起义，哈斯丁斯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农民起义，殖民者把大量的乡村焚为灰烬。

孟加拉的破产促使东印度公司找寻新的掠夺场所；而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壮大，海上霸权的巩固，尤其是北美殖民地的丧失，以及法国拿破仑时期殖民竞争的加强，都推动了贪婪的英国资产阶级对印度的侵略和吞并的扩大。

英国殖民者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迈索尔和马拉塔。迈索尔是印度南部一个强大的公国。1755年赫德尔·阿里成为它的实际统治者，他原是迈索尔邦总司令南贾拉杰部下的一位军官，他乘迈索尔邦破产和军队叛乱之际，撵走了南贾拉杰，而掌握了军权和政权，王公只是作为傀儡而保留下来。1761年他打败了得到马拉塔支持的迈索尔官员坎德·拉奥，稳定地在迈索尔建立了统治。接着他利用马拉塔忙于战争的时机，占领了马拉塔以南的大片领土，成为印度南部一个强大的公国。

英国殖民者不甘心这样一个强国的存在。1767--1769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对迈索尔的战争，战争进行了两年，“只是由于得到

孟加拉省慷慨的援助，东印度公司才能继续进行这一不幸的战争。”① 最终赫德尔率领的轻骑兵突然冲锋，逼迫了马德拉斯，英国殖民者被迫于1769年缔结了和约。在第一次英国——马拉塔战争（1775—1782）时，迈索尔开始与马拉塔修好，赫德尔采取了坚决反抗英国的态度，同时采取联合法国的政策。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国，成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强大竞争者。法国资产阶级决心继续和英国进行争夺，拿破仑已决定开始向印度进军，由于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失败以及后来在埃及的多年战争，使得拿破仑未能向印度进军。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遥远的印度也发生了影响。在印度的五个法国占领城市建立了共和政权。许多法国的密使潜入印度的各个公国，法国人千方百计地削弱英国人在印度的势力，支持了某些印度公国的反英情绪和反英斗争。

1780—1784年的第二次英国——迈索尔战争，迈索尔就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赫德尔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但国家还比较稳固，民族成分比较统一，并有着一支近代装备的军队，因而在反抗英国的斗争中也比较有力。国内大部分居民信奉印度教，作为伊斯兰教徒的统治者却执行了慎重的宗教政策，不触犯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统治者同时采取保护商业和发展手工业的政策，在国内开办了由欧籍军官领导的军火工场。在同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得到本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赫德尔以轻骑兵控制了交通，英国人不能从沿海进入内地，使他们得不到足够的供应。法国舰队与英国舰队在海上进行了多次战斗，由于指挥和战斗的不力，法军一直没有登陆。1782年12月7日赫德尔死去，1783年6月英、法议和。1784年英——迈第二

① 威尔克斯：《迈索尔史探索—南印度史纲》第2卷第127页，伦敦1810年版。

次战争宣告结束。

赫德尔的继承者提普。这位苏丹基本上执行他父亲的政策，以把英国人驱逐出印度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的。

提普自 1782—1799 年统治着这个公国。他是英国的死敌，他准备和法国结成同盟反对英国，但他基本上是用自己的兵力同英国人作战。在他的统治下，迈索尔得到巩固。它的民族成分很单一，居民绝大多数是印度教徒，提普为首的上层分子信奉伊斯兰教，但他和其父一样并没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迫害自己的属下。他减轻了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农民的处境有所改善，军队里的农民的爱国热情高涨，战斗力也较强。不少邻近迈索尔的英国属地内的农民逃到迈索尔公国来，提普拥有一支来自下层卡斯特的人民所组成的军队，提普苏丹在外交上采取了联法抗英的政策。

迈索尔的强大是东印度公司在德干东部的殖民统治的严重威胁，阻碍了它把印度东西海岸连成一片的殖民计划。英国殖民者把迈索尔看成是心腹之患。1790 年英国殖民者对迈索尔发动了第三次侵略战争。英国利用分化瓦解的手段，把海德拉巴和特拉万库尔等公国拉到自己一边，使迈索尔陷于孤立。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提普苏丹进行了顽强抵抗，战争延续了两年，一共进行了三次战役。战争开始时，两支从孟买和马德拉斯开来的英国军队攻入迈索尔，虽然逼近了首都塞林加帕坦，但英军没能占领这个城市，提普苏丹采用了焦土战术使英国陷于饥饿。英军被迫退却。最后一次战役中，英军包围了塞林加帕坦，并占领了通往首府的要道上的很多堡垒，因而迫使提普苏丹求和。条约的条款对提普苏丹极为苛刻，迈索尔的一半领土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管区，并向英国殖民军缴付 3300 万卢比的巨额赔款。英国当时的印度总督科威利斯得意地说："我们终于成功地结束了我们的印度战争，获得了有理智的人都会考虑到的一切利益。我们粉碎了我

们的敌人，但没有因而过分地加强我们的朋友的力量。”[①] 英国暂时还没有灭亡迈索尔，而把它作为抗衡马拉塔的力量。

这次英迈战争结束后，提普利用时机推行强兵富国政策，着手巩固国家政权，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组了军队，扩大了税源，付清了赔款，准备同英国人决一死战。

1798年英国殖民者进一步展开了扩张活动，首先针对着法国势力的支柱迈索尔。英国总督威莱斯莱把军队集中在迈索尔边境，突然袭击，在塞林加帕坦四周形成了包围圈，勒令苏丹投降。提普英勇地领导了迈索尔人民反抗英军的保卫战。在没有取得法国和其他王公的援助的情况下，迈索尔人民为捍卫每一寸土地而勇敢战斗。英军处于优势，对塞林加帕坦的围攻开始于4月17日，5月4日才在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占领了它，提普英勇牺牲，他的儿子投降。迈索尔的赫德尔·阿里王朝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英国殖民者在迈索尔烧杀掠夺，并把它的傀儡扶上了迈索尔王位。东印度公司终于侵占了迈索尔。

在征服迈索尔的前后，英国总督威莱斯莱（1798—1805）还疯狂地合并了坦焦尔（1799），加尔那迪（1801）和其他一些小土邦。1801年又吞并了奥德的一半领土。至此，在印度，“除了英国人以外只有一个巨大的力量，这就是马拉塔人。”[②]

马拉塔公国所处的地位，严重地妨碍着英国殖民扩张欲望的实现。东印度公司决定征服马拉塔诸公国。英国总督威莱斯莱开始准备新的战争，他不仅企图消灭马拉塔人的力量，而且还要占领大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德里，以便为英国人打开通往印度西北部的道路，进而控制印度全境。

---

① 穆希布尔·哈桑汗：《提普苏丹史》第271页，加尔各答1951年版。

②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125页。

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拉塔公国联盟实际上已经瓦解。王公之间经常处于内讧，帕什瓦的中央集权大大削弱。国内剥削加重，农民因受重税和高利贷的盘剥而破产。马拉塔王公的军队也缺乏统一的编制，它是由不同部落的雇佣兵组成，教官和指挥官多数是外国冒险家，其中许多人是东印度公司的间谍。这一切，使这个不久前还相当强大的国家陷于崩溃，而给英国殖民者提供了可乘之隙。

1796年巴吉·拉奥二世继位"帕什瓦"，这个软弱和狡猾的统治者，在内讧中被赶出了浦那。他逃到巴森后，投靠了英国，1802年12月31日和英国缔结了一项屈辱性的条约。条约规定：一支6000人的英国雇佣军，永久地驻扎在他所统治的领土上，并把收益260万卢比的县区，指定为供应这支军队。英国人控制了帕什瓦的对外关系。帕什瓦以牺牲他的独立作为得到保护的代价。由于英国人的援助，巴吉·拉奥二世1803年5月在浦那复位。作为他的敌手的查斯万特·罗·荷尔卡从浦那撤到北方。

马拉塔联盟的成员，拒绝承认巴森条约。可惜的是马拉塔王公们没能联合起来共同打击英国殖民者。他们的抗英斗争是各自孤立的，这就使得英国人便于取得胜利。印度斯坦的英军总指挥拉克击败了瓜廖尔王公的军队，占领了德里和阿格拉；威尔斯利在中央印度打败了那格浦尔的军队。瓜廖尔和那格浦尔被打败求和，英国获得了奥里萨、德里和阿格拉等广大区域。英国对印多尔公国的征服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印多尔的王公赫里卡尔采用了马拉塔人所惯用的游击战，大败英国人，使英国的蒙逊上校的部队遭到惨败。但终因寡不敌众，在1804年11月13日赫里卡尔的军队被击溃后，最终，印多尔也成为英国的属国。

英国对迈索尔和马拉塔诸公国的征服，大大地扩充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直接属地。到1805年时，除了北方和西北部的信德

和旁遮普等还是独立的公国外，所有的印度领土，包括中部印度和南部印度的一些土邦，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东印度公司还没有废弃莫卧儿皇帝，而把他变成傀儡为殖民统治所利用。而当1803年英军总司令拉克进入德里时，马拉塔人在帝国首都的势力就衰弱了，这个有名无实的帝国政权开始在历史上消失了。

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采取了各种形式，贸易、殖民并重，欺骗、分化兼施，一切阴险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武力征服。从1600年英国建立殖民贸易机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对印度进行疯狂掠夺起，到1849年兼并旁遮普，基本征服印度为止，共费时249年。在这漫长的两个半世纪的过程中，它所欺凌的对手，就是莫卧儿帝国。一直到英国全部征服印度后，仍将莫卧儿帝国作为一个傀儡工具，置于掌握之中。这种局面延续了许多年。陈翰笙先生把莫卧儿帝国的灭亡，定在帕尼帕特战役，“莫卧儿王朝经历了二百三十五年，即公元1526年至1761年”。[①] 这为时尚早。在这以后，不论是名义上或是莫卧儿帝国的统治机构都没有完全取消。“在许多年中，穆罕默德沙和他的继承者，仍占据着这个古都，仍然称为莫卧儿皇帝，以这种名义统治着德里附近地区的这个国家。同时，常常发生有野心的首领，如马哈杰·信比亚，建立以大莫卧儿为名的挂名政权，以臣属执政为掩饰来控制德里的政治事物。”[②] 帕尼帕特战役以后，莫卧儿王朝还有三个皇帝先后在位。一直到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德里起义时，莫卧儿最后一个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被推为起义政权的皇帝时，莫卧儿王朝才最后消亡。印度史

① 陈翰笙：《印度莫卧儿王朝》第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S·M·爱德华兹、H·L·O·格林特：《莫卧儿在印度的统治》第364页，新德里1979年版。

学家V·D·萨瓦迦写道："德里市民使德里皇帝恢复了古老的莫卧儿王位，以便建立一个强大的核心，利用这个名称的威望，以支持人民解放的斗争。旧的莫卧儿王朝的复位既不是旧的势力的恢复，也不是旧的权威和旧的传统的复辟。"[①] 一直到英国镇压了这次起义，把巴哈杜尔·沙流放到仰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称印度女皇，莫卧儿帝国才最后地完全从印度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了。

莫卧儿帝国的灭亡，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首先，政治上的腐朽，集中反映了莫卧儿帝国统治集团的无能。在印度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古代文明的多民族的国家中，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企图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②] 莫卧儿帝国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它建立时起就处于与人民敌对的状态之中。在它统治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巩固其统治，对人民群众则是残酷无情的镇压。一旦掌握了统治权，统治集团的内讧，争权夺利，又是层出不穷，连绵不断，耗尽了无数的社会财富，人民群众则遭到大量的死亡和蹂躏。个别有作为的统治者曾做了某些有利于社会的改革，但也不能持续下去，不久即被其继承者抛弃了。他们从统治集团的狭隘利益出发，敲骨吸髓地进行掠夺和盘剥。到后期，莫卧儿统治集团已完全腐败，他们甘当英国殖民者的玩偶，成为民族的败类。马克思在1857年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说这些王公还有些用处的话，那么他们的用处

① V·D·萨瓦迦：《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第283页，孟买1947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仅仅是展示已经完全腐烂和十分可笑的君主政权。例如，拿帖木儿的后裔大莫卧儿来说，他的年薪是 12 万英镑，他的权力超不出宫墙的范围，成了白痴的王族子孙在宫里像家兔一样听其自然地繁殖着。”[①]这是多么可鄙的角色啊！如果这个统治集团的成员，生气勃勃，有所作为，他们是不甘过如此囚禁式的猪猡生活的。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莫卧儿皇室王公卑躬屈膝，投降苟安，最终导致印度完全灭亡。

其次，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济停滞不前，生产萎缩，经济机构完全破裂，则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在它统治时期，特别是后期，土地荒芜，水利失修，战事频繁，加之连年灾害，致使民不聊生，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贫困的深渊。农民起义，连年不断。王室的捐税奇重，差役繁多，帝王挥霍无度，官吏贵族奢侈成性，更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早在 17 世纪时，一位法国珠宝商人塔浮尼埃，多次到过印度，他曾叙述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乞丐，估计总数达百万以上。这些人包括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失业的雇员和仆役等等。这只是粗略估计，全国的饥民数量远远超过此数，以后则有增无已。经济凋敝，灾害频仍，仅 1702—1704 年恒河流域的旱灾和瘟疫，就使 200 多万人丧生。村民逃亡，生产低落，社会经济到处遭到破坏。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基础大为动摇，它的灭亡是不可抗拒的。《莫卧儿在印度的统治》一书中写道：“经济和财政体系的枯竭，真正地促进了莫卧儿帝国的衰败。可以肯定地说，在 1740 年，这个问题就严重地影响了帝国的生存。沙·阿拉姆二世 这个徒有虚名的皇帝，在位 47 年直到 1806 年，从没有实在地控制帝国的任何一个地区，他是一个空头的君主。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27 页。

那得[1]攻占德里，抢劫了这个将近三个半世纪所积聚的财富的城市时，莫卧儿帝国所有的实际性意图就都落空了。”[2]

最后，重要的原因是军事上的腐朽无能。莫卧儿帝国为了维持统治，有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帝国拥有各种军队 30 多万人，加之各地区封建领主的 10 多万骑兵，全国士兵近 50 万，连同家属、佣人达 200 多万人。但是军事机构庞大臃肿，缺乏战斗力。莫卧儿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导致它的军队软弱无力。众多的莫卧儿军队，携带着抢劫来的财富的拖累，后面跟随着几万仆人，军队纪律松弛，道德败坏，完全处于瓦解状态。表面看来非常庞大的队伍，实际上却不能作任何的迂回机动。根据记载，1700 年的一次行军中，50 公里的路程，这支军队却走了 35 天。这种腐朽无能的状况，以后更为严重。莫卧儿帝国的军事制度规定：马匹由士兵自备，因而护马逃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莫卧儿军队在陆地上镇压人民群众，还能起一点作用，遇到强大的外来敌人，就不堪一击了。在海洋上，莫卧儿帝国根本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遭到海外殖民者的袭击，就束手无策了。“莫卧儿帝国即使在权力极盛时期，在海上也是无能为力的。阿克巴由于他的中亚传统，对海权没有认识，而且直到征服了古吉拉特以后实际上才看到了海洋。这个帝国根本上是大陆性质的，除了在苏拉特的一个出海口和在孟加拉的一些较小的港口以外，他和他的继承人似乎不曾想到要建立一支海军。”[3] 而马拉塔的西瓦吉还建立了自己的海军舰队，这样，莫卧儿帝国在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入侵面前毫无防御能力，而只能坐以待毙了。至于莫卧儿军队的装备与技术，更不能同以近

① 那得即纳得尔·沙（nadir shah），波斯国王，1739 年入侵印度，洗劫德里，为了与前述马克思著作中的引文译名一致，故作此译名。

② 《莫卧儿在印度的统治》第 364 页。

③ 潘尼迦：《印度史纲》第 186 页。

代技术装备的殖民者军队相匹敌了。

印度的民族复杂，种姓繁多，等级森严，全国极不统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深重。印度遭到英国的侵略而亡国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我们说莫卧儿帝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说英国占领印度是历史的必然。没有英国的侵略，印度的历史仍然会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发展到各个較高的社会阶段。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而招致外族入侵，使本国沦为外国的殖民地，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像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多于英国10倍以上，土地大于英国15倍以上，而最终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深思和引之为鉴的。

英国对印度的侵略和占领，对其在19世纪对整个亚洲的扩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殖民者利用印度的人力、物力及其地理位置向阿富汗、伊朗、东非、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

第五节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

随着英国北美殖民地的丧失，对印度的统治与剥削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注意的中心。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少数资产阶级控制的东印度公司继续垄断对印度的统治和剥削日益不满。他们要求对印度自由贸易，要求改革管理印度的全部行政机构。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管理法案”，反映了政府对公司事务的干预，政治权力开始转归英国政府。根据这个法案，印度总督和孟加拉参事会的参事，不由公司而由英国国王任命，而且不一定是公司职员。以国王和当权贵族为靠山的东印度公司却极力反对这一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于1784年通过了印度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六位枢密院委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它的职责是：检

查、监督一切涉及东印度公司领土和属地的民政、军政或赋税的法令、业务和事务。"[①] 实际上，这一法案把公司的权力移交给了国王所指派的委员。公司的董事会仍保留任命公司职员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利。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则一直保留到1831年。

1786年科威利斯到印度担任总督，这位庇特首相的朋友，成为议会意志的忠诚执行者。他立即着手实行在印度的改革，私人贸易被禁止，限制公司职员的抢劫行为，而发给他们以高额年饷，一个最低职务的职员可得年薪500英镑。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一步建立起殖民政权的官僚机构。税务、警察和法院都直接归英国官吏控制。公司占领和管辖的土地被划为区、县、乡，并委派英国人充当行政长官。同时在印度保留着最反动、最落后的社会结构。

由于无限制的殖民掠夺，英国首先占领的孟加拉地区破产而衰落了。殖民统治者为了使掠夺性的土地租税收入更加稳定，并培植支持它的统治阶级，科威利斯于1793年公布了"关于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度的法律"，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地区施行。根据这一法律，本来只是收税人、包税人的柴明达尔，这时便被宣布为地税征收权力所及地区的土地所有者。这样，便取消了公社和小封建主的土地世袭权。只有寺院的土地是例外。农民是这一殖民政策的受害者。他们实际上丧失了土地占有权而变为无权的佃农。英国官吏也承认："从其身上榨干一切的农民，在我们统治印度以前所纳的赋税受着专制统治者的限制，而现在他们在固定柴明达尔制度范围内交纳的税额，未经英国政府明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69页。

规定。”[①] 伴随着柴明达制度的实行，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和奴役急剧加深。柴明达尔获得了封建权力而随意向农民征收捐税，甚至农民剪发和带伞都要缴纳捐税。柴明达尔作为英国殖民者的走卒，必须把其收入的 9/10 作为地税交给东印度公司，如果他们不按期缴纳这种地税，土地便要被拍卖掉。在 1815 年孟加拉有 1/3—1/2 的土地因地税交付不足而被拍卖，这些土地很快地转到了富有的商人和高利贷手里。新的土地所有者不仅必须向英国缴足地税，同时也力求扩大自己的收入。他们采取提高地租和开垦新的土地的办法，来增加收入。由于土地税已固定下来，地主的收入便逐步增加，英国殖民政府的收入相对减少。20 世纪初期，孟加拉柴明达尔所征收的 1.2 亿卢比的地租中，柴明达尔获得 3/4，政府所得部分只有 1/4。

有鉴于此，东印度公司对南印度和中印度的占领地区，没有推行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度。同时也因为南印度的一些地区早就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群起反对掠夺他们的土地。1793 年，英国殖民者在马德拉斯的大部分地区和孟买地区实行了莱特瓦尔制度[②]。根据这一制度，原来的扎吉达尔和包税人等封建主的征税权全被取消。除了寺院的土地未加触动外，所有农村公社的土地，包括荒地和牧场，以及森林、矿藏，都被东印度公司窃为已有。其余的耕地及园田仍然归农民使用，直接向东印度公司取得无限期的租佃权。各类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田赋，即被承认为土地所有者。农村的上层分子逐渐成为小地主，农民则很快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成为无地无权的佃农，随时遭到被驱逐出土地的厄运。根据莱特瓦尔制，从前属于村社的牧场和荒地被殖民者的国家没收

① 《东印度公司文件汇编》1832 年伦敦税务署第 3 卷第 16—17 页。

② “莱特瓦尔”（ryotwari）一词来自阿拉伯名词“莱特”（ryot），意为农民、佃农之意。

了，农民也不得进行放牧和垦荒。由于农村土地实际上已被少数上层分子占有，农民并未得到多少土地，大部分土地落到中小封建主手里。在莱特瓦尔制度下，农民地租的苛重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不是固定的。耕种土地成为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农民不能随意离开土地。

莱特瓦尔制的推行加强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把土地变成了殖民者国家的财产。殖民当局开始把农民看作是自己"永久的佃农"，他们有权要农民缴纳任何的地租，课征任何的田赋。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封建方式剥削印度人民，榨取殖民利润。农民欠缴租税日益增加。19 世纪期间，英国当局在修订土地税率时，不得不注销一些欠款。英国当局不打自招地承认："从 1818 到 1855 年以及后来的全部征收土地税的历史，是一部坚决地和公正地要求大幅度降低土地税率和注销欠缴税款的历史。……这是由压在莱特身上的过于沉重的土地税引起的。"[①] 但是农民摆脱不了沉重的租税和债务的枷锁，他们的状况更加悲惨。

1822 年，英国殖民者还在印度北部瓜廖尔和奥德地区，实行了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度。它的特点是税额不是固定的，而是每隔 25 至 30 年重新审定一次。土地所有者不是孟加拉那样的大包税人，而是中小封建主。不固定的柴明达尔最初要把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地租的 83%缴给东印度公司，自己只能留下 17%。这里的农民遭受剥削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他们同英国殖民者所统治的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遭受着东印度公司、封建主、高利贷者和投机商人的层层盘剥和压迫。

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这种改革后的土地制度，在印度农村培植了一批地主，这一阶级和殖民者一样吸吮着农民的血汗，为英

---

① 《印度政府的土地税政策》第 166 页，加尔各答 1902 年版。

国殖民者的帮凶，而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农村推行的改革制度，完全是为了殖民者的贪婪私利，结果把农民弄得穷困不堪。马克思写道："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①] 新地主柴明达尔用尽一切办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不停地向农民压来。孟加拉最初的地租固定为300万英镑。但到20世纪初，柴明达尔却向农民征收了1200万英镑。农民陷入了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之中，饥饿、疾病、死亡夺去了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的生命。

由于英国殖民者实行上述土地政策的结果，使印度的土地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公社土地所有制。"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②] 由于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土地买卖的发展，大部分土地都转入了商人、高利贷之手。这样英国殖民者不仅培育了支持自己的地主阶级，而且把商业高利贷资本导致了购买土地和继续进行封建剥削方面，使其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阻塞了印度民族工业发展的可能，来达到使印度经济永远从属于宗主国英国的目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实质，指出："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是英国人用命令实现的两个性质相反的土地革命。一个是贵族性质的，另一个是民主性质的，一个是对英国大地主占有制的拙劣摹仿，另一个是对法国的农民占有制的拙劣摹仿。但是，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占有土地的掌管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的利益。”①

英国资产阶级依靠对印度的剥削，于19世纪初完成了产业革命。英国的产业革命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英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特别是在反雅各宾和拿破仑战争中，英国确立了工业、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权。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废除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期满了，国会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这样，英国对印度的剥削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写道：“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1813年取消贸易障碍以后，英印之间的贸易额在很短的时间内增加了两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贸易的整个性质也改变了。”②

在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独占贸易的特权之后，英国对印度市场的控制范围更加扩大。在英国工业资本剥削印度的新的阶段中，除直接掠夺和使用暴力方法外，向印度倾销商品已成为剥削印度的主要方式。19世纪上半期，英国输往印度的商品直线上升，而对印度的手工业和商业则具有毁灭性的摧残和打击。马克思说：“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棉织品工场，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印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毛织品和英国的棉织品。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2—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73—174页。

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1]1818到1836年，从英国输入到印度的棉纱增加了千百倍。印度生产的棉花被运到英国，在英国进行加工，再以布疋的形式运回印度。在取消独占贸易后的15年内，英国向印度输入的布疋增加了3倍。从1814—1835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90万码增加到4600多万码，而同一时期印度输入英国的棉布却从125万疋下跌到30.6万疋，到1844年更跌到6.3万疋。英国把印度变成商品销售市场以后，英国也开始把印度变成原料产地，从1834—1858年，由印度输往英国的原料产品，如棉花、兰靛、粮食等产品总额由818.8万英镑增加到2827.8万英镑，即增加了三倍半。

英国对印度工业的破坏性作用，不只是由于机器工业的优越技术，而且是由于英国商品可以自由进入印度市场，而殖民当局却以高额税率限制印度商品输往英国，同时限制印度商品同欧洲和其他各国进行直接贸易。

在廉价的英国工业品的打击下，印度具有悠久历史和高超工艺的纺织业崩溃了，其他的旧有工业如造船业、五金业、玻璃业、造纸业及多种的手工业也都被摧毁了。印度工业的被破坏，使千百万手工业者陷于破产。英国在破坏了印度的旧工业之后并没有建立起印度的新工业，这些精通本行技艺的工匠只得变成乞食的流浪者，无食果腹，他们当中数十万人惨遭死亡，1834年印度总督班廷克说："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2] 往日工业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例如达卡、穆迟达巴德、苏拉特等，经过英国统治了几年之后，也遭到严重破坏而荒芜，1840年一个英国议会印度调查委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74页。

②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72页。

说："达卡城的居民由十五万减少到三、四万人，城市很快地长满了莽丛，疟疾迅速地流行起来。号称印度的曼彻斯特的达卡城，由一个繁荣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小镇，这个城市所遭受的灾难确实是非常大的。"印度其他城市，所遭受到的浩劫也与达卡一样的悲惨。

1832 年英国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巨头直接参与了国家政权，他们对英国的印度政策发生了直接的和越来越大的影响。根据 1833 年的法令，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变成了抵押印度税收的承押人，公司的商业组织解散了，印度完全成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殖民地。

军队是英国殖民统治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土著雇佣兵。英国人利用这种军队征服印度，还利用它控制和统治印度。1830 年时，土著雇佣军达 23 万。"大约只有两万名英籍军人分布在印度大陆上。"① 由他们来控制大量的印度籍土著士兵。从 1817—1819 年第三次对马拉塔战争后，印度已有 30 年没有大的战事，这支部队就执行着国内治安的警察职能。印度土著武装力量，主要包括三支军队：孟加拉军、马德拉斯军和孟买军。他们在种姓成分上、组织和作战地区等都有很大差别。孟加拉土著雇佣兵只在印度服役，而孟买兵和马德拉斯兵则常常被调往缅甸和中国等地方作战。土著雇佣兵处于极低下的地位，他们的每月薪饷只有 7 卢比，战时 10 余卢比。他们的职衔不得超过上尉级。任何一个英籍班长实际上都比他们高。殖民者为了拉拢他们，规定其家属享有赋税优待和诉讼案中的优先审理。

司法制度在印度的殖民机关中起着重要作用。在 19 世纪初，每一管区有一个最高法院，共计三个。它们不受总督管辖，法律

① 特里维廉：《坎普尔》第 20 页，伦敦 1910 年版。

诉讼完全有利于英国人，他们可以收买和雇佣任何当事的"证人"出庭作伪证。在刑事审判中处处是敲诈勒索和肆意妄为。民事案件则不负责任地任意积压和拖拉，一件司法审判有时要拖延七八年甚至十几年，诉讼费也随着时间而增加。高昂的诉讼费使案件的有关人员倾家荡产。英国的司法制度对印度村社解体起着推进作用。土地法实施后，农民被迫出卖土地，促使公社瓦解。英国统治者也承认："情况迅速恶化，直到缴不起田赋和整个农村落到买主或包税主的手里为止，在他们的压榨下，从前的土地所有者—农民实际上成了难以驯服的雇农。"① 随着村社的解体，柴明达尔所委派的村长逐渐变成了政府的官吏，村社的差役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仆役，他们每人领取几个卢比的报酬而为殖民者效劳。

英国殖民者在统治印度的内政方面，制订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经常利用印度境内的一个民族来反对另一个民族，以便使它们都遭到削弱。殖民主义者还利用宗教纠纷，鼓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不和与斗争，来为殖民者谋利。殖民者利用宗教僧侣来毒害和麻醉印度人民。帝国主义者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手法来分裂印度。马克思指出："罗马的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是大不列颠大约一百五十年来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国的重要准则。总合起来构成那个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的不同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国家彼此之间互相仇视——这种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基础。"②

英国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彻底破坏了印度的工业，也破坏了印度的农业。印度农业命脉的灌溉系统，常年失修。殖民者没有从印度榨取的数千万卢比中，拨出一文钱，维修和建设灌溉网，致

① 《1852年英国国会期间奉上院命令出版的会刊》第18卷第525页，伦敦1852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1页。

使印度千年的灌溉体系遭到破坏，使这块肥沃土地上的农业陷于破产。东印度公司带给印度人民无穷的灾难，必将引起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强烈斗争。

第六节 英国侵占印度的完成及其后果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它的标志是1832年英国第一次国会改革法），为了加速印度的殖民地化，英国殖民者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集中反映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833年关于特许状的法令，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马克思为此曾写道："公司什么生意都不许做了，它的商业性没有了，而且还被剥夺了禁止不列颠臣民在印度居留的特权。"[①] 东印度公司的领地，在以后的20年内，受国王的委托，继续由公司监督。这个法律使印度立法制度发生了变化，孟买和马德拉斯政府失去了立法权，这个权利转到总督和三人委员会的手中。这个法令，尽管表面上规定印度人可以同英国人一样，在东印度公司内任职，实际上是徒具形式。这一改革的实行，特别有利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印度国内关卡的取消，财政的整顿，管理的集中，都有利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对印度的掠夺。当1833年的特权法案公布时，在印度担任总督的威廉姆·班廷克（1828—1835年），整顿了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减少了公司的赤字，消除国内关卡，把公司的行政管理加以集中，同时大大地推行了鸦片贸易。班廷克开始用欧洲教育方式，来训练为殖民者效劳的印度人。他颁布了关于禁止寡妇殉夫的命令，废除寡妇殉葬制度。取缔了以尊崇宗教为由而杀人的汰旗教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73页。

班廷克统治政策，促进了东印度公司行政机构和财政制度的改革，暂时稳定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为进一步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作了准备。

19世纪开始的25年间，英国殖民者先后向尼泊尔、马拉塔公国和缅甸等地发动了侵略战争。

1768年廓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英国人极力插手尼泊尔，1792年英国人与廓尔喀人缔结了贸易条约，并派遣了军事代表到加德满都。直到1814—1816年的对尼泊尔的战争，才迫使廓尔喀人签订与批准了萨高利条约，英国人从尼泊尔割取了一片土地，并派统监驻扎加德满都。在英国人最后对马拉塔的战争中，打败了这个强盛的公国，巴吉·拉奥于1818年6月向英国人投降。接着他被幽禁在坎帕尔附近的比瑟尔，他死于1853年。帕什瓦的领土被英国人所统治，并且并入了孟买辖区。英国人对缅甸的第一次战争发生在1824年3月，至1826年2月结束。18世纪中叶，雍籍牙统一了上缅甸和下缅甸，直接与印度接壤并发生对抗，这次战争迫使缅甸国王割让了阿拉干省和丹那沙林省给东印度公司，并支付1000万卢比的赔款，英国特使同时派驻缅甸。1852年又发生了一次战争，缅甸丧失了勃固省。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占信德和旁遮普，除了进一步满足英国殖民者的领土扩张野心，它还企图以此地区作为侵略中亚细亚的跳板，以便和当时野心勃勃的侵略势力沙俄竞争。马克思指出英国的意图："占有了旁遮普和信德，就可以击退来自中亚细亚的任何侵犯，对抗正向波斯边境扩张的俄国了。"[①]

19世纪前半期，信德为海德拉巴土邦王公所统治。19世纪初，英国人迫使他们签订了条约，其目的把信德纳入英国势力范围，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71页。

止邻近的锡克教国家势力的增长。1839年进而将它置于英国保护之下。1843年又发生了对信德的兼并战争，海德拉巴被占领，信德也被并吞。

旁遮普当时处在锡克教徒的统治下，兰季特·辛格1780—1836年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他在近25年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吞兼了境内旁遮普王公和各小王公的领土。他的统治下设有卡斯特的等级区分，从农民那里征收适度的税额。并由农民组成富有战斗性的军队。这支军队装备很好并受过法国军官的训练，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在他后期已达6万余众。兰季特·辛格不仅利用这支军队防止了英国人的侵略，同时利用它向其他王公国扩张。从1818—1823年，他先后占领了木尔坦、克什米尔和白沙瓦等。兰季特·辛格王国从萨特累季河扩张到开伯尔山口，从北方的小西藏到南方的信德边界。英国人阻止了他并吞信德，不让他的势力扩张到海上去。辛格进行的多次战争牺牲了众多的士兵，削弱了军队，也削弱了国家力量。随着战争的进行税额的无限增加，农民破产，从而削弱了锡克教徒的国家。

1839年兰季特·辛格死后动乱发生了，封建集团互相争权夺利。很多上层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寻求英国人的支持。他们想得到征服者的支持而当上附属王国的大臣。握有实权的封建主组织了阴谋活动，并与东印度公司进行勾结。它的主谋者是宰相拉尔·辛格和总司令塔杰·辛格等。英国侵犯锡克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锡克的军事首领仓促与英军交战而失利。1845年12月锡克人的军队渡过萨特累季河，英国迎战而获胜。叛徒的叛卖使锡克军队接连遭到失败。英军于1846年2月渡过萨特累季河，占领了拉合尔。锡克人失败，终于1846年3月缔结了条约。查兰达河间地区割让给英国人，并付出150万英镑的赔款。割让出克什米尔，它被以100万英镑卖给查谟的统治者。这样，这个国家的

实际统治权已掌握在英国人手里，驻扎在拉哈尔的英军成为它的实际统治者。旁遮普已变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附属国。

1843年锡克教又组织了反英起义，一月间在奇利安瓦的战役中，起义的军队击败了英国殖民者。随后，在1849年2月的古吉拉特战役中，英国侵略军利用强大炮火的优势又挫败了起义军，起义的领导者舍尔·辛格及积极参加起义的其他地方官员都作了俘虏。旁遮普因而变成了英国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英国殖民者攫取了管辖它的无限权利。不甘遭受外族压迫的锡克教徒再一次组织了起义，但是又遭到英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而失败。英国当局增加了旁遮普的驻军，加强了对旁遮普的控制与统治，旁遮普终于沦为英国殖民地。这样，英国对印度的全部征服完成了。马克思写道："英国用武力并吞了旁遮普和信德，这样，从人种边界、政治边界和军事边界上看，就在东印度大陆全境最终建立了不列颠的统治。"[①] 从1849年起，一个庞大的英印帝国开始出现。

19世纪中叶，印度的全部土地都掌握在英国殖民者的手中。马克思写道："在征服信德和旁遮普以后，英印帝国不仅达到了它的自然界限，而且还抹去了印度各独立国家的最后痕迹。"[②] 在征服印度的整个战争期间，英国殖民者使尽各种阴谋手段：参与印度王公的内讧，伪善的结盟，公开的欺诈、挑唆、贿买、勒索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总之，英国殖民者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手段征服了印度。英国殖民者同时实行愚民政策。英国人说：印度"人民群众是用不着教育的。不过我们应当努力造就出英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数百万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阶层，具有印度血统和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1页。

色而有英国趣味、观点和智能性质的阶层。”[①] 在印度学校用英语施教，向印度学生灌输歪曲印度历史和现状的概念。通过教育和传教士的活动，对印度人民进行思想意识上的征服。

英国用武力把印度的土地统一在自己的政权之下以后，印度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英国统治了整个印度，唆使一部分印度王公反对另一部分王公的政策已经过时，而这时全部被奴役的印度都在与英国对抗。马克思指出："它已成为唯一的征服者，而不必再从事征战。它手下的军队不需要再去扩展它的领地，而只要保持这些领地就行了。士兵变成了警察。”[②]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又有了新的运用。印度的统治统一，出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一方面这种统一结束了过去无限的战争和封建内讧，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基础；另一方面为反英的全印运动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况下，为了防止全印的反英运动，殖民者完全保留了印度的分散性，把印度的统治区域分为直接领地和藩邦。为数众多的大小封建王公，保留了他们对臣民的无限权力。印度领土的 1/3 和人口的 1/4 为 500 多个藩邦所统治。封建公国星罗棋布，杂乱无章；面积大小悬殊，大的等于一个法国的领土，小的只有一个小村落的土地。这种封建性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印度人民的联合，延缓了印度各民族的形成。“世袭的王公是英国专制制度最驯服的工具。”[③] 这些寄生的藩邦王公，成为印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19 世纪中期，印度进一步变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自古以来印度就是世界棉纺织品的大工场，产品的美观和实

① 马考莱：《印度教育情况纪实》第 1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25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26 页。

用闻名于世。棉织品、生丝、硝石是印度的重要输出物资。自普拉西战役以后，印度的棉丝织品手工业开始衰落了。东印度公司只允许生丝的制造，而不鼓励丝织品，它对棉织品和生丝进行垄断性的控制。英国的法令规定，从印度输入的丝棉物品"不能在英国穿用或做其他用途"。殖民主义性质的关税，进一步挫折和毁灭了印度工业，印度的纺织工业和造船业一蹶不振。英国殖民者只鼓励原料出口，特别是生丝和靛青，成为英国的工业生产原料。英国的关税制度也将印度工业置于死地，英国输往印度的丝棉织品交纳 3.5%的关税，毛织品为 2%。印度输往英国的棉织品要纳 10%的关税，丝织品为 20%，毛织品则高达 30%。1824 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织品不到 100 万码，而 1837 年则达到 6400 万码以上，13 年间增加了 64 倍。印度人民生活的整个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印度进一步变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英国殖民者决意完全占领各附属公国的领地，合并到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中来。在锡克教徒起义被平定以后，印度各附属国的王公已变成软弱无力的附庸。英国人还不敢轻易取消"土邦"。但他们开始削弱土邦王公的权力，其中包括王公在无嫡嗣时指定继承养子的传统权力。英国驻印度总督大贺胥（1848—1856 任期）颁布了"无嗣继承法"。采取了"领地没收论"的主张：各公国在没有直接继承人时，必须将领地转交东印度公司管理。英国拒绝承认养子可做法定继承人的印度的古老法制。根据这种主张，大贺胥首先吞并了萨塔拉，并且用同样手段兼并了其他各公国，奥德、那格浦尔、詹西等先后被宣布合并于东印度公司，一些王公的头衔被取消，他们的供养金也停止支付。大贺胥总督时代，取消和兼并了许多土邦，约占全部土邦的 1/3。由于确立了英国的直接统治，不仅加重了对这些地区农民的剥削，而且由于失掉了职位和收入的来源，许多封建主阶级人物，旧土邦宫廷和军队服务的手

工业者和商人也破产，社会矛盾更为尖锐。

为了把印度变成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殖民主义者在土地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在掠夺性的捐税和封建残余统治被保留的基础上，农民的半农奴地位被取消了。1852年，大贺胥颁布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在施行莱特瓦尔制度的马德拉斯和孟买等邦中，农民耕种土地已不再是国家强制的义务，土地税额也略有减低。此后，土地价格立刻开始上涨，土地为高利贷者和商人等所收买、兼并。在实行固定的和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度的地区里，土地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英国殖民者的干预和推动，土地由旧封建王公手中，迅速地转移到高利贷和商人手里。寺院封建主也在改革之列，寺院封建主的60%的土地被没收，剩余的土地同样课以地税。

由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实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的结果，彻底破坏了印度社会旧的经济结构，即破坏了把自身活动建立在农业和手工纺织业相结合的农村公社。马克思在考察英国殖民政策的这种破坏作用时，把1813年作为分界线。他指出，在此以前，虽然对印度的大量掠夺，土地私有制的盛行，对灌溉和公共工程的忽视等等，已使印度的农村公社开始崩溃，但还没有给它带来“致命的打击”。因为，“单是收税人不能完成这种任务，要消灭此等村落自给自足的特性，必须破坏极旧的工业。”[1]1813年以后，随着英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559页。

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①

印度在旧的经济结构崩溃以后，却没有很快形成新的经济结构，英国的殖民统治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饿——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②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19世纪初期，英国殖民者为了便于掠夺，开始在印度修建铁路，30年代起大规模筑路，首先修复早在莫卧儿帝国时代就有的从德里至阿格拉的铁路并把它延伸到加尔各答。英国并着手建立了一些原料加工工业，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到了殖民地印度，从而使印度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地分析，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③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实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英国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级便于对印度人民的掠夺而发财致富。在大贺胥统治的年代里，英国在印度开始大规模地铺设铁路并设置了电报通讯。新的技术，新的改革，消除不了人民中间的不满情绪，同样也阻止不了日益逼近的革命风暴。马克思写道：1856 年“大贺胥下台，临别时提出一个报告吹嘘他的功绩：其中他提到关于运河、铁路和电报的建设；税收增加 400 万英镑，由于兼并奥德而获得的收入尚不在内；驶进加尔各答商船吨数几乎增加一倍；实际上财政有赤字，但他解释这是由于对社会事业巨额拨款的缘故。——对这吹嘘的回答是印度雇佣兵革命（Sepoy Revolution）（1857—1859）。”①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 178 页。

第三章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

第一节　起义前夕印度社会各阶级状况

英国殖民者完全占领了印度之后，“自己高高在上，整个印度都伏在它的脚下。”① 英国开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印度，同时也就第一次打下了印度各地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共同基础。全印度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成为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19世纪50年代，印度到处滋长着对殖民统治的反抗情绪。英国对印度侵占的完成也正是它统治印度危机的爆发。

英国殖民统治彻底破坏了印度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用暴力使印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附属殖民地，变成了宗主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他们利用柴明达尔制度使印度的农业适应自己的需要，适应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英国殖民者加速了印度农业的专门化，扩大了黄麻、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同时把大片土地变成了茶叶等作物的种植园。

大麦和小麦的输出量急剧增加。1849年英国从印度输出价值85.8万英镑的粮食，1858年则猛增到380万英镑，10年内增加了4倍多。

在印度农村的农民处在殖民者及其走狗高利贷者、地主的双重压迫之下，被迫失掉土地而陷于贫困，变成了地主的佃户。英国殖民者一系列的土地政策的目的，使新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1页。

起来了，这是符合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的，从而保持了它对印度农村的掠夺。在东印度公司的总收入中有2/3是从田赋中搜刮来的。在柴明达尔制的地区里，殖民者利用其走狗柴明达尔共同剥削农民；在莱特瓦尔制地区里，殖民者直接掠夺农民。农民所受的剥削进一步加剧。孟买和马德拉斯管区在19世纪50年代，实行税务改革，规定了固定税率。孟加拉也实行了固定税制，从而引起了农村的严重的两极分化。西北省的土地所有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的土地和世耕的份地为抵债而变卖。农民生活无着，“与其说他们痛恨债主，不如说他们痛恨国家。他们认为他们除了消灭这一制度外，别无生路。”[①] 高利贷者和商人成为地主以后，仍保存着甚至加强了封建剥削。农民的处境每况愈下，“农民，即印度人民的绝大多数，通常是处在赤贫和绝望的状态中”。[②] 殖民统治者贪婪掠夺，而忽视了农业灌溉的水利工程的开发和维修，致使印度的农业遭受到致命的打击。马克思指出：“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③] 灌溉工程荒废的后果，使大批粮田变成荒地，而给印度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农民穷困到无法生活的程度，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内外压迫者。在英国统治下，印度农民的反抗斗争是层出不穷。1855年孟加拉的拉兹玛哈山地区的桑达尔部族爆发的起义，就是印度农民英勇斗争的一例。这次起义后来发展成为反英的游击战争，坚持斗争达7个月之久，直到1856年2月，才被英国殖民者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一百年来英国殖民者的残酷统治，而造成的饥馑、灾荒以致农民的流离失所，是

---

① 米德：《土著雇佣兵的起义》第318页，伦敦1859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65页。

他们进行武装起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根本原因。农民是这次印度民族大起义的主要动力。

英国片面的"自由贸易"政策，严重地打击了历史悠久工艺精良的印度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印度的手工业彻底破坏了，大批手工业者失业而丧失生计。他们世代相传的优秀手工技艺，已完全无用武之地了。尼赫鲁描述这种情况时写道："他们归日的职业对他们再也无分了；通向新职业的道路又遭受了阻塞。"[①] 破产的手工业者不得不大批涌向农村寻找出路。在农村中耕作的原始方式和英国的殖民主义的土地政策，早已使农民遭受着沉重的压迫。手工业者在农村并不能使他们的悲惨处境有所改变。印度的手工业者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极为仇恨。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他们就踊跃地参加了伊斯兰教"清净派"所领导的反英斗争。他们是积极参加这次民族大起义并成为起义动力之一的重要力量。

印度被英国殖民者强制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个过程也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灾难。在印度的封建经济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推动了印度社会的前进，但这需要印度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成千上万人民的死亡和众多劳动人民的贫穷和破产。资本主义关系在印度城市和农村，同样地发展起来了。在农村中形成的资产阶级大多是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19 世纪中叶，印度也出现了工业资产阶级，同殖民者进行合作，是在印度开始建立某些工业企业的条件之一。1854 年，在加尔各答创办了第一所黄麻工厂，两年后，又在孟买创办了第一个棉织工厂。1854—1856 年间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开设的这些工厂，是早期的印度民族工业。印度第一批工厂主，是从同海外市场有联系的买办

---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 388 页，世界知识社 1956 年版。

阶层产生出来的，他们在海外市场起着销售英国商品的中介人的作用。在这种贸易中致富之后，他们决定自己开办工厂。他们在自己的工厂里使用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使用了异常残酷的剥削手段，以至超经济的剥削方式，在产品的耗费上比英国工厂少得多，因而在同英国人的竞争中，免遭破产。殖民统治者与民族资产阶级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宗主国多方面的钳制与抑止，萌芽状态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反殖民主义的倾向。

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开始培养为殖民者服务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不自觉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和资产阶级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即出现了受过欧洲教育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罗姆莫汉·罗易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婆罗门大地主贵族家庭，毕业于巴特那伊斯兰教学院，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腊文，深谙梵文和英语。青年时代在东印度公司任过职。1814年，辞去东印度公司的职务后，致力于社会工作和文学工作，把当代的科学和文化介绍到印度。他的宗教哲学体系否定印度教的教义，反对卡斯特和宗教的习俗，反对妇女自焚殉夫的恶习。为了进行宣传。他于1821年和1823年在孟加拉先后创办了两种报纸，并于1828年在加尔各答创立了“最高精神信徒”协会。他对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他曾不倦地从事文学创作，他是第一个用孟加拉文写出反封建作品的人，他编著了孟加拉语语法。他强调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积极提倡世俗教育。他是印度史上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力图维持印度落后性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先躯者。印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为英国殖民者效劳，另一方面他们也具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虽然在起义前夕这一阶层的人数还很少，但却

反映了当时社会反殖民主义的爱国倾向。

起义首先是在英国在印度的雇佣军中开始的，被称为“土兵”的印度雇佣军是起义的重要力量。“土兵”一直是英国殖民者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东印度公司利用“土兵”的刺刀，征服了印度并对其进行掠夺与盘剥。马克思指出：“这支军队的军事实力是英国在印度的整个统治的支柱。”①

英国殖民者利用约30万雇佣军统治了两亿印度人民，同时利用4.5万皇家英籍军官控制着这些‘土兵’。英印军队编成三个军团：孟加拉军团、孟买军团和马德拉斯军团，由一个总司令部指挥。驻在印度北部阿萨姆到旁遮普之间广大地区的孟加拉军团最大，人数超过17万人，其中印籍土兵约14万人。“土兵”都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为生活所逼迫不得不在这条可怕的道路上谋一生机。在英印军队中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土兵”被迫为了殖民者的利益而到处征战，得到的却是英国军官的歧视、怀疑和侮辱，自己很难成为军官，而要受英籍军官的监视。他们的宗教信仰遭到粗暴的干涉、殖民者利用威吓、利诱等手段，强迫他们信仰基督教，并经常侮辱他们的习俗。在殖民者全面占领印度后，“土兵”与殖民者的矛盾更加剧了。“土兵”享有的许多权利，如减少其家中的捐税，战时多得一半薪金等，也被取消了。殖民统治者常常违反雇佣条例，把“土兵”派往印度境外作战，英国对阿富汗、缅甸、波斯、中国等国的侵略战争，经常派遣印籍军队参加，给“土兵”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负担和牺牲。“土兵”和广大印度下层群众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孟加拉军团的土兵，大多数是从奥德应征的，殖民者吞并了奥德，也使他们的家乡受到威胁。曾任印度总司令的罗伯茨写道：“印度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6页。

坦土著雇佣兵的主要兵源地正笼罩着愤懑和骚动。”[1]“土兵”与印度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1850 年英印军队共有 28 万人，而印籍军队就有 23.5 万人。英籍士兵和印度“土兵”地位、待遇的异常悬殊，也激起了“土兵”的强烈不满。种族歧视侮辱了他们的民族感。不平等的待遇也促使了印籍土兵的反抗。统率土著雇佣兵的印籍首长，还没有一个英籍下级军官的俸饷多，英国无知的级低军官可对他任意指挥。19 世纪 50 年代初，英印军中的一些规章制度，也加剧了土著雇佣兵的愤怒。他们拒绝到海外作战，如拒绝参加英阿和英缅战争，英国当局却要求新兵宣誓准备派往任何指定地点服役作战。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上也极为歧视，凡改信基督教的均可按规定升级。英国当局还限制土著雇佣兵看报和宗教活动。“土兵”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在他们中间广泛地流传着传单，鼓舞“土兵”起来反抗，其中有一份这样写道：“弟兄们！我们是在亲手拿外国人的利剑来刺自己的身体！只要我们起来，就一定会胜利。”[2] 号召“土兵”调转枪口打击英国殖民者。当时英军忙于侵略其他国家，1857 年在从巴拉克普尔到阿格拉长达 750 英里的交通线上，只有一个英国联队驻防在巴特那附近的第那普尔，“土兵”也觉察到自己力量的作用。在比哈尔蓝靛种植场的农民起义和桑达尔部族起义的推动下，握有武器较有组织的“土兵”，很快就调转枪口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大起义。

殖民主义者大贺胥执行着英国资产阶级的使命，完成了最后占领印度的侵略计划。1848 年吞并了旁遮普和萨特拉，1853 年吞并了比哈尔和詹西。1856 年他把英军集中在坎普尔后，即下令占领了奥德公国。大贺胥到处触犯封建主的利益，他不承认封建统

---

① 罗伯茨勋爵：《在印度四十一年，从副官到总司令》第 1 卷第 415 页，伦敦 1897 年版。

② 阿肖克·梅达：《1857 年的大起义》第 10 页。

治者的立嗣权，并剥夺了他们的恤养金。许多封建主和王公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被剥夺或受到限制，而纷纷怨恨不满。大贺胥同时剥夺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僧侣寺院原先享有的土地免税权，并没收了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外国侵略者也侮辱了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感情，一部分上层僧侣和印度人民一样，同样仇恨殖民统治。

起义前夕，印度的局势非常紧张，英国殖民者坐在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火山上。全印度反对英国殖民者政治基础形成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十八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加紧对印度的奴役，是激起这次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①]

第二节 反抗殖民统治的大起义

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19世纪50年代，印度到处酝酿着反英的起义。秘密组织在恒河盆地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展开活动，其中著名的组织者是毛列维·阿穆德·沙，他是破产了的收税区长。封建主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他们通常是秘密组织的领导者。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僧侣，也在人民和军队中进行着广泛的活动，他们是秘密组织的主要骨干。在1856年中，便出现了起义的标志，当时在乡村间开始传递着一种叫着"恰巴奇"的薄面饼，印度农村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传统，用这种方法报告外来军队的入侵、瘟疫的发生或其它灾难。印度人这次传递面饼是同反英起义的宣传直接联系起来的。它是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传送重要消息的信号，这个村庄便立即烤制新的面饼派使者陆续向邻近村庄传送。

---

① 王藻：《一八五七年印度人民起义》第2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在1857年这种“恰巴奇”就成了起义的信号。但是印度当时还没有条件把一些分散的反英秘密组织统一起来。而在较有组织的“土兵”中，这种酝酿过程已经成熟起来，起义首先在“土兵”中发难而爆发了。在土兵中则传递着莲花而互通消息。

起义的导火线是由于涂油脂的弹药而引起的。英国在印度军队开始使用新式的恩菲尔德火枪，1857年1月，殖民当局发给了土兵以涂着猪油或牛油的厚纸包装的新子弹。他们在装枪时，必须先用嘴咬破子弹的厚纸皮。由于伊斯兰教禁止食用猪肉，而印度教则不食牛肉，新子弹的使用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中引起反感和愤恨，他们认为外国殖民者污辱他们正统的宗教信仰，是想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1857年2月间，印度许多地区发生“土兵”拒绝使用新子弹的事件。1857年3月29日，在距加尔各答不远的巴拉克普尔，在检阅“土兵”第34联队时，一个名叫曼加尔·潘德的印度兵开枪打死了英籍军官。起义开始了。尽管殖民者解散了该联队，曼加尔·潘德被处死，但他发出的第一枪，却点燃了印度人民对殖民者的仇恨怒火，全印度展开了埋葬殖民主义者的反英大起义。

1857年5月10日，驻扎在德里附近的密拉特城的土兵师团举行了起义，打死了英国军官。这里驻有1500名英籍土兵和部分炮兵，但也没有能力采取措施，镇压起义。数以千计的农民从近郊赶来，他们带着原始武器，和起义的“土兵”一起袭击殖民者，市民也积极参加了起义。人民和军队中的秘密组织在联系发动起义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义者抓住战机，主动进攻。秘密组织立刻向德里派去使者，并切断了电线，断绝了英国殖民者的电讯联系，守住关卡要道，积极准备向德里进军。人民起义的怒火在密拉特燃烧起来了，起义者杀死了许多英国殖民官吏。殖民者惊慌失措，张皇四逃，往日的威风为之一扫。起义军迅速地向印度的

古都德里挺进。5 月 11 日密拉特的起义者进军德里，和德里的"土兵"会合起来。在德里，城市贫民亦举行了起义，并受到了郊区农民和德里市民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德里是印度古都，四周有坚固的城墙，有七个城门和筑有射门的炮塔，起义者很快控制了这座城市。德里的几乎所有的英国军官都被消灭了，东印度公司的机关被烧毁。并毁坏了一切标志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建筑物。"土兵"们使用了他们不久前拒绝使用的子弹，来杀伤敌人，他们受到德里市民的热烈欢迎。在密拉特的军队进入德里时，城市中的几千名穆斯林把他们围拢起来，表示慰问；印度教徒则到处拿着水罐用山葵和糖果做成的浆液来慰劳这些起义的战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抛却了往日的嫌隙，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了。在一个号召起义的文告中写道："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兄弟们！你们要知道，如果这些英国人留在印度斯坦，那末他们就会把我们都杀光，把我们的宗教都消灭。印度斯坦的人民长久以来一直就受着英国人的愚弄，用自己的剑在杀自己。因此，我们现在都应当赎还自己有负国家的罪行。英国人现在也还会玩弄他们那套老把戏，他们会想法挑拨印度教徒来反对穆斯林以及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文告接着号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们，"忘掉你们之间小小的分歧，参加到这个神圣的战争中来吧！投身到战场中来，在一个旗帜下战斗，用鲜血的洪流把印度斯坦土地上的英国名字冲洗干净！"①

印度民族大起义风起云涌地展开起来，起义的风云波及全国。德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印度各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印度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城市，如阿格拉、阿拉哈巴德、坎普尔、贝拿勒斯，巴特那、詹西等地都发生了"土兵"和农民以及市民联

① 森德拉尔：《1857 年印度民族起义简史》第 40 页，世界知识社 1957 年版。

合的起义。民族起义像熊熊烈火一样在各地燃烧起来了。从加尔各答近郊到白沙瓦漫长的地带都发生了起义。起义的领袖有坎普尔的那那·萨希伯，他是前帕什瓦巴吉·罗二世的养子，他是被大贺胥剥夺了王位和恤养金的封建王公，他自称帕什瓦，也是奥德秘密组织的领导人：坎普尔的将军坦提亚·多比，詹西女王拉克希米·拜依和勒克瑙的毛列维·阿穆德·沙等都成为起义的著名领袖。

面对着普遍爆发的民族起义，英国殖民者惊慌失措。"土兵"发动起义后，农民组织了游击队，到外袭击殖民者。在勒克瑙的街道上贴满了反英的标语、口号。在英国总督所在地的加尔各答，殖民者也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天天流传着将要起义的消息。总督坎宁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恐惧心理，在6月的一个夜里，只穿了一条短裤仓皇地溜到船上去了。

同时爆发的大规模反英起义没有联合成一个中心，这种各地分散的起义给殖民者各个击破，分别"围剿"造成了时机。英国殖民者调动了其在亚洲的侵略军队，从四面八方来围攻起义者。侵略中国和伊朗的军队都被调往印度。从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和孟买，从加尔各答，从旁遮普都调来军队，镇压起义。加尔各答是反对印度起义的主要基地。从6月起，阿拉哈巴德的起义被镇压了，在殖民军的屠刀下，一次即被屠杀了6千多印度居民，在贝那勒斯也以同样的方式对起义者进行了屠杀。7月16日英军将领哈伐洛克偷袭了坎普尔，那那·萨希伯败走，英军进入坎普尔后，大肆掠夺和屠杀，起义者英勇不屈，与殖民者进行殊死搏斗。哈伐洛克企图解救勒克瑙被围的殖民者，但是，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里的每个村庄的人民都愤起打击英国侵略军，在勒克瑙，起义者进行了更英勇的战斗，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进来。哈伐洛克的军队大败而逃，不得不逃回坎普尔。

德里地区的军事胜利，具有重大意义。起义者占领印度古都后，给予英国殖民者沉重一击，起义不仅夺取了城市要塞，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起义者占领了印度的政治中心，在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占领德里后，起义者宣布恢复莫卧儿帝国，拥立巴哈杜尔·沙二世为皇帝。这表明了印度人民驱逐英国殖民者和恢复印度独立的决心，他们把祖国的独立和先前的莫卧儿帝国的强盛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起义者在占领德里后，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其中军事代表6人，文职代表4人。代表都是经过选举产生，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起义的领导机关，巴哈杜尔·沙二世只是名义上的首脑。

英国殖民者对德里的起义，十分慌恐，他们又害怕起义的继续发展。在德里起义不久，他们决定首先镇压这里的起义。英国殖民者于1857年6月把重兵调往德里，其中有一部分是驻在旁遮普的皇家军。殖民者采取分化拉拢手段，借助锡克封建主的帮助，并利用恐怖手段保持了旁遮普的局势。英国军队逼近德里，并把德里包围。与此同时，在加尔各答登陆的从欧洲调来的英国殖民军，也开始从加尔各答方向出击，他们向恒河上游进犯，对印度人民进行野蛮的屠杀。英国将军下达一道残暴的命令："杀死一切手持武器的人；杀死伤兵；不许接受俘虏"。在沿途上，殖民军遭受到起义者的袭击，英军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后备人力日益减少，战争和疫病造成了很大伤亡。

德里被英军包围后，起义者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但德里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形势对起义者不利，更为严重的是起义者内部不和，缺乏坚强的领导，没有统一的防御计划。英国间谍在城里煽动各首领之间的不和，并阴谋鼓动叛变。巴哈杜尔·沙多次释放了抓到的间谍，他不相信起义的胜利，而力求事先向英国人讨好。起义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从6月起，德里艰

苦的保卫战进行了三个月之久。起义者曾屡次出击敌人，取得了一些战绩。特别是普拉西战役一百周年纪念日时，即 1857 年 6 月 23 日，起义者出击激战一昼夜，给殖民军以重大杀伤。印度历史学家萨瓦伽写道："1857 年 6 月 23 日是普拉西战役百周年纪念日。一百年前的今天，在普拉西战场帝国的赌博中，印度的骰子证明是没有好运的。一百年间，在过去的苦难中不断地增加新的侮辱和羞耻。要用血的斗争，去解释一个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的屈辱地位，去洗刷掉这种民族的屈侮和耻辱，这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得清楚。通过微风的吹动，通过太阳光线的照射，通过大炮的轰鸣，通过刀剑的撞击，所有这一切从各处汇集成一个低沉而隆隆的巨响：'普拉西，为普拉西报仇！'当不幸的普拉西战役一百周年的那天黎明到来时，起义的军队立即涌出德里的拉合尔大门。"[①] 德里起义者英勇杀敌，与英军拚搏，给殖民军以大量杀伤，使英军三易围攻德里的统帅，而德里久攻不下。但起义者缺乏统一指挥，没有形成牢固的团结，行动是各自为政，在英军攻围德里的困难时刻，起义者大批离开了这个城市，保卫者只剩下 2 万人，而削弱了它的防护力量。英国军队利用炮兵和后备军的增援，对德里发动攻击。9 月 14 日，英国殖民者派出 5 个纵队约 8 千多人，从北面向德里进攻。50 门大炮日夜不停地进行轰击。德里城西北部的保卫者，曾经击退了一个纵队的进攻，在正北面城墙附近，保卫者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英军经过 6 天的冲击，于 1857 年 9 月 19 日占领了德里。巴哈杜尔·沙向殖民者投降，他在发动或指挥德里的起义中并没有积极参加。他在德里陷落后被捕，经过审判后被流放。1862 年死于仰光。他的儿子和孙子则被英军枪杀。英军完全占领德里后，一部分起义者撤出德里继续战斗。英

① V·D·萨瓦伽，《1857 年印度独立战争》第 293—294 页，孟买 1947 年版。

国殖民军残暴地镇压了起义者，不论老人和孩子，都难免于侵略者的屠刀；被俘者被绑在炮口上轰击。殖民军的兽行，造成德里城内的惨状不堪忍睹。抢劫到处进行，人民惨遭涂炭，德里躺在一片血泊之中。

德里陷落后，奥德的首都勒克瑙便成了起义的中心。1857年5月31日，距勒克瑙10公里地方的驻军，举行起义。同英军作战后，进入奥德腹地。首府勒克瑙立刻爆发起义，并掌握在起义者手里。1857年9月间，英国从加尔各答派来了新的援军，哈伐洛克带着2500名军队，并有近千名的锡克雇佣军。他们在向勒克瑙推进的沿途中，受到各地起义的袭击，哈伐洛克的军队遭到大量杀伤。9月25日在勒克瑙发生了战斗，英军将领亨利·劳伦斯被起义军击毙，另一将领奥特兰被击伤。哈伐洛克在付出很大代价后，冲进了被起义者包围了长达两月之久的英国官邸堡垒，可是他们却无法再出来，去路被起义者截断了。勒克瑙起义者的领袖毛列维·阿穆德·沙早年在印度南部开始了自已的反英活动。1865年迁到印度北部，这里的反英斗争气氛更浓。他曾到德里、密拉特、阿格拉、巴特那和其他许多城市，到处号召人民起义。他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军事素质，无比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他在奥德定居以后，便着手建立武装部队。1857年初，他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关进监狱，他不屈地斗争，在等候对他死刑的判决。起义后他逃出监牢，成为起义的领袖。

陷于孤立的城堡的英军成为瓮中之鳖，他们只有等待新的援军。驻在德里的英国将军威尔逊，派了一支2800人的部队前来增援，10月25日，这支军队到达坎普尔。11月间，英军总司令柯林·坎培尔集中了优势的兵力，向勒克瑙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英军安置了一部分兵力在坎普尔，以便守卫恒河大桥，保住其交通要道，坎培尔依仗着优势的大炮，终于与被围的哈伐洛克会合，将

被围困的英军解救出来。从14日到23日，在勒克瑙展开了浴血战斗，守卫在这座城市的2万“土兵”和5万民兵，对英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给予英国殖民军以沉重打击，53个军官被击毙，450名兵士伤亡，坎培尔束手无策，只得退回坎普尔。

起义者这时利用战机，打击敌人的要害，不让恒河两岸的英军会合。在坎普尔附近的那那·萨希伯的总司令坦提亚·多比指挥着他的军队，会同冲破封建王公阻挠而赶来的瓜廖尔的“土兵”，利用坎培尔进攻勒克瑙的时机，他们决定占领坎普尔和恒河大桥，以切断从奥德向坎普尔移动的英军的退路。1857年11月19日坦提亚·多比开始行动，通向恒河渡口的要路被温德汉姆指挥的英军所阻，经过两天激战，温德汉姆所部被击溃，英军被压挤到恒河边上。而在这时，坎培尔率军从勒克瑙退回，两军相遇，进行了激烈战斗，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至26日坦提亚·多比被迫向南退却，起义者被英军控制的恒河截成了两部分，中印度和奥德起义者的联系被英军切断，勒克瑙的形势更加孤立了。

同时在勒克瑙起义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起义的军事指挥者毛列维·阿穆德·沙由于要撤换无能的军官和主张继续追击坎培尔的军队，而遭谮言陷害，被封建主关进了监狱。1858年3月初，坎培尔集中了7万军队，重新向勒克瑙进攻。在万分危机的关头，毛列维·阿穆德·沙才被释放，但时机已失，防御工事失修，阵地一个个地陷入英军之手。经过几天的激战后，3月15日勒克瑙陷落了。

殖民者占领这个城市后，和在德里的暴行一样，进行野蛮的烧杀、抢劫。在两周的抢劫中，强盗们不仅洗劫了王宫和封建主的家园，而且手工业者其他居民的住宅也不能幸免。英国侵略者为了抢夺财物使尽了一切野蛮残酷的手段，他们以枪杀、拷打和一切惨忍手段，夺取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们的一切贵重财物。英国

侵略军在勒克瑙掠夺的财物价值达五百万英镑。140 名军官因大发横财而呈请辞职。恩格斯对此曾愤怒地写道："实事是，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洲都没有像英国军队这样残暴的军队。抢掠、暴行、屠杀——这在任何别国军队都是已经严格禁止和完全排除了的行为，——是英国士兵由来已久的特权，是他们的合法权利。""在十二个昼夜内，在勒克瑙的不是英国军队，而是一群无法无天、酗酒肇事、粗暴无礼的乌合之众，分散为一帮帮的强盗"。"1858 年勒克瑙的洗劫是英国军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①

英军攻下勒克瑙后，并不能使奥德的起义者屈服，斗争并未停止。毛列维·阿穆德·沙继续坚持战斗，在起义的后阶段，游击战争不断地打击着英国侵略者。

勒克瑙陷落后，在詹西展开了新的战斗，在朱木那河畔詹西公国的领土上，拉克希米·拜依领导了起义，她是詹西的王后，国王死后大贺胥以无子嗣的理由将它吞并。这时詹西成为反英起义的基地，成为英国殖民者的极大威胁。拉克希米·拜依领导的詹西军民的起义，具有巨大的声势和影响。史学家萨瓦伽对此备加歌颂："马拉塔的旗帜升起来了，斗争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看啊，整个斗争的中心人物就在这里，她光照一切。她是民族意志的中心，她的自治性格十分耀人。她是自由的灵魂，她是自由的化身。"② 作为杰出的起义领袖，詹西女王承担起为印度民族自由而战的光荣历史使命。英国人决定要消灭她而发动进攻，1858 年 4 月 2 日，英军开始进攻詹西。詹西女王拉克希米·拜依亲自领导作战。坦提亚·多比率领 2.2 万人援助詹西，但他未能突破英国的包围圈，增援没有成功。詹西保卫战进行的十分激烈，全城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499 页。

② 《1857 年印度独立战争》第 463 页。

分男女老幼都参加到战争中来，起义者英勇地保卫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变成了抵抗侵略者的壁垒。当詹西无法守住时，拉克希米·拜依从城市突围，和坦提亚·多比联合起来，准备新的战斗。在卡尔皮山区，他们又组织了一批较大的队伍，并在这里和英军进行了战斗。6月2日，坦提亚·多比和拉克希米·拜依的联军向瓜廖尔进攻，这里的"土兵"响应起义，英国的走狗、瓜廖尔的土王信地亚被赶走了。她穿着男装，曾多次手执马刀参加白刃战。6月18日，起义军和英军在瓜廖尔附近石卡尔高地进行了会战，在激烈的战斗中，这位英勇的女王为了祖国的独立而光荣的牺牲了，当时她只有二十三岁。敬仰她的人们，把詹西女王的遗体运到她牺牲地附近的葛格达斯·巴洼村，洗净了她身上的血污。根据印度传统的习惯，架起柴堆，把她的遗体火化了。

"燃烧在葛格达斯·巴洼村附近的火焰，是1857年独立战争的愤怒火山大火中最后和最光亮的火柱！"印度史学家给詹西女王以极高的评价："战斗的拉克希米，实现了她的愿望，履行了她的壮志，实践了她的决心！她这样人物的出现，说明了印度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她是美德和优秀品质的体现。她是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女人，像一朵鲜花一样的美丽；她有着神采照人的风韵和纯洁感人的情操；她具有组织民众的能力。这样的品行，即使是在男性中也是少见的。爱国主义烈火在她内心燃烧，在战争中，她成为祖国的杰出英雄和骄傲。这样天使般的人物是民族的幸运，而作为女性和女王出现则更为罕见。"[①] 她的反英斗争的英勇事迹，受到印度人民的极大的尊敬。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她的刚毅和英勇。曾与她交锋的英军将军休格·罗斯曾称她为："起义者的最

① V·D·萨瓦伽，《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第492页，孟买1947年版。

勇敢和最有才干的领袖"。①

勒克瑙的陷落，使起义者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占领勒克瑙并不能使奥德屈服。整个奥德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抗英堡垒。英军攻击这些堡垒时疲于奔命，要遭到比攻占德里和勒克瑙这种大城市更为惨重的损失。当时，握有武器的起义者还有10万人之多，各地居民更加仇恨英国殖民者，不给英军任何帮助。英国殖民者的处境异常困难，他们所攻下的各座城市，仍然是起义火焰中的孤岛。起义的浪潮仍然在印度此起彼伏，但却不是统一的。英国殖民者采取分化和拉拢封建主的手段，总督坎宁宣布不侵犯封建主的利益。1858年11月1日，他在阿拉哈巴德宣布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文告，保证不侵犯封建主的特权和地产，大部分封建主转到英国殖民者一边去了，以便保住自己的领地和既得利益。这样封建主和英国殖民者进一步勾结起来了。内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起义，给起义者带来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反英大起义的斗争形式转为游击战争，以便更有效地灵活地打击敌人。

游击战争的地区很广泛，罗希尔坎德、戈勒克普尔、班德勒坎德以及西印度的许多地区，仍然在起义者掌握之中。起义者的有名领袖，那那·萨希伯、毛列维·阿穆德·沙、奥德王后等都聚集在这些地区继续战斗，他们都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

游击队有名的领袖之一是比哈尔起义的领导者库马尔·辛格。他的游击队到处流动地袭击英军，英军穷于应付，到处挨打。后来，他们掌握了奥德西南部的森林地区，在这里坚持战斗八个月之久，在游击战中主动出击敌人。后来库马尔·辛格阵亡，他的弟弟阿米尔·辛格继续战斗。许多农民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进行游击战争是最有效最适合的斗争方式，起义者习惯印度的气

① 引自《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第32—33页。

候，熟悉印度的地形。游击队不断的出击和无休止的战斗，使英国军队大伤脑筋。英国军队每天的移动速度只有20英里。英国的许多军官被迫辞职离开印度战场。

坦提亚·多比成为游击战争的重要领袖，从瓜廖尔战役以后，他就转战在中印度和西印度一带，不断给英军以重大杀伤，斗争一直进行了一年左右。英国军队对这次游击队的追击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在游击战争中，他们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点，即没有很好地发动农民，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样就使他们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坦提亚·多比在斗争中反而到处投奔封建主，由于瓜廖尔附近的封建王公、叛徒曼·辛格的出卖，坦提亚·多比于1859年4月7日被殖民者所俘。他在殖民者面前，表现了非常坚定和勇敢的气质，痛斥殖民者的罪行。18日坦提亚·多比英勇的牺牲。

至此，印度反英民族大起义结束了。

第三节 起义的失败原因、性质与历史意义

长达两年、遍及全国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英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而遭到了失败。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起义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很坚强的起义和作战组织，未能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起义的领袖。马克思指出："那些杀死了自己的军官，挣脱了纪律的束缚、连一个可以赋予最高指挥权的人都推选不出的形形色色的起义士兵，当然很少有可能组织认真而持久的抵抗。"① 能征善战的"土兵"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挥部。起义的领导权为封建主所掌握，封建主的领导不可能把反对英国殖民者和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9页。

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起义过程中，一些封建主直接帮助了英国殖民者，做了他们的帮凶，如海德拉巴、尼泊尔、瓜廖尔、巴基阿尔的王公们即公开地投到英国殖民者方面。英国殖民者事先得到了锡克王公们的帮助而制止了旁遮普的起义，并且依靠锡克教徒和旁遮普的军队而扩大了殖民者的军事力量。英国殖民者利用封建主的叛变行为和印度社会内部的复杂情况，破坏和镇压了起义。封建主脱离了起义的阵营，他们竭力勾结英国人，以便保持住自己的领地和权益。恩格斯于 1858 年 10 月写道："一旦大多数地主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起义者的队伍便立即瓦解。"[①] 正如恩格斯论断的那样，在英国人答应不侵犯封建主们的领地后，他们便倒向殖民主义者方面去了。

英国殖民者的军队在组织和武器方面，都大大胜过起义者，他们在军事技术上占有优势，并有统一的指挥。而这一点正是起义军队所缺乏的，起义者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和统一的指挥机构。英国殖民者利用传教士破坏和瓦解起义，他们刺探起义者的情报，给英军传递消息，对起义起了反动的作用。英国殖民者同时勾结葡萄牙殖民者，果阿的统治者害怕起义向自己统治区发展，与英国殖民者联合起来，镇压了果阿附近的起义。

起义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作为殖民地的印度，国内受着封建桎梏的严重压榨，没有反封建的纲领和措施，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不能很好地发动起来。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民族成分的复杂，宗教和卡斯特的鸿沟，都大大妨碍了起义者对英国殖民者斗争的共同发动，而这一切又被英国殖民者所利用，对起义者进行"围剿"。1858 年 11 月 1 日，印度总督坎宁在阿拉哈巴德宣布英国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612 页。

王维多利亚的诏书：不再侵犯大小封建主的利益和特权。农民斗争开展后，封建主逐渐倒向殖民者方面。起义转入游击战后，各地联系更加困难，无法相互支援，英国殖民者除了军队装备精良以外，还控制着铁路电报等运输和通讯设施，地方上的治安与统治，则依靠大小封建主为其效力。

1857—1859年的起义是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信，他认为是军事叛乱的运动，实际上是民族起义。"① "士兵"首先发动了起义，但起义远远超过了"士兵"的范围。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起义所要解决的矛盾是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起义的时间、地区、范围和参加起义的广大阶层等特点，都说明了这次起义是一次民族起义。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把这次起义称作为"兵变"是别有用心的。

帕尔姆·杜德在1940年写的《今日印度》一书中说："1857年的叛乱是没落的封建势力、本国以前的统治者要逐退外国统治的浪潮而作的最后努力。"② 这不仅贬低了1857年印度起义的民族性，完全忽视了农民、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中的主力军作用，而且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把这次民族起义污蔑为"叛乱。"杜德还说："当时的进步势力，代表初生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支持英国的统治来反对叛乱。"③ 这种论断是极端错误的，它不仅缺乏事实根据，而且把印度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与英国殖民者矛盾一笔抹煞。这种论点，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论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典型观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71页。

② 帕·杜德：《今日印度》下册，第150页，世界知识社1954年版。

③ 帕·杜德：《今日印度》下册，第150页，世界知识社1954年版。

印度1857—1859年民族起义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它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印度一百多年来，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侵略印度的过程中，曾经遇到多次的反抗，其中著名的如迈索尔的反英斗争，马拉塔和旁遮普的锡克人的反英斗争。仅在19世纪上半期即发生了数十起的起义，其中有名的如浦那的拉摩西部族，在1836—1855年间就发生了22次反对英国殖民者及其走狗的武装起义，以及清净教派的起义和桑达尔部族的起义等等。但是，这些彼起此伏的起义从来没有形成全印度规模的起义。而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起义，才形成第一次全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者的革命运动。

这次民族起义在印度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大起义加强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英意志。起义的英勇斗士皮尔·阿里在殖民主义者的绞刑架前豪迈地说："你们可以把我绞死，你们也可以把像我这样的其他人绞死。然而，你们却绞杀不了我们伟大的理想。我死去，还会有成千上万的英雄们，他们将从血泊中站起来摧毁你们的统治。"[①] 烈士的英雄业绩，鼓舞着印度人民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顽强的战斗。印度的许多爱国者，不断的利用大起义时期印度起义战士的英勇事迹，唤起和加强印度人民的爱国心，对英国殖民者进行着长期和艰苦的斗争。民族大起义有力地推动了印度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这次起义也反映了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斗争。它和1850—1864年的中国太平天国革命，1848—1852年伊朗的巴勃教派起义一起，形成了19世纪50年代亚洲民族解

① 《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第320页。

放斗争的高潮。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①] 英国殖民者以武力侵略了亚洲许多国家，它是当时亚洲人民的主要敌人。印度大起义严重地削弱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牵制和消灭了它的军事力量，支持和配合了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抗英斗争，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印度的起义使英国对中国侵略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一年之久，也使他们在伊朗的冒险行为完全破产。马克思也把这次起义看作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他写道："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②]

19世纪中叶，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客观上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也是互为关连和相互支持的。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印度"土兵"第2团和第41团因拒绝来华作战而发生兵变。1856年10月，英国侵略者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初，英国侵略者在广州人民英勇抗击下，遭到挫败以后，英驻华公使鲍令和远东舰队司令西马米格利曾一再向印度总督坎宁求援。作为英国侵略东方各国基地的印度，已成为反英大起义的战场。1857年春，反英起义的火焰已经在印度的许多地方点燃起来，这样就使英国对中国侵略的计划遭到搁浅。1857年3月，英国殖民者派额尔金率军前来中国，企图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犯。印度人民的反英起义，使殖民者的武装侵略意图遭到破灭。正当英国侵略军气势汹汹来中国的时候，英勇的印度人民于5月10日在密拉特掀起了伟大的起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起义者很快就占领了德里，此时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处境十分危急。坎宁发出十万火急的公文，恳求额尔金将“远征”中国的侵略军立刻调往加尔各答，以维持英国在印度摇摇欲坠的统治。额尔金不得已派格雷率领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到了印度，英舰长皮尔曾写信说：“请告诉额尔金勋爵：解勒克瑙之围的，解坎普尔之围的，完成12月6日的战役的，就是派往中国的远征军。”[①] 英国殖民者还从新加坡派出两团兵力，同时从好望角调动开往中国的炮兵和三团兵力，开往加尔各答。结果英殖民者把本来派往侵略中国的军队调去镇压印度人民的起义。这样，印度人民的起义，在客观上就支援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直到1860年，英国平定印度起义后，作为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才威逼清政府于10月20日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了九龙半岛。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支持了印度的民族起义。当印度起义爆发后，英国侵略者企图调集远东所有的侵略军去镇压印度人民的起义。由于中国人民在1857年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迫使英国殖民者，不得不把相当数量的海陆军留在中国，这样也起到了牵制敌人，支持了印度起义的积极作用。

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人民在斗争中觉察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了解到色厉内荏的英国殖民者不是不可战胜的。起义加强了印度人民反英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印度民族大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推动了印度历史的进程。

① 转引之摩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90页。

第四节　大起义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政策

印度民族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胆战心惊的英国殖民者，在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措施是取消了罪行累累而为印度人民恨之入骨的东印度公司。1858年8月2日，英国国会通过《改善印度管理法》，规定："印度应该在名义上由英皇统治，在十五个参事组成的参事会的协助下，由一个主要的国务大臣来管理。"

撤销了东印度公司的权利，由英国女王对印度直接统治。撤销伦敦的管理局，设立阁员担任大臣的印度事务部。印度总督就是副王，代表女王管理。至1877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始称印度女皇。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来掠夺印度达一百多年的东印度公司寿终正寝了。殖民者改组统治机构的目的，是在印度人民中散布错觉，转移视线，以维持其殖民统治。受益者仍是英国殖民者，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从而得到了300万英镑的偿还金。马克思曾写道："1858年8月2日史坦莱勋爵提出的印度法案被通过，东印度公司于此告终。印度成了'大'维多利亚帝国的一省。"[①] 这意味着庇特所实行的统治印度的"双重管理"制度被彻底取消了。印度民族大起义是东印度公司消逝的根本原因，大起义对英国的统治政策发生了深远影响。

大起义的风暴使殖民者深为恐惧，印度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殖民者深深感到单凭军事力量控制印度是不够的，因而又采取了联合封建统治上层分子和高级僧侣的政策。1858年11月英国颁布的女王诏书，声称"尊重当地王公权利、尊严和体统"，"对于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190页。

旧日一切土地所有权予以保护”。殖民者极力安定封建上层，保护封建势力，作为自己的统治支柱。1859年11月，副王坎宁在阿格拉举行盛大招待会，第一次正式宣布殖民当局放弃“无嗣继承法”，准许瓜廖尔统治者信地亚培养养子作为继承人。在起义的后期，英国殖民者和印度封建势力的勾结，已成为殖民统治的重要政策，它们的联盟已经开始形成，而在起义失败和结束时，这个内外反动派的联盟最后形成了。殖民者同时利用印度宗教、种姓、民族的分歧，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殖民当局继续煽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敌视。在起义之后，英国人对比较积极参加了起义的伊斯兰教封建主的信任开始减低，而对印度教封建主则施以拉拢，他们开始经常被任命为国家官吏，他们一般都处于较有特权的地位。

民族大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所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后果是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等地区的广大农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们积极参加的民族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农民的斗争要求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但广大农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殖民主义者为了缓和农民的情绪，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手法。1859年在上述柴明达尔制地区实行“固定租佃制”这种法令规定：地主即柴明达尔无权把一些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或任意课以捐税，凡连续租种地主土地12年的农民可成为“固定佃农”，柴明达尔无权随意提高地租。“固定佃农”可以抵押或出卖所耕种的土地。结果，高利贷者和商人有机可乘，通过各种手段收买固定佃农的土地，然后随意增租夺佃，农民遭受着柴明达尔和新地主的双层压榨。开始实行“固定租佃制”时，使农民相信自己可能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企望已成泡影。印度的土地关系因而也形成了复杂和混乱的局面，以前的地主柴明达尔依然是高高在上，他们从“固定佃农”那里征收

地租，只是地租额受到殖民当局的法律限制，并且不得把“固定佃农”从土地上赶走。那些从高利贷阶层产生出来的，形式上也称为“固定佃农”的新地主，则任意提高农民——转租者的地租，并可以随意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显然，这种制度的推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状况，反而更加深了殖民统治下印度农村的阶级矛盾。

英国殖民者在起义之后进行了重大改革措施之一是改组了英印军队。“土兵”的武装起义，也使殖民者感到印度人组成的军队不可靠。东印度公司取消之后，事实上旧“土兵”军队便不存在了。英国殖民者不可能完全不用印度雇佣军队，但它的比例成份大大改变了。起义前英印土兵比例为1：6，改组后增加英籍士兵人数，北部起义中心省份为1：2，其他地区为1：3。至1864年，印度军队里的20.5万人中有6.5万英国人。炮兵和技术部队，除了少数例外，完全由英国人充任。他们几乎不在孟加拉和奥德这些起义中心地区中募兵，而是从旁遮普的锡克人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中招募土兵。在大多数场合下，每个团队的成员都是1/3的伊斯兰教徒，1/3的印度教徒和1/3的锡克教徒，而他们又属于各不同的印度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说不同的语言。英国殖民者利用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大量地从印度最落后的部落和部族中招募土兵，便于控制，以防止1857—1859年事件的重演。

民族起义被镇压后，印度的人民运动暂时走向低潮。英国对印度的改革措施增加了印度人民的负担。沉重的捐税和可怕的灾害，无情地落到印度人民的头上。英国镇压起义的全部经费达5千万英镑，都由印度人民负担。早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者便开始在印度修筑铁路，铁路可以保证从印度内地不断地输出大量的原料，并把英国的工业产品送到印度市场。铁路还能保证英国侵略的战略任务的执行，向中亚方面扩展自己的势力，并在那

里挡住沙俄的矛头。同时还利用铁路运输的方便，迅速调集兵力，镇压可能发生的民族起义。从60年代起，许多铁路干线陆续完工。修建铁路和改组军队的大量费用，使赋税猛烈增加。19世纪60年代对广大印度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困苦年代。1861年在印度斯坦发生了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饿死，1865年在马德拉斯，1860年在奥德萨也先后发生大饥荒，数百万劳动人民死于饥馑。幸免于死亡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印度人民继续酝酿着反英斗争。60—70年代，清教派还进行着抗英活动，1872年印度副王梅约勋爵被清教派所刺死。但是，旧式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在以后的年代里，印度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和发展，并开始登上了印度的政治舞台。

第四章 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运动

第一节 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印度是英帝国主义最大的殖民地。英国为了维护它的殖民统治，除了依靠军事镇压的暴力手段外，还极力在印度扶植维护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即印度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到 19 世纪下半期，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英印帝国，它是“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①] 印度社会的原有的整个结构已经被破坏，印度人民遭受到历史上罕见的重大灾难。1857 年印度民族起义被镇压以后，英国殖民者改变了过去对印度各阶级一律加以打击的政策，而采取对印度封建主阶级竭力拉拢，加以保护；对印度新兴资产阶级一方面进行压制，一方面又进行笼络收买的政策。英国统治政策的变化，除了印度的反抗这一根本原因外，还在于英国国内工业资本代替了商业资本的统治。它需要印度有安定的社会秩序，为推销工业产品和取得工业原料创造条件。英国的统治，破坏了印度原有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②] 印度资产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这种“社会革命”的必然后果。早期的印度资产阶级，主要的还是那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7 页。

依靠英国主子而发财致富的大买办、大商人、租税承包人和高利贷者。在印度工人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条件下，印度资产阶级已经出露头角。他们的工业当时也只是商业的附带业务；他们的政治要求以局限于英国统治下的代表权和代议制而发展为民族独立的主张。印度发展了的工业资本和英国统治者矛盾也随着发展。到 19 世纪末，这种矛盾更加深了起来。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兴起，而出现在印度历史舞台上。

为了保持在印度的统治，英国殖民统治国家机器大大的加以强化。1857——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给予英国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起义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可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却大大削弱了，土兵军队瓦解了。庞大的战争开支耗尽了印度的黄金和财富，引起了长期的预算赤字。英国殖民者处于空前的民怨众怒的对抗之中，英殖民者已经不能在印度照旧统治下去了。民族起义摧毁了英国对印度长达二百多年的掠夺和统治机构——东印度公司。马克思曾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战争结束以前就结束了。”[①]

东印度公司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普遍的憎恶，它已失去了英国殖民者进行侵略战争和掠夺、剥削印度各族人民的工具的作用。旧的统治制度也影响了殖民地国家机器的强化。《印度通史》的作者写道：“起义着重说明了由东印度公司来统治印度的不得人心，并加强了那些希望把这个庞大的属国置于英国议会的直接控制之下的人的力量。”[②]

根据《改善印度管理法》，印度的管辖和统治权，直接掌握在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 189 页。

②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第 4 册第 992 页。

英王手里。印度由英国议会和政府直接管理和统治。英国内阁设立印度事务大臣，他有全权监督印度殖民政府的工作和监管前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军政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仍由国务大臣掌握。印度总督改称副王，他成为国王的直接代表，他的权力和以前一样，在印度是最高的殖民统治者。

在庇特内阁时通过的印度法案规定的“双重统治”制度，这时完全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权力被取消了。它的全部财产，除股本外，全部归英王所有，即归英国国家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从国家那里领取了大笔补偿金，他们都成为万贯富翁。而作为“国债”的补偿金，还是要缴纳捐税的印度人民负担。

同时，英殖民者进行了司法和行政改革，随着东印度公司统治的结束，废除了原来并存的王家法院和东印度公司法院，而先后成立了各管区的最高法院。1861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参事会法案》，规定在副王下设执行委员会，由六人组成，分别担任行政部门的长官。在副王和省督、地方长官之下，设立立法委员会，它的职能只有建议权。法案规定，财政、税收、军队、宗教，以及对印度各公国和外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不交立法委员会审理。在这个委员会内任职的少数印度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只是徒具其名。副王有权否决中央和地方立法委员会所通过的法律。

英国殖民者同时对军队进行了改组。东印度公司撤消后，它的军队就变成了英国国王的军队。根据 1857 年民族起义的教训，英国殖民者进行了改革。改组军队时，英国籍的人数大为增加。

英国在印度的军政机构，仍然是英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掠夺印度的工具。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机构，改组为殖民地的国家机构，只是加强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专制统治。英国在印度行政改革的目的，只是促进管理体系的集权化，大大加强了印度事务大臣和副王的

权力。这些改革只涉及殖民地国家机器的上层环节。印度基层农民所惨遭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则很少变革。英国殖民者加强殖民政权的统治，并没有解决印度人民群众对殖民者刻骨仇恨和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对抗矛盾。英国统治的国家机器强化了。印度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也加强了。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持在印度的统治，他们在加强国家机器的同时，加紧了对土邦和封建主的勾结，推行了同封建地主阶级结成联盟的方针。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印度除了是英国的原料附属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外，也变成了英国资本输出的对象。英国资产阶级开始用从印度人民那里掠夺来的资本，在印度建立现代化的交通网。马克思在 1853 年写道："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①]早在 1853 年即建成铁路 32 公里，1859 年为 690 公里，1819 年将近 8 千公里。1872 年在印度就已敷设了 2.4 万公里铁路，花费的投资达 1 亿英镑。而到 19 世纪末，印度修筑铁路所花费的投资已达 2.26 亿英镑，印度变成了英国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至 1890 年在印度修建的铁路达 2.56 万多公里。

在印度建筑铁路完全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资本家把这种工程变成压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工具，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灾难。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在农业国家中以资本主义方式建筑铁路所引起的一般后果，如物价高涨，捐税加量，使农业生产服从于输出，在封建主、商人高利贷者、铁路公司、银行等发财的情况下群众的贫穷加剧等等，都强烈地表现在殖民地的印度国内。而在印度的铁路建设则极为浪费，缺乏监督，它成了英国资本家发财的良机。前印度财政部长马赛在调查时曾报告说："大量的钱被滥用了，承造者毫无节约的意图。所有的钱都是由英国的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2 页。

家手里拿出的，只要他们得到了印度岁收上5%的利息的保证，那就不论他们借出去的钱被扔到河里或是变为泥土，对他们都无关紧要……在我看来，在印度建设铁路是历来最浪费的工程。”

铁路的建筑使印度劳动群众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铁路的建筑年复一年地扩大了印度对英国银行的财政依赖。由于建筑铁路所引起的英国资本大量投入印度，而这些资本则是对印度人民掠夺的结果。英国政府把这些投资看作是印度的社会“债务”。从1858年——1876年英国政府握有的社会“债务”增加了一倍，共计1.4亿英镑，到1900年则达到2.4千万英镑。

除铁路建设投资外，英国资本也投入橡胶、茶、咖啡等种植园。同时也在市政、银行、矿业，工商业等方面投资。1909——1910年英国在印度（包括锡兰）的投资总数为3.65亿英镑。1914年以前英国在印度的97%的投资是为了政府需要，是在运输，种植业和财政事业方面，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印度的剥削，而不是为了发展印度的工业。

从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开始在印度工矿业投资。50年代末，英国资本家在加尔各答附近兴建第一批黄麻工厂，60年代坎普尔的棉纺织业也正式开工。

在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下，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合乎规律的发展。如印度铁路的建设完全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但铁路的建筑也具有进步意义，在客观上消除了印度经济的孤立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促进了煤矿业和铁路工厂的发展。但在印度建筑铁路，决不像在其他独立的国家那样，带来了普遍的经济繁荣。

马克思于1881年写道：“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

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① 在印度由于殖民统治而造成的饥饿大军，使劳动力特别廉价，同时在印度有着低廉的工业原料，这些都刺激了当时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首先刺激了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19 世纪后半期起，印度国内的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属于英国和印度资本家的大工业，以及完全握在印度人手中的纺织工业就开始发展起来了。

印度的工业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其他大港口城市的商业买办和高利贷阶层形成的。他们经营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自 1854 年在加尔各答创办了第一个黄麻工厂，1856 年又在孟买创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以后，到 1880 年就有 156 家纱厂，雇佣工人达 44000 名。到 1900 年，纱厂已达 193 家，雇佣工人达到 161000 名。印度的纺织工业很长时期只生产棉纱，棉纱主要销售国外。中国当时是印度棉纱的主要市场。19 世纪下半期由孟买运往中国的棉纱的增长速度很快。1876 年输出为 19817 捆，1905 年增为 651000 捆，占当时全印度棉纱产量的 1445000 捆的 45%以上。后来，由于日本和中国本身都建立了自己的纺织工业，印度棉纱往中国的输出量开始下降。帝国主义的日本，从中国市场上排挤了殖民地的印度。

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极力保持旧的制度。列宁写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51 页。

的、中世纪的东西”。他们“为了一些财阀和资本家骗子们的贪利目的而支持亚洲反动势力”。[①] 英殖民主义者为了维系对印度的剥削，极力保存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在印度1/3的领土上保留了封建专制的禁地——土邦，在社会关系方面扶植卡斯特种姓制度和其他封建残余。这就大大阻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印度是一个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中连续不断的三个阶段的发展：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工厂的过程被破坏了。印度的大工厂主，除少数例外，不是从小工业家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印度大工业资产阶级形成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②] 因此，印度工业资产阶级一开始便遇到严重的困难。印度农村中严重的封建制度残余，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英国资本以其宗主国的优越地位成为印度资产队级竞争的劲敌，而获得高额利润。同样生产能力的纺纱工厂，在英国兰开夏造价为5万英镑，而在印度的孟买却需15万英镑。兰开夏的股票年利为5%，而孟买则为9%，这种地区的差额都落到了英国资产阶级腰包。

同时，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国金融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资产阶级是在依赖英国工厂设备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殖民地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资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工业资产阶级都从属于英国金融资本。英国资本利用印度没有重工业而将工业设备出贷。于是，英国资本便成为印度企业的实际共有者。英帝国主义利用政治统治的权力，废除英国棉织品的入口税，并建立起许多英国统治的经济杠杆——经理行、银行、英印合办公司等。在19世纪末，这些机构不仅使用英国输出的资本，而且还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6页。

使用他们在贸易、高利贷和其他业务中所赚得的钱，也使用当地有产阶级的储金。因此，由于经理行的作用，英国在印度的投资总数大大超过了英国输出的资本。

在印度的英国经理行、银行等机构，均是英国财政集团的分部。因此，它们竭力阻止建立可能与英国资本竞争的企业部门，它们决定着印度新兴企业的性质和命运。除了纺织工业外，其余工业部门几乎都是对原料进行初步加工的企业。

由于各种原因所决定，印度的纺织工业必须转向发展还很缓慢的国内市场。这样，印度工业家立刻便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第一，印度的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殖民地的条件，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容量。封建残余和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严重地束缚了农民，延迟了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第二，印度资产阶级一开始便在印度市场上遇到了英国资本的强有力的竞争。英国资本投到印度市场的纺织商品，不只是由宗主国运来的，而且还有当地生产的。例如印度的纺织中心孟买，1895 年的 70 所工厂中，有 14 所便处在英国资本家的直接监督之下。

许多印度工厂主都同英国的财政资本有密切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资本。英国资本侵入印度工业的手段，大都是由于印度工业对于英国供给的工厂设备的依赖所决定的。英国资本利用他们在供给设备上的独占地位，不仅强迫印度工厂主同他们分享利润，而且还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夺取了印度工厂工业的直接监督权。

19 世纪末，工厂工业发展的同时，在印度家庭手工业的某些部门中，首先是手工织布业中，出现国内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愈来愈强烈的发展过程。织布工人现在不是为自然经济工作，而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织造各种布疋所用的棉纱，不是自己家里纺的，而是工厂生产的工业棉纱。这种情况使织布工人愈来愈

陷入对工厂主的依属地位。在激烈的竞争中，手工织布的比例逐渐下降，手工织布业的工人数量也在缩少。大生产逐渐排挤小生产者和低级形式的工业企业的倾向，手工织布工人便陷入极其困难的处境。

尽管工厂生产发展了，但印度资产阶级在国内市场仍未获得经济独立。它不仅同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大商业垄断资本有密切联系，而且也同大封建土地占有制有密切联系。殖民制度阻碍了印度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阻碍了印度机器制造业及其他重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从而使印度工业家对英国资本家产生了依赖性。

英国殖民经济对当地工业的阻挠，使得商业高利贷者把自己的资本广泛地投入农业。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土地占有的人数增加了 5 倍。在印度因而形成这种现象，有些工厂主同时与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同对印度农民的剥削有密切联系。这一切，给印度资产阶级打上了特殊的烙印。由于资本侵入农业，又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地区变成了各种原料的供应地，农业的专门化发展了。孟买和中央印度棉花成为主要的农作物，在孟加拉生产黄麻，在阿萨姆生产茶叶，马德拉斯则生产花生，等等。

农业商品化的加强和农业的专业化，引起了农民的破产，他们的土地进一步被剥夺，而高利贷在农村则获得了无限权力，沉重的捐税和对市场日益增长的依赖，进一步把农民逼到高利贷的罗网之中。不耕种土地而靠地租为生的人数增多，农民继续被剥夺，而大量变成农业工人。他们经常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过着饥饿生活。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间，印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就达 1500 多万。

由此可见，印度的工厂工业，虽有某些发展，但是印度的工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完全处于英国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受到宗主国多方的限制与打击。英帝国主义者取消了英国棉织品的入口税

的措施，对80年代初印度工业的成长与发展，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英国的殖民统治，严重阻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决定了印度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商业买办以及大封建土地占有制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 英国统治政策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英国殖民主义者极力拉拢印度的封建地主阶级、土邦的王公、贵族和高级僧侣，作为他们的附庸和走狗，成为统治印度人民的帮凶和控制印度的基本支柱。这种政策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推行的更为明显和露骨。1858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颁布文告，声称："我们对印度土邦王公宣布，东印度公司或公司所属机关同你们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合同，我们将全部接受并且严格遵守，也希望印度方面同样遵守。

我们不打算扩张我们现有的领土，既不允许我们的领地或权利受到侵犯，也不允许别人的领地或权利受到侵犯。我们将视同自己的一样尊重印度土邦王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我们希望他们同本国臣民一样地享受社会繁荣和进步，而这一切也只有国内安宁和良好管理才能保证。"

"我们将体谅和尊重印度土著人民对祖传土地的依恋。我们打算在保持政府合理赋税的条件下，保护他们有关土地的一切权利。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将从各方面适当照顾印度的传统权利和风俗习惯。"[①] 这明显地表明，英国殖民者改变了过去奉行的兼并藩属土邦和剥夺封建地主土地和特权的政策，而实行保障印度

① 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第194—195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

封建主的土地占有权和局部统治权的政策。凡同英国殖民者忠实合作的土邦王公，对其领地和专制政权，都给予以保障和支持；对封建地主也保障其地产和特权不受侵犯；对于宗教僧侣将维持他们中世纪的习俗和机构。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政治制度、土地关系和宗教、种姓等方面，成为印度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保存者。同时，在封建主内部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煽动宗教纷争。对参加起义的封建主加以打击，而把驯顺的封建主阶层罗致到官僚统治机构中，加以庇护和利用。同时，在民族起义过程中对反英运动稍露痕迹的人士则和农民、士兵一样，进行残酷的镇压。凡参加运动的人，不论其出身和社会地位如何，不经审讯，即被英国讨伐队枪杀，有的人则被送到安达曼群岛处于徒刑，遭受了严酷的迫害。

英国殖民者进行的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加强同印度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系。成立立法委员会时已经规定，它的一半以上的成员将从未担任公职的人士中任命。据此，印度封建贵族的代表被收罗来参与立法委员会的工作。印度事务大臣查·伍德，于1861年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对印度封建主进入立法机构的后果，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就不再会认为自己是脱离管理本国事务的人。我深信这是能使当地高级人士欢迎我们的政权的上好之策。”①

印度的上层封建主参加立法机构，虽然是徒有其名，印度副王有权不经立法议会的同意，就可以颁布法令。可是，英国殖民当局的这些措施，对拉拢印度封建主还是起到作用的。《印度通史》的作者写道：“修改立法制度的原因是必须让某些有代表性的和有势力的印度人进入立法议会。查理兹·伍德爵士指出，这样

① 《英国议会辩论记录·第3辑》第163卷第643页，伦敦1861年版。

一个步骤将更加有助于和谐上层土著的人心来服从我们的统治。在1857年的起义以后与'上层的土著人士'达成和解是一种迫切的政治需要。"①

英国殖民者同时在经济权益上和维系封建特权上拉拢和抚柔封建主。印度副王坎宁早在1859年11月即宣布：英国殖民当局放弃"无人继承地产处理办法"。准许土邦王公物色养子作为继承人。以前吞并的一些土邦，也归还了原来统治者的养子。但是一些居重要地位的大的土邦，仍保留在英属印度的直接统治下。英国殖民者对西北各省支持他们镇压民族起义的许多封建主更为恩赐，封赠印度传统的高贵的封号，为"罗阇"、"纳瓦布"等，并发给巨额钱财，赏赐许多土地和年金。

印度土邦王公成为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个社会阶层。马克思在1853年曾指出："当地的王公是当前丑恶的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② 土邦虽然不属于英国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范围之内，但英国通过与他们签订各种条约、以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各种强制手段，把土邦的大权操纵在英国顾问手中。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有意识地扶植土邦王公作为殖民统治的支柱。在印度独立前，土邦共有562个。③ 它们的面积占印度1/3以上，人口占1/4，最大的土邦海得拉巴，相等于英国本土，小的只不过是个小地主罢了。土邦的疆界从未正式划定，王公的地位和权限也没有什么规定。英国殖民者故意造成这些现象，便于控制，从中渔利。

英国当局以条约的形式保留了各土邦和殖民政府的从属关

①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第4册第10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6页。

③ 见，拉姆：《克什米尔问题，历史概览》第30页，纽约1967年版。

系，确定了各王公应缴纳的贡赋。同时保留了小公国从属于大土邦的制度。保持了各王公之间的磨擦和纠纷。殖民主义者广泛利用这些纷争来加强自己在各土邦的势力。英国殖民者加强了对各土邦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了维持自己在各土邦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惜撤换对他们不利的王公。1875年，英国殖民当局以企图毒死驻在他的朝廷中的英国统监的罪名，逮捕了巴罗达土邦的王公马尔哈·罗·盖克华尔，最后没有正式判他的罪，却以"行为不正，国家严重的治理不善，以及他对实行必要的改革上显得无能"[①]为辞，而剥夺了他的王位。可见土邦王公只是英国殖民者手中的玩偶，他们操纵了王公的废立以至生死的大权。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的强化，殖民者又采取新的步骤，来加深对印度各土邦封建主的控制关系。1877年1月1日，在印度副王莱顿的主持下，在德里举行的有全体印度王公出席的招待会上，宣布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这样，印度各土邦便成了英王的直属附庸，并入了大英帝国。印度的土邦不再是英国"盟邦"，而成了它的属国了。各土邦的王公和印度封建地主一样，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附庸了。

英国在印度的土地政策对印度社会也发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殖民者加强对农业原料产地的印度的剥削，需要增加印度农业生产，从而必需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和巩固农村的土地私有制。这就构成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的土地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18世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十分复杂和多样。它既有土地国有制，又有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也存在着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旧时代的种

① 《印度通史》第4册第1021——1022页。

种残余形态在一个地区内同时存在。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英国侵略后正在发生变化：土地国有制在破坏过程中，公社土地所有制也处于瓦解过程，私人土地所有制则在逐渐形成。公社土地所有制虽然很早就开始瓦解，但是公社一直是印度经济核心，是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英国实行殖民地的土地政策，用工业资本的力量摧毁了印度手工业，才最后消灭了农村公社。

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各地编制了地籍簿，重新修改了土地税率。土地私有权得以固定，土地税率予以降低。作为私有土地所有者的各类封建地主的权利，在法律上最后固定下来。英国为了加深对印度农业原料的掠夺，就需要增加农业生产，特别是为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如果不实行和巩固土地的私有权，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保存了大部分旧式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在推行土地赋税制的同时，农村公社的上层或其他收税人，都成为佃农和上一级收税机关的中介人，他们只按低税率缴纳土地税。英国殖民当局规定，对他们保留下来的地产享有占有权。这样，既保存了大部分旧式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同时使一些负责向国家征收地租税收的人，在中部各省的主要地区获得了土地占有权。这些地主们，在英国侵入以前，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农村公社的头人，或者是税收包税人。在印度的这些地区，英国殖民者造就了地主阶级的一个新的阶层。这些人在封建时期，那些土地在形式上也不享有占有权。在开拓荒地方面也贯彻了巩固地主私有权的方针。殖民当局以优惠条件出租荒地，成为完全的私产，承认其所有权利，并可以豁免土地税。这些土地大部分成了出身于商业高利贷的货币资本拥有者的地产。

印度的罗梅什·杜特在《英属印度经济史》一书中，概述了印度的土地占有情况，他写道：“孟加拉的土地是被地主所占有，

他们向政府缴纳固定不变的田赋。北印度的土地一般是被地主所占有，他们缴纳的田赋每查定一次就改定一次。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土地一般是被自耕的土地所有者所占有，他们缴纳的田赋，每查定一次改定一次。旁遮普的土地一般是被住在农村公社里的自耕的土地所有者所占有，每个村庄集体地缴纳田赋，田赋是每查定一次改定一次。"①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既培养了他的社会统治支柱新的地主阶级，又通过田赋形式保证了殖民当局的财政收入。经过这些安排，赋税率逐渐趋于一致。孟加拉赋税率在19世纪中叶，约为地租总额的一半，北印度、孟买和马德拉斯赋税也为地租总额的一半。庞大的税收，保证了殖民当局源源不断的财源。

英国在印度的土地政策，是在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推行的。土地私有权的巩固，使土地的价格很快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在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购买土地成为商业高利贷者和封建分子的货币积累投资最有利的形式，而广大农民日益失去土地，最终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了。

19世纪后半期，印度许多地区出现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这不仅形成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而且也促成了印度农业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也成为印度封建社会进一步解体的重要因素。自然，印度农民阶级的分化，早在封建的农村公社内部就已开始，而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土地转入农民上层和货币资本拥有者的手中，为印度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印度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是缓慢的，英国殖民者采取巩固地主占有制和继续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政策，致使19世纪后半期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一般地说，没有引起直接生产者同主

---

① 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下册第79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

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分离，而是以小农租佃的形式，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与土地结合起来。同时，以地租为主要收入的人数增多了，地主阶级的人数增多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紧密地结合起来。

英国的土地政策，就是为了使印度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关系，适应英国资本主义对印度人民进行剥削的需要。在降低土地税率的情况下，从法律上确定和巩固土地私有权，使印度最终地形成了封建私有土地所有制。这一过程，是宗主国对农业原料产地进行剥削的不断增长，印度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印度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巩固，是作为奴役印度的整个殖民体系的组成部分保留下来，但它却是封建所有制解体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产生的必要前提。殖民地印度不同形式的土地关系的形成，也就导致了封建关系的必然解体。

英国殖民当局把地主阶级培育成在印度统治的支柱。英国人确认耕地主要部分归封建地主所有后，又保留了殖民国家对大部分森林、荒地、大型灌溉工程建筑的所有权，而且限制各类地主自由转让和继承他们的地产。英国人的目的是加深地主对殖民当局的依附，进而使他们不能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活动中有所作为。同时，保留殖民国家的最高所有权，使殖民者和印度封建主之间造成了某些矛盾；也存在着地主阶级和殖民国家瓜分农民租税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并不具有决定意义，19 世纪后半期，印度地主阶级完全变成了英国殖民者的附庸。

英国对印度的投资的增加，大大影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19 世纪中叶，英国资本开始输入到印度。德国、美国等工业强国的兴起，和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亚洲、非洲等地的渗透与侵略，成为英国的竞争劲敌，严重地威胁了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地位。英国加紧了对印度的经济联系，英国的

加工工业同印度的农业和采矿业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分工，英印之间的商品流转迅速地增加，1873—1883 年间的英印贸易增加了60%。

英国对印度的投资首先用来榨取印度的原料。铁路就成为英国在印度投资的第一个主要对象。

早在 1845 年在印度成立两家铁路公司，一家是东印度铁路公司，另一家是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铁路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印度政府决定以印度税收来补足铁路资金。英国资本家认为铁路能够更快地为他们的商品打开通往印度内地的道路。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殖民政府以不断的压力，要修筑和延长铁路线，即使牺牲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在所不惜。

东印度铁路公司，1854 年修筑了第一条铁路，1855 年，加尔各答至拉吉甘吉的 121 英里铁路通车。总督大贺胥亲自草拟了印度铁路干线总规划，并与东印度铁路公司签订合同，将铁路修到德里，政府同意新建铁路线以 4.5%为资本保证利息。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则于 1854 年完成了从孟买到卡利安的铁路线，同时同意以 4.5%的保证利息建筑延长的路线。印度政府逐年付给铁路公司保证利息。到 1858 年印度民族起义斗争正烈时，印度政府付给东印度铁路公司的保息累计为 152 多万英镑，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为 45 万余英镑。[1] 这都是印度纳税人主要是印度农民的血汗啊！

1857 年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更加速了在印度修筑铁路。起义使英国人明白，完全有必要在印度国内迅速建立起交通联系的设施，以保持英国在印度的军事运输，同时铁路交通有利于英国人对于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印度的掠夺和剥削。到 1859 年印度已

① 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下册第 147 页。

建铁路690公里，十年以后，建成的铁路将近8000公里。建设的速度是很快的。在印度修筑铁路是出于军事目的，马克思说："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人员和开支。"① 英国资本家在印度修建铁路的重要目的是便于对印度的掠夺。马克思同时指出："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② 铁路的修建也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巨额负担。到1900年，印度已建成铁路39800公里，用于修筑铁路的支出已达32.95亿卢比。

水利建设为英国投资的第二项主要目标。印度历代王朝在北印度所建造的许多巨大灌溉河渠，经过连年的战争已经年久失修，影响了农业生产。英国殖民者把印度作为农业原料产地进行殖民剥削，修建水利成为势在必行。水利建设也是与扩大种植出口作物相联系的。建立水利灌溉系统，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项完全有利可图的事业。他们利用对人工灌溉主要水源的垄断权，来增加水费的税收，对印度广大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由于经营国家水利灌溉工程，1900—1901年度即获得2千多万卢比的收益。由于在旁遮普和信德进行了水利建设，这两省即成为提供出口棉花和小麦的重要产区。在旁遮普兴修的巴里河间河渠，长约450英里。朱木拿河东渠全长155英里。恒河河渠和它的支渠全部完成后全长将达898余英里，灌溉面积将达450万英亩。到1902年，水利建设的投资达2400万英镑。英国资本家很快即收回了他们的投资。水利建设也成为他们长期掠夺印度人民的主要场所，而给他们带来巨额财富。

19世纪中叶以来，种植园成为英国资本在印度最主要的投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1页。

② 同上，第72页。

项目。印度的南部和东北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地方，种植茶叶、咖啡、罂粟等作物，需要大量的原始投资。这是破产农民所力不胜任的。这些农业生产部门，利润率很高。以种植农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茶叶生产行业，很快地加速了资本和生产集中到英国垄断资本家手里的过程。英国殖民当局千方百计支持英国种植农场的发展，将适于种植作物的土地出售为私人所有，同时采取以优惠条件把一些土地租给种植园主的形式。

英国资本家在印度的投资，主要的还是投向工厂企业和采矿工业的建设。19 世纪 50 年代末，他们在加尔各答附近兴建了第一批黄麻工厂。60 年代，坎普尔的棉织工厂业正式开工。同时在种植棉花和黄麻的地区，数以千计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从事这些农业原料的初步加工。英国工业资本加紧资本输入和原料输出的方式，加深对印度的剥削。英国资本的输入，为印度商品出口的急剧增长创造了条件。英国殖民主义者，把征收捐税，输入工业品、输出原料和输入资本等剥削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加深对印度人民的剥削。英国的工业资本正是在剥削其庞大的殖民地人民时，大大地加速了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节　早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印度资产阶级的出世，遇到了重重矛盾。国内的封建制度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严重地束缚和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要求启迪个性解放，启迪民族意识，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在印度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思潮，它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并开展起来。

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也出现了它的知识分子阶层。英国人为了统治方便，开始在印度培育了一批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初，

英国人先后创办了加尔各答威廉堡大学、梵文学院、孟买艾尔芬斯顿学院等学府，这些学院一方面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一方面研究印度的传统文化，培养殖民机关的下级职员，学生来源多数是商业买办阶层和正统的封建大家族的子弟。这样就产生了印度最早的知识界。

印度知识界新思潮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罗姆莫汉·罗易。他出身于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曾就学于帕特纳的高等伊斯兰教学校，做过东印度公司收税吏的助手。他精通梵语、英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对印度古代文化遗产和西方哲学思想及文化都深有研究。他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是倡导新思想。1833年去英国请愿，贫病交加，死在英国，终年六十一岁。他的启蒙学说，是以宗教改革为核心，向一切封建习俗挑战。他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揭露殖民统治的弊端，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良主张。他写了不少文章和著述，为启蒙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刚刚诞生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他们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看到了印度社会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种种弊端，思想活跃起来，一些有志之士，纷纷组织了各类社团，讨论研究社会问题，创办各类学校，发行各种报刊。先进思想家们看到：资产阶级必须首先砸碎封建枷锁，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从而才有可能解救民族危难，他们还注意到自己的国家特别崇尚宗教信仰，社会生活无不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意识，盛行种姓制度。因而启蒙运动又是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展开的。正如罗易所说："印度教徒所信奉的现行宗教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兴趣。种姓差异使他们形成了不胜枚举的大小宗派，因而完全抹煞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同时，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使

他们根本不能从事任何艰巨事业。"[①]因而运动首先从改革宗教教义开始，批判封建蒙昧主义，革除中世纪习俗，抵制种姓歧视传统，通过传播近代科学文化，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创立新型学院和学校，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等方式，来达到欲图的目的。

启蒙运动的开创者罗姆莫汉·罗易，在早期的启蒙运动中，高举宗教改革旗帜，向封建势力全面挑战，着重社会改革和推行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同时提出了宗教、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改良主张。他是启蒙思想理论的奠基人和民族民主主义的先驱者。

罗易主张一神教。他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最初组织了'雅利安人协会'，1828年又创建了"梵社"，作为他推行一神教——梵天教的组织，宣扬梵是宇宙本体，万事万物都是由梵法定的宗教教义。打破印度教的种姓隔阂制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罗易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印度教古代产生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和不可接触者阶层——"贱民"，随着千百年来社会分工的发展，已形成了上千种的亚种姓，而结成了不同的集团，与阶级划分交织在一起，集团内严守内婚制，实行高低贵贱、男尊女卑等人身依附制度。种姓制度束缚着人和社会的能动的活力，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罗易极力倡导破除种姓制度，为后来废除种姓制度的活动，做了舆论准备。

革除印度盛行的寡妇殉葬的"萨蒂"制度，维护寡妇的生存权利，是罗易启蒙活动中最突出的贡献。印度自古流行着丈夫死后寡妇必须自焚殉夫的习俗，这也是印度教的一种宗教祭礼。印度沦为殖民地以后，"萨蒂"在某些地区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1812年，年轻的罗易亲睹嫂子在火化亡兄的火堆上熊熊烈火中挣

① M·C·考特莱拉：《罗易和印度的觉醒》第194页，新德里1975年版。

扎的惨状，她企图逃出火堆，却被宗教狂热的亲属和祭司们用竹杠压住，同时鼓乐齐鸣，淹没了她的呼喊声。印度每年有千百名不幸的妇女被活活烧死。如此野蛮残忍的"萨蒂"，竟被愚昧无知、麻木不仁者赞颂为高尚行为。可见印度民族精神空虚，日益衰败，追求来世而自我残杀。罗易认识到，以寡妇为牺牲祭的宗教迷信是罪过。1818 年他发起，向当局呈递了 300 多人联名的请愿书，列举了"萨蒂"的种种罪状，请求禁止"萨蒂"。请愿书写道："有从火中逃出的妇女，又被亲属带回去烧死。根据各国法典和所有国家的常识，请愿者认为这些行为都属杀人。"[①] 他以敢于触犯宗教教规的大无畏精神，史无前例地把过去认为的神圣事物宣判为犯罪行为。"梵社"成员的活动也推动了反"萨蒂"斗争。于 1829 年 12 月，迫使殖民政府当局颁布法令，宣布"萨蒂"为犯罪活动。

罗易提倡新型教育方针，废弃梵文教育制度，兴办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建立新型学校，成为开创近代教育的先驱。一些新型学院和学校，先后创建，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30 年代至 50 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民族主义精神高涨起来，启蒙运动从思想、组织到内容都有进一步的发展。1833 年罗易逝世后，"梵社"的活动由著名的印度诗人罗·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尔卡纳德·泰戈尔和父亲德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先后领导，造成了强烈的社会舆论，推动殖民当局颁布了几个限制种姓权利的法案，如 1850 年的《废除种姓权利法案》，1856 年《寡妇再嫁法案》等。随着改革活动的开展，各地区的文教团体陆续出现。40 年代末，各地社团开始出现民族团结倾向，开始抨击殖民制度，要求印度人同英国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提出印度人参加国家管理的政治要求。

---

① S·D·科利特：《罗易生平和书简》第 87 页，加尔各答 1962 年版。

从60年代起，孟加拉社会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梵社”的改革，以喀沙布·钱德拉·森为代表的激进情绪的青年集团组成“代表社”。他们反对种姓制度，主持种姓之间可以通婚等等。在“梵社”中形成新旧两派的尖锐斗争。喀·钱·森一派退出“梵社”，称“印度梵社”。他们宣扬新教义，受到自由派集团的欢迎，在孟加拉社会中的影响增大。

喀·钱·森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主张教育救世论。他说：“教育是摆脱国内现有的一切邪恶的主要方法”。[①]他创办了一些学校，包括一些专门的妇女学校。他主张维护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同时又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梵社教义的原则，把自己女儿嫁给土邦罗阇，实行童婚。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向右转的。这样也引起了“印度梵社”的分裂而成立了“公共梵社”，他们的主张更为彻底地反对种姓制度，反对童婚和寡妇殉葬。并允许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梵社”运动的历史，反映了孟加拉民族运动中各种流派的态度和观点。

宗教改革的团体在其他地区也先后出现，1864年马德拉斯成立了“吠陀社”。1867年在孟买成立了“祈祷社”。它们的宗教学说同梵社的教义很少区别。宗教改革运动是印度资产阶级力图使印度教和印度封建文化适合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反映。宣扬一神教无疑是反映了全印度统一趋向的要求。宗教改革的各种协会在唤起民族觉醒方面，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相当作用。

1875年孟买的印度教改革者达耶南达·萨拉斯瓦蒂创办了“雅利安人协会。”和“梵社”一样，他们反对严格的种姓限制和童婚。他们的学说，在旁遮普、西北诸省和其他地区，得到广泛传播。

---

① 《喀沙布·钱德拉·森旅英日记、讲道、致词及书信》第201页，加尔各答1938年版。

“雅利安人协会”重视社会福利和教育工作，在拉合尔成立了一所专门学院，除了古老的印度文化外，还讲授资产阶级现代科学。他们的观点较梵社的观点更为进步。萨拉斯瓦蒂公开指出："外国政府永远不能保障人民的福利"。[1] 该会的活动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倾向。

印度伊斯兰教徒中的启蒙运动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伊斯兰教启蒙团体的活动主要发生在旁遮普、孟加拉和西北诸省。这里居住着大部分印度伊斯兰教徒，而且在商业资产阶级和地主中有着很大势力。

伊斯兰教封建主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失去了特权集团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在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是处于落后的地位。伊斯兰教徒在所有的学院中的大学生的比例很少，不到4%。他们受不到良好教育，没有英语知识，便不可能在殖民机关中担任职务。因此，伊斯兰教徒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普及世俗和欧洲式的教育开始的。

1863年，阿卜杜尔·拉蒂夫倡议成立了“伊斯兰文学社”，是第一个伊斯兰教的启蒙团体，在加尔各答的伊斯兰教团体中普及欧洲式的教育。1877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它的活动遍及全国各省，成为第一个全印度伊斯兰教的启蒙团体，在80年代初已有30多个分会。赛义德·艾哈迈德的活动有着显著的影响，他建立了一些学会和教育机关。伊斯兰教协会提出殖民行政机关中扩大伊斯兰教徒人数的要求。

19世纪下半期，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关系还是谅解和团结的。印度北部民族运动的活动家纳坚德腊纳特·古普塔在谈到这时印度教团体和伊斯兰教团体的关系时写道："在两个团体

① 见拉季帕特·赖，《雅利安人协会》第176页，伦敦1915年版。

之间占上风的是极其诚挚的关系。他们之间建立起睦邻的关系。”“他们组成了一个民族。”[1] 印度的民族运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当时的锡克教居民中也产生了一些启蒙团体，建立了协会，兴办了学校，用旁遮普语进行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锡克教徒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早期的政治团体，一些改良主义的活动也很活跃。由于印度梵社和其他社团和人士的斗争，促使殖民政府于1872年颁布了第一个国民婚姻法。按照梵社派要求，革除童婚制，法定婚龄为男18岁、女14岁。尽管仍然不够合理，却为科学地安排婚龄迈出了有益的一步，对妇女问题也成为改革派注目的问题。六、七十年代，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也开始建立了改革组织。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各地区差异也很大。但从启蒙思潮的内容上看，则是以宗教改革为旗帜向陈规陋习开战；学习西方兴办近代文化教育以及揭露殖民统治争取政治经济的改良。印度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某些障碍，唤起了民族觉醒，使人民初步有了“民族”、“祖国”等爱国主义观念，同时造成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为后来的民族解放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但这次运动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资产阶级还处在幼年，启蒙派还不懂把工农群众的斗争引导到自己的旗帜之下，运动局限在上层社会中，圈子比较狭窄，影响面不大，反封建斗争中，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束缚。可是启蒙运动属于当代的先进思想体系，方向是朝前走的，是早期的资产阶级运动，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序幕。

---

① 纳·古普塔：《沉思和回忆》第7页，孟买1947年版。

第四节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除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其统治政策，促使了印度旧社会结构的解体，而纳入了英国资本主义体系，推行了印度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印度本身的条件也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阵地。印度在历史上是一个发达的手工业国家。“印度在十八世纪既是一个巨大的手工业国家，又是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家。印度织布机的产品供应过亚洲和欧洲的市场。”[①] 但在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中，印度手工业受到了致命地打击。印度人只生产英国纺织机和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料，为英国的工业服务。英国殖民当局曾发布命令，迫使印度工匠在东印度公司的商馆里工作。殖民官吏控制着印度织工的村庄和组织。英国对印度的丝绸和棉布征收苛重的关税，不许这些货物进入英国市场，而英国纺织品却像洪水一样充满了印度市场。英国动力织布机的广泛应用完全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最终的结果是“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②]

英国资本破坏了印度手工业的自然经济状态，破坏了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宗法关系，把手工业经济推进到商品货币关系中去，

① 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上册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5页。

促使作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基础的小商品结构的形成。在印度农村商业货币关系的扩大，为大工业的商品开辟了市场，同时也为手工业的产品打开了销路。破产了的农村手工业者，不是成为无土地的农民，就是沦为小商品生产者。在英国大工业商品的竞争面前，印度手工业者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

印度的手工业与大工业竞争抗衡的主要条件，是利用价格超级低廉的劳动力。印度手工业中的主要形式是分散的手工工场。手工业者全家，包括儿童在内，往往都在作坊从事生产。工时长达14小时之久。手工业者除了蒙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外，还有高利盘剥和种姓奴役。手工业生产是利用便宜的进口货或当地工厂的半成品进行加工。印度工场手工业实际上成为英国和一部分印度大工业的分支附属机构。半成品的供应控制在大商人手中，半成品的价格又是英国和印度工厂主剥削手工业者的有效手段。手工业者缺乏资本主义的信贷，高利贷者趁机对他们高利盘剥。

手工业中低级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了规模相当大的专业化手工生产中心的形成。专门经营某一部门的手工业中心日益代替了古老的封建城市，这些城市都拥有一些部类很多的生产部门。对农业原料进行加工的手工业行业，更遭到特别残酷的剥削，因为这些行业简单劳动比例大，工时长，劳动条件差。

手工工业是印度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印度有着众多的人口从事手工劳动。“根据1891年的人口调查材料，从事手工业的工人，连同家属将近有四千五百万人。”[1] 自然，从事手工业的人员，避免不了分化，由于经济上的破产，他们分别沦为无地农民，城市贫民和工厂中的工人队伍中。同样，在保留下来的小商品生产者中，也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的过程，一部分成为小企

① 安东诺娃等主编，《印度近代史》上册第572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业资本家，大部分成为一无所有的工人。

印度的手工业者和印度人民一样，遭受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惨重压迫。殖民当局的苛捐杂税，殖民统治机构的蛮横和奴役，特别是英国商品的竞争，等等，都构成印度手工业的严重障碍。印度小商品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又受到殖民当局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束缚。这里表现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倾向，必然与殖民主义者、封建主阶级的势力相对抗。千百万手工业者和工人，尽管还未解脱小企业主的局限性和穷苦手工业者的愚昧落后状态，但是他们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巨大力量。

印度第一批工厂是在19世纪后半期在孟买开设的。1854年2月孟买第一座工厂投产后，在1860年该市就开办了9座棉纺工厂。印度开始在国内兴建大工厂，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首先，印度的工业资本是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孟买的买办大商人中产生了印度第一批工厂主，他们同英国资本家首先发生接触，和海外市场有着贸易联系。从18世纪以来，孟买商人就在远东、中国等地成为推销英国货物的中介人。不仅在鸦片、棉花和布匹贸易中，而且在同殖民者的多方面的经济合作中，成为殖民主义者的买办，从而为兴建工厂积累了所需要的资金。19世纪中叶，英国的棉纱大量倾销中国，也刺激了孟买的买办商人在印度兴建棉纱工厂，而以后孟买的大部分棉纱是向中国输出的。英国殖民者开辟的这些沿海商埠的印度资产阶级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塔塔财团就是在孟买起家，这个财团的始祖詹姆奢德治·塔塔是殖民地军需机关的供应者，他又热中于做中国鸦片生意和棉花投机，当他积累了大宗资金，在孟买建成棉纺织厂以后，又开始在产棉区中心那格浦尔兴建工厂，他利用各种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而扩大了自己的财富。在建厂以来的43年间，塔塔获得

的巨额利润，总额达 7500 万卢比，超过原来资本的五十倍。① 新兴的孟买印度资产阶级，成为印度工厂工业的创始人。接着不久，在加尔各答建立了黄麻工业中心，在阿迈达巴德建立了另一棉纱工业中心，这些都是印度的沿海城市和地区，都有着和殖民主义和海外贸易接触早的条件，因而也决定了印度工业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国内是不平衡的。

其次，印度资产阶级是依靠英国的殖民主义的卵翼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推销英国商品起家，他们在印度、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供应殖民军队军需品，而发侵略战争财。并参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积累了财富。他们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投资棉纺、军火等工业。印度资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同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殖民地军事政治机器的一切威力，尽力阻挠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英国在技术、财政和组织上都比印度资产阶级拥有更大的经济优势。这一切，决定了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屈从于英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则任意阻挠印度工业发展和对它进行殖民剥削。英国资本只有利用印度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依赖性，来攫取殖民地的利润。殖民当局千方百计地保持着这种地位，阻挠印度发展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例如在孟买，于 1874 年英国人仍成为大工厂首领，一些英国工厂主在殖民当局和英国资本的支持下，供应孟买各工厂主企业机器装备，而成为孟买的最大工厂主。到 1895 年，孟买有 1/5 的工厂归英国资本直接管理。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阻挠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引起了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印度新兴资本主义不能不产生独立发展的趋向，它和宗主国英国的矛盾，日益发展和尖锐起来。

---

① 见 F·H·哈利斯：《詹姆奢德治·塔塔的生平》第 42 页，伦敦 1925 年版。

第三，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的增设，雇佣劳动的盛行，必然促成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发展。19 世纪 60 年代，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形成了第一批印度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当时工人总数约 70—80 万人。在殖民地的印度，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低水平的工资和大量供应的劳动力，使资本家有可能只利用年轻的男人，女工和童工几乎找不到工作。殖民主义者向民族工业征收繁重的赋捐税。印度工人阶级遭受了双重的资本主义剥削。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工人阶级的榨取比宗主国的工人要惨重得多。印度事务大臣查理葱·伍德在下院演说时曾透露："在印度，工资方面节省了大笔资金。在兰开夏一个不太大的企业，这项开支每周需要四百英镑，而在印度，同等劳力的价格，总共只一百英镑。"①

印度工业的不发达，根本解决不了印度工人的充分就业，形成了相对的人口大量过剩，这是殖民地国家包括印度所具有的特征 。大多数工人同农村保持着联系，一旦解雇，就回农村。他们在工厂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在农村又要向高利贷者借债。他们往往要用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去缴地租或田赋。工人体力消耗大，文化水平低，技术不熟练，殖民地工厂设备落后，这一切使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资本家则加强劳动强度来获得超额利润。印度工人阶级受压迫愈重，反抗斗争愈烈，19 世纪 70 年代，印度无产阶级就开始了争取经济权利的自发的罢工斗争。

第四，英帝国主义利用一切手段阻挠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巨额的殖民地"贡赋"，必然影响印度民族资本的积累；保留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制，使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障碍，阻碍了印度的社会进步。如果不推翻殖民制度，就不能消灭阻挠国

① 《英国议会辩论记录·第 3 辑》第 160 卷第 496 页，伦敦 1860 年版。

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中世纪的生产关系。帝国主义和印度本国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形成冲突和对抗。殖民主义者和印度民族的矛盾是19世纪后半期印度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要求独立发展印度政治和经济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斗争中，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经济利益上与帝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恐惧，又大大影响和削弱了印度资产阶级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印度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无力，甘心同帝国主义妥协，这是印度局势的重要特点，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后果。

第五节　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19世纪后半期，英国加深了对印度的封建性的和殖民地性的剥削。印度各地掀起了各种形式不同的反英殖民主义的人民运动，这些斗争活动是长期和顽强的。它表明了印度的觉醒，同时为以后持续不断的反英斗争开辟了途径。

在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产生了地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的组织，孟加拉就是民族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

孟加拉民族主义者于19世纪60—7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英属印度协会”，它代表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柴明达尔、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孟加拉知识分子上层人物的利益。他们要求发展印度和英国之间的交通路线和扩大贸易。加尔各答的商业资产阶级支持这些主张。协会中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代表，只是要求扩大欧洲式的教育机会，反对殖民地的种族歧视，他们只批评英国殖民管理制度的个别方面或者是批评个别的英国官吏的工作。他们对孟加拉农民的阶级斗争，更是采取否认、阻挠的态度。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带来的民族运动的浪潮，要求具

有更为民主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协会。而“英属印度协会”开始失去它的社会进步作用。激进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于1867年创立了“印度会”的政治团体。他们在加尔各答出版报纸和杂志，在民族运动中起着鼓动和组织的作用。1868年由什什尔·库马尔·高士和海曼塔·库马尔·高士等人创办的《甘露市场报》是印度人创办的早期报纸之一，宣传民主思想，对于孟加拉社会民族意识的形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孟加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反对殖民统治，也表现了一定的反封建倾向，同情农民的革命斗争。1859—1862年孟加拉爆发了靛蓝农民起义。农民被迫种植靛蓝，按低价卖给种植园主。农民于1860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向种植园主发出指令：如需要靛蓝，则应提高收购价格。种植园主即采取增加佃金的方法，来弥补这笔费用，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孟加拉农民拒绝种植靛蓝和不缴纳债款，而组织起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家的作品中，对斗争的农民表示了同情。什什尔·库马尔·高士1860年在《印度爱国者》上刊登了12封信，揭露了英国商人，通过订购靛蓝对孟加拉农民的剥削。迪诺班杜·米特罗写的剧本《靛蓝镜子》，揭露了英国靛蓝种植场主的罪行，震动了孟加拉。农民群众的自发性斗争第一次在印度进步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响。

孟加拉的左翼民族主义者希望农民的斗争，导致国家管理制度的改变，削弱和最后消灭殖民压迫。这和以后国大党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孟加拉民主派明确和勇敢地发表支持农民用革命方式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斗争。1874年5月22日《甘露市场报》上把靛蓝农民的起义称为“英国人到来以后孟加拉的第一次革命”。写道：“如果发生第二次革命，一定会使国家摆脱有无限权

力的警察和州政府长官的可怕的统治”。[1]

孟加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的活动，还是局限于文学活动和报刊出版工作上。他们在政治上具有不可克服的软弱性。他们没有能够制订一个统一和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成分复杂。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倾向，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尚未成熟。

小资产阶级努力于建立孟加拉民族主义者的新政治组织。1875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大学生联合会”，它的领导人是阿南·摩罕·鲍斯和苏伦德兰纳特·班纳吉，他们在青年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以为祖国服务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大学青年。

1875年9月，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新协会“印度联盟”成立了，它比“英属印度协会”的代表面更为广泛。它于1876年春在加尔各答开办了一所技术学院，标志着该组织开始活动。“印度联盟”开始争取加尔各答市政府选举制的运动，这与保持自己在市政府和孟加拉民族主义者政治组织中垄断地位的“英属印度协会”发生了冲突。孟加拉民族运动中，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同时，由阿·摩·高士和苏·班纳吉为首的一批自由派退出“印度联盟”而于1876年组成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印度协会”，“印度联盟”即不复存在了。

至70年代中期，孟加拉的民族运动可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一是保守派，以英属印度协会为代表，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殖民主义当局有密切关系；二是自由派，由印度协会领导；三是激进派，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民族运动反映了孟加拉民族的觉醒。但自由派主要的政治要求是参加国家管理，他们否定人民大众的斗争，他们的活动只局

① J·巴加耳：《孟加拉农民革命》第6页，加尔各答版。

限于通过决议和向殖民当局递交请愿书。“印度协会”的活动，反映了孟加拉境内和全印度民族运动的增长。“印度协会”活动的政治纲领可以归纳为：“1. 在国内确立社会舆论；2. 在政治利益和愿望共同一致的基础上，联合印度的各种族和各民族的组织；3. 促进建立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友谊；最后，引导大众参与当前的重大政治运动。”①

孟加拉民族运动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殖民制度是全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共同敌人。印度民族主义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统一又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团体之间联系的建立。孟加拉以外的印度其他地区，民族运动也开展起来了。

在印度北部和南部，民族运动也发展起来。印度各地区差异很大，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平衡。印度北部在1857年起义之后，受到殖民当局的严格的警察管制，资本主义发展比孟加拉和孟买地区是缓慢和落后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运动也正在兴起。大量的民族语言报纸的出版，就反映了这一趋势。据1861年材料，北方联合省出版了17种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报纸。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启蒙性的社会政治团体，如1880年马丹・摩罕・马拉维亚在阿拉哈巴德创办的“印度学社”，开展使用印度各种语言的教育，推动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印度北部特别是旁遮普和西北各省，有很大一部分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运动采取启蒙团体活动的方式，带有宗教色彩，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传统很活跃。19世纪60年代他们成立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新阵线”。印度斯坦各个地区开始建立新型的伊斯兰学校，进行反殖的民族运动的活动。参加过1857年起义的穆罕默德・卡斯米于1867年在德欧邦德创办了宗

① 苏伦德兰纳特・班纳吉：《一个正在成长的民族》第40页，马德拉斯1925年版。

教学院，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所学校。他们主张用乌尔都语来代替官方办公语言，不学习宗主国的语言英语。进入宗教学院的人，没有财产和宗教的限制，抵制有钱人施加的影响；同时主张在反英斗争中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联合起来。不少印度教徒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他们过分地重视神学的研究，甚至连欧洲式的现代教育也被排除，他们也没有同农民和手工业者结合，没有提出改善人民大众处境的纲领。他们的反英活动只处于秘密的性质，也缺乏广泛的群众性。

印度各地区的民族运动已加强了联系。孟加拉的苏·班纳吉曾多次到北方地区旅行、宣传和联络北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团体，推动了这些地区的民族运动，并在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加尔各答印度协会的地方分会。

南方的马德拉斯省和印度北部一样，民族运动在60—80年代期间比孟加拉和孟买地区要弱得多。在政治生活上极端温和派占有重要地位，地主和高利贷分子的势力影响很大。但是民族运动仍有发展，19世纪上半期创立了民族主义团体“本地人协会”。在这个团体的基础上于1884年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团体“马德拉斯士绅会”。1878年出版的《印度报》成为这个团体的重要阵地。在1885年召开了马德拉斯全省第一次民族主义者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马德拉斯士绅会”的50个地方分会的代表。民族主义分子的活跃是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南方其他地区，同样也发展着民族运动。

另外，在印度西部的孟买地区，民族运动的开展也是较为软弱无力。1852年建立的“孟买管区协会”，它的领袖是同孟买的大商行和大银行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富有的律师。达达拜·瑙罗治于1866年在伦敦创建了“东印度协会”。在东印度协会的一些会议上瑙罗治宣读了一系列报告，指出了由于殖民剥削而造成印度的贫

困。孟买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手段也只是限于批评英国殖民制度的某些方面，却没有触动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如瑙罗治写道：“如果对印度进行真正的英国式的管理，以代替现在的非英国式的管理，那末无论是英国或印度都将繁荣昌盛起来。”①

孟买的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地区一样，没有提出消灭殖民制度的任务，他们反对人民大众同殖民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这时，印度的上层阶级，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没有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他们的政治要求只是在英国统治下扩大印度人就任国家公职的机会，给予印度有关阶级的上层分子以合法权利，有向英国殖民行政当局就治理印度问题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同时要求发展自己的经济势力。他们总的态度是进行活动，企图说服英国，要求英国信任印度上层分子，让他们来和英国共同治理印度。同时，要求在英国的保护下使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们是这样对英国呼吁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在公民的和社会的活动方面最广泛地鼓励国家的政治发展。”②

印度各地的民族运动逐渐兴起，但民族主义者的力量是软弱的，他们的纲领是行不通的。但他们的活动，反映了印度民族和英国殖民者的矛盾。这些民族主义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强力量，改变策略，发展成为与英国抗衡的政治势力。历史的发展同时也表示，他们的力量是不足的，印度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才真正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有着相当程度的广泛性和斗争的坚定性。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工人阶级逐渐形成。19

① 达达拜·瑙罗治：《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的统治》第544页，伦敦1901年版。

② 见A·R·德赛：《印度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第284页，孟买1954年版。

世纪 60 年代，加尔各答和孟买形成了第一批印度工厂无产阶级的队伍。印度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使其他地区，工人数量很少。19 世纪末，印度各工厂、矿山和铁路等部门的工人总数约 70—80 万人。

印度工人遭受残酷的剥削，突出的表现为工资特别低下。90 年代初，孟买纺织工每月工资为 7—20 卢比，女工、童工则更低，为 6—7 卢比。加尔各答黄麻工厂的工人，全家平均工资不到 30 卢比。其他各省工厂的工资更低，平均工资比此低 10%—30%。资本家为了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采取的重要手段是延长工时。19 世纪最后 30 多年，印度工厂每周工时共达 80 小时，比英国平均量高出 24 工时。工时最长每天达 16 小时。正规的休息日，实际上是没有的。

从 70 年代起，印度工人阶级开始了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斗争。1877 年，那格浦尔的"女皇"纺织厂发生了印度历史上第一次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这家属于塔塔家族的纺织厂，以增加工时，减少工资等各种手段，对工人进行惨酷剥削。虽然工人的罢工主要是属于经济斗争，但以后逐年增加的罢工斗争，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锻炼了工人阶级。1890 年，孟买建立了第一个纺织工人的职工会。工人们通过自己的斗争，迫使殖民当局实施了有限制剥削行为的工厂法。印度工人阶级按人口比例来说，在数量上还是少数，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还不够成熟，但它是一个新生的不断成长的阶级，必将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民的反英斗争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重要力量。孟加拉地区也是开展农民运动较早的地区。除了早期的"靛蓝起义"外，1872—1873 年间，东孟加拉地区又爆发了猛烈的农民运动。地主强迫农民提高佃金 50%，柴明达尔也肆意侵犯农民的权利，农民忍无可忍，280 多个村庄的农民，行动起来，拒绝缴纳上涨的租金。他们提出："不许增加地租"、"不许从土地上撵走农民"等口号，要求

用国家土地税代替包税地主的租金。一些知识分子支持了东孟加拉农民的斗争。英国殖民当局镇压了这些运动，将近300人被逮捕，进行审判，罚以苦役，但农民的斗争却没有停息。

1870—1880年间马拉塔农民运动更具有空前壮阔的规模。马拉塔族农民丧失了土地，遭受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奴役。他们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袭击地主和高利贷的领地，夺取他们的财物，烧毁他们的房屋。这次农民运动的领袖是霍尼雅，在农民的支持下，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运动席卷的广大地区摆脱了高利贷者的剥削。1876年，霍尼雅被殖民当局俘虏，农民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对农民的债务奴役更为变本加厉。

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尼苏德夫·巴耳万特·帕德克发挥了卓绝的重要作用。他了解马拉塔族农民的困难处境和不满情绪，决心组织反对殖民主义制度的起义。他同时提出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政纲，如取消对宗主国商品的优惠关税，征收新的消费税，修筑铁路，解决成千上万的贫民就业问题等等。在马拉塔农村爆发骚动的影响下，帕德克的活动对农民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的组织和指挥下，农民武装力量于1879年先后袭击了土邦的议会大厦，存放农民债契的宫殿等地，掳获了大量的财物，分给农民。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镇压。1879年7月间帕德克被捕，判以终身苦役，1883年死于狱中。

自发的农民运动最后遭到了失败，但是农民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给予殖民主义者的打击也是沉重的。马拉塔族农民的英勇斗争，推动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

与帕德克领导的运动的同时，在马德拉斯地区爆发了另一次农民起义。殖民当局和地主苛重的租税，把农民逼上反抗的道路。1879年殖民当局规定征收棕榈树新税的命令，农民对繁重的捐税忍无可忍，爆发了起义。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冲突很快发展成为

游击战争。山区居民也参加了农民起义的行列，他们大多是用弓箭武装，同时也有一些火器。这次农民起义的领袖达拉康德·钱德利亚，勇敢和机智地领导了这次斗争。农民运动急剧发展，席卷了距拉姆帕150多公里以内的广大地区。钱德利亚在列卡帕利建立了政权。起义政权坚持了数月之久。1880年2月，钱德利亚牺牲，起义农民受挫。最后，起义军溃败了，但它在印度农民斗争的历史地位是永存的。

此外，各土著部族，各教派也先后和不同形式的发动了反英的运动。英国殖民者付出了极大的气力，才在一些起义的地区保持了统治局面。印度人民的反抗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同时也削弱了封建反动势力，唤起了印度的民族觉醒，印度全民族更加自觉的投入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中。

第六节 国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殖民主义的统治，阻碍并破坏了印度国内已经开始了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引起了印度各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加深了印度社会的矛盾，加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表现在印度资产阶级对殖民统治的反抗情绪上，表现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暴动上，以及主要表现在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自发的零散的起义上。

1878—1881年的英国第二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死伤了许多士兵和耗费了大量金钱，结果遭到了失败，整个阿富汗为阿卜杜·拉曼所统治，一切英国军队都被迫撤退。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的战争，致使英国在军事、政治和物质方面发生了许多困难。英国长期不断的侵略战争和与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而在外交上形成的冲突，同时也促进了印度内部情况的复杂化。

在这个时代的转变时期，激起并推动了印度各阶级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旧的社会结构在历史的洪流中被破坏了。它不仅摧毁了印度原有的旧的社会结构，而且也摧毁了自古以来为宗教所熏陶的日常生活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也开始形成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在印度产生了受欧洲教育的印度知识分子的阶层，他们利用西方知识来巩固和发展民族意识，因而增长了谋求民族解放的情绪。

70 年代时期，在印度形成了人数极为众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国内民族运动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英国当局在为殖民机构培养官吏、职员时，曾被迫吸收了一部分富裕阶层出身的当地居民参加。但他们始终受到轻视与排斥，因而在这些人员中间便产生了不满情绪。其中一些人意识到：殖民制度只能给印度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反英情绪在知识分子中间发展起来。

1875 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印度人的组织——“雅利安人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广泛宣传婆罗门教对其他各宗派的优越性，它的活动中心是孟加拉和旁遮普。它的成员宣传人类平等，否认卡斯特制度的等级差别，号召回到古老印度教的“美好时代”里去。这个组织把宗派的口号同恢复印度古老文化的要求普遍结合起来，但同时也没有否认欧洲文化和科学的成就。“雅利安人协会”的建立，是印度人民民族意识成长的表现。与此同时，印度知识分子马哈志夫·高维特·兰那狄在浦那建立了一些文化教育组织。马拉塔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这些组织的活动。兰那狄等进行宣传活动，使印度人民起来要求实行社会改革，推广欧洲式教育并鼓动奖励发展民族工业。这时在孟加拉还出现了许多“英印协会”和“印度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联合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为了适应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全

印民族运动，当地激进性的报纸、杂志出刊并发展起来。它们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政治情绪的传导者。它的影响也涉及到劳动者身上。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活动，都遭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镇压。1878 年的印度总督莱顿，颁布了许多法律，其中关于出版物的法律规定，各地警察当局有权停止出版印度诸语言的报纸，以刊登反政府的材料为名，报纸的出版和编辑者可能被判处巨额罚款和遭到监禁，财产可以被没收。出版报纸必须交纳巨额保证金，将全部稿件预先交付审查。殖民主义者借此来扼杀民族报刊。英国没有扼杀印度民族报刊，印度的报刊反而加强了印度人参加国家公职运动的宣传。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全国举行集会，围绕着一些政治问题展开活动。莱顿执行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其中包括禁止印度人携带武器的一些立法)，不可能使殖民主义者如愿以偿，反而加剧了宗主国和印度的矛盾。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政策。英国殖民当局也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莱顿颁布的关于出版物法令，在 80 年代初，被新任副王里庞所废止。里庞采取拉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法，以便使其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分离开来。他同时拉拢印度社会的有产阶层，新颁布的地方自治法，给予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参加市政委员会和各区行政机构任职的权利。

1882 年印度事务大臣作出关于扩大印度人参加地方自治机关的决定。根据这一法律，在印度一些大城市的市政会议里，大多数人经过选举产生，这些只是一些咨询机关。英国当局只是借此来满足印度民族主义者关于自治的要求。

在里庞统治时期(1880—1884 年)，英国当局开始煽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纠纷和敌对情绪，他们企图藉以来削弱印度的民族运动。与殖民当局的愿望相反，印度的民族运动继续

得到发展。

1883年由于印度协会的倡议，在加尔各答召开了群众大会，通过宣传活动，加强了各省社会政治团体之间的联系。1883年1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了国民会议。孟加拉印度协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西北省、旁遮普、孟买、哈迈达巴德和马德拉斯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南·摩罕·鲍斯担任会议主席。他指出：这是成立全国议会的第一步。

1884年在马德拉斯成立了“印度国民联合会”，它的宗旨是提倡印度人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全国各省民族团体的著名代表。这个会议对于成立全印度资产阶级第一个政治团体，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国民大会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英国殖民者进行活动，鼓动组织印度的资产阶级政治社团，企图把它们的活动纳入符合英国利益的轨道。英国的退职官员阿兰·奥克塔维安·休姆参与了这种活动。他得到了印度总督的支持以后，筹备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立。1885年12月27日在孟买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印度各地各协会的72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要求设置王国委员会调查印度情况，要求扩大立法会议权利，扩大印度人参加公职的范围。孟加拉律师伍·克·彭纳吉主持了会议，但大权还是掌握在休姆手里。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大会，休姆当选为秘书长，国大党初期没有设置中央领导机构。休姆在秘书长的职务上一直占据了20年。

印度记者克里尚·巴蒂亚在分析国大党的性质和成立的背景时写道：“1885年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后来它被混称为国大党，或简称为国大。这个组织原来显得平凡无奇。在成立之初和其后的许多年内，它并不曾声称要为印度谋求独立。早在它成立以前，国内已存在着爱国情绪，以及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获得自

由的愿望；然而，印度的民族主义有如无数具有季节性的细小溪流，偶尔沿着没有沟渠的路线暂时出现一下，往往是隐没在广漠和荒凉的沙地里。在国大中，各式各样的小溪汇成了一股洪流，它终于冲走了沿途的大块顽石。但它的进程是缓慢的。”① 国民大会党的建立，是在印度民族运动兴起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但它的性质和作用，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表明了英国殖民者企图利用它作为反对印度工农运动的工具。关于这两方面的含义，《印度通史》作者写道："国大党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得到某些著名官员的支持，可是不久印度政府就开始对它发生怀疑了。”“国大党的目的是想通过宪法的手段在印度实现立宪和代议政治。这种温和的纲领没有满足热诚的爱国者，而1892年的印度议会法案表明，英国政府还不准备在立法机构的组织中采用选举原则。”②

英国殖民当局力图在印度寻找自己统治的支持者。1886年副王多弗林说："在我所碰见的本地人中，有很多是既能干又懂事的，他们的忠诚合作无疑是靠得住的。他们拥护政府这一事实，将使政府的许多法案获得民心，这些法案现在颇有强迫立法机关加以通过之势；在它们方面，如果有一个本国的政党予以支持，那么印度政府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座矗立于咆哮的大海之中的孤岛，浪涛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它的基础周围猛烈冲击。”③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英国殖民当局支持和批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但国民大会党并不能完全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虽然它的产生是在屈从于英国统治的前提下开始的，但它并没有一贯屈从于殖

① 克里尚·巴蒂亚：《英迪拉·甘地》第27—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第4册第1034页。

③ 转引之杜德《今日印度》下册第35页。

民统治，它代表着印度资产阶级的要求，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尽管其中包含着许多改良主义的内容。国大党逐渐与殖民当局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为殖民当局所不容而遭到迫害。国大党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这种关系，巴蒂亚曾作了有风趣的描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组织这个国大的并不是什么印度的政治煽动者，而是一位退休的英国文官阿兰·奥克塔维安·休姆。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十二位印度人，应休姆的邀请，聚集在孟买学院的会堂里，他们齐齐整整地穿着晨礼服和条纹裤，戴着大礼帽，因为这是在盛大的场面上出现时应有的打扮。对应邀的大多数人来说，国大的第一次会议谈不上是什么革命的，它简直就像是红十字会召开的一次年会，或者像是省长官邸中举行的一次授职典礼。实际上孟买省长差点儿同意来主持会议。当时的总督多弗林勋爵对这组织颇具好感，希望它能起类似本国忠诚的反对党那样的驯服作用。

"国大党成立后，许多年内一直表示要对英帝国忠诚不渝，然而，逐渐地，开始在一些宣言和决议中出现了摩擦性和挑战性的调子。它的领导人发表的言论，往往是一些堆砌辞藻的空话。例如，休姆谈到，如果统治者不能减轻人民的痛苦，那就需要直接跟'大英帝国'进行交涉。然而，有时候提出的要求是具体的，并且，在英国人听来，那种语调甚至是傲慢的。国大党曾指责英国当局不让印度人有权携带武器，并叫嚷要分享高级行政官员的职位。国大党还要求改革立法会议，要使其更能代表人民。对那些刚在两个世代以前镇压了 1857 年流血的叛乱的英国官员们来说，这类言论不但是刺耳的，而且几乎是具有煽动性的。他们认为，若不加以制裁，它们可能会引起另一次叛乱。如果国大党的首脑不是一位忠诚可靠的英国人，政府也许早在它初成立时就把它取缔了。多弗林勋爵自悔失策，没有认清楚该组织的实质和宗旨，但

由于本人曾经鼓励它的成立，也就不好意思再公然取缔它。而等到现代印度的创建者，如巴尔·干加哈·提拉克和哥帕尔·克里希纳·郭克雷等人控制该党时，该党羽毛已丰，再不怕得罪英国人了。”①

国民大会按其成分说，一半代表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另一半是商人买办、高利贷者和地主。国民大会中有些代表也确实表现了对英国殖民者的“忠顺”，特别是在国民大会形成后的初期。但国民大会总的性质却表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殖民制度的反对立场，民族平等和赋予印度自治的要求是国民大会章程的基础。国民大会章程宣称：“大会指望用宪政与和平的方法，即用逐渐改革现存的管理制度，加强民族的统一，鼓励社会义务的精神，组织全国的精神、道德、经济和工业资源”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反对政府为了镇压印度人民的巨额军费的支出。要求对棉织品规定入口税，缩减国家开支，实行技术教育，要求增加印度人在国家机关中任职人数和实行宪法改革，等等。

印度国民大会党尽管初期是不健全的，但它的成立标志着印度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形成了一个阶级。在它的影响和活动下，印度民族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协调了民族运动的斗争，民族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了。

国民大会党是民族运动的温和派的政治团体，它代表了印度上层资产阶级和某些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地主的利益。至19世纪末国民大会党没有超越在野的反对党的活动范围，同时在它的活动中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英国资本家之间的矛盾。90年代初开始，国大党对英国当局的经济政策的批评加紧了。国大党的

① 克里尚·巴希亚：《英迪拉·甘地》第28—29页。

领导人之一马·哈·哥·腊纳德写道："政治权力的垄断正导致愈来愈可恨的对工商业活动的垄断。"[①] 印度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严重障碍，是英国的压抑和竞争，国大党要求对印度工商业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但是光凭国大党会议的一些决议案，请愿书等是不可能改变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政策。他们号召，小企业主们组织生产和资本，建立巨大的联合企业组织，以抗衡英国企业的竞争，但政权掌握在殖民者手中的情况下也是行不通的。

在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上，国大党提出的纲领是要求实行固定的赋税制度，以便建立起对维持法律和秩序感兴趣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即地主阶级。在1896—1897年印度大饥荒中，国大党对受苦挨饿的农民也表示同情，他们是由于害怕农民愤怒增长而群起反抗，在农民的反殖民运动中，他们是支持殖民当局。

印度国大党的民族主义温和派脱离人民大众，根本没有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思想。他们害怕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任何群众形式的运动，反对同殖民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因而，国大党的政治斗争只限于作抗议决议案，向殖民当局提出备忘录和请愿书等等。国大党政纲的基本点是要求扩大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上层人物参加政治管理的机会和权利。这是国大党初期活动始终不变的政纲。尽管如此，英国殖民当局对国大党还是采取鄙夷和仇视的态度，阻挠国大党举行常会，否定他们提出的建议案。同时，殖民主义者利用给予印度资产阶级地主上层人物的小恩小惠的手段，来分化和削弱印度的民族运动。

国大党的领导层，多数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在亚洲首先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他们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观念。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些观念。19世纪末叶，印度

① 马·哈德夫·哥·腊纳德：《印度经济学论文集》第71页，马德拉斯1906年版。

全国共有300多种报纸。上述观念的传播，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

国民大会党要求殖民当局实行行政改革和经济上的让步，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要求在印度无阻碍地发展资本主义。但国大党初期的纲领和决议中，对濒于完全破产的印度农业和农民问题却只字未提。一直到1901年加尔各答年会上，在不断的饥馑和农民起义的压力下，才通过了一项有关土地和农业问题的决议案。大致内容为：一、固定地税应扩大到全国各地。二、应当成立农业银行。三、要求采取步骤改善国家的农业等等。非常明显，这是一项懦弱的决议，事实上农民并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英国殖民当局千方百计地削弱和分化印度的民族运动。他们企图利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分歧，挑起宗教冲突。1885年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建立的"伊斯兰教教育会"和"奥德农民保卫印度反对国民大会协会"等，就是殖民主义这种阴谋活动的产物。

19世纪末期，英印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处于殖民统治者的优势地位，从而利用殖民机构实行了许多打击印度资产阶级的办法。例如：工厂产品的土产税，宽松的财政改革，工厂立法等等。为了反对英国殖民者，印度资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也由经济范围转入了政治范围。在这场斗争中，最激进的并不是印度的大资产阶级，而是中小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手工业者和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这是由于他们比大资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更甚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民族运动明显地分成三个派别。一派是以国民大会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他们的要求只限于某些改良，而政治活动方式则是抗议和请愿。他们的消极策略被人描写成三个特点：对英国人的请愿、抗议和谄媚。他们是改良主义的温和派。一派是小资产队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主义

者，这个派别把政治斗争提到第一位。他们为了和温和派或自由主义者相互区别而称为“激进派”。他们是反对国民大会党官方领导方针的反对派。第三个派别则是印度劳动人民群众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它们有自发的性质，其中农民运动仍带有落后的中世纪的斗争形式，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第七节 提拉克为首“激进派”的反英斗争

英国的镇压和在许多方面破坏民族运动，引起了印度的反响，反而加强了民族主义激进派的活动。在巴尔·干加哈·提拉克领导下的激进派集团，在国大党中发展起来了。

19世纪末，在国大党中产生了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反对温和派的激进派。印度国大党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数年之久，彼此的力量时有起伏消长，公众的情绪也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变化。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印度的杰出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巴尔·干加哈·提拉克。提拉克于1856年出生在浦那城一个属于高级婆罗门的小地主家里。“他的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想起1857年起义的失败和屈辱就心里难受的一代人中间度过的。”[①]

他受到西方教育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他是一个学者，对印度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他在历史著作中对西瓦吉很注意，把他当作一个民族英雄来宣传，藉以激发印度的民族意识，他力求把印度人民团结起来同在印度的奴役者进行斗争。他大声宣称：上

① M·P·斯里库马兰·奈尔：《巴尔·干加哈·提拉克是表现为激进派的稳健派》载《印度历史杂志》1976年12月号。

帝并没有把印度作为永恒的领地交给外国人，提出“自治是我们天赋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得到它”[①]的口号，号召印度人民为解放祖国而斗争。

巴尔·干加哈·提拉克是印度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立宪政府的杰出的民主主义者，是反英斗争的勇敢战士，他在印度民族运动中有着重大影响。提拉克青少年时代是在印度民族最苦难时代度过的。1857 年起义失败后，屈辱和不幸就伴随着印度民族，在他年轻的心灵上，就激起了对英国的统治和剥削的义愤。提拉克在浦那的德干学院读书时，欧洲式的教育和自由主义思想也对他有深刻的影响。1880 年离开学校后，他和一些民族主义者，为了培养真正的印度爱国主义者，而在浦那开办了一所学校—“新英格兰学校”。第二年他们出版了两种报纸，用英语出版的《月光报》，对象是印度的知识分子；马拉塔语出版的《猛狮周报》，读者更为广泛。提拉克和他的同志，主张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他把报纸作为主要斗争武器，发表文章，提出抵制英货，保护印度工业家的利益，抵制英国殖民当局为破坏印度商品竞争能力于 1881 年颁布的第一个工厂法。提拉克的同志是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活动的基本目的是组织国民教育，以及在马拉塔族知识分子中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为了实现这些目标，1884 年，他们组织成立了“德干启蒙协会”。它得到了孟买自由主义者的支持。1885 年又创立了费格森学院，这是一所一般人可以就学的学院，提拉克亲自在这所学院任教。

以提拉克为首的马拉塔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最初的活动年代里即有着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以教师和新闻记者的工作，宣传和鼓动群众，遵循坚决反抗殖民制度的路线；有民主倾向，不

① 《巴尔·干加哈·提拉克是表现为激进派的稳健派》，载《印度历史杂志》1976 年 12 月号。

拒绝支持人民大众；但又反对手执武器反英斗争的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样也不可避免地在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加深分歧。在提拉克的团体里也同样出现意见分歧。这是印度社会思潮必然的反映。提拉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是政治斗争。随着国民大会党的成立，这些分歧、矛盾必然反映在国大党的内部派别上。提拉克作为激进派的代表，在印度民族运动史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1887年，提拉克和“浦那全民大会”的温和派领袖腊纳德、郭克雷等的分歧加深了，同时不得不同当时的《猛狮周报》的编辑阿加尔卡尔最后分手。1890年提拉克最后脱离了德干启蒙协会的工作。

提拉克与动摇分子的决裂，促进了马哈拉施特拉民族运动左翼的加强。他亲自编辑出版《猛狮周报》和《月光报》，扩大左翼的影响。1891—1895年提拉克和他的支持者，在“浦那全民大会”中，获得了大多数的拥护，1895年他们被选进议会的领导委员会。这是马拉塔族民族主义者最有势力的团体。

国民大会党的成立并没有导致各省独立活动的民族团体的消失。提拉克既参加了地方团体的活动，同时也自始至终地积极参加了国大党的工作，他担任了国大党的秘书。提拉克主张，用一切主法保持民族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逐渐把国大党变成民族主义者联系群众的机构。提拉克的经济纲领是争取印度经济的独立发展。他著文揭露了英国对印度的经济掠夺，指出了印度经济落后的原因，尖锐地批评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经济政策。1896年他号召抵制英国纺织品，保护本民族的工业生产。他写道：“我们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满足我国人民的需要。请大家使用印度布匹，而且只使用印度织品吧。不管是谁，只要买即使一码英国

织品，就让他被当作祖国的叛徒而受到唾弃。”[①]提拉克的主张，得到了孟买资产阶级的欢迎。1895年提拉克被孟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上层人物选举参加了省议会，尽管它不过是省督管辖下的一个咨询机构。

提拉克认为运动成功的保证在于人民大众的参加。80年代末，提拉克和他的支持者开始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希望把他们吸引到民族运动中来。他写道：“我们不仅应该面向受过教育的阶级，而且应该面向商人，手工业者和工人。”[②]提拉克主张，必须唤起群众参加反对殖民制度的斗争。1896年“浦那全民大会”领导了马哈拉施特拉的不纳税运动，公开反对殖民剥削和掠夺。他号召群众更坚决和彻底地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

在斗争形式上，提拉克利用了马拉塔族的历史和宗教传统。1895年起，提拉克开始举办纪念马拉塔民族英雄西瓦吉的庆祝会，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象征，西瓦吉的名字在马拉塔族中是深入人心的。提拉克和马哈拉施特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对于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孟加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左派的活动和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位马哈拉施特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得到了孟加拉等地激进派的支持，他们的力量得到加强，提拉克和温和派的领袖们之间的分歧加深了。在1907年的苏拉特国大党年会上，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同时在孟加拉组织了暴力运动。提拉克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斗争开始尖锐化，也把国大党的斗争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90年代提拉克的思想发展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为激

① 《印度时报》1896年2月15日。

② 英杜格尔·亚季尼克：《一位印度革命者的传记和时代》第94页，孟买1950年版。

烈。1897年夏，纪念西瓦吉的庆祝会变成了印度民族主义左派同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游行示威。提拉克在这时义愤地说："如果小偷钻进了我们的房屋，而我们没有力量把他们赶走，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锁在屋里，活活地烧死。"①

提拉克在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时，揭露并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卑劣行径，指出了印度人民大众饥饿和贫穷的根源。揭露了受官方影响的国民大会党政策的妥协性。提拉克领导了国民大会党的左翼。他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民主主义者阶层中间，获得了相当大的威望。提拉克及其一派的活动某些方面超过了国民大会的范围。提拉克认为，把印度广大的人民阶层吸引到解放斗争中来是非常重要的。"激进派"同孟买的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中间进行了政治鼓动。印度工人非常需要知识分子的结合，能够帮助他们解释某些疑难的社会现象，帮助他们统一起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激进派"发动工人群众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1899年，孟买工人在提拉克信徒的影响下，举行了反英示威，这是孟买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发动。

提拉克作为一个为争取自由和立宪政府的英勇斗士，战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团结斗争的策略是他活动的一项重要成就。在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他盼望着不分阶级、宗教和种姓差别的全体人民的支持，因此，他对印度国大党的"激进派"和"稳健派"作出了平衡，也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遗产。

以提拉克为代表的"激进派"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提拉克的政治斗争，还摆脱不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阶级偏见。他不敢正视阶级斗争，力图解说印度民族运动及其思想意识是超阶级的。提拉克对于土地问题的观点只限于土地所有者和殖民当

① 《印度时报》1897年9月10日。

局的税务关系方面。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而只是作为国大党的一个反对派出现的。它没有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它没有提出反对农村中的封建压迫的纲领，没有真正深入群众和发动群众，更没有号召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激进派”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力图把民族群众运动建立在正统的印度教文明上，从而妨碍了在反帝运动中和其他教徒、特别是与穆斯林的联合。更为突出的是提拉克一派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斗争极为软弱，完全放弃了武装斗争。提拉克说：“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打算拿起武器反对政府。”“历史大量的证明，一个附属国的人民，不问是如何地无依无靠，却是能够用团结、勇敢和决心战胜他们的高傲的统治者，而无须乎诉诸武力。”[①]他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也总是那么软弱无力，直到他活动的后期他的政治态度仍是如此。他说：英国当局“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所给的东西虽然很少，但我们用不着悲观。”“不管拿出来的是什么我们都接受，但是我们不应该对它感到满足而放弃我们的运动。”[②] 提拉克与“激进派”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是以印度国大党作为先导的民族运动所具有的特点。实质上，“激进派”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它也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与富裕的农村上层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没有摆脱封建意识的影响。

英国殖民当局视提拉克为最大威胁。1897 年以查彼卡尔兄弟杀死殖民官吏兰德为借口，逮捕了提拉克，并判处十八个月监禁。广大印度群众和国内外舆论界，强烈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对提拉克的迫害。英国殖民当局迫于压力，于 1898 年释放了提拉克。提拉克更加勇敢地继续同英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① 见《印度历史杂志》1976 年 12 月号。

② 见《印度历史杂志》1975 年 8 月号。

开始走上了新的阶段。

“提拉克作为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为印度的自由和独立不息地斗争，终而积劳成疾，不幸于1920年逝世。作为一位学者，造诣极深，著有《吠陀中的北极故乡》、《薄伽梵歌的秘密》等著作。诚然，以他为代表的‘激进派’本身，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弱点，它不可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没有提出完整的反封建压迫的纲领，未能真正深入和发动群众。而且，‘激进派’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印度教文明为正统，从而妨碍了和其他教徒特别是与穆斯林的联合。但是，提拉克为印度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站在‘印度觉醒’时代的前列。”①

① 李文业：《东方黎明的一颗晨星——提拉克与印度的觉醒》，载《现代世界风云纪实1900—1990》第13—14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五章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亚洲觉醒中的印度

19世纪最后30年，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是于1898年至1914年间在欧美及亚洲一带完全形成的。

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夺取了大量殖民地，更加扩大了资本主义对劳动群众的剥削范围。对殖民剥削来说，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掠夺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原有方式外，资本输出已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指出："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①] 19世纪60年代，英国资本家在印度大规模地修筑铁路，同时也建立工厂。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加速的移植到殖民地。列宁指出："英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②]

印度成为英国最大的直接的典型的殖民地，遭受到英国各种形式的剥削与掠夺，因而也激起了印度民族的强烈反抗。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25页。

掠夺愈益加重。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占领主要经济和政治阵地后，对殖民地国家实行了新的压迫的掠夺方式。帝国主义力图使殖民地长期处于农业原料附属国的地位，千方百计蹂躏民族工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增长和尖锐起来。殖民地的印度发展民族工业对英帝国主义是不利的，因为民族工业会成为他们的竞争者，因而他们千方百计阻止印度资本主义主义的发展。可是帝国主义者阻止不了这种趋势。列宁指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 19 世纪末在印度产生了民族工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结构，从而也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民族思想和民族觉悟的增长，产生了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的社会矛盾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结果，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印度社会的阶级构成，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是印度这一个时期历史最突出的现象。和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形成重要的对抗力量。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印度除了是英国的原料附属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外，印度已成为英国资本输出的场所。英国资本家用在印度掠夺的资本，在印度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铁路钱。铁路的建设是完全为了殖民者的利益，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但铁路的建筑在客观上都消除了印度各地经济的孤立性，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85 页。

印度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从纺织工业发展起来的。印度的工业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加尔各答、孟买、古吉拉特、马德拉斯和其他大港口城市的商业买办和高利贷阶层形成的，他们经营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

印度的资本主义公司很大一部分是受英国资本家监督的。为了服务于本国资本家，英国殖民当局不但不援助印度工业，反而向印度工厂出产的布匹征收3.5%的消费税。印度工厂主反而需要利用小商品生产，来维系工厂棉纱业的发展。在国外竞争能力的削弱，远东市场的丧失的情况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极力主张发展手工织布业。手工织布业是印度家庭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成千万人。廉价的劳动力，增加了资本的利润。印度棉纱在国内市场的销路有了保证。棉纱厂和手工织布业的关系，构成了共同反英运动的经济基础。手工业者受害于殖民主义的专横和英国商品的竞争，比资产阶级尤烈，他们和农民一样，是反殖民压迫的重要力量。

印度资产阶级对宗主国的依赖性是殖民统治造成的。殖民制度阻碍了印度工业的发展，阻碍了印度机器制造业和重工业的建立，使印度工业和资产阶级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印度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商业买办和封建土地占有制有着密切联系，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也是尖锐存在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新兴阶级——工人阶级也同时形成和加速发展了。由于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而造成的普遍经济落后状态，使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迟缓，印度工人阶级的发展延续了一个长时间，状态更加恶化。

印度的工人阶级是由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形成的。这些人被生活所迫，是在只要不饿死的条件下进工厂做工的。资产阶级利用这一切，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印度工厂主的高额利润和英

国资产阶级的超额利润都要从印度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印度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达到惊人的程度。工人工时一般都是十四小时。工厂里的非人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过长的劳动时间，高利贷者的勒索，使工人的状况更为悲惨。在印度，已开始形成固定的工厂工人阶层。工人阶级为了改善自身状况，要求提高工资，常常举行罢工斗争。作为一个新生的不断成长的阶级，它是印度群众中最进步和革命的力量。

在殖民地的印度，知识分子作为一定的社会阶层，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印度知识分子的发展壮大，是和印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的。殖民地国家机关的印度籍官员，构成印度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普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依靠自己的薪水维持生活。他们人数相当众多，包括教师、职员、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他们大部分过着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生活。失业经常威胁着他们。知识分子渴望扩大运用他们才能和知识的机会，这就影响了英国官僚在管理印度事务方面的垄断地位。同时知识分子面临着种族歧视、文化生活的限制，对政治权利的剥夺和物质生活的贫困等方面的威胁。有正义感的热爱自己祖国的印度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反对殖民统治的要求，大部分知识分子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

印度城市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时期，印度的大城市开始由行政中心和商业集散中心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城市的作用日益增长。城市在传播进步思想和争取国家独立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城市居民，包括中小工商业者成为民族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城市居民逐渐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重大力量。

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这个时期内，较为快些。这是由于英国加速对印度的资本输出造成的。根

据英国统治当局的官方材料，1895—1908年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速度，全部银行准备金从34900万增加到74200万卢比；股份公司的资本从28870万增加到56720万卢比。[①] 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印度封建残余的束缚，妨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不能阻止它的发展。在印度国内主要发展的是纺织工业，在20世纪初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工业企业。印度最大的财团之一塔塔钢铁厂就是在1913年兴建的。在代理店的基础上，出现了印度垄断资本主义联合组织，塔塔公司则是最大的联合组织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公司建立了冶金工厂，水泥厂和水力发电站等厂矿和银行机构。印度垄断资本在发展的早期就得到封建势力的资助，这也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封建残余制度影响了印度国内市场的扩大，封建土地制度、行会制度、种姓制度等，大大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封建王公把敛积的财富却往往投资在工业上。有些封建王公本身就发展成资本家。19世纪下半期在孟买和阿默达巴德建立起来的第一批印度棉纺织厂中，就有不少王公参加了投资。塔塔财团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得到王公们的大力支持，格华里奥大公曾认购塔塔钢铁公司四十万英镑的股本，另外几个大王公提供了塔塔水电公司资本的2/3。比尔拉财团同封建王公也有密切的联系。迈索尔、海德拉巴、巴罗达、格华里奥和特拉凡哥尔等土邦的大公，都曾经在自己的土邦内创办企业或与垄断资本合办企业。他们本身就成为大资本家。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日俄战争时期增加了对中国和其他地区输出商品的机会。1908年，由于日本恢复了竞争，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量下降。印度资产阶级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夺国内市场上。他们在政治上提出的主张，则是保护印度工业、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

① 《印度财政和币制皇家委员会报告·附录第3卷》，第2卷，第657页。

在民族独立的国家中，国家的支持是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可是在殖民地的印度，殖民当局对民族工业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加以阻挠。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同英国垄断资本的竞争和冲突是多方面的。

印度的许多经济部门，都操纵在英国垄断组织手里。20 世纪初期，印度还没有本国的航运业，印度资产阶级提出建立自己的商船队问题。英国资本输出的日益增多，束缚了印度民族工业企业的活动。印度民族资本家也在兴办印度银行事业。这些方面的事业，在 20 世纪初在印度都有了发展。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客观上是符合印度独立发展的要求。20 世纪初，他们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纲领，抵制英国货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人民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抵制英货运动对印度工业生产又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运动为印度棉纺织厂的产品扩大了国内市场，使大工业中心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运动也促使了资产阶级加强了资本积累，印度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群众的爱国热情，获得大量推销商品的机会，反而唯利是图的任意提价，获取超额利润。纺织工业中心孟买的工厂主，明显地表明 1905—1906 年度由于抵制英货使他们获得发展："目前，在我国许多地区展开的抵制英货运动如火如荼，这对热中于布匹生产的人概会有所裨益。"[1]

抵制英货运动有利于印度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的兴起。1906—1907 年内，孟加拉出现了 70 余家新的股份公司，同时有 60 余家公司增加了资本。孟买地区在 1905—1907 两年内，工厂由 455 家增加到 519 家，这些工厂的就业人数也增加了。印度最大的股份公司塔塔冶金公司，就是在抵制英货运动推

① 《印度时报》，1905 年 4 月 28 日，第 19 页。

动下兴办起来的，它拥有股东7千人、资本为2300余万卢比。商业、银行业、保险业等，在抵制英货运动高潮的年代里也发展起来了。印度民族资本企业、在全国所有地区与英国公司并存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英帝国主义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激烈化，要求民族自治，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第二节　印度的觉醒和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民族工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关系开始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阻碍了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使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同外国垄断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共同剥削工人和农民。英国垄断资本加强了对印度的剥削和控制，印度的民族工业处于对英国垄断组织的依赖状态，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陷入对英国垄断资本的依属地位，对帝国主义具有妥协性。随着印度民族工业的成长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它同英国殖民主义的矛盾日益增大。由于殖民者对印度劳动群众剥削的加深，印度广大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情绪普遍增长，从而形成反英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洪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民族运动日益高涨，给予英国殖民统治沉重打击和严重威协。

印度农民备受深重灾难。农业卷入资本主义；商业高利贷在农业中的渗透，使农民进一步走向破产。19世纪末，农民丧失土

地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随着而来的严重饥荒，造成大量农民的死亡。19 世纪下半期即发生了 24 次饥荒，死亡人数约达 2850 万。这种严重情况，必然使阶级矛盾尖锐化，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反对地主和高利贷者，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早在 1872 年在旁遮普即发生了纳姆达尔教派的起义。这个教派在拉姆·辛格(1815—1888)的领导下，联合了旁遮普的农民群众和城市下层群众，为把最广泛的锡克教徒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而努力，同时也和英印军队中的锡克教徒的军团建立了联系。但是，由于起事过早，起义缺乏充分准备，被英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9 世纪末，马拉塔农民运动最为突出。马拉塔农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而 1879 年的起义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农民起义有了较好的组织和领导，有了较明确的斗争目标。这次起义的领袖瓦苏达甫·巴尔旺特·布哈德克(1845—1883)，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婆罗门卡斯特，曾在浦那城政府的一个机关中作文牍员，他接触下层群众，了解马拉塔农民的悲惨处境，而对殖民统治深恶痛绝。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并领导他们组织武装斗争，反对印度的英国政权。起义者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宣布成立马拉塔人的独立国家。在斗争目标上，起义者不仅反对地主和高利贷者，同时也反对殖民当局。起义者要求孟买殖民当局减少捐税，减少英国官吏的薪俸，要求实施有利于社会和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农民起义把反封建斗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当起义爆发时布哈德克决定用从高利贷和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财物雇佣一支职业军队，他打算把这支职业军队变成将来反对英国的民军的核心。英国殖民当局派遣了许多兵团来围剿起义者，马拉塔人的这次起义被英国殖民者极残酷地镇压了。殖民当局利用叛徒的帮助，逮捕了布哈德克，并被判为终身苦役。1879 年 11 月 3—7 日，在浦那审判时，大量人群汇集

在法院前，群众高呼："瓦苏达甫万岁！"表示了对他的极大崇敬和怀念。

在此期间，1879—1880年在哥达维利河下游地区也爆发了起义。这次自发的起义，不久便演变为农民的游击斗争。游击队使英国军队遭到了很大损失，游击队的指挥者德哈拉昆·钦德利亚表现的非常勇敢和机智。此外，在印度各个地区：比哈尔、拉其普坦、马拉巴海岸等地都发生了起义。其他各省也在准备起义。

印度农民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农民没能导致了19世纪末期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农民的组织软弱，也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和方向。民族解放斗争只有在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才能走向胜利。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但当时的印度无产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开始登上了印度的政治舞台，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开始成长起来。19世纪60年代，孟买和加尔各答形成了第一批印度工业无产阶级队伍，到90年代，人数已达40余万。加之铁路与矿山工人总数已有七、八十万人。由于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殖民地性质，种植园在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定地位。因此，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农业工人。印度的工人阶级，是由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主要是破产农民形成的。这些破产的农民是被迫在只要不致饿死的条件下进入工厂的，资产阶级利用这一点，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工作日长达15小时，甚至延长到18小时，工作条件恶劣，工资特别低，女工、童工和成年男子一样长的工时，从事着力不胜任的劳动。工人们没有星期日、假日的休息时间，工人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难以忍受的劳动条件，迫使部分工人离

开工厂重新回到农村，另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又补充进来，这样不断的流动，妨碍了工人的团结。在孟买、加尔各答等工业中心，也逐渐地形成了固定的工人骨干，这批产业工人，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 世纪 70 年代，印度无产阶级开始掀起争取经济权利的罢工斗争。80 年代在孟买和加尔各答都爆发了几次声势浩大的罢工。在斗争中工会组织也产生了。1884 年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孟买纺织工人协会"。印度工人阶级进一步开展了争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斗争。早在 1877 年，那格浦尔的"女皇"纺织厂，发生了第一次产业工人罢工，反抗工业家和百万富翁、厂主塔塔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此后，罢工斗争年复一年的增加。初期的罢工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斗争，但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锻炼了工人阶级。

1881 年，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实施第一个工厂法，禁止 7 岁以下的儿童进厂劳动，虽然这项法律并未改变工人的处境，但却使工人懂得他们斗争的胜利，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取得。1890 年在孟买建立了第一个纺织工人的职工会。1891 年工人们争得了新的工厂法，规定实行休息日制度，并禁止 9 岁以下的儿童进厂劳动。但在殖民统治的条件下，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是得不到实行的。

19 世纪末期的印度无产阶级，数量上还不太大，但它却是急速发展。1894 年印度的产业工人只有 35 万人，1902 年即达 54 万人。虽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还不够成熟，然而它是一个新生的和不断成长的阶级，它是印度人民中最团结和最革命的力量。

印度工人阶级在 20 世纪初还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因此还不能提出独立的政治纲领。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零散的和多次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是 1905—1908 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动力之一。

在大工厂和铁路上工作的印度无产阶级队伍的积极性最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孟买的纺织工人广泛地开始发动。出现了《马拉塔人联谊协会》这样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启蒙活动的组织。早在1905年前，"激进派"首领提拉克就与孟买工人阶级建立了初步联系，在部分孟买工人中建立了单独的行动组织，首先是马拉塔人组织。提拉克派的反帝宣传，在工人中间产生了极大反响。"激进派"在工人中的活动，促进了工人中民族意识的增长，吸引无产阶级更积极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

1905年工人运动不仅局限于孟买纺织工人的工潮，还遍及于国内其他地区无产阶级的队伍中，1905年10月，东印度铁路近千名员工罢工，紧接着加尔各答的印刷工人，邮电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反对殖民统治。此后，孟加拉各行各业的无产者都掀起了罢工高潮。1906年8月东印度铁路工人罢工的风潮，遭到英国当局的弹压，致使一些车站停运。1905—1907年，工人阶级罢工运动比比皆是。在这些年里，几乎所有罢工都带有经济性质。作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派"，力图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影响和组织无产阶级前进。他们的纲领，也为工人群众所接受，他们的策略对无产阶级也有消极影响。孟加拉"激进派"的一个首领贝·钱·巴尔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自由，自由即意味着没有一切外国监督"。斗争方式则是"消极对抗。它意味着有组织地坚决不给当局以任何支持，无论是自愿的或是给酬金的。"①

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大会的"稳健派"被吓倒了，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号召人民群众放弃抵制英货运动而与英国合作。他们认为抵制英货有暴力气氛，是

① 《印度时报》1906年9月22日第15页。

对英国不友好的表示。而要与英国决裂，在他们看来是不许可的。然而“激进派”则主张继续坚持抵制英货运动，反对与英国妥协。这样“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关系便愈来愈尖锐了，竟发展到分裂的地步。1907年12月，国民大会苏拉特年会上，终于发生了以郭克雷为首的“稳健派”与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的决裂。“稳健派”首领害怕“激进派”势力的增长，他们提出废止抵制英货并同英国合作的要求，对“激进派”进行了恶意的攻击，“激进派”则坚决反对这种不利于民族运动的主张。两派当场发生了徒手的搏斗，互相撕打。最后“稳健派”得到英国警察的帮助，把“激进派”逐出会场，以这时起两派各自发展，直到1916年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才回到国民大会中去。国民大会苏拉特年会上的分裂，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之被驱出国民大会，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妥协、退让，国民大会大大地向右转了，它更加脱离群众。尼赫鲁曾写道：“1907年冲突发生了，结果显然是旧的稳健派得了胜利。但是此次得胜是由于组织上的控制和国大党当时的有限选举权所造成。但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在印度有政治头脑的人是赞成提拉克和他的集团的。国民大会党的重要性丧失了很多，而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其他的活动上去了。”[①] 到1908年，“稳健派”终于脱离了国民大会而另行组织自由主义联盟。“激进派”也退出了国民大会，建立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但却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在1908年提拉克及其他领袖被逮捕以后，由于缺乏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个政党实际上便瓦解了。

在民族运动的浪潮中，出于对殖民者的仇恨，在印度发生了一些暗杀殖民官员的个人恐怖行为。在这紧张的气氛中，提拉克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466页。

的文章遭到政府的强烈反对。在殖民当局眼睛里，提拉克文章激烈的调子，成为闹事的煽动者。他于1908年6月23日遭到逮捕，并交由审判。1908年7月，提拉克被提交孟买最高法庭，以“企图煽动对政府的敌对情绪”的罪名进行审判。提拉克在法庭上表现的非常英勇，他在长篇演说中，彻底驳斥了对他所提出的控告，他坚持印度人民争取解放的权利，不惜采用起义并援引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宣称印度正处于反对官僚制度，争取实现宪政的伟大斗争的前夜。但是英国殖民者决心谋害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理地判处提拉克在安达曼群岛上服苦役六年。

英国殖民者对提拉克的判决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无比愤怒，激起了全印度解放运动的新高涨。西印度成为这次运动的中心。为了回答殖民者这一暴行，孟买群众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7月23日，孟买工人开始总政治罢工，要求释放提拉克。罢工持续了6天，参加罢工的各行业的工人，竟达10万以上。城市的其他阶层也积极参加了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工人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为了反击警察的弹压，工人在街上筑起堡垒，用石块和木棒反击警察。工人们在斗争中表现了工人阶级固有的坚强和团结精神。7月27日，殖民当局调来了大批正规军残酷地镇压工人，用实弹射击徒手的群众，甚至逮捕唱民族歌曲的小学生，大批工人被逮捕。工人们顽强地坚持巷战。

在孟买以外的其他地区，人民群众对判处提拉克的反响同样强烈，运送提拉克路经阿迈达巴德城时，很多商人关闭了商店，工人罢工。8月初，在加尔各答群众和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在那格浦尔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

1908年7月23日至29日的孟买政治罢工，是印度1905—1908年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顶点。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政治斗争，拉瓦尔品第和

旁遮普的铁路工人，加尔各答的黄麻工厂工人和提涅维利的纺织工人，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而孟买无产阶级的政治大罢工成为争取印度独立斗争的里程碑。从这时起，印度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列宁非常重视当时亚洲各国的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列宁对孟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给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孟买的游行和罢工，标志着“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政治斗争了。”[①]

1908 年在孟买举行的有 10 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连续 6 天之久。罢工几乎使这个城市的全部活动陷于瘫痪。这次事件被看成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的政治大罢工，列宁曾经给予很高度的评价：“欧洲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而且人数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②]

第三节　1905—1908 年的革命高涨

20 世纪初期，英、印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印度各族人民普遍觉醒，投入到民族运动，更积极地进行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英国殖民者大为恐慌。印度作为英国的重要殖民地，英国是不会轻易放弃它的统治的。相反，英国殖民者，视印度为它的“生命线”，殖民当局竭力制止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扼煞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以达到巩固英国殖民统治的目的。

20 世纪初印度的政治、社会矛盾大大尖锐起来，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面对着印度民族运动的浪

---

① 《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5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58 页。

潮，英国殖民者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1899年出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正是执行的这一蛮横政策。他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直接执行暴力的镇压措施，推行殖民压迫，仇视印度人民的民族要求。他上任伊始，剥夺了19世纪80年代印度民族运动所取得的局部的地方自治权。1899年，他为了使加尔各答市政府中的欧洲人占多数，擅自把民选人员减少了一半。这一蛮横措施激起了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愤怒，28名留任的印籍民选人员退出市政府，以示抗议。

英国殖民当局加强了思想和舆论的控制，进一步压制和打击印度的自治和独立活动。民族报刊受到严格的控制。1898和1904年，两度修改"国务机密法"。凡是在报刊上对殖民当局提出批评，根据该法的规定，就可以将其编辑投入监狱。

英国殖民当局，加强了警察统治。1905年警察局改组，各省成立了"刑事侦查部"，殖民者肆意对人民群众侦讯、逮捕，加以镇压。警察机构扩大，经费增加。

寇松的统治政策露骨的贯彻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路线和原则。他在1899年—1905年任印度总督和副王期间，推行了许多极其反动的政策。他把印度最反动的势力，如封建王公和地主分子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而对逐渐增长着民族意识的国民大会竭力加以挫伤。寇松于1900年致印度事务大臣的信里写道："国民大会正摇摇欲坠，我在印度的大志之一，就是帮助它寿终正寝。"①寇松粗暴地蹂躏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极端仇视他们争取独立和自主的思想。寇松曾公开宣称，印度人是劣等民族，没有能力实行自治。并借口印度人做事无能，而将国家机关中的印籍职员驱逐出去。寇松看到印度的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思想的传播者，为了

① 转引之《今日印度》下册第42页。

缩小这一阶层，乃于1904年颁布了反动的大学法。限制印度青年进入高等学校。根据这项法律，不仅学费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而且规定殖民当局有权对各大学派遣警察监视。大学的监管机构成员五分之四由政府委派，英国人占大多数。大学法剥夺了印度下层知识分子的求学机会，引起印度社会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挠孟加拉地区的民族运动，1905年5月，殖民当局颁布了分割孟加拉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孟加拉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孟加拉分治案强行把一体的孟加拉省分割为二。将孟加拉东部划为一省，居民占三分之二，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西部的孟加拉省，只有原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为印度教徒。这次分割孟加拉省的目的，是分裂已经形成的孟加拉民族，使大部分孟加拉人脱离其政治中心加尔各答。并在孟加拉人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煽动宗教纠纷，藉以削弱孟加拉民族运动。寇松曾招认了分裂孟加拉的罪恶目的："分治把激进派和鼓动家的政治计划打成两半，这些人在争取政治让步的斗争中，将要寻找机会把全部孟加拉人民的力量用来反对英国政府。"①

1904年，寇松为了分治孟加拉，特此在东孟加拉全境做了一次巡视，拉拢上层人物支持分治，并以巨款收买伊斯兰教的封建贵族，成为他们分治政策的帮手。殖民当局借口保护伊斯兰教的利益，给予上层伊斯兰教徒的特权，借以扩大他们对于广大伊斯兰教徒商人和知识分子、伊斯兰教群众的影响，进一步挑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纠纷。

殖民者分割孟加拉是怀有恶毒阴谋的。殖民者企图削弱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制止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破坏正在形成中的孟加拉民族及其文化。孟加拉的工业比印度其他地区更为发展，这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议会辩论集·第4辑》，第191卷，第511页。

里民族工业发展的程度竟然达到能同英国入口货物相竞争的地步。民族主义在这里强烈而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在这里早已形成了一个相当有势力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和资产阶级一起，和英国殖民者进行了积极的竞争。英国殖民者蓄谋已久，进行过一系列打击印度资产阶级的措施，例如扩建和装备吉大港以削弱加尔各答的地位等。最后终于用分割孟加拉的办法，企图给印度资产阶级和民族运动以沉重打击。英国殖民当局分割孟加拉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挑拨孟加拉人的宗派纠纷。东孟加拉的农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西孟加拉的居民大部分是印度教徒。而地主及其他剥削分子则多为印度教徒。英国殖民者为了提高地税，借口新邦的成立而消除东孟加拉地主即印度教徒的柴明达尔的权力，而把自己标榜为反对印度教地主和保护穆斯林农民的。与此同时，殖民者煽动宗教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削弱民族运动。

寇松的一系列反动措施，尤其是孟加拉分割案，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普遍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产生了不满，广大人民由于处于日益沉重的压迫和剥削而强烈的反抗。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05年—1908年形成新的高潮，印度与英国殖民者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是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基础，而1905年俄国革命，推动了亚洲各民族包括印度人民的觉醒。列宁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展，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 印度1905—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1908年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就是在当时世界革命高涨的影响下，以激起普遍愤怒的孟加拉分割案为导火线而开始的。为了反对分割孟加拉的法案，孟加拉各界1905年8月7日宣布抵制英货。接着，民族运动迅速展开了。随着分割孟加拉法案于1905年10月16日生效，全孟加拉人民更加沸腾起来。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都参加到抗议运动中来。人民群众展开了一切抗议活动，交通断绝了，商店关闭了，罢工、罢市到处可见。居民为孟加拉的分割而致哀，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人民群众强烈地抵制英货，妇女也参加了斗争。运动很快由孟加拉发展到旁遮普和孟买等地。与过去的运动不同，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便具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群众性质，而孟买和孟加拉地区的革命运动的群众性尤其明显。在那里集中着印度四分之三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这次运动所采用的主要斗争方式——经济抵制，也与过去的一切宗教的空谈大相径庭。

国民大会“稳健派”虽然耽心爆发革命和害怕群众运动的发展，但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在“激进派”的有力影响下，在1906年国民大会加尔各答年会上，终于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这个纲领要求合并孟加拉，初次宣布“司瓦拉吉”（自治）的目标，并支持抵制英货的运动，支持“司瓦德希”（自产）和民族教育。以这时起，“司瓦拉吉”、抵制洋货、“司瓦德希”和民族教育便成了国民大会纲领的四大要点。

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各个阶级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国民大会的左翼即“稳健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的自治。国民大会主席，“稳健派”的首领达达拜·瑙罗治（1825—1917）于1906年加尔各答年会的演说中，说明了他们争取自治的手段：“我认为，无论谁都不

会想，一切现今的国家机器会被突然粉碎，而我所规定的印度自治的那些权利会一下子被实行。”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认为武装起义是推翻殖民制度和获得独立的主要手段。但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把起义想象为少数人的密谋和恐怖活动。因此，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秘密组织所准备的武装起义，不论在孟加拉或在印度其他地方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些组织被英国暗探所破获，大多数由于英国当局的迫害而转入秘密活动，保存下来的几个小组仍旧经常对英国官僚采取个人恐怖手段。

国民大会左翼的“激进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利益不统一。目标不一致等自身的弱点，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本身对纲领的理解也颇不一致的。以提拉克为首的一部分人某些方面承认反帝斗争的暴力形式，但又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而许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又把武装起义理解为少数密谋分子的活动。因此，在实践上他们并没有发动真正的武装起义。提拉克一派主张建立一个以总统为首的联邦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应有出版、集会和言论等自由，国家应保护民族工商业。然而土地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在提拉克的纲领中仍然被忽视了。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与发展，1907 年 4 月在东孟加拉暴发了农民反对地主及高利贷的运动。英国殖民者企图以宗教敌视转移阶级仇恨，多方进行挑拨。然而农民不仅反对印度教徒地主和高利贷者，同时也反对穆斯林剥削者。英国殖民者以残酷的手段将农民运动镇压下去。

1907 年初，反帝国主义的中心暂时从孟加拉转移到旁遮普。在旁遮普参加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包括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农民处于斗争的第一线。1906 年底开始，殖民当局增加了土地税、灌溉

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极为不满。殖民当局公布的新的土地法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权利，引起了旁遮普农民的普遍仇恨，加之鼠疫流行，农民状况极为苦难。"激进派"在普遍不满的农民中，进行组织鼓动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著名的"激进派"人士阿吉特·辛格于1907年2月组织了《印度爱国者协会》，这个组织为要求减轻农民困难而斗争。他在农民中特别是农业工人中有很大影响。4月间在巴里·多阿布举行了反对增加水税的群众集会，拉合尔附近的农民1.2万余人参加了大会。辛格在拉瓦尔品第的一次集会上号召："兄弟们，我们有2.9亿人，他们仅仅15万人。当然，他们有大炮，但是2亿几千万人，呵口气就能把那些大炮吹走，何况我们还有自己的拳头。"[1]

1907年5月旁遮普的农民爆发了起义，在"激进派"代表拉志帕特·罗易的发动下，农民拒绝缴纳水捐和地税。在拉瓦尔品第等地区，农民举行了起义，并占领了这个城市。民族解放运动把农民运动和工人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而互相支援，农民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同时旁遮普的铁路员工则宣布拒绝运送镇压起义农民的殖民军队而举行政治罢工。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辛格和罗易，没有经过审讯，就将他们流放到缅甸，并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起义。这次起义显示了工农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能够给殖民者以致命的打击。

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高涨时，就采取镇压手段。殖民当局禁止群众召开大会和示威游行，派出军警镇压罢工工人。殖民当局的镇压手段必定引起印度社会的反抗，在印度社会的愤懑声中寇松被迫于1905年辞职，他的继任者明托一方应允改革，玩弄欺骗的手段，极力拉拢孟加拉地主和印度封建分子，

---

① 《印度时报》1907年6月8日第4页。

保证不影响他们的固定赋税额。一面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加剧镇压。东孟加拉许多地区的农村，驻有"警察惩罚队"，对农民施加各种暴行，却由村民供养。1907年11月，殖民当局公布了"防止聚众暴乱法"规定，非经当局许可，不得举行任何集会和示威游行。民族报刊受到迫害，许多编辑被捕入狱。土邦的王公也跟随英国主子镇压民族运动。1907年克什米尔禁止一切与民族运动有关的活动。许多土邦禁止英属印度各省的报刊在境内传播。

分裂孟加拉，是对孟加拉民族人民的攻击，也直接损害了孟加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而，民族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工人和农民广大群众参加到抗议运动中来，资产阶级和地主也卷入了。全孟加拉沸腾起来了，人民群众在1905年10月16日分割法案生效之日，宣布为民族志哀日，各界群众都参加到抗议运动中来。孟加拉人民展开了一切抗议活动，商店关门、停止营业、交通断绝、罢工罢市。加尔各答市区里这一天举行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浩大的群众游行。男女老少组成的群众队伍高呼着"祖国万岁!"的口号，唱着爱国歌曲，向举行净手圣礼的恒河岸行进。为了表示志哀，全日不生烟火。在加尔各答市有五万多人参加了群众大会，东孟加拉也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尽管，群众运动伴随了宗教仪式和复杂的封建礼仪，但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即群众运动一开始便具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性质。这次运动不仅具有群众性，而且还具有自觉性和民主性，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尤为明显。

孟加拉群众大会为民族团体所主持，他们大多是自由主义派的实业家和地主。他们把群众运动仅仅限于要求取消孟加拉分治、而不敢触动印度的英国当局。而日益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企图依靠群众运动，迫使英帝国主义让步。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被剥夺

了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不可能通过国家措施来保卫新兴民族工业，利用群众性的民族运动，打击外国竞争者，抵制英货，就是他们的主要策略。苏·班纳吉写道："不由立法者的决议而由我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建立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我国工业的道义关税保护政策。"① 民族资产阶级把他们的经济要求散布到群众之中，作为激发人民爱国心，提倡国货的民族口号而提出来的。这些口号得到了日益愤恨殖民主义剥削和异族统治的印度人民的支持，同时也促使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孟加拉成立了民族义勇军组织，加尔各答设立了中心机构。它的基本成员是青年学生，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推动抵制英货运动和举行群众示威。他们在集市上号召不买英国货，并在孟加拉组织举行了数百次各种群众大会。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纷纷成立了自称提倡国货的新的工业和商业公司，成立了各种国货协会和国货基金会。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成为这些机构的组织者。

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在激进派的影响下，国大党排出了温和派的干扰，在 1906 年的加尔各答年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并要求合并孟加拉。

在强大的印度民族运动的打击下，1911 年英国殖民者被迫重新修正了孟加拉分割案，把东西孟加拉重新合并起来。孟加拉分割案的修正，标志着 1905—1908 年革命运动的局部胜利。英帝国主义者则企图以重新合并孟加拉来缓和英国和印度的民族矛盾，以维持其殖民利益。这一企图也必定遭到失败。

殖民当局的镇压手段同时也加强起来。接着高潮之后而来的

① 苏伦德兰纳特·班纳吉：《一个民族在成长中，公共生活五十年回忆录》第 199 页，马德拉斯 1925 年版。

是警察的横行和反动镇压的黑暗时期。英国殖民当局在民族运动高潮时期于1907年通过了危害治安集会条例。1910年通过了严厉管理新闻的"新闻条例"。不需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即可加以逮捕和流放的条例，现在又拿出来对付"激进派"和其他革命人士。成千计的迫害案件，堆积在殖民当局的法院里。在这时期，不时出现的恐怖分子的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反映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带来的却是对工人和农民更为残酷无情的镇压。

1905—1908年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最终是失败了。但它对印度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具有重大影响，从这时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带有全印的性质。在这次高潮产生了新的思想以及和殖民者作斗争的新形式，在此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中都得到发展。随着印度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印度人民更加积极地大规模地投入为祖国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浪潮中。

第四节　工农运动的开展与国大党的分裂

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对印度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一次革命的洗礼。它标志着印度人民开始觉醒，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而进行英勇的斗争。

在孟加拉掀起的民族运动高潮，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旁遮普与联合省各民族团体于1905年底，已经开始宣传提倡国货和抵制英货。印度北部各城市，甚至克什米尔土邦，都召开了提倡国货的群众大会。1905年底到1906年初，在孟买以及其他几个中心地区和加尔各答一样建立了一些提倡国货的机构。提拉克本人在孟买开设了"提供国货"合作商店。这类机构，政治作用大于商业作用，他们对人民群众宣传民族独立思想，获得了人民支持。

1905年兴起的提倡国货运动，到1906年在孟加拉已成为群众性的规模，很快发展成为全国各城市的积极反帝行动。印度工人阶级成为积极的参加者，激进派成为他们的组织者。他们一面对人民提出民族口号，一面发动产业工人，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重要力量。

1906年7月，孟加拉的东印度铁路的工人，爆发了罢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取消种族歧视。他们派出纠察队并召开群众大会。殖民当局派出警察镇压罢工，并占领了各火车站，解雇了罢工的积极参加者。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罢工斗争中成立了印度早期的一个工会——东印度铁路工人工会。这是与民族运动有直接联系的第一次罢工。

加尔各答各工厂的工人也同样展开了斗争。1906年8月“克莱武黄麻厂”的所属工人罢工，1千多名罢工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对于英国行政人员对印度人的侮辱行为提出抗议。1906年12月，棉织厂和黄麻厂又举行了两次罢工，其中一次坚持一周，参加罢工的有4千人。“克莱武黄麻厂”罢工时成立了黄麻厂工人工会。与此同时，在孟加拉，印刷工人、搬运工人、清洁工人都举行过罢工，增加工资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初期的几次斗争，对印度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在产业工人罢工的同时，手工业者也参加了斗争，他们举行了示威，召开了反殖民统治的大会。

农民的斗争也开展起来，在孟加拉和旁遮普的农村，激进派展开了宣传。他们向农民宣读了民族报刊和秘密传单，多次召开了群众大会。农民对英国统治者的愤怒十分强烈。农民对旁遮普1906年审订土地税率、税额大增，水捐上涨，极为不满。激进派在旁遮普农民中展开宣传工作，召开农民大会，反对殖民压迫。

1907 年初，阿吉特·辛格在旁遮普建立了民族团体“印度爱国者协会”，积极对农民进行宣传工作，号召农民不纳税。殖民当局对农民运动进行了野蛮镇压，逮捕了阿吉特·辛格等人，并将他秘密流放缅甸。这一暴行，引起了旁遮普和其他各省群众的抗议和示威。英国当局一面镇压，一面又在土地税收政策上稍作让步，暂时制止了旁遮普群众斗争的发展。

1907 年孟加拉许多城市和农村地区，掀起了反英运动的浪潮。1907 年比哈尔省的靛蓝种植场农民也起来进行斗争，杀死了一个英国种植场主。

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民族运动内部的矛盾也发生了。激进派组织的活动，吓坏了上层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地主，温和派力图防止激进派在民族运动中政治影响的增长。这种激烈的纷争表现在国大党内部派系斗争上，最终导致了国大党的分裂。1906 年 12 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上，激进派推举提拉克为会议主席，但温和派不容选他，结果达达拜·瑙罗治重新当选主席。国大党内部两大派的斗争，继续着并且激烈起来。

1907 年，群众性的反帝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不仅打击了英国殖民者，也吓坏了资产阶级地主集团，他们开始公然要求停止运动。国大党温和派并派代表团晋谒明托总督，表示对英国当局的效忠，并为此召开了专门大会。1907 年 8 月，孟加拉的一百名大包税地主联名发表宣言，污蔑民族运动是“仇恨运动”。到 1907 年底，由于殖民当局的镇压和温和派的破坏，孟加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已趋减弱。

温和派的投降言行，引起了进步集团的愤怒。民族运动中两派的斗争又更加激烈了。1907 年围绕着国大党年会主席候选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07 年 8 月，8 百余名代表在那格浦尔举行会议时，激进派提出提拉克为主席候选人，但温和派占绝对

多数，而通过了它的候选人罗什·毕哈利·高士。第二天激进派组织了学生贫民2千多人到会场示威而发生冲突，结果把温和派赶出会场。年会改在苏拉特市举行，温和派发出要求把激进派赶出国大党，苏拉特年会激进派占少数。会议一开始两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讨论主席演说时，温和派不让提拉克发言，以致互相殴斗。结果第二天温和派和激进派各自召开了会议。

国大党苏拉特年会分裂的原因，在于温和派所代表的印度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对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妥协政策，他们害怕反帝斗争的彻底进行。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坚持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同时他们的大多数又不愿意和温和派分裂，他们不能单独达到目的，力图与温和派妥协。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群众性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同时鼓舞了印度进步爱国人士，主张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士日益增多，他们作为民族运动中的“激进派”，在运动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激进派”成为国大党内的革新派，20世纪初开始发挥其作用。国大党于1905年12月在贝拿勒斯召开第21届年会，国大党温和派领袖被形势所迫承认必须吸引群众参加民族运动。但在群众斗争的目的与方法上，温和派和激进派却发生了意见分歧。

国大党主席、温和派领袖哥帕尔·克里什纳·郭克雷在主席发言中声明：印度必须逐步地建立英帝国自治领地的政治制度。表示不愿意与英帝国主义决裂，反对印度其他各省抵制英货运动。以提拉克为代表的“激进派”在21届年会上主张扩大群众运动，把抵制英货运动推广到全国各地，提倡国货的宣传是动员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的手段。“激进派”尽管在国大党年会上是少数，但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会后他们第一次召开了自己的一个代表会议。

在社会上激进派的各地组织也相继诞生。1906年在达卡成立

了“进步社”，在附近各区建立了分社，和其他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交流、发行书刊，设法取得武器。1906年在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成立了民族团体，涅什·萨瓦卡尔和维那雅克·萨瓦卡尔创办了秘密团体“新印度社”，包括了孟买、浦那和海得拉巴等地的小组。瓜廖尔也成立了“瓜廖尔新印度协会”。

激进派号召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完全根除英国在印度的政权。在争取独立的斗争方法上，由于激进派的社会成分复杂，意见纷纭不一，而形成了两个集团。贝平·钱德拉·帕尔、奥罗宾多·高士和拉志帕特·罗易等激进派领袖，他们主张开展群众运动，而不进行武装起义，即不通过武装斗争而达到民族独立。以提拉克为首的一派，在原则上不反对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使用革命暴力，并组织派遣印度人员赴欧洲学习军事。发动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的力量，争取民族解放，在印度建立共和国。提拉克说：“我们印度人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深信代议制的人民政府的重要性。”①

激进派比资产阶级上层领导更坚决地为争取印度独立而斗争，这正表现出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的一面。在民族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民族压迫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的矛盾地位。不论哪一派别集团都没有提出在农村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纲领。积极参加提倡国货运动的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则主张完全消除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专横，是印度复兴的唯一方法。他这种空想主义色彩的主张实质上是不了解印度农民的解放是以印度的政治解放为前提的。同时，一些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力图把民族运动涂上宗教色彩，奥·高士说：“民族主义是神赐的宗

① 巴·干·提拉克：《言论著作集》第80页，马德拉斯1919年版。

教。"[①] 用宗教态度特别是印度古代宗教道德的态度来对待民族解放运动，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逃避阶级矛盾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激进派的政治主张，也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和乌托邦的幻想。在斗争中必然影响其运动的不彻底性。

激进派的斗争形式主要表现在大量发行民族报刊和组织"秘社"方面。他们发行的报刊数量大增。除了发行报刊外，还传播书籍、小册子和传单，号召和鼓动群众参加反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1906年，在孟加拉出版的由勃本德洛纳特·多托编辑的《新时代》周刊最受群众欢迎。印度总督明托1906年说："人民把《新时代》周刊当作福音来读，当圣物来保存。"[②] 可见，这些报刊在印度人民中间的影响。"秘社"是激进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成员，他们直接号召武装起义，却缺乏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们对敌人营垒的力量缺乏全面分析，对人民群众力量又缺乏正确认识，因而组织上很软弱，几乎是赤手空拳在搏斗。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等地的"秘社"，组织秘密宣传工作，散发传单和书刊，号召开展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初期的激进派，在当时印度的殖民地条件下，他们首先在政治上号召推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并以自己的行动来唤醒人民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们代表着印度人民的利益，是有其历史功绩和作用的。激进派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在各运动团体、文教团体、各学校内，都成了反殖民主义压迫斗争人士的聚集中心，但激进派尚无印度全国性的组织，仅作为国大党激进派的形式进行活动。随着国大党组织、策略的演变，激进派也处在不断改组分化过程中。

---

① 奥罗宾多·高士：《言论集》第7页，加尔各答1948年版。

② 明托：《印度·摩里和明托，1905—1910年》第234页，伦敦1935年版。

第五节　1906 年穆斯林联盟的成立

英国殖民者利用煽动宗教纠纷的手段，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高涨以来，英国殖民当局挑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宗教纠纷的手法，比以往更加恶劣。1906 年，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利用宗教建立了两个政党：一为“伊斯兰教联盟”，英国授予公爵封号的阿加汗成为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们自称联盟是代表 7 千万穆斯林的利益，他们是在保卫穆斯林免受印度教徒的侵犯，而不是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另一个是“印度教徒大联盟”，它是印度教地主、高利贷者的宗教沙文主义的组织。英帝国主义借助这些组织，企图将民族解放运动引向宗教纠纷，从而达到削弱和分裂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目的。

民族运动在发展中波及到印度所有阶级和阶层。伊斯兰教徒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满国大党所代表的政治立场，而和伊斯兰教地主阶级联合起来，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的政治态度为英国殖民当局拉拢伊斯兰教上层提供了条件。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教徒占优势的局面下，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事物中，使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上层人物的各种矛盾和分歧加剧起来。殖民当局借口保护伊斯兰教的宗教利益，公开给与伊斯兰教上层分子以特权，加强他们对广大伊斯兰教徒的影响，进一步挑起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宗教纠纷。

在英国官吏的指使和支持下，1906 年组织了“上层伊斯兰教徒代表团”晋谒总督，要求在行将建立的选举制度中，伊斯兰教徒另设选民单位，增加代表席位，伊斯兰教徒有单独的和特殊的代表权；请求给伊斯兰教徒在行政机关任职的特权，等等。总督明托立即宣布接受这些要求，他说：“你们正当的要求，不要把你

们的地位单纯从你们的人数上来估量，而要从你们的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及其对帝国的贡献上来加以估量。我和你们完全一致。"①

1906年在东孟加拉宣布接受伊斯兰教徒任国家官职，并增加他们在市政和民选机构中的人数。东孟加拉上层伊斯兰教分子，在殖民主义者一手操纵下，阻挠伊斯兰教徒群众参加民族运动。

英国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削弱和分裂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抵消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影响，企图使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对立起来。在他们的支持下，1886年在印度建立了所谓"伊斯兰教教育会"，新兴的宗教组织，它的作用自然是抵消反殖民主义的力量。英国殖民者始终是推行煽动宗教纠纷的政策，在他们支持下，1906年12月30日，在达卡成立了全印伊斯兰教的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它的主要宗旨是："在印度的穆斯林中促进效忠于英国政府的感情，消除对于政府在印度事务中所采取措施的意图可能产生的任何误解。"②

以后，在1907年的卡拉奇年会和1908年的勒克瑙年会上，穆斯林联盟制定了盟章，任命了常任主席。孟买的阿加汗任主席，他是伊斯兰教中大高利贷商人集团的代表。伊斯兰教徒中商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参加了穆斯林联盟的建盟工作和领导工作。

英国当局在各地特别是在孟加拉，大力挑拨印度教伊斯兰教纠纷。殖民主义者利用这一策略，唆使了大部分上层伊斯兰教徒来反对民族运动。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孟加拉，穆斯林上层开始举行大会，表示效忠英国当局，反对抵制英货。东孟加拉上层伊斯兰教分子，在殖民主义者一手操纵下，阻挠伊斯兰教徒群众

---

① 约翰·布拿普：《明托勋爵传》第244页，1925年版。

② 赫克托·博莱索：《真纳传》第59页，中译本商务1977年版。

参加民族运动，提出“护教运动”的口号，和提倡国货的口号相抗衡，并利用这个口号，煽动群众，对印度教徒展开斗争。他们设立了纯伊斯兰教学校，扩大纯伊斯兰教的商业和工业。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907年多次在东孟加拉许多地方煽起了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冲突，结果在混乱中毁坏庙宇、抢劫商店，许多人遭到伤亡。英国殖民者挑动的印度教伊斯兰教纠纷，削弱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第六节　莫尔利[①]—明托改革法案及其影响

1905—1908年全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至1909年初已进入沉寂阶段。在印度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殖民当局对地方的资产阶级上层作了一些让步。1909年公布的莫尔利—明托改革方案，就表明英国殖民者分裂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阴谋。

英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它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一面加紧镇压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一面采取措施，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等反动分子，参与议会和政府机构，为殖民统治服务。1907年间，殖民当局安排了两个印度人古帕太和比尔格兰来进入印度参事会，这个中央立法会议的机构，完全是徒具形式，更不用说印度人在这里的作用了。1909年斯·普·辛格爵士被指定为总督的行政参事会的法律参事，这同样是在形式上装饰殖民统治机构的印度化。

在孟买的罢工和反殖斗争运动以后，英国殖民当局除加强武力镇压外，同时采取了拉拢、怀柔的政治策略。1909年5月，英

---

① 约翰·莫尔利（Morley）为英国内阁印度事务大臣。

国议会通过了修改印度立法会议的人选的法案。这个新的“印度立法会议法案”，被称为“莫尔利—明托改革法案”。它的基本内容是扩大了立法机构的规模，中央立法会议与各省立法会议的议员，总数由124人增至331人，其中民选议员由39人增至135人。根据这个方案的规定，总督的参事会即中央立法议会增加印籍名额，但仍占少数；地方立法议会可占多数。实际上这个机构是毫无实权的，而进入者却要有很高的财产资格的限制。因而所有的委员几乎都是稳健派。

这只是一种骗局。在中央立法议会中维持了固定的官方的多数。除孟加拉立法会议外，地方上大多数立法会议的议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殖民当局委派的殖民官吏和豢养的走卒。莫尔利—明托改革法案的基本原则，对国大党要求在英帝国内实行自治，没有进行任何让步和实施。立法会议只能讨论当局交议的法案，它的决议，对殖民地行政当局并无约束力。印度总督兼任中央立法会议主席，他有权禁止通过任何决议，名为“立法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徒具形式的咨询机关，毫无立法实权可言。

英帝国主义实施这个法案的重大阴谋和严重后果是加深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纠纷。选举实行“分区选举”制度，选民有财产资格限制，只有很少数上层分子才有权参与选举活动。选举分几个选民单位举行，伊斯兰教选民为特别单位单独进行，伊斯兰教选举单位的财产资格，低于普通单位，伊斯兰教议员席位，超过伊斯兰教人口在全体居民中的比例。增加伊斯兰教上层代表的数额，其目的是加强他们的政治影响。伊斯兰教单独选举代表，是挑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纠纷的重要手段。

莫尔利—明托改革法案，并没有触动英帝国主义者在印度中央专制的统治。英国炮制的这个法案对地方的控制也没有放松。“印度政府并没有放松他们对省政府的控制；因此省立法议会能够

影响政府行动的范围被限制得很小。”[1] 更可怜的是，英国当局规定的“选民”数为5千人，这同3亿多居民多不相称！广大的各阶层的居民没有得到任何权利。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英国殖民当局拉拢和纠集一些反动分子为其效力。用所谓立法会议选举及议院结构的虚设，拉拢印度上层集团成为其统治的社会支柱。当然，它不能消除英国殖民者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莫尔利—明托改革法案只是对自治制度的一幅讽刺画而已。

印度人民的反抗给了英国殖民者以沉重打击。1911年英国殖民者不得不重新修正了孟加拉分割案，把东、西孟加拉重新合并。孟加拉分割案的修正，标志着1905—1908年革命运动的局部胜利。同时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德国帝国主义在竭力挑动爱尔兰和印度去反抗大英帝国。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殖民者企图以重新合并孟加拉来缓和印、英民族矛盾，以保持其殖民利益。

①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第4册第1038页。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印度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是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惨重的灾难。战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次战争震动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没有成为战场，直接参加战争。但是印度，作为不列颠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英帝国主义利用印度士兵做炮灰，与德、奥等的同盟国厮杀。英国把战争中的军费加在印度人民身上，把一部分军费，包括雇佣印度士兵的费用，交由印度负担，把印度作为军事物资的主要供应地。

第一节　大战时期英国对印政策

英帝国主义是战争的主要一方。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为了准备战争，极力巩固它在其殖民地的统治。把印度这样最大最重要的殖民地，视为支持战争的重要基地。战前，英国于1911年重新合并孟加拉，以缓和印度人民的愤怒情绪的同时，将比哈尔、奥里萨、阿萨姆等地划为单独的省份，以期稳定殖民统治。英帝国主义懂得，它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受着德国的威胁，德国控制西亚，影响阿富汗、伊朗，威胁着印度。

在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作为交战国的一员，从印度攫取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支持其进行的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到 1917 年，英国将 130 余万印度人投入战争，从印度攫取了大量的军需品。整个战争期间，使印度人民担负了 1 亿英镑的战争债务。[①]

英帝国主义者从战争一开始，就贪婪地利用印度的人力和物资来满足军事的需要。在印度招募的殖民地军队士兵，超过战前的 23 万增加为 100 多万。

在战争期间，英国加重了对印度原料的榨取，所有的原料都是按照比世界市场低得多的固定价格输出的，矿产、木材等原料，源源不断运往英国。同时榨取了大宗的农产品，从印度运走了大宗的生丝、麻、茶叶、毛皮等物资。1915 年底，殖民当局对小麦的收购进行了管制。到大战末期，英国从印度运走小麦共 300 多万吨，食用植物油 250 万吨。殖民当局广泛利用印度的工业生产能力满足军事需要。大宗的麻织品供应战争，包括麻袋约 30 亿条，麻布 40 亿码等等。英国出产的军用鞋有三分之二是用印度原料制成的。印度的棉织厂和麻织厂为军队制造了制服、棉被等军需品，约 4200 万件。同时，也让重工业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供应物资，塔塔冶金工厂战时提供了将近 30 万吨钢材。

英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榨取了大量的印度财富，迫使印度不能生产国内所需要的物资。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加紧了对印度人民的掠夺。

首先，殖民当局大幅度地增加税收、税率一般是在 50%以上，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对广大群众的日用必需品，如食盐，课以重税。从战争初期到战争末期，税收总额从 8110 万英镑，增加到 12330 万英镑。直接军事费用同一时期增加一倍以上。殖民主义者为了支持战争的需要，使用了各种方法榨取印度人民的财富，

① 英国《每日先驱报》1920 年 8 月 19 日。

如实行“献金”，发行公债等手段，来抵补殖民当局浩繁的财政开支。

其次，实行通货膨胀，是战争期间掠夺印度人民的一种主要手段。大量的发行纸币，攫取印度人民财富。1914年2月1日，纸币流通额为5.19亿卢比，1918年3月31日增至13.4亿卢比。[①]只发行纸币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英帝国主义者着手铸造并按票面价值使用银币。通货膨胀的加剧使银币的发行量越来越大。英国从伦敦购买大量的白银输入印度。白银价格迅猛上涨。而英国宣布白银输入印度由国家垄断。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英国殖民者当局依靠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大量地铸造银币，以便更多地购买军事物资，掠夺印度人民的财富。

同时，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限制外国竞争者的渗入，英国殖民当局，提高印度关税，在1916年把一般关税平均从5%增加到7.5%。战争初期，印度的贸易出口额大大减少，一方面出口的原料被大大压价，一方面也失去了德国及其盟国和欧洲许多中立国这些贸易伙伴。英国由于战争的拖累，不能利用印度原有潜力，美国、日本便趁机渗入印度市场。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英帝国主义的垄断地位第一次受到了威胁。英国殖民当局增加关税，正是为了英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战争期间掠夺日益加剧，印度殖民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英帝国主义一面对一切反殖民主义压迫的抗议运动继续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一面像战前一样，对印度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实行拉拢、怀柔政策。战前，英国当局在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取消了孟加拉分治。从而取得温和派的欢心，他们除发表感激之词外，也做出

① S·G·汤南迪卡尔，《战争给印度带来的经济后果》第199页，孟买1921年版。

了效忠英国当局的表示。在孟加拉重新统一的时候，英国殖民当局于1911年把印度中央行政机关，从民族运动的重要的政治中心孟加拉的加尔各答迁移到德里。这个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中心，被英国殖民者继承下来了。英国当局重新表示对国大党的扶持，力图使温和派对其保持忠诚。这种拉拢的怀柔政策，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印度的资产阶级地主上层分子，卖力地支持英国的战争。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展开为英军募集志愿兵与军需物资等运动。印度资产阶级支持英国，是希望在战争中增强其经济地位，并指望取得英国人的政治让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是这种态度，他写道："经过了许多讨论，我们终于决定在联合省采取合作态度，因为我们的青年认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受点军事训练也是值得的。我提出了参加新军的申请书。我们便在阿拉哈巴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推动这个计划。"[①] 尽管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表示效忠英王，但印度政治局势仍很紧张，民族解放运动在战时日益激烈地开展起来。

第二节　大战时期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印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大战的爆发，给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由于战争的关系，印度经济起了很大变化。战争削弱了宗主国英国与其殖民地印度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印度民族工业的成长，大大加强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英国的全部工业和经济差不多都卷入了战争并为战争

① 《尼赫鲁自传》第37页，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

服务，根本无力向印度推销工业产品。甚至为了战争的需要，宗主国还要仰求殖民地工业的支援。印度工业发展形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英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在印度的竞争；大量的战争物资的定货，又促进了印度工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不得不给印度发展工业的一些自由。在战时经济的条件下，英国大大减少本国工业品对印度的出口，而且还要输入印度商品。印度资产阶级把世界大战看成是自身发财的良好机会，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全力支持英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他们同时要求国家给予当地企业家以长期支持，以便占领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的印度市场，也包括一部分国外市场。

大战期间，印度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最大的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削弱了，国内外的销售市场扩大了，英国大大增加了军事定货，农产品原料价格相对下跌，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而工业品的价格却上涨。这一切，为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时机。1917 年统计，印度已有 1800 所民族资本的棉花工厂。1917 年与 1800 年相比，纺织工业的民族资本增加了 375%，纺织机的数量增加了 792%，纱锭数目增加了 411%。

大战期间，印度已注册的股份公司由 2552 家增至 2789 家，资本额由 72100 万卢比增至 106610 万卢比。[①] 印度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棉纺织业，由于广泛地利用了机器设备，增加了大批新工人，布匹产量大大增加，1914—1915 年布匹产量为 117600 万码，1917—1918 年为 161600 万码，增加了三分之一。[②] 国内贸易也大

① 《印度私人企业的作用—回顾和展望》第 2 页，加尔各答 1951 年版。

② 《印度棉纺织工业》第 128 页，孟买 1950 年版。

大发展，战前每年平均为54600万英镑，即6000万吨，1917—1918年度增加到68400万英镑，即6000万吨，第二年又增加到81300万英镑，即6900万吨。[①]

印度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获得了巨额利润。孟买的棉织业战争期间比战前平均股息增加了一倍。塔塔冶金工厂在战争期间发展很快，积累了很大的资金，战时它相继建立了两座水电站。军事定货保证了印度资产阶级有固定的销售市场，如在战时投入生产的印度最初的三家水泥厂，所出产的产品大部分卖给了国家。

可是，当时印度的纺织工业，仍只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一半左右。由于印度本身缺乏重工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致使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最大的资本家塔塔财团在孟买地区建立了一些重工业，如发电站和冶金工厂等，西印度相当大部分的地方资产阶级利益，都同这个财团的活动有联系。它的第一个公司建立于1910年，原始资本为125万英镑，股票的认购者都是印度人，王公和封建主的资本占有三分之二。这些封建主靠残酷剥削农民得来的大量货币财富，转投到资本主义企业，再去剥削印度无产阶级。这种趋向，在农村经济已经严重破坏，地主、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难于进一步掠夺农民的时候，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尤其迅速。剥削者竭力想通过资本的这种转移来达到发财致富，而印度的许多大工业资产阶级集团，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1915年2月，洛纳瓦尔电站开始第一次发电，随着电价的上涨，塔塔财团所获得的利润急剧增加。几年以后，又相继建立了两个电站，都是处在塔塔财团的监督之下。1911年建成的塔塔冶金工厂，到大战末期，产品增加了30%，年产量达30万吨生铁。

① 《关于印度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及其情况的报告》第95页。

1917 年，印度的煤的开采量已达 1800 万吨。

英国在印度市场上失掉了垄断地位，因而被迫对印度资产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如调整了关税率等，这决不意味着英国对印度工业的鼓励，而是为了排斥在大战年代里侵入印度市场的美、日资本。由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也不断地增强。较大的资本家集团，如塔塔财团已控制着许多种企业，包括一些电站和钢铁厂。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无情地剥削印度工人，使自己的财富大大地增殖起来。塔塔财团的许多工厂，以及孟加拉的黄麻厂，孟买、阿迈达巴德和其他地方的纱厂，年利率都达 300%到 400%，甚至更多。

在大战期间，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巩固了。他们得到印度社会其他有产阶级和阶层的支持，并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他们提出，印度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要有国家特别是关税政策的保护，要求停止输出原料和进口工业品。

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印度发展起来的是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前就出现了这种因素，殖民者垄断了铁路运输和水利工程。1917 年 3 月 1 日，成立了印度军事供应管理局，集中了国家机关已有的各种经济商业职能，差不多把国家全部采购业务都集中在它的手里。它是战时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大代表，具有公开的掠夺性质，也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大威胁。同时，管理局为了阻止列强，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商品输入印度，使用了各种方法限制进口。而它收购的商品大部分是印度制造的，对于印度工业发展又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在殖民压迫的条件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要将在利用战争环

境获得的利润来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很困难的，主要的是缺乏机器设备，缺乏重工业产品，这一切都操纵在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手里。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货币积累都用于从事商业、高利贷、购买土地和不动产上去。英国垄断资本对印度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独立发展起了限制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则要求限制外国资本的活动范围和条件。随着大战的结束，印度军事供应管理局便停止了活动。在战时印度资产阶级是大发其财，得到发展。可是地方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发展极其有限，民族资产阶级从殖民当局所得到的仍是歧视和限制，印度大工业资产阶级感到不满，英国殖民者把它们看成英国商业和工业的威胁而得不到英国当局的鼓励，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英帝国主义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日趋深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是加速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而来的后果，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从大战开始时到战争结束，工人数量显著增加。1914 年，工厂的工人总数为 95 万余人，1918 年则达到 120 万人之多，加上 100 万铁路工人、水手及矿工，印度产业工人总数已达 220 万人。无产阶级的队伍大大增长了。民族资本在印度整个资本中的比重也大大增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印度资产阶级带来了迅速发展的绝好良机。随着经济力量的加强，印度资产阶级也要求扩大政治权利。英国资产阶级深有痛感，此时不仅在印度市场上失掉了垄断地位，对印度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做一些政策上的让步，以便换取印度资产阶级、地主对英国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而印度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为了换取殖民者的更大让步，从而“效忠”英国殖民者，大力支持英国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

第三节 战时劳苦大众的悲惨状况与反帝斗争

战争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和印度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的庞大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大劳动人民收入减少，生活状况恶化。战时的征兵、捐税等各种负担，都压在印度人民头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征募了150万以上的印度人入伍参战。至1918年11月止，从印度运走370万吨的各种装备和物资供战争需要，从印度攫走500万吨粮食为军需。1918年9月底截止，印度用于装备军队和各种供应的费用达8000万英镑。印度在战争中供应了英国及其盟国大量矿产、木材、橡胶、石油，各种油类及其他物资。同时，为了保证本国的需要，印度却不得不被迫从国外输入一部分这样的物资。这些差价的负担，都需要广大农民和工人承担。农民和工人遭到了巨大的灾难。粮食和其他商品被掠夺式地运走，地主、高利贷和商人趁机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他们按照殖民当局人为地降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收购粮食和食品，印度绝大多数的小农经济遭到破产，收成下降。印度在1910—1914年小麦的平均产量是965.7万吨，1918—1919年减为750.2万吨。[①]同时期的大米产量也没有增加。在战时，大部分劳动人民受到口粮不足的饥饿的威胁。由于粮食的严重缺乏，1918—1919年度印度缺粮近千万吨，因而发生了严重饥荒，加之疾病流行，在这一年，印度死去了120多万人。破产的农民大批涌到城市，但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失业后备

① 《印度统计部对1918—1919年印度主要农作物的面积和产量的估计》第6页，加尔各答1920年版。

军。

工人的状况同样处于悲惨境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的工人数量有所增加，至1919年，印度工厂工业就业工人共136.7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棉纱织厂、黄麻工厂和铁路工厂等主要工业部门，还有为数众多的矿工。在战争年代中，由于主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则大大地降低。以孟买棉织业为例，1917年比1914年工人工资只增长6%，而有些部门甚至于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但大多数工业城市的粮食批发价上涨了一倍。工人的生活是苦不堪言。

印度劳动人民中众多的手工业者也是每况愈下，他们当中的织布工的情况尤为悲惨。战时布匹的需要增长了，但工厂的棉纱供应却显著减少，布匹的实际产量下降，他们停业待料，无工可做，结果大部分织工的处境比战前更加悲惨。

在战争年代，印度的工农运动并没有停止。在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斗争。1917年在大工业中心孟买爆发了罢工，罢工的工人一致要求增加工资。铁路工人、工厂工人、邮政工人等都参加了罢工。工人最终取得在一年内提高工资10—30%的胜利。孟买纺织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10%，罢工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加尔各答的黄麻工人，经过斗争后工资增加了10%。在罢工斗争中，工人的团结增强了。他们在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策略水平。参加孟买罢工斗争的工人们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缩短工作日，实行劳动保险，工人子弟免费教育等要求，最后规定起码的工资限额，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他们组织进行了群众性的斗争。

农民的斗争规模也十分壮阔。1917年春，比哈尔省昌巴兰区的农民，起来反抗种植园主的压榨，反对增加地租，农民的愤怒和骚动，发展成了具有很大影响的“抗租运动”。孟买管区的农民，

在此时也发生了暴动，打击了地主和殖民者的统治。1917年，农业区发生了多次农民饥饿暴动，捣毁市场，向地主和不法商人夺取粮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农的群众运动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起了良好作用，推动了国大党开展反殖斗争的民族运动。

第四节 甘地战时的政治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提出了他的关于社会、政治和哲学的一系列的观点，成为印度政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年）出生于古吉拉特的一个小土邦的大臣家里。青年时去英国学习法律，后到南非，在印度侨民中间充当律师和受理印度商行诉讼。南非是一个种族歧视特别严重的地方，10余万印侨大多是矿工、手工业者、种植园的工人，他们被视为“有色人种”而遭到野蛮的种族歧视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甘地在南非初次参加了政治活动，领导印度侨民开展反种族歧视运动。于1907—1908年和1913年两次领导印侨组织群众运动和示威游行，举行罢工和组织“大进军”。甘地的斗争形式是不采取任何暴力，他称之为“坚持真理”运动。同时，力图强调他本人对南非联邦当局及整个英帝国的忠诚。南非印度侨民的斗争，也得到国内的支持。英国当局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对南非当局施加影响，南非从而做了某些让步，1914年废除了几项露骨歧视印度人的法规。甘地由此而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印度国大党中，甘地的立场，充分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由南非到英国，他曾在伦敦发起组织印侨救护队，支持

英国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他签名致函印度事务大臣，请求参加服役："在帝国遭遇危机的时候，……居留英国而可以效劳的那些印度人应当无条件地供当局的驱使，这是我们许多人所想望的。我们代表自己及附录名单诸人，谨向当局请求参加服役。"①

1915年1月，甘地回到印度。甘地回印后便帮助英国当局征兵，号召认购战时公债。他巡游全国，不仅来往于地主、资产阶级之间，也经常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也为扩大印度人的政治权利而奔波。企图靠着为作战中的英帝国主义效劳，换取英国给予印度自主的目标。甘地以后承认："在一切服务的努力上，我受着这样的信念所驱使，即靠着这种服务可能为我国同胞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②

在大战期间，甘地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为其招募军队和组织医疗队等。在战争末期，甘地仍坚持和宣传"非暴力"运动。甘地开始准备运用他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在印度进行了一年的漫游，与群众交谈，研究贫民的情绪与愿望。他的日常生活极为简朴，穿着与农民一样，他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作为一个宗教的善行者而博得了与其交往的普通人的好感。

大战期间，甘地在印度多次地组织了"坚持真理"运动。首先在古吉拉特建立了"坚持真理村"，为他的党人设立了活动基地，接着他又组织了反对把印度人陷于半奴隶地位的招募印度苦力出国劳动的制度，争取取消土邦肆意勒索的过境税，反对种植园主的过分盘剥，要求减租，也支持过工人的罢工斗争。他的策略是非暴力运动，斗争方式是绝食。在各地民族团体的支持下，甘地的斗争迫使英印当局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战争结束时，甘地的

---

① 引之《今日印度》下册，第51页。

② 同①，第52页。

威望显著提高，也越来越得到国大党各主要集团的支持。他是温和派郭克雷的得力弟子，又与激进派提拉克并驾齐驱。他成为印度民族运动最有权威的领袖。

甘地在他的政治活动中，把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政治原则结合了起来。他和温和派一样，原则上反对民族解放斗争中采用任何暴力，他的哲学观点蒙上印度教和佛教的宗教色彩，戒绝暴力。非暴力主义成为甘地全部思想的核心。他与温和派不同的是，甘地出现印度政治舞台之后，他成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采纳了激进派从政治上抵制英国当局的主张，把它称为“非暴力不合作。”他不让这种抵制发展成为起义，在严格遵守非暴力原则的情况下，对殖民当局某些具体决定开展群众性不服从运动。这种策略使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动员群众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并使群众性的民族解放斗争能服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控制。

甘地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是倒退复古的说教，甘地说：“古犁、纺车和古代地方教育，保证她——印度有了智慧与福利。必须恢复往昔的纯朴……印度的洛克菲勒不会比任何其他人好。迷恋机器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民成为奴隶。”[①] 在封建残余浓厚存在的印度社会，甘地的这种主张起着极为消极的影响。甘地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大大限制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甘地的非暴力号召，满足了温和派的要求，他对群众性反帝行动的号召，鼓舞了激进派。”[②] 甘地的活动促进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团结，首先是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联合，印度资产阶级需要这种团结，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群众的支持，并保

---

① 甘地，《印度自治运动》。

② 南布迪里巴德，《圣雄及其主义》第32页，德里1958年版。

证他们在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国大党温和派脱离人民，他们传统的斗争方法，不能动员人民群众开展反帝斗争。激进派影响的扩大，使其在国大党的作用也日臻重要。在温和派首脑人物郭克雷和梅塔逝世后，1916 年在勒克瑙举行的年会上，激进派的势力扩大了，年会赞同他们提出的自治运动的纲领。联合民族运动的力量，也表现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进一步接触上。双方多次协商，制定了争取自治的共同纲领，同时在 1916 年各自举行的勒克瑙年会上通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国大党与伊斯兰教联盟的接触，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稳健派和激进派又重新合作。甘地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增大了。尼赫鲁写道："我第一次跟甘地见面大约是在 1916 年圣诞节期间，勒克瑙会议的时候，我们大家钦佩他在南非的英勇斗争。""我们知道他又准备把他的方法在印度运用，这种方法是有成功的希望的。"[①] 甘地的方式与原则成功与否，只替历史做出结论。

第五节　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与国际上的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高涨，也与国际上的革命影响有密切关系。世界大战，扩大了印度与世界的联系。战争一开始，就有 175000 印度军队，调到国外战场，在很短时期内，被征入伍的已达 150 万人，饱经辛酸的印籍士兵在国外广见多闻，从帝国主义战争前线归国以后，给国内农民带来了新的思想。英国殖民者也引起惊恐，害怕归国印度士兵成为叛乱分子和革命者。

① 《尼赫鲁自传》第 40 页。

印度人在战争时期对英国的威望大大动摇了。尼赫鲁写道："尽管有人高声宣称对英国效忠，可是很少有印度人同情英国人。无论是稳健派或极端派，一听到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就拍手称快。当然这并不是对德国有什么喜爱，而只是希望自己的统治者倒霉罢了。这是弱者借刀杀人的报仇思想。我们大多数印度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抱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在交战国中，我最同情德国。我们对协约国方面的宣传虽然大打折扣，可是这种宣传对于我们产生了一些影响。"[①]

印度资产阶级在大战期间，一般是采取了与英帝国主义合作的态度。但广大爱国志士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战争政策的，他们的活动受到国际上的支持。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亡命国外的印度爱国者，计划潜回印度举行起义，其中一部分冒充印度在北美的侨民，被遣回国，他们集体乘日本轮船回印。当轮船经由香港到达加尔各答时，英国殖民当局不许他们留在加尔各答，而以警察监视他们的行动。结果这批归国志士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双方死伤数十人。这就是1914年9月29日的"驹形丸事件。"印度爱国者在国际上的支持下，进行的一次武装行动。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印度人民的反抗，只能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

1914—1918年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加深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十月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战线，为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是由到过中东、德国、里海以东地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帝国主义大战前线的印度士兵，冲破英国殖

① 《尼赫鲁自传》第36页。

民当局的层层封锁而传到印度的。印度士兵热烈欢迎十月革命的解放思想。许多印度部队不愿意为殖民者的利益而作战，在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伊朗，印度士兵拒绝参加反对起义人民的军事行动，在英国武装干涉者派到外高加索去的印度士兵中间也发生了骚动。印度士兵有的拒绝接受军饷而要求回国。当士兵们回到印度时，他们看到自己家乡十分穷困的状态，同时对照统治阶级和英国殖民者的奢侈富华。这些活动加强了印度士兵的革命情绪。

十月革命的影响也通过阿富汗波及到印度。英国派到印阿边境去的印度士兵，不愿为殖民者的利益作战，而是同情阿富汗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而且在印阿边境部落中爆发了反英起义。

十月革命鼓舞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印度人民同情俄国革命。他们发布文告，派出代表团访问苏俄，向列宁和俄国的工农群众致敬，列宁非常关心印度革命。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印度历史也从此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

在大战期间，印度资产阶级是采取与英帝国主义合作的态度。大战爆发时，当时在伦敦的国民大会代表团，如罗易、真纳、辛格等，致函印度事务大臣，表示自己的效忠："印度王公与人民将欣然而自愿地全力合作，并以本国资力悉听皇上支配，以提供达到该项目的之机会。"[①] 国民大会党和伊斯兰教联盟把自己的力量提供给殖民当局支配，号召印度人民援助、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激进派"首领提拉克也改变了态度，1914 年 8 月大战爆发后，他向英皇提出了"忏悔书"，表示对英国参加战争的支持。

① 引之《今日印度》下册，第 51 页。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所提供的合作，使殖民当局异常顺利地利用着印度广大的人力、物力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大战一开始，就有175000人的军队从印度调到欧洲战场。至1915年，被征入伍的包括军事辅助人员的印度人，已达150万人，而战前总共不过23万人。他们是在印度地方当局的协迫下，强征入伍的。供养军队的支出非常浩大，每年约达3000万英镑，这种负担都落到印度人民身上。同时，印度也成为英国战略物资的供应地，大批军用物资从印度掠走。从战争开始到1918年11月为止，为了前线需要，英国从印度运走近400万吨各类装备和物资，以及500万吨粮食，其中主要的是小麦。印度的工厂主收到了大批军鞋、军服、子弹和各种军用物资的订货。印度资产阶级因而获得了大量利润。

印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又竭力设法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因而与英国殖民者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除了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外，处于合法地位的国民大会党和伊斯兰教联盟也同时展开争取印度自治的活动。

英国殖民者在这种形势面前，施展着它惯用的两面手法。一方面，用残酷的手段对反抗英殖民统治的人们加以无情镇压，无数次的工农运动被血腥镇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历史上留下了血迹斑斑的记录。1915年实行了“保卫印度”的法案，规定殖民当局享有镇压一切反抗者的无限权力，根据这个法律，成千上万的印度爱国志士遭到惨杀和监禁。另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资产阶级极尽拉拢之能事。殖民当局于1916年宣布实行入口布匹的税率，抽货价的35%，并委任了一批资产阶级为政府“工业委员会”。进而大肆宣扬这是对印度纺织工业的关税保护政策。印度资产阶级也接受这种宠遇，甚至认为这

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印度民族工业政策的改变。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资产阶级支持英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原因所在。

然而印度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也在不断扩大。反对外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自治的呼声，在战争期间从未间断过。资产阶级要求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联合行动，1916 年 12 月，在国大党的勒克瑙年会上，“稳健派”和“激进派”又重新携手。大会决议：向殖民当局要求立即赋予印度以广泛的自治，由印度人担任军队中的要职，关税自主以及对财政的控制权等。这些要求得到在勒克瑙同时开会的伊斯兰教联盟的同情和支持。

虽然英国当局力图拉拢伊斯兰教上层分子，分化印度的民族运动。但伊斯兰教联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伊斯兰教上层也发生了作用。此时，印度一部分穆斯林，因英国进攻土耳其，同情伊斯兰教国家而对英国有反感；而随着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自然会影响到作为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组织之一的伊斯兰教联盟。联盟的领导发生了变化，顽固的阿加汗被革职，比较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穆罕默德·阿里和萨乌卡特·阿里兄弟成为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者。从此，伊斯兰教联盟与国民大会党日趋接近，并在 1916 年国大党勒克瑙大会上走向合作。

为了使勒克瑙年会上所通过的纲领发生影响，在提拉克的倡议下，建立了“印度自治同盟”。同盟的参加者有那些从 1907 年起就脱离了国民大会党的“激进派”分子，而且在中产阶级中也有一批成员。可是，自治同盟并没有接触广大群众。虽然如此，同盟的活动，仍遭到殖民者的残酷迫害。

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力量的统一趋向，以及

民族运动的增长，加之英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削弱，无力控制印度等等，感到极度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印度资产阶级作些让步，以达怀柔目的。“孟太古宣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笼的。

1917年8月20日，印度事务大臣伊·斯·孟太古在下院宣称：“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和印度政府完全一致，即在让印度人参与一切管理部门，并逐渐发展自治机构，以便作为英帝国的一个完整部分的印度责任政府之进一步实现。”① 自然这比莫尔利—明托的改革方案大大跨进了一步。空泛的宣言终于安抚了印度资产阶级。为了答谢这个宣言，印度资产阶级为英国政府认购了1亿英镑的战时公债。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协约国的交战形势大为不利。在这形势紧张的日子里，1917年11月孟太古亲临印度，同印度副王切姆斯福德讨论他们的改革计划。1918年7月发表了孟太古—切姆斯福德的报告，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即以这个报告为基础。

这个法案为英属印度设立一个立法机构，它由总督和两个议院（即国务会议和立法大会）组成，它的200余名成员，三分之一由总督指定，仍保留“分区选举”，扩大教派的矛盾。有的行政部门分为“保留”和“移交”的两部分，这种“两头政治”使部门复杂，难于进行任何的有效工作。“稳健派”接受了1919年的法案，对他们来说，承认印度获得“自治”的权利就是一大进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资产阶级趁机大发横财。工人、农民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却是每况愈下，沉重的战费负担，完全落在他们身上。工人阶级的状况更为恶化，资本家为供应战争的需要，许多工厂日夜开工，工

① 引之《印度通史》第4册，第1043—1044页。

时延长到 14—15 小时。工作条件和住房极端恶劣，工资极低，生活费用却不断上涨，工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除了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地有一部分老工人外，其他地区绝大部分工人都是破产的农民，工人阶级还没有健全的阶级组织。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和资产阶级的野蛮法律，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最起码的权利，宣布罢工要受到刑事处分。虽然这样，工人们还是进行过多次罢工斗争，以争取自己的权利。但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领导，很少取得胜利。

印度农民的情况更加悲惨，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大量输出棉花、大麻、米以及其他原料和粮食，而其价格却通过殖民政府的权力人为地加以压低，农民的产品几乎无代价地被劫掠去了。英国殖民者，强征青、壮年农民充当帝国主义者的“炮灰”，强迫农民种植一切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巧取豪夺农民的一切产品。地主和高利贷者又趁农民举债时大肆进行剥削活动，迫使农民出卖仅有的一块土地，许多农民变成了分成制佃农，成为流浪者。这种情形在旁遮普特别严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利用欺骗和强迫手段搜罗印籍士兵，旁遮普则是重点区。尼赫鲁曾写道：“人们想起旁遮普农村中强迫拉人当兵的事还心有余痛。”[1] 旁遮普这个盛产小麦的地区，变成了英国强盗抢劫粮食的对象，广大农民贫困到极点，无食果腹，无衣蔽体。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景况也是极端困苦，战争带给他们的是沉重的捐税和生活费的暴涨。不满情绪在小资产阶级中普遍滋长起来。

饥馑、贫困、疾病，夺去了成千上万印度劳苦大众的生命。工农群众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展开了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大

① 《尼赫鲁自传》，第 46 页，世界知识社 1956 年版。

战末期，在信地、联合省、比哈尔和旁遮普等地，频繁的农民运动在发动，1916—1917年孟买纺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印度，瓦桑特·D·劳写道："最重要的是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印度以人力和金钱援助了协约国。印度军队在各个战场上，所表现的英勇，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酬答印度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给予的支持，英国政府就考虑给印度人以更多的政治权利。"[1] 这位印度史学家说的前半部分是对的，印度人民为战争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后半部分，英国恩赐印度人民"更多的政治权利"则不是事实。相反地，印度人民不能忍受殖民压迫的苦难，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展开了更加广泛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而把印度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时期。

---

① 瓦桑特·D·劳：《提拉克对于孟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的态度》载《印度历史杂志》1975年8月号。

第七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经济与政治状况

印度被英国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对印度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影响。英国把印度变成它的主要的战争供应地，强迫印度以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大战期间，印度负担的军费额在英帝国联邦中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本土的英吉利。大战结束后，印度的军费开支并没有减少，1918—1919年度军费开支为7亿卢比，1920—1921年度反而增加到9.4亿卢比。战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英国感到威胁，因而继续保留和扩充了大量军队和警察。军费和贡赋的增加，形成国债大增。战前的1914年3月，印度国债为41亿卢比，1923年3月增为78.1亿卢比。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国债利息都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战后，印度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80%以上，70%的居民从事农业。印度农业极端落后，农民生活异常贫困。1920—1921年间，每年缺少粮食1000万吨以上。粮食奇缺，粮价上涨，1919年小麦价格为1913年的1.9倍，大米为1.65倍。粮荒和物价上涨，成为英国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发财的良机，他们屯积居奇，巧取豪夺，土地急剧转入他们手里，破产农民的队

伍激增。“不可接触者”佃农的情况更加悲惨。1918—1919 年，印度又发生了严重的流行病，病魔的袭击使众多的贫穷人民丧生，旁遮普农民的死亡率竟高达 50%，联合省和中央省的死亡率则更高。战后的第一个年头，灾难和疫病夺走了 1200 万印度人的生命。

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工业有了发展。战后，设备输入的机会也增多了。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的印度大资产阶级也竭力为自己寻找市场，英国殖民当局被迫放松了对印度民族工业发展的阻挠，也有利于其发展。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从工业结构可以明显看出来，战前主要是轻工业，战后重工业主要是钢铁工业有了发展。以塔塔冶金联合公司的情况为例：在战时为中近东战线等地区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等而大发横财，生产迅速增长。1913 年铁产量 20 万吨，1920 年增加到 31 万吨，钢产量由 6 万吨增为 11 万吨。到 1923 年印度的生铁总产量达到 613000 吨，钢产量为 15 万吨。战争期间，塔塔财团依靠王公们提供的资金和美国的技术设备在孟买附近建立了一批水电站，成为印度的最大的能源中心，而垄断了孟买地区的电力供应。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资本与生产的集中也加强了。1917—1918 年度的机制布匹产量达到 16.2 亿码，比 1914—1915 年度增加了约 40%。而 1919—1920 年度的手工织布产量为 5 亿码，比 1914—1915 年度 10 亿码减少了 50%。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空前加剧，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起来了，一批大工业企业公司逐渐成为垄断集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英国垄断资本家和印度资本家、企业主的利润比战前有显著的增加。英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印度的黄麻工业和茶叶、橡胶、咖啡等农产品加工业和开矿业，从印度榨取了巨额利润。暴利促使英国在印度的黄麻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到 1920 年黄麻工厂达到 76 家，黄麻工厂主的利润在 1915—1924 年间达到投资总额的 90%。纺织业资本家在此

期间也获得了巨额利润，1921 年有 41 家股份公司的股息达到100%以上。主要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煤矿开采业，开采量大幅度增长，战后比 19 世纪末增加了约 22 倍，这给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

这一时期，英国垄断资本工业或者是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几乎都是在固定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取得高额利润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对工人的超额剥削取得的。在资本家利润急剧增加的同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却大幅度下降。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和痛苦，尼赫鲁写道："在大战期间，工业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巨大的利润。孟加拉的黄麻厂，孟买、阿迈达巴德和其他地方的纱厂，获利达百分之一百到二百。这些利润的一部分流入那些在伦敦的外国投资者之手；一部分增加了印度富豪的财富。可是那创造这些利润的工人的生活却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住在污秽不堪而疾病流行的小屋里'，没有窗户和烟囱，没有水电和卫生设备。"[①]

战后的形势，反映了印度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纵横交错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印度工农群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表现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与英帝国主义者的矛盾空前尖锐。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发展，增强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情绪，与外国垄断资本的矛盾深化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有独立要求的中、小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冲突也加剧了。英国殖民当局利用封建势力阻止印度社会的发展，而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靠山。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成了当时印度社会矛盾的集中点，成为印度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高潮阶段。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展》第 469 页，世界知识社 1956 年版。

第二节 1918—1922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帝国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同时也开辟了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十月革命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了一条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统一战线。具有争取人民自由和民族独立斗争悠久历史的印度人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尽管英国殖民当局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其殖民地，尤其是印度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隔绝开来，但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是阻挡不住的，它仍然传播到印度。

在1917年以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没有传入印度，国内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组织。印度的革命者尽管在最初还不完全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但他们相信苏维埃共和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自己革命的同盟者。印度进步阶层和革命者，向往和支持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苏俄外交部从德里的一个穆斯林组织那里得到一份文件，它是1917年底通过，1918年1月在印度地下报纸登载。对俄国革命热烈颂扬：

“俄国革命的领袖们！印度祝贺你们在为争取世界的民主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印度对你们在取得政权后所宣布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原则钦佩不已。印度祈祷天意加强你们对这些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印度的独立应该是你们计划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尽管乍一看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印度不解放，世界上任何的民主统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印度的彻底解放意味着

英国帝国主义的崩溃。”“印度各族人民向你们致以真诚的敬礼。”①

这反映了印度人民和革命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热爱和向往。

十月革命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封锁和禁锢，印度几乎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著作才秘密传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积极参加者，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印度人民把第一个工农国家看成自己的希望。

1918 年 11 月，一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了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接见了他们，他们向列宁赠送了礼物，表达了印度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敬爱。1920 年 4 月 3 日，在印度革命者的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并拍发给列宁。决议中说：“印度革命者对苏维埃俄国为解放全体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特别是为了印度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表示深切的感谢和不胜欢欣之至。我们十分感谢苏维埃俄国，因为它听到了从那些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受到空前灾难的三亿一千五百万人民的胸中所发出的拼命挣扎的呼声。”② 列宁为此写了致“印度革命协会”的祝词，写道：“俄国劳动群众以毫不倦怠的关心注视着印度工农的觉醒。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我们欢迎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人士实行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一联盟推广到东方的一切劳动者中间去。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才能保证彻底战胜剥削者。自

① 见《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 314 页，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② 见《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 315 页。

由的亚洲万岁!”①

列宁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极为重视，密切注视印度人民革命斗争。列宁于1920年写道：“连有三亿雇农受英国人蹂躏的印度在内，都在觉醒，革命运动都在日益增长。”②

在印度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苏维埃俄国受到欢迎的原因，是由于为反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十月革命在印度引起的反响不只是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措施，而且引起印度革命人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大兴趣。

1919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其官方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继德国的军事威胁而来的是一个更可怕的威胁——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③ 英国殖民当局极为害怕俄国十月革命对印度所发生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掀起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18—1922年的印度革命新高潮，则是印度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人的数量逐渐增多，在国内是相当强大的力量。印度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直接影响下印度革命情绪高涨的表现。1918年罢工浪潮波及了全印度。1918年的罢工比过去不同，这些罢工包括了所有的工业中心。它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斗争手段。1918—1919年的罢工斗争，连续发生在阿迈达巴德、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等重要城市。

1918年2月在阿迈达巴德爆发了罢工，这是资本家降低工人冒瘟疫流行上班奖金引起群众愤怒而举行的。甘地也参与了罢工，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57页。

③ 《关于1919年印度精神和物质进步状况的报告》第6页、1920年伦敦版。

他代表工人同企业主进行谈判，并领导纺织工人组织了工人协会。战后，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参与了一些工农运动。甘地调整这次冲突。罢工坚持了一个月，满足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而告结束。同年夏天，马德拉斯的纺织工人掀起了斗争风潮，他们向行政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在工人中禁止种族歧视，停止英国人对工人的粗暴行为等等。

1918年12月开始的孟买纺织工人的总罢工，是这次罢工浪潮中最大的罢工。它持续了一个多月，125000多工人参加了总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印度工人第一次高举着红旗，举行示威游行，提出要求印度独立，打倒英帝国主义统治，各民族自决权等口号。在举行罢工当中，工人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来领导工作，这些组织后来便转变为工会。1918—1920年间，在马德拉斯、阿迈达巴德及其他城市也产生了工会组织。尽管这些工会，着重在罢工中进行活动，罢工后缺乏经常性的工作。但印度工人终究有了自己的组织，使印度工人运动有了新的气象。罢工运动席卷了愈来愈多的地区，涉及了印度全国。印度政府在官方报告中也承认1919年一年内罢工从没有停止过。在印度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团结性的罢工，联合行动进行斗争。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达到了提高工资10%的斗争目的。

印度工人阶级一方面为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进行斗争，同时也配合着资产阶级，支持它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大党的领袖甘地，代表资产阶级宣布了不够明显的民族独立口号，这个口号动员了印度人民的最广大阶层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印度国大党为此在国内获得了很大的声望。全国被反帝的罢工、罢业所笼罩。在罢工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工会组织，主要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然而这已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它在同企业主的斗争中保卫工人的利益愈来愈发挥积极的作用。英印政府以及印度的企业主，企图阻止工

人运动，并以各种各样的调停委员会、仲裁法庭等组织的办法，来削弱工人运动。但是印度工人运动却具有愈来愈积极和广泛的性质，罢工斗争也成为反帝运动的重要因素。

1918年的罢工浪潮，使城市和农村各阶层的群众都受到推动而活跃起来。战争时期从未平息的农民运动的风潮又重新爆发了。与工人运动开展的同时，各地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特别在西北地区的旁遮普斗争更为壮烈。旁遮普在战时给英印军队供应大量的粮食及畜料，致使粮食奇缺，小麦涨价2倍，该地居民的主要粮食玉蜀黍、高粱涨价三至三倍半。加之高利贷的盘剥和土地的被收买，广大农民生活极其悲惨。此外，在战时英印军新兵中的一半以上来自旁遮普，战后这些复员回家的士兵，大部分在欧洲作过战，了解到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和建立各民族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他们成为革命的宣传者，也成为农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对殖民统治和战争给家乡带来的贫困和灾难，极为不满，他们参与和领导了这里的农民运动。农民反对英国官吏、拒纳租税，他们打着写着列宁名字的旗帜，他的名子，在运动中鼓舞了印度人民的斗争。千万农民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要求恢复他们的生活权利。

印度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下去。1920—1922年，印度各地区都发生了群众性的农民运动和规模巨大的起义，联合省的农民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1921年起义开始于奥德地区并扩展到省内各地，起义农民袭击了地主的庄园，夺取了粮食加以分配。

这次农民起义迫使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新的地租法，以便借此平息农民起义。这个法律并没有改变佃农的基本状况，只有一少部分佃农获得了终身租佃的权利。这个法律只是在形式上宣布了地主没有征收附加的苛捐杂税的权利。农民起义并没有因此平息下去。起义开始是自发的，后来采取了较有组织的形式。这时

在联合省产生了农民的组织“联合会”。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农民组织，在短时间内发展成群众性的组织，到1922年，它的全体成员已达10余万人，领导人是出身于下层卡斯特的农村更夫曼达利。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农村委员会，号召农民反抗地主的暴力，不缴纳法定数目以上的地租和非法的附加苛税，不服从地主从土地上赶走农民的命令。这次起义没有得到国大党领导人的支持，因为这大大超出“非暴力运动”的范围，同时国大党的活动也削弱了这次运动。这次起义几乎延续了二年之久。殖民政府派了大批军警镇压了起义，不少农民被枪杀、被监禁。到1922年末，这次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

在这个时期，其他的两次起义也有重大影响，即“莫普拉”和锡克教徒的起义。在马德拉斯省的马来亚人，一部分信仰印度教，另一部分则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的便称为“莫普拉”，约有200万人，其中大部分过着奴隶式的低级卡斯特生活，他们进行反抗斗争称为“阿卡里运动”。最初时只限于和平斗争的运动，后来发展成为一次强大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艾尔那达和瓦留瓦那达地区，宣布这些地区为哈里发王国。领导起义的是一个普通的马车夫沃·库那赫麦德·哈志。英印政府调来了装备精良的军队镇压以简陋武器作战的起义者。起义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最终被镇压下去了。“莫普拉”起义从1921年8月，持续到1922年1月。甚至在失败后，起义者还在山中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

锡克教徒的起义，也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锡克教徒中的贫苦农民，反对掌管大教堂及田庄的僧侣，这些僧侣渐渐变成封建大地主，并且得到了英印政府的支持。这次起义不仅农民参加了斗争，地方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英国殖民政府派了军队，伙同警察镇压了这次起义。

农民运动和全民族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使英国统治遭成了

非常紧张的局面。群众的革命斗争越出了“非暴力运动”的框子，在联合省哥拉克普地方的曹里—曹拉村发生的事件特别具有典型意义，那里的农民抗议政府的恐怖手段，在 1922 年 2 月 4 日开枪打死 22 名警察，放火烧了警察局的房子。

人民群众愈益主动采取坚决手段同外国殖民者进行斗争，印度资产阶级就愈害怕。国大党的领袖们对工人与农民群众的斗争形势十分恐慌。为了回答政府的镇压，印度国大党员按照甘地的号召举行示威，步行前往监狱，自行投案。政治犯愈来愈多，至 1922 年初，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而被判处徒刑的约有 3 万人。

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人民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1919 年 3 月 18 日，殖民当局通过了“罗拉特法案”，印度总督据此拥有特别的权力，当局可以不经起诉而逮捕、搜查和监禁任何一个人。但是殖民政府不可能用一纸法律来遏止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印度各阶层都卷入了抗议“罗拉特法案”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1919 年 3 月全国到处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国大党根据甘地的倡导决定在 1919 年 3 月 30 日举行总罢业。甘地号召人们把这一天作为戒斋和祈祷日，以非暴力手段来抗议“罗拉特法案”。后来决定推迟在 4 月 6 日举行。但群众斗争情绪激昂，仍然在 3 月 30 日自发地举行了罢业。

这一天在德里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帝活动。一切工厂、商店和机关都停止了工作。群众举行集会，严厉地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罢业的参加者遭到了英军的扫射。英军的枪弹镇压不了群众的革命活动，3 月 30 日罢业活动波及全国，许多地方群众的活动不仅是国大党所要求的斋戒和祈祷，而且也有强大的示威游行和激烈的群众大会。

旁遮普成为运动的中心，农民运动也推动了城市群众运动的

发展。英帝国主义在旁遮普开始向全印度的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进攻，制造了阿姆利则大屠杀的惨案。阿姆利则这个15万人口的城市，是锡克教徒的中心和旁遮普的工业中心，它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工业与商业城市。从1919年3月起，这个城市经常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人民群众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4月10日英殖民政府逮捕了领导抗议“罗拉特法案”运动的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家萨伽·巴尔和赛福丁·克其鲁。当天，在市自治局的广场上，集聚了3万人，抗议英国殖民者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者。集会的群众，遭到英国军警的枪击。愤怒的群众，进行反击，打死了英国人，捣毁了英国银行。英国当地驻军于11日宣布戒严，并禁止一切集会。然而愤怒的市民不管殖民者命令，于13日清晨在广场上集会。英军指挥官戴叶尔命令军队包围广场，把守出口，突然向集会群众开枪扫射。这次惨绝人寰的屠杀，打死379人，打伤1200多人。戴叶尔在阿姆利则签署了一个侮辱性的“爬行命令”：在打死英国女传教士的地方，设立岗哨、强迫过路的印度人匍匐而行。不执行这个命令的印度人受到枪决的威胁。印度人民对这种暴行恨之入骨。国大党领袖莫蒂拉尔·尼赫鲁说：“这是极端残忍的最坏的日子。那些必须走过那几条街的印度人被迫像蛆虫一样地爬行。”①

在旁遮普还设有战地军事法庭，对印度人民任意审判与处罚，殖民者的“讨伐队”，不问集会的人群什么目的，就向他们开枪射杀。殖民者的暴行令人发指。印度的伟大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向印度总督递交了一分愤怒的抗议书：“政府为了镇压地方上的风潮，在旁遮普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这是一种粗暴的打击，它使我们想起了我们印度作为不列颠臣民的软弱无力。我们确信，

① 《国大党第二十五次至第五十次历次会议主席的致词》第440页，马德拉斯1934年版。

在文明政府的历史上再没有什么可以和不幸的人民所遭受的极端粗野的惩罚和执行这些惩罚的手段相比拟了。"①

英国殖民者为了掩盖他们镇压印度人民的真相，颁布了一个控制舆论的法律：任何一家印度报纸，"不经地方政府事先批准，不得刊载。"

但是印度人民是压不倒的，人民群众以强大的罢工浪潮和新的反帝运动来回答英国当局的镇压活动。革命的风潮在印度一直没有停止过。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蓬勃发展，大大削弱了殖民当局在印度的地位。英国统治集团企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巩固其在印度的政权。他们采取最残暴的恐怖手段来镇压印度人民，同时对资产阶级进行让步和拉拢。孟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法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笼的。这个法案在印度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影响，削弱了印度人民的政治团结。

这个改革法案引起了印度社会各阶层的抗议。国大党在1920年1月1日—3日的年会上表示，不同意这个不完整的法案，并在后来进行了拒绝选举新的立法机构的运动。甘地这时提出不合作纲领，规定了拒绝政府颁发的官爵封号、在法院和政府机关服务、选举立法机构和拒绝进英国学校和穿英国服装。他鼓励手工纺织业来抵制英货，并提出拒绝纳税的要求。

1920年12月那格普尔举行的国大党年会上，不合作纲领得到了赞同，并以绝大多数的票数批准了这个纲领。宣布"司瓦拉吉"（自治）为斗争目标。大会改变了国大党的组织机构，在各地方建立自己的支部。国大党反对当时印度实行的行政区划制度，并提出以语言为基础而建省的要求。国大党组成了15人的执行委员会进行领导。

① 漢罕：《一次拟议中的起义及如何遭到镇压的》附录7，第685页。

这次会议决定建立一支15万人的志愿团来组织和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吸收大学生、青年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代表参加，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支持工人运动，开展农民运动和吸收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国大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但是，在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印度资产阶级被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吓坏了。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大党领袖们害怕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1922年2月11—12日在巴雷利举行的国大党执委会的紧急会议上通过决议，停止大规模的居民反抗运动，并责成地方委员会要农民缴土地税和其他租税。从志愿团队伍中开除那些激进分子。号召国大党党员推行手工纺织业和推广民间教育等方面，转向和平建设性的工作上。

巴雷利决议，反映了国大党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妥协性，也说明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国大党的领导集团对此也产生了分歧，当时在狱中的贾·尼赫鲁指出："当时我们似乎正在巩固阵地，各方面向前推进，忽然听说斗争停止了，不由得感到愤怒。"①

人民群众不顾国大党的决议，继续进行反帝斗争，罢工运动仍在进行。1922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阿迈达巴德爆发，十三个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东印度铁路工人，孟买34个工厂都举行了罢工。联合省的农民运动不顾镇压仍在继续进行，有些地区如比哈尔、班加罗尔和其他省，又爆发了新的农民暴动。

国大党用自己的行动减弱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度国内，当时还没有一个大的政治组织，能在殖民恐怖镇压的条件下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英国殖民当局更加残酷

① 《尼赫鲁自传》第91页。

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1922年3月10日甘地也被捕。

印度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高潮，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结束。斗争的实践教育了群众，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觉悟。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印度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具备了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1918—1922年的革命高潮时就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在孟买并出版了《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刊。1923年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拉合尔、康波尔等大城市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后来印度共产党的建立做好了准备工作。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朝着更加广泛的阶段发展。

第三节 国大党内部分化与甘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19世纪20年代期间，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破坏的危机局面，也相对地稳固了它已经动摇的在印度的经济地位。同时，英帝国主义者加深了对印度人民的剥削。

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加速。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印度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之间矛盾的增长。要求政治上的民族独立成为印度资产阶级的主要倾向。

自19世纪末成立的国大党，是印度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基本上只限于社会上层分子范围内活动。它所倡导的在1918—1922年期间的群众性不合作运动结束后，处于沉寂阶段，国大党也经受了深刻的危机。人民群众对国大党的领袖的政策感到失望，开始脱离国大党。1921年印度国大党党员人数近1000万人，在1923

年减少到几十万人。印度资产阶级参加和领导了1918—1922年的群众运动，是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财政资本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而印度资产阶级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面性，就不能不影响它斗争的彻底性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很明确，这次斗争进行的很不彻底，农民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土地革命，工人运动也未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英国的殖民统治政权也未推翻。这次斗争后，广大印度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改善，印度资产阶级也没有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得到什么权益。英印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国大党仍影响劳动群众同英帝国主义采取多样的斗争方法，同时却竭力制止群众运动。

国大党是一个内部复杂、派系丛生的资产阶级政党。印度资产阶级内部在关于继续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方法和方式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反映在国大党内部势力的分化，也愈演愈烈。这种分化也是由1918—1922年反英运动的失败和国大党威信急剧下降的新形势所决定的。

甘地和国大党其他几位领袖拉贾戈帕拉恰雷、拉金德拉·普拉沙德等，仍坚持实行旧的同殖民当局不合作政策，包括抵制立法机关。这个集团被称为“不变派”。他们把群众看作是没有掌握非暴力原则，对争取自治斗争还没有准备。暂时结束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是不得已的决策。他们把非暴力手段看作是实现不合作的必需的前提。在停止群众性的运动后，这个集团坚持实现甘地的纲领，它的内容包括：生产土布、反对种姓制度、争取改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关系。这些措施，特别是宣传推行手摇纺车，对印度群众状况的改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国大党内部另一有势力的集团，主张改变争取自治斗争的策略。他们在利用非暴力手段实现不合作运动纲领的问题，与甘地

没有分歧。但是他们反对抵制立法机关，他们主张，为了从内部争取自治，也应当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搬到立法机关进行。他们被称为“主变派”，也称“参议会派”，这个集团的领袖是两位律师：奇·兰·达斯和莫蒂拉尔·尼赫鲁。他们力图说服甘地，认为应参加印度总督下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机关中组成反对派，甘地则认为这样违反了不合作原则。争论没有结果。

“主变派”的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并企图利用妥协、安全的手段同英国作斗争的愿望。同时，它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某些集团利用立法机关向英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争取某些让步的意图。许多人对殖民当局控制下的立法机关的可怜作用和无能为力的状态是很清楚的，大多数国大党人不支持“主变派”。但巴多利决议，也使甘地所宣传的斗争方式在群众中丧失了信心。国大党内部发生了涣散和分裂。很多国大党人悲观失望，无所适从，有些因此脱离了斗争。在这革命风暴后的混乱状态中，奇·兰·达斯和莫蒂拉尔·尼赫鲁组织了自治党。自治党成立后，仍保留在国大党内，声称旨在改变国大党的政策。宣布：在立法机关中通过宪法争取印度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在这种诺言下，自治党参加了立法会议 1923 年的选举，并获得了许多选票，立法会议中的 145 席中占了 45 席，在各省咨议机关中则占了大多数席位。自治党则以稳定国大党的姿态出现，掌握了国大党的控制权。自治党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利益，成员中不乏升官发财的野心家和政治上的投机分子。进入立法机关后，抛弃了选举时的诺言，开始与英国妥协。国大党在他们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与英国合作了。1924 年甘地因病被释出狱，但他在国大党内不能像以前那样起作用了，他想制定国大党接纳党员的一些规定，也遇到自治党人的激烈反对。

英国殖民政府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说：“国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

很快地笼罩了领导上层。阿拉哈巴德极著名的领袖莫蒂拉尔·尼赫鲁先生和孟加拉的著名人物奇·兰·达斯都成了参加立法机关的主要宣传者。某些伊斯兰教领袖，其中应当指出的是阿志马尔汗·哈基姆和他们发生了联系。他们还得到各省最有威信的大多数国大党人的支持。国大党的年轻的普通成员都反对他们。国大党普通成员依旧完全相信甘地的绝对正确，坚决拥护群众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把它看作是能保证'黄金时代'到来的手段。"①

从那时起，关于抵制立法机关或参加这些机关的问题成为国大党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也是 1922 年 12 月在加雅举行的国大党年会上的主要议题。大会主席奇·兰·达斯积极主张参加立法机关的政策。在国大党成员中却广泛流行着相反的信念，认为在殖民制度条件下，不能指望把立法机关变成获得自治的工具。结果，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不赞成参加立法机关的提案。"主变派"继续进行活动，1923 年 3 月在阿拉哈巴德建立的自治党，就是这种活动的结果。

自治党成立后，国大党内两派斗争加剧了。国大党的分歧论战非常严重，只得召开非常会议来解决纠纷。这次会议 1923 年 9 月在德里召开。这时，自治党人已经加强了自己在国大党中的地位，取得了许多有势力的国大党人的支持。"不变派"的地位因而大大削弱了。自治党获得了优势。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在宗教或其他道德方面不反对参加立法机关的国大党人，都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实现自己在未来的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因此，国大党停止反对参加立法机关的一切宣传。"②

这次会议考虑到下层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不欢迎参加立法机关

① 《关于印度在 1923—1924 年的精神与物质进步状况的说明》第 249—250 页。

② 帕达比·西达拉马亚，《印度国大党史》第 1 卷第 260 页。

的口号，在决议中强调声明：国大党将继续坚持不合作运动的立场。国大党德里会议还通过决议，指出支持当地的生产，特别是土布的生产，以加紧抵制英货。这个决议不仅得到小企业主，而且得到纺织厂主的欢迎，因为这会有利于他们同英国布疋的竞争。

同年12月在科坎纳达市举行的例会上，国大党通过了成立全印土布社，来宣传和组织土布生产，实现不合作运动的一种措施。在这些会议上，自治党人都取得了胜利，他们获得了参加立法机关选举的权利。

自治党人参加选举和进入立法机关，都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而不是以国大党的名义。国大党虽然允许自治党人参加选举，但没有把自治党人的政策接受为自己的纲领，这无疑使他们不快，自然地削弱了他们的地位。在参加立法机关问题上，国大党内的意见分歧仍然继续存在。

1924年2月，甘地出狱。当年5月，他与自治党人领袖奇·兰·达斯和莫蒂拉尔·尼赫鲁在孟买附近的朱胡举行会谈，双方都指望对方相信自己立场的正确性，但都没有成功。甘地声明同意，允许以自己名义参加立法机关的决议，表明他对自治党人的退让态度，这是不得已的做法。由于停止群众性的运动，大大地削弱了对他的斗争方法的信任，而自治党的威信却提高了。因而，甘地反对自治党人担任国大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他建议国大党党员每年必须缴纳2000码手纺纱的党费，并主张那些相信不合作运动的人，抵制立法机关的人，选进国大党的机关。

甘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是很复杂的。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诞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土邦的大臣的家庭。父母是虔诚的教徒，属于印度教中耆那教派，崇尚不作恶，不杀生，不作暴行的教义。甘地童年是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自少便从母

亲的身上得到了感染。甘地以后所接触的社会环境，读书时在英国社会中，归国后在孟买当律师时印度的社会里，后来侨居英国另一殖民地南非时，无论在哪里，他都亲身感受到种族的歧视和英国统治的专横，使他很早便孕育着反抗的情绪。他在英国受了高等法律教育，1893 年，甘地到南非充任一个印度大商业公司的法律顾问。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他领导了印度侨民进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1906 年 9 月，他在约翰内斯堡号召他的同胞不要服从种族法，不管白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手段。当时，他第一次提出："萨蒂亚格拉哈"即"坚持真理运动"的口号。他解释宣称："坚持真理运动是强者的工具，不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①

1915 年 1 月，甘地回到印度，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得到印度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包括财政上的支持。孟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甘地回印不久，就在阿迈达巴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成立了"坚持真理运动院"，在 30 多人中，讲授他的非暴力抵抗策略。

与印度国大党许多领导者不同，甘地在作风上与人民大众没有隔阂，他不轻视普通人和他们的习惯。他明白，不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就不可能获得英帝国主义者的任何让步。但是，甘地坚决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只有道德感化才能迫使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压迫。可是甘地在实际活动中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暴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为英军募兵，支持英国参战，希望印度人帮助英国人作战争取得到自治权。

甘地学说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基础，和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信仰的印度教的教义有密切联系。甘地主张，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要

① 《印度每日新闻》1920 年 1 月 10 日。

不倦地改善个人的德行，要实行禁欲主义和放弃对物质福利的追求。他以对苦难和死亡的轻视、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同殖民主义者的暴力、恐怖手段和罪恶相对峙。“非暴力”的原则是他的整个学说和社会观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他指责“群民”采用革命暴力。甘地的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是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而不容分割的。具体的表现便是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他所追求的无疑是要使印度获得主权的独立，使印度从帝国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但这还不是甘地所追求的最终目的。甘地最大的理想是要把印度变成最伟大的宗教国家。因此，甘地的斗争方式方法，是一般人所难理解的。正当印度人民武装暴力争取独立未能获得胜利，用合法的斗争也未能取得成效之际，甘地提出来非暴力不合作的新的斗争方式，正好为笃信宗教的一般印度人民所接受。他不是反对英国人，而是反对英国人带来的欧洲文明和剥削。他向往农村淳朴的风尚，简单的物质生活，他没有想到改变农村中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带着封建的思想意识。1916 年他开始站在国大党的立场而最后成为国大党的领袖，主张坚决抵制英货，鼓吹手摇纺车时，他不完全代表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论在那个阶段，他的政治思想中总有宗教的因素，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脱离不了宗教。甘地的这样思想和对抗暴力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赞同的。

1917 年，甘地在印度首次发动了“坚持真理运动”。甘地在比哈尔西北部的钦帕兰地区进行活动，鼓动农民废除与英国种植场主关于种植靛兰的合同。甘地发动了争取废除合同制度运动，并同总督和钦帕兰地方当局进行了谈判。他关于改善农民状况的号召，引起居民很大的热情，甘地在当地农民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甘地的策略对小资产阶级和国大党人知识分子起了很大影响。使甘地在印度广大的各阶层居民中的声望增长的，不仅是他

的政治活动，而且是他的某些个人品质。他回印度后，就脱去西装，换上大多数印度人穿的土布衣裳，过禁欲式的生活，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甘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人们谈话与写作，除了本族语古吉拉特语外，他还懂印地语、马拉塔语、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

甘地谴责欧洲资产阶级文明及其机器，他把资产阶级文明与印度的独特文明对立起来。他号召回到纺车时代恢复某些旧的民族传统。这个主张符合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的利益，并为他们所理解。甘地熟悉印度的农村，了解农民、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的生活。他懂得，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宗教习惯在很多方面决定着印度人的行为准则。甘地诉诸宗教感情，藉以加强普通人民对自己民族传统的热爱，并且与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同时，甘地把宗教看作是能帮助把群众运动保持在非暴力范围的工具。

甘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甘地的反帝运动主要原则的非暴力学说，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立场的复杂性和两面性。一方面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矛盾，他们要求摆脱殖民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外国垄断组织和国内封建势力保持密切联系。印度资产阶级害怕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因为它不希望自己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甘地一再声称：革命的道路不适于争取印度的自治，“印度不要布尔什维克主义”。[①] 同时，印度资产阶级明白，和英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如不吸引劳动群众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会遭到失败。

甘地在成为国大党的实际领导者后，竭力在争取自治的口号

① 莫·卡·甘地：《青年印度·1919—1922年》第279页，马德拉斯1924年版。

下，把群众团结起来。甘地主张地主和资本家应当关怀从属于他们的农民和工人，并保护他们。他主张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一切冲突都用仲裁解决。甘地提出所谓保护学说与阶级斗争学说相对抗。甘地反对阶级斗争。

印度的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已经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促成各阶级在反对殖民压迫斗争中的一定程度的团结。劳动群众对外国统治的憎恨，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大党，以代表全民的名义，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

甘地吸引群众参加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唤醒他们的民族觉悟和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非暴力策略有可能把群众运动引向资产阶级需要的道路。但是，已经起来斗争的印度劳动人民，越来越迫切地提出阶级要求，越出非暴力范围。甘地严厉地责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方法，并在某些场合下还为殖民当局用暴力镇压革命运动开脱罪责。这就是甘地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的反映，甘地的否认阶级斗争的唯心主义哲学，加深了他的思相体系的矛盾，决定了甘地主义的保守性、玄虚性和行动与决策的不彻底性。

甘地宣布，从 1920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行不合作运动。甘地制定了不合作运动纲领，规定拒绝英国政府授与的头衔，抵制立法机关的选举，抵制法庭、政府机关、学校，不穿英国服装，鼓励手工纺织。在运动的后一阶段拒绝纳税。就在这一天，提拉克在孟买逝世了。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了群众大会，追悼这位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斗士。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推动了反帝运动。甘地开展不合作运动的号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响应，人民的反英情绪越来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国大党的领导必须立即确定自己对选举和甘地提出的纲领的态度。

1920 年 9 月，在加尔各答举行了国大党非常会议。甘地提出的不合作纲领引起了一些权威人物奇·兰·达斯、拉兹巴特、罗

易和A·贝赞特等的强烈反对。其中大多数人赞成这个纲领，但是反对抵制新立法机关的选举，在激烈的辩论中，1919年起任国大党主席的莫蒂拉尔·尼赫鲁成为甘地的同盟者。经过长时间讨论后，不合作纲领得到赞同。

随着不合作纲领的通过，国大党本身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国大党的会议语言开始改变英语为当地语言，国大党人开始换上民族服装。有些国大党人不同意新纲领而脱离了国大党，其中包括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1918—1922年印度革命高涨的失败，同时也结束了公民不服从运动。群众对国大党的失望情绪，比国大党领袖预料的还要严重。1924年12月，国大党贝尔高姆年会上，甘地在演说中建议停止不合作运动的理由时，不得不承认说："当个别的人坚决相信不合作运动的时候，与这个运动有关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却对它丧失了信心。"[①] 印度阶级斗争的加剧使甘地的纲领无以通行之路。甘地说："关于手织机我谈得这么多，是因为我不能向全国谈什么更好的东西。如果承认这些方法应当是和平的和合法的，那么我就不知道还有争取自治的其他有效方法。"[②]

在这种形势下，自治党也毫不留情地向甘地进攻。1925年9月国大党巴特那会议上，通过了对自治党极为有利的决议：国大党的活动不能再限于实现不合作运动的纲领。参加立法机关的工作，以前由自治党实现，现在应成为国大党的主要任务。这无疑是自治党的胜利，正统的甘地信徒西达拉马亚写道：这是"甘地向达斯和莫蒂拉尔·尼赫鲁的投降"。[③]同时又为甘地辩护："甘地

① 《国大党第二十五次至第五十次历次会议主席的致词》第734页。

② 同上，第739页。

③ 帕达比·西达拉马亚：《印度国大党史》第1卷第276页。

暂时放弃了自己的纲领，可是保持了对自己的原则的忠诚。"①

甘地的思想和策略在国大党内外，到处碰壁，实践证明它是行不通的。苏·昌·鲍斯写道："虽然自治党的领袖和普通成员都非常尊敬圣雄的身份，但是，党却公开地反对甘地，它有足够的力量迫使甘地自愿离开政治舞台。实际上在1928年12月举行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以前，甘地一直处在政治舞台之外。"②

同样，自治党的威信和影响也大大减弱，在立法机关中根本不能实现他们提出的任务，不可避免地出现与英国当局合作的倾向。1925年6月达斯死后，莫蒂拉尔·尼赫鲁仍保持了党的领导者地位。

关于国大党的派系活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了这样的评述："当时在活动的国大党两派——参议会派和不变派——都引不起我的注意。参议会显然倾向于改良主义和立宪主义。我认为这条路走不通。不变派……过多地重视甘地学说的表面意义，反而忽视了它的精神。他们缺乏活动力，实际上他们大多数都是些庸庸碌碌的主张社会改革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有利的条件。他们接近农民群众，而参议会中的自主派则完全忙于议会活动。"③

20年代末印度工农运动重新有了开展。群众所向往的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国内的形势影响了国大党内的激进派，他们集结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巴斯·昌德拉·鲍斯的周围，形成了国大党的左翼。

贾·尼赫鲁出生于1889年，受到良好的资产阶级教育。在不合作运动中被捕坐牢，获释后于1926年5月去欧洲游历。在英国

① 同上书，第290页。

② 苏巴斯·昌德拉·鲍斯：《印度的斗争·1920—1934年》第133页。

③ 《尼赫鲁自传》第117页。

正逢1926年的工人大罢工。1927年代表国大党参加了布鲁塞尔召开的被压迫民族大会，会后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次欧游使尼赫鲁对国际工人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莫斯科时听到了英国组织西门调查团赴印的消息。西门调查团由英帝国主义派出，规定修改印度的管理制度，英国委派西门调查团，在印度引起了极大的风波，激起了反帝情绪的高涨。这件事也引起了印度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党的反感。尼赫鲁急忙赶回印度，参加了1927年12月在马德拉斯举行的国大党的年会。

马德拉斯会议在印度国大党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反帝情绪的高涨和民族主义左翼在国大党内影响的扩大。会上通过了贾·尼赫鲁提出的关于给印度以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决议。但这个决议只是具有宣传的性质，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要求，并藉以要挟英国统治集团，并不意味着国大党领导有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贾·尼赫鲁承认："关于独立问题的决议当时并不是国大党方面重要的迫切要求（过了一、两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而只是一种广泛的，日益发展的情绪。"①

会议通过决议，抵制西门调查团。还通过了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决议。

根据马德拉斯会议决议，于1928年在德里召开各派联席会议，草拟印度宪法，选出以莫·尼赫鲁为首的委员会。莫·尼赫鲁代表右派势力的利益。提出只要求在大英帝国范围内自治领的地位，同意保留英国在印度的军队及经济势力，并保证土邦王公的权力。贾·尼赫鲁为代表的左派主张印度完全独立，停止英国

① 《尼赫鲁自传》第190页。

在印度的统治，要求英军撤退，取消王公领地，在普选基础上成立制宪会议等。两派在宪法草案问题上的争论，十分激烈。在1928年12月加尔各答的年会上，在甘地的支持下，莫·尼赫鲁的报告书得以通过。贾·尼赫鲁代表左派在会上声明，坚持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政纲。同时，以贾·尼赫鲁为首组织了印度独立大同盟，提出争取印度完全独立、若干大工厂收归国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纲领。这些纲领，自然地得到了人民的欢迎。

1928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巴斯·昌德拉·鲍斯当选为国大党总书记。国大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开始分裂。争取彻底的民族独立，成为印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斗争口号，国大党左派以活跃的姿态出现，领导印度人民为此目标继续进行斗争。

第四节 印度劳动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1923—1928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印度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纺织工业，从1925年到1928年纺织厂由270家增加到334家，布疋的年产量由1921—1922年度的1739万码，至1927—1928年度则增加到2356万码。冶金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其他工业领域民族资本的发展也较迅速。印度工业的发展，威胁着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英、印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英国垄断资本加紧了对印度的掠夺，英国垄断资本家通过经营大工业、种植园和商业，对印度人民的剥削也加剧了。同时利用经理行和银行的垄断作用，限制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资本占垄断地位，印度人所占外贸中的比例不到15%。在印度境内英帝国特惠权制度的确立和扩大，也大大限制

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印度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英、印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深了。

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印度城乡劳动人民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印度农民贫穷不堪，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土地占有状况极端不合理。沉重的殖民剥削和农村的封建势力，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因灾荒和饥饿而死亡。种植园的农业工人生活状况也是非常困苦的，他们经济贫穷，政治上无权，被迫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劳动，收入微薄而不得温饱，从而激起了他们广泛的不满与强烈地反抗。

印度工人阶级的情况与农民一样非常困难。工人的工资收入很微薄，加上层层盘剥和罚款而变得更少。进入 20 年代后，房租不断上涨，10 年间几乎上涨了 1 倍，工人的负担更为加重。外国和印度资本家以延长工时和降低工资等手段，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从 1925 年起，工业和农业雇佣工人的工资普遍下降。到 20 年代末，由于国内劳动市场的扩大，印度工厂主采用在欧美流行的“工业合理化”的方法，剥削工人。在工时和工资不变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生产负荷，增加劳动强度，增殖资本家的利润。这是获得高额利润的一种手段。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先在铁路运输、铁路工厂等部门采用这种办法。在 20 年代后期，在印度棉纺织工业中也广泛推行。这样印度纺织工人的劳动量增加了 1 倍以上。国内外资本家残酷榨取工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行径，给印度工人阶级带来了严重灾难，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

20 年代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923 年阿迈达巴德 61 家纺织厂中有 56 家的纺织工人，共为 4.5 万余人，为抗议降低工资举行罢工。罢工持续两个月，工人的要求部分的得到满足。1924 年爆发了影响更大的孟买纺织工人罢工，参加工人有 16 万人，罢工持续了 3 个月，使资本家损失工作日近 800 万。1925

年孟买省罢工斗争更为激烈，罢工次数占全国罢工总数一半以上。有着光荣历史的印度铁路工人的斗争更为显著。1925年西北铁路工人4万多人为抗议解雇工会会员举行大罢工。第二年又发生了孟加拉—那格普尔3.5万铁路工人罢工，他们攻占了车站，阻止列车通行，表现了英勇斗争的精神。1926—1927年，罢工斗争遍及许多土邦地区。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工会组织也产生和逐渐增多。1926年末，印度已有近200个工会，共有会员30万人以上。有些工会是由印度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组织起来的，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如孟买纺织工人的红旗工会具有较强的政治斗争要求，在后来反对西门调查团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至1927年，全印工会已联合了357个工会，会员超过12万人，1927年坎普尔全印工会大会年会上，集中于抵制西门调查团的斗争上。

农民运动继续发展，1927年后更为活跃。在孟买工人运动影响下，巴雷利发生了由8万人参加的暴动，抗议提高捐税和增加土地税额，农民群众同殖民当局的税收官吏展开了英勇搏斗。斗争遭到殖民当局派兵镇压，但巴雷利农民取得很大胜利。这次农民运动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英国政府为了欺骗舆论，安抚印度上层集团和蒙蔽广大人民群众，以研究印度"管理制度的效果，教育普及英属印度代表机关的发展"为名，以调查印度人"希望在什么程度上建立责任制政府"为钓饵，1927年11月决定以西门为首的调查团派往印度。这引起印度全国各界的反对，强烈抗议西门调查团来到印度。1928年西门调查团抵到印度时，遇到群起攻击的浪潮。以旁遮普和孟买为中心，工人群众掀起了广泛的斗争。当西门调查团到达勒克瑙车站时，示威群众手持黑旗涌向车站，殖民当局不得不派出骑兵部队和警察来驱散群众，但也无济于事，调查团乘坐的火车被

迫开往下一站停留。在加尔各答、孟买以及其它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抗议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西门委员会滚出印度去!""完全的印度独立万岁!"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民族独立的迫切愿望。1926年12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外，竟有2万工人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印度完全独立!"工人甚至冲进会场，要求停止会议，倾听工人意见。1928年工人罢工总数达200多起，参加人数50多万，使资本家损失的劳动日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工人运动的规模化比以往大多了，工人的觉悟程度也大大提高。

在印度工农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与影响下，从1926年起，印度的一些省份出现工农党，它作为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而活跃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1926年孟加拉成立了第一个工农党。1927年5月，加尔各答的共产主义者和孟加拉工农党成员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草拟了纲领。主要内容是：争取印度完全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大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减轻租税，提高农业技术水平；重大企业实行国有化，由国家资助实现工业化；规定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限额的工资。旁遮普的工农党由阿姆利则和拉合尔的工农小组合并而成。阿姆利则工农小组主要在农民中进行工作；拉合尔的小组主要在铁路工人、纺织工人和青年学生中活动。旁遮普工农党成立后分别出版了工人和农民的机关报。它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积极进行活动。

孟买的工农党党内工人阶级力量较强，它于1927年3月在国大党一个工人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对它影响很大。这个党出版了"革命"和"火星"两种机关刊物。它注意引导和团结工人群众，使他们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斗争。

1927—1928年，在比哈尔、联合省和其它省份也建立了工农

党，后来西北边省也建立起了工农党。因此，工农党在这一时期成了协调全国革命行动的政治组织。1928年1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了工农党代表大会，代表来自孟买、孟加拉、旁遮普、联合省等地区，共有100多名。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工农党政策提纲以及工会运动提纲三个重要文件。主要内容是争取印度完全独立和原则上无偿消除大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等。大会通过的提纲和决议，反映了印度这一时期革命的迫切任务，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全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地方革命组织的巩固和联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早于印度共产党的形成，印度工农党于20年代末期在许多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国大党的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许多普通党员和拥护者开始寻找反对外国统治斗争的其他方法和组织形式，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也起了推动作用，1926—1928年在孟买、孟加拉、旁遮普和联合省共建立了四个工农党。各工农党的组织原则，各有不同。孟买工农党采取个别吸收党员，总共只有900人，孟加拉工农党采取个别吸收和集体党员两种方式，有125名党员和约1万名集体党员。争取印度的真正独立为各工农党的主要纲领性口号，他们积极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达到工人、农民的阶级要求而战斗。各工农党都在很大程度上处在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下，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仍不能承担领导印度革命的历史重任。

印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还是漫长和艰辛的。

第八章　三十年代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一节　经济危机对印度的打击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与破坏是空前的。印度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国内工业从属于欧美工业资本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印度，首当其冲的是印度的农业，特别是那些种植单一性工业原料的地区。工人和农民收入降低，生活更加贫困，从而迫使他们进行更广泛的斗争。

印度各族劳动人民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急剧地尖锐化。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给了英国以沉重打击。英国为了挽救危机，把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印度人民身上。英国和印度资本家力图靠无情地剥削工人，榨出劳动人民的血汗，来弥补危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印度仍是一个农业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特别是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依附于英国，国内经济是从属于英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必然会立刻影响到印度。

经济危机对印度工业的打击极为严重，工厂纷纷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工人工资也大幅度下降。在工人生活极度贫困的同时，印度工业生产却形成了更大的集中，在危机年代，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大资本家以廉价并吞了它们。塔塔、比尔拉等垄断组

织，在危机年代巩固起来了，水泥业、制糖业等新的工业垄断组织也形成起来。印度垄断组织的形成是依靠与英国垄断资本家的勾结才有可能，同时与地方的高利贷资本家和大地主也有密切的联系。形成印度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复杂。

经济危机对印度农业发生了致命的影响。在危机的年代里，主要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印度的主要出口作物黄麻、茶叶的产量骤减，黄麻种植面积1931年只及1929年的75%，致使整个孟加拉的农民收入降低，贫困的程度加深。危机使农产品的总产值从100亿卢比降到55亿卢比。原料价格的下跌符合于英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可以用贱价收买黄麻、棉花和其他商品。农产品价格降暴，农民收入减少一半，但向农民征收的地租和捐税却同从前一样。他们不得不陷于高利贷的罗网，高利贷者使他们破产而失去了土地。在1930年农民所欠的债款已达99亿卢比，以后的年代里还在继续扩大。这一切激起了农民的革命情绪，他们挺身而起进行斗争，席卷全国的反帝运动普遍开展起来。

革命的浪潮，对国大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英国当局拒绝在印度自治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广大的各阶层居民对国大党的软弱策略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人物极力活动，国大党内的左翼力量开始增强。1929年12月拉合尔年会上，国大党宣布1930年1月26日为独立日，在这一天，全国到处组织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贾·尼赫鲁写道："为了开始运动，同时也为了看一看全国的民意，决定以1月26日那一天为独立日，全国宣誓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①

国大党号召印度人民展开国民不服从运动，它的主导者仍是甘地。实质上是不合作运动的翻版和继续。这个运动从1930年3

① 《尼赫鲁自传》第228—229页。

月甘地和他的门徒进行“食盐长征”开始的。他们步行到古吉拉特海滨去煮盐。甘地带领79个信徒由阿迈达巴德前往海滨的丹地村，沿途发表演说，号召农民参加坚持真理运动，遵守非暴力原则。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食盐税并破坏关于食盐专营条例。这一运动获得了苦于食盐高昂价格的劳动人民群众的支持。国大党同时还号召抵制外货、罢业、举行集会游行等。广大的农民、工人、学生、机关职员和中小资产阶级都参加了罢业和抵制运动。这次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不仅是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活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利用国大党的立法来反对地主和高利贷。他们抵制当地的集市，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甘地却极力把群众运动严格地限制在非暴力的框子内。甘地竟不惜讨好英国的殖民总督而写道：“我知道，和我一样遵循非暴力的革命家阻挠着以暴力手段行动的革命家的胜利……我想完全停止后者的活动。也可以说，我对他们要比对欧文勋爵的统治和迫害更害怕。”[①]

殖民当局仍然以暴力镇压这次运动，逮捕了这次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国大党的一些领导人。甘地也不能幸免，于1930年5月5日再一次被捕。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英殖民当局仍以暴力对待，结果有6万多人被关进了监狱。

英国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只能激起印度的反帝运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广大工农群众越出国大党和甘地的限制，采用激烈的暴力革命手段，对殖民主义者进行殊死搏斗。

第二节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

1930年4—5月，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英起义，孟加拉吉大

① 见D·G·坦杜卡尔《圣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生平》第2卷，第13—14页。

港的武装暴动，是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第一次起义。4月18日晚10点钟，由苏尔贾亚·森率领的一支武装队伍，伪装着英军制服，携带着手枪和炸弹，包围了吉大港英军军火库。他们是称之为"吉大港印度共和军"组织的一部分武装，有鉴于旁遮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采用的个人恐怖手段已经无效，他们着手准备组织能使全区英国行政当局活动陷于瘫痪的有组织的斗争。他们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建立了许多秘密接头点，秘密地生产了炸弹和爆炸物，而且有秘密印刷所。他们制定了广泛的起义计划，规定和国大党1930年4月在全国发动的第一次反英罢业同时开始。他们希望这样有组织的打击英国殖民者能给印度人做出革命斗争的榜样。这次攻取军火库获得了成功，进攻者除掉了岗哨，杀死了英军军官，夺取了武器。另两部分人分别在城里破坏了通讯和占领了警察营房。起义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高唱《祖国万岁！》，同时消灭了全部警察所，在道路上布满了堡垒。在几天时间内，起义者实际掌握了吉大港这个城市。

英国殖民当局调来了边防军和步兵旅，对吉大港进行镇压。起义者未占领港口，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殖民者以此为通讯联系点，并从这里集结军队，向起义者进攻。苏尔贾亚·森被迫率部退往市外的山区。4月底英军包围了起义者坚守的山头。起义者得不到增援，这次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个组织的一大半成员10名起义者被殖民者交付法庭审判。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直坚持到1932年末。

印度人民的反英浪潮汹涌澎湃。如果说吉大港是这个浪潮的先头浪花，那么白沙瓦起义就是滔滔巨浪了。

白沙瓦为西北边省的中心，在这里爆发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反英起义。国大党预定于1930年4月20日开始公民不服从运动。当群众开始游行示威以及纠察队开始包围外国人的商店、铺子和酒

馆时，警察开始进行武装镇压，当地国大党组织的 9 位领袖和领导运动的所谓“军事委员会”的几位成员，横遭逮捕。群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者。4 月 23 日晨，工人、手工业者，学生和来自农村的农民，拦截载送被捕者送往监狱的汽车。而国大党领袖却前往劝说人们不要抵抗行政当局。群众越出国大党的框框，反帝的愤怒情绪不断增长。警察对群众开枪镇压，引起群众的武装反抗。工厂、机关、学校停止了工作，全城的各处都举行了反英集会。白沙瓦举行了反英起义，并开始修筑街垒。英国调集军队前来镇压，一部分英印军队拒绝向起义者开枪，起义者争取印度士兵的同情，一部分印度士兵参加了起义。起义者取得了很大胜利。在两周的时间内，城市为起义者所掌握。

白沙瓦起义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是极大的威胁，起义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印度各地人民支持起义者，在旁遮普以及其他各省，于 5 月 3 日举行了“白沙瓦日”。各地的爱国者开始前往援助起义者。英国当局调来了英军替换在西北边省驻扎的几个印度营，并调来了一个空军大队。

5 月初，西北边境上的帕坦族举行了起义，他们的义勇队向白沙瓦挺进，已接近白沙瓦。起义前不久成立了民族主义组织“帕坦党”。同时成立了第一批帕坦人志愿队，称为“真主的仆人”。他们的制服起初是白色，后用红色砖粉浆染成红色，省内外很快把他们称为“红衫党”。他们的纲领里提出帕坦人的民族团结，改善劳动者状况，对殖民当局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等等。它的领导者是阿布杜尔·加伐尔汗，他在当地创建了教育团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由于进行反殖民当局的活动而被捕，后被驱除出本省，20 年代末返回故乡。他开始政治活动时，就与甘地有密切的联系。他组织帕坦人的群众性反英活动，同时又遵循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他在西北边省有很高的声望，在印度被称为“西北边

省的甘地"。在反帝斗争的浪潮中，"红衫党"组织的普通成员却把国大党在西北边省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变成了人民的反英起义。1930年5月10日，他们的1万多人的义勇队开往白沙瓦附近，他们和边境各部落的武装起义密切结合，对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严重威胁，当时殖民当局的行政陷于瘫痪。

白沙瓦人民的起义斗争，得到印度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但是国大党和甘地本人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只是口头上谴责英国政府派军队去白沙瓦镇压劳动者而已。英国当局向白沙瓦城集结军队。白沙瓦的起义者顽强地对英国进行抵抗。1930年5月4日，国大党地方委员会相信了英国殖民者的虚伪诺言，为英军打开了城门。英国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对起义者进行残暴的镇压。敌人占有很大的优势，殖民军队又控制了城市，到5月中旬，城市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红衫党的义勇队后于1930年7月和8月，两度包围了白沙瓦，但缺乏城内的配合，被英军击败。红衫党的反英活动仍继续着，1931年红衫党组织加入了国大党。这次起义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而失败，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却给了殖民者极大打击。1930年末，英国在西北边境集结了全印英军的三分之二以上，大大牵制了殖民者的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在印度的中南部也爆发武装起义。西北边省的起义炮火纷飞之际，孟买省的纺织中心绍拉普尔又爆发了新的起义，南北夹击，边境内地相呼应，英国殖民者处于四面冲击之中。

绍拉普尔的群众，在国大党的鼓动下，规定5月初举行不服从运动。警察阻止群众的示威游行活动。1930年5月8日，群众为了回击警察的暴力，打死了几名警察。殖民当局军警变本加厉镇压群众，当天打死了群众5人，打伤100余人，包括许多儿童在内。

被英国殖民当局的暴行激怒的绍拉普尔人民，转入进攻，举

行武装起义。国大党组织无法以非暴力运动的轨道限制人民的反帝斗争。工人们激发了革命精神，该城14万居民中，有5万名纺织工人。工人们组织了志愿队，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推选出了领导者。起义的革命风暴，来势凶猛。起义者烧毁了一处军火库，6个警察局，大部分英国人的机关和店铺。警察被追赶与围困在火车站，平日耀武扬威的英国殖民者和印度官吏慌张躲逃。城市上空升起了国大党的国旗。绍拉普尔所有的殖民官吏都被免职，起义者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机关。“他们接管了行政机关，并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法律和规章。”① 在几天时间内，整个城市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里。

殖民当局调来了英籍军队约克夏兵团和皇家步兵营前往镇压。当时英国罢工的约克夏纺织工人集会、声援绍拉普尔工人起义。英帝国主义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英国军队遇到起义者激烈的顽强抵抗，他们用石块和障碍物堵塞英军的通道，进行阻击。起义者得到广泛支持，孟买群众举行大会，抗议派军队去绍拉普尔进行军事镇压，在绍拉普尔附近的农村，农民烧毁了警察所。

这次有组织的起义和工人群众的广泛参加，所产生的革命影响，使英国殖民当局胆战心惊。他们认为这次起义是1930年印度人民群众的最危险的一次起义。殖民当局不遗余力地企图扑灭这次起义。英军在城里与起义者每天都发生激烈的巷战。至5月16日起义者的武装才被击败，英国人的机关和工厂企业才恢复了工作。起义的领导者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许多工人领袖被处死。英国人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次起义。

白沙瓦和绍拉普尔的武装起义，说明在印度不仅发生了不合作的和平运动，而且广泛地发生了武装斗争。工人、农民和小资

---

① 系当时报刊猜那《明星报》的报导，见杜德：《今日印度》下册，第84页。

产阶级同仇敌忾反抗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这充分说明印度人民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具有客观条件，所缺少的只是没有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运动走向胜利。

第三节 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成立

在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他们参加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武装起义斗争，吉大港起义、白沙瓦和绍拉普尔起义，都流有工人群众的鲜血。工人阶级的斗争，都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1932 年孟买码头工人举行罢工，他们高举红旗，喊出："打倒帝国主义!""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等口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达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斗争目的。

印度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在斗争中有了发展，在这期间，印度工会的中央机构共有 3 个。由于国大党的软弱和妥协，它对工会运动的影响，也产生了改良主义倾向。由于密拉特审判案，进步工会的领袖被英国当局关进监狱，工会的领导权落到改良主义分子手中，造成了工会运动的分裂。在 1929 年的全印工会代表大会上，分裂成对立的两派，而相争不下。左派因为主要领导关在狱中，尽管有很大势力，却无力排出右派的干扰和破坏。右派不服从大会通过的决议，公开攻击左派支持工农党和共产主义者，后来公开分裂出去，另行组织了印度工会联合会，与全印工会大会相对抗。在左派内部，也没有真正的团结统一，部分自称左派国大党人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参加红色国际联合工会和工会独立活动问题上发生分歧。国大党左派强调印度工会自己的独立性，不主张服从国际工会的指挥，实际上只要工会单独接受国大党的领导。印度共产主义者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出发，坚决主张接受国

际红色工会的领导。因而全印工会大会一分为二，共产主义者退出来组织了红色职工大会。这样，1931 年印度存在着 3 个中央工会组织，即国大党领导的全印工会大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红色职工大会和改良主义分子组织的全国职工联合会。印度工会中央领导机构的分裂，不利于印度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反映了印度共产党人不善于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正确的策略是：应当与拥有群众基础的国大党合作，从它的内部影响和争取群众，而不应走上宗派主义道路，把千千万万的群众推到了国大党一边，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印度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印度共产党的建立，经过了艰苦曲折的道路。早在 20 年代，在印度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 10 月 17 日，在第三国际中亚局指导下，在塔什干成立了第一个印度共产党，初期只有 7 名党员，M・N・罗易是当时的实际负责人，推行着机会主义的路线。印度共产主义者在较长时期内没能建立全印度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印度革命历史的严重过失。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残酷镇压，警察和侦探机关用尽一切极严密的手段对付共产党人，同时采取各种阴谋活动来破坏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各民族地区的互不往来，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弱点，也延缓了共产党的建立。

1924 年初，殖民当局制造了坎普尔共产主义诉讼案。将 4 名被捕者以“阴谋以暴力革命推翻英王对英属印度主权”① 的罪名，判处 4 年的监禁，其中也包括丹吉。坎普尔案件发生后，1924 年 12 月末，建立了一个合法的共产党，在坎普尔举行了第一次代表

① 《孟买纪事报》1924 年 4 月 23 日。

大会，除了萨提亚·布哈克塔为首的左翼民族主义者外，还有不少英国侦探机关的奸细。合法的共产党的成立，不能不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发生一定的紊乱。印度共产主义者当时还不明确怎样把合法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还不完全明确怎样对待合法的斗争。一些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参加了成立大会，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甚至获得了多数。以布哈克塔为首的左翼民族主义分子在丧失了该党的领导地位后，就脱离了它，另行组织了一个“民族共产党”。合法的共产党在群众中没有威信是不足为怪的。但它的存在，妨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建立。在印度当时实行残酷的恐怖政策的情况下，只有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得以发展，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巩固。殖民者从内部瓦解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合法的共产党，也只能使它更臭，促使了它的垮台，到1928年，它就名存实亡了。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初期，所受机会主义者M·N·罗易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罗易在20年代初代表印度共产主义者，后来又代表印度共产党在欧洲创办了机关报《前卫报》，宣传了极其有害的机会主义谬论。提出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他力图证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印度带来了“文明”，印度从殖民地国家变成了工业强国，工业达到与宗主国相平等时，国家的独立就会到来。他胡说印度正在英国帮助下从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工业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正处在非殖民化的过程。这样的错误理论，必然引申出来这样的策略：印度的革命不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对资产阶级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可见非殖民化的理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而在当时的印度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向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则又是十足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罗易的这套错误理论，决定了印度共产党人政策上的失败。首

先认为英帝国主义不是印度的敌人，而完全放弃了民族解放运动，取消了一切反帝口号，更谈不上建立和领导反帝统一战线。罗易一伙看不到印度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在革命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农民问题也无须注意。实际上印度的殖民地位并未改变，印度资产阶级与英国资产阶级虽有妥协一面，但矛盾并未消除，仍存在着斗争；印度农村中的封建制度仍原封未动的存在，反封建的任务仍需完成。罗易的理论是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是完全违背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的。

印度国大党在反帝的立场，坚持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使国大党在印度广大群众中获得了威望，一直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可见罗易的机会主义理论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危害极大，对印度共产党的成立造成了莫大的阻碍。

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更是无情地向共产主义者扑来。殖民者蓄谋以久，于 1929 年 3 月 20 日夜，出动了大批军警，在各城市一齐搜捕，各处均呈现战车满布，如临大敌的局势，结果 32 名工会领袖，包括 14 名共产党人被捕。他们被控告为企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运动，阴谋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罪名，被押往联合省密拉特这个小镇的监狱中，在这里进行了 4 年多极其残酷和无理的审判。

1933 年 1 月，密拉特案件，宣布判决，孟加拉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孟加拉工农党书记穆扎法尔·阿赫马德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其余的人被判不同刑期的监禁。

这是英国殖民者卑鄙的迫害阴谋，藉以镇压工人运动，打乱其领导核心；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向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进攻。但帝国主义打算失败了。被捕者在法庭上英勇斗争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印度国内立刻掀起了抗议密拉特审判的怒潮。

国大党也成立了保卫密拉特囚徒的中央委员会，尼赫鲁父子也参加了活动，为被捕者作法律辩护。国际上知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其中包括罗曼·曼兰、赫柏特·威尔斯、爱因斯坦、宋庆龄等也纷纷提出抗议，为保卫密拉特受迫害者而斗争。1933年2月16日，在印度各地举行了罢工和抗议性示威，开展了“密拉特案件被囚禁者日”的群众性运动。

1933年，英国政府在准备批准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前夕，在印度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释放和改判了大部分密拉特的囚禁者。

获释的工人运动领袖，继续进行斗争，重新努力团结全印共产主义者。1933年，一些出狱的共产党人和各地代表举行会议，选出和组成中央委员会，印度共产党便成立起来了。同年，印度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

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镇压首先指向左派分子，指向共产主义者，1934年7月，英国殖民政府，正式禁止印度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第二次大战期间，印度共产党才获得合法地位，1943年在印度共产党成立十年后，才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节 1935年的“奴隶宪法”与英帝国主义和印度人民矛盾的急剧尖锐化

英国统治集团在印度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力图保持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一方面残酷地镇压反帝运动，一方面进行立宪欺骗，藉以拉拢印度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土邦王公，推行分裂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以期削弱印度的革命力量和

熄灭反帝斗争的火焰。

30 年代，英国财政资本继续控制着印度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外贸易仍然是帝国主义剥削印度的一个重要领域。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地主的剥削造成生产力的停滞不前。印度的殖民地位所造成的工业不发达，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印度农业中严重的封建残余，实质上也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同殖民制度的矛盾日益加深，特别尖锐地表现在争夺利润的斗争上。印度资产阶级各阶层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加剧了这种斗争。如印度的股息平均额 1934 年为 8.9%，1939 年 6.5%，这引起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王公矛盾的激烈增长。同时，印度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态度有所不同。印度资产阶级某些集团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各集团代表的政治活动家对待英帝国主义立场也不是一致的。

甘地和国大党倡议的不合作运动，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参加下，抵制了英国纺织品和英国货物，符合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英国资本家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年份中，英国纺织品在印度被排斥而为印度的产品所代替。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停止抵制英货，取消不合作运动的目的，不得不同印度资产阶级进行某些让步。此时领导运动的国大党，在人民中间享有威信，要平息群众的抵制运动，必须与国大党领袖谈判。出于这种策略需要，英国帝国主义从 30 年代初开始与国大党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马拉松式谈判。由于各自的利害冲突，谈判中讨价还价，时断时续，但它对印度政局却发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步，英国殖民当局把当时在监狱的尼赫鲁父子与甘地囚禁在一处，他们在狱中的办公室举行了三天会谈，提出了停止和

平抵抗运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的最低条件，其中规定承认印度自由脱离英帝国的权利，允许印度建立完全自治的国民政府，并有控制国防部队和经济的权力。这些条件如得到英国应允，当可建议国大党停止和平抵抗运动。但抵制外国布疋和禁酒，仍继续进行。英当局自己禁止进口布匹和酒类时，才能取消运动。同时，必须释放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被捕的人员和政治犯；发还根据食盐法而勒索的罚款和退还人犯所缴纳的罚金和保证金；恢复在运动中辞职及被解职官员的职务；废止各种紧急法令等等。只有上述各条款获得圆满解决，国大党才能派代表和英国政府谈判。

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1930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的英印第一次圆桌会议，没有国大党代表参加。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党的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印方代表只是宗教团体、土邦、贱民上层分子等，他们代表印度封建势力及买办、大地主的利益，实质上他们和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受英国人支配，是愿为英国人效劳的走狗。尼赫鲁在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时说："由于他们认识到国大党日益左倾，而群众对国大党的影响也日益增加，因此加速了他们投奔伦敦。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在印度产生根本的政治变革，这就意味着各种群众因素将占绝对优势，至少也会变得重要。而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将加紧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从而会危害到这些既得利益。印度既得利益集团从他们认为可怕的这个前途退缩回来，转而反对任何深刻的政治改革。它们要使英国继续留在印度，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以保持现存的社会组织和既得利益。"[1]

这样的一群代表的谈判，无非是英国殖民利益的双簧表演。关于印度未来的独立地位，英方避而不谈。英印反动派的勾结，目

① 《尼赫鲁自传》第 273——274 页。

的仍是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长达三个多月的谈判，做出的决议是毫无价值的。决议组织全印联邦国会，扩大个别省的自治权。总督、省长仍不受立法机关的监督。选举仍按宗教原则进行。他们的目的是如何加强土邦王公在未来联邦国会中的地位，把土邦的势力推上中央来，成为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支柱。

这样的一次反动会议的协议，注定是要失败的。它不仅遭到印度人民的反对，也受到国大党的抵制。善于玩弄权术的英国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圆桌会议上未达到与国大党成立协议的目的，更慑于西北边省和联合省等地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而进一步对国大党进行拉拢。于 1931 年 1 月 26 日不合作运动一周年时，在印度各地分别释放了监禁的国大党领袖，敦促他们聚会，商讨有关圆桌会议事宜。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召开会议，听取了参加圆桌会议的自由联盟的代表的报告。会议建议甘地与总督会见，甘地表示同意。1931 年 2 月 17 日甘地与总督欧文在德里举行谈判。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移到德里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3 月 4 日宣布了两人签订的德里协定。这是一个为人民所不满的协订文件。协定全文 21 项：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停止抵制英货，派出代表参加伦敦的圆桌会议，讨论以第一次圆桌会议协议为基础的建立联邦国会等问题。

这一协定不只是企图解除人民的反英斗争，而且实质上同意第一次圆桌会议决议，根本没有提出印度独立问题。这对拉合尔会议上提出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也是一个倒退。它遭到全国人民的不齿，甚至尼赫鲁对这个协定也感到失望，他写道："难道我国人民一年来的英勇奋斗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吗？难道我们一切英勇的言行就这样结束了吗？一再重复的国大党的独立决议和一

月二十六日的誓言也就这样完结了吗？”[1]

为了通过德里协定，1931年3月国大党在卡拉奇召开了年会。会上左翼和右翼两派斗争很激烈。除了通过德里协定外，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基本权利”的决议。这是左翼为挽回人民对国大党的威信，缓和人民对德里协定的不满而主持通过的。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印度公民均享有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选举、居住、迁徙的自由，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工人和农民有权组织自己的协会；国家制定保护工人的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劳动保险等规定；保护女工和童工，降低捐税、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实行农业收入累进所得税，除消盐税等，特别提到国家必须掌握或控制重要经济命脉，保护纺织及其他民族工业。

国大党年会能出现这样的决议，无疑是受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响。社会主义已成为印度人民向往的方向。尼赫鲁在评价这个决议时写道：“国大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了一步——很短的一步”。[2] 但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内容都是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而当时印度国家政权仍掌握在殖民主义者手中，没有得到革命的改造，一切所谓关于社会的改革都是纸上空谈。

英国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圆桌会议。1931年9月来伦敦参加会议的，国大党仅有甘地一人，其他的是土邦王公，教派上层分子，贱民中的有产者和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代表。在会议上英国故意制造贱民的席位问题，造成纠纷，引起各派代表争论不休，坠入英国人的诡计之中。最后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提出一个继续保持英国殖民统治的方案；在印度联邦基础上建立一个两院制的议院，国防、内政、财政大权掌握在总督手里。为推行“分治”政

① 《尼赫鲁自传》第293页。
② 《尼赫鲁自传》第302页。

策，把信地从孟买省分离出来为独立省，西北各省民族起义地区成立特区。这个方案，完全是从维持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利益出发，与老一套的统治方式相比并无新的花样。

第二次圆桌会议，实际上未达成任何协议。1932 年 11 月又举行了第三次，出席人数极少，国大党也没有参加。第三次会议最后炮制了一个"印度联邦制"的骗局而告终。

英国政府所导演的圆桌会议，是英国殖民者玩弄欺骗诡术的继续。它转移舆论的视线，制造印度人民的分裂，目的还是在于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至于它对印度本身问题的解决有多大关系，尼赫鲁作过论述："强大的民族运动，并不会因为远在伦敦施展的技巧权术而消逝。民族主义代表中产阶级和农民真正的直接需要，他们企图依靠运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①

英国政府为了拉拢印度大地主、王公和一部分资产阶级，作为它在新的情况下继续统治印度的支柱，以便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三次圆桌会议后，于 1933 年 3 月 17 日根据西门调查团的建议，制订了印度宪法草案的白皮书。于 1935 年 8 月 2 日在白皮书的基础上，公布了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这是一个条款庞杂的文牍，全文共 478 条。在序言中露骨地指出：印度的所有权利，一切政权和全部司法"都由英王陛下实现。"印度仍然处在完全对宗主国依附的殖民地地位。难怪尼赫鲁气愤地说："它使任何真的进步成为不可能，并且一点也没有漏洞留给印度人民的代表们去干涉或变更那为英国所控制的行政机构。对于这机构的任何改变或宽放只有通过英国议会才行。"②

这个法案规定建立一个由英属印度各省和印度土邦组成的联

① 《尼赫鲁自传》第 334—335 页。

②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 483 页。

邦政府，土邦加入联邦是自愿的。新法案的目的在于保存封建势力的残余并把它大力移植到中央政府重要机关中。

英国保持对印度的绝对统治，未来的印度联邦是毫无主权可言。印度的主权仍属印度事务大臣和印度总督。组成政府的十个部长，统由总督任命、并对总督负责。总督拥有一切行政大权，并有否决议会所通过法律的大权。印军总司令由英王任命。

法案没有规定给予印度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选民有严格的财产限制和教育程度的限制。法案贯穿了"分而治之"的惯伎，在11个规定要选举立法机关的省份中，规定把近三分之一的席位留给回教徒，并按宗教原则分别选区进行选举，这是制造印回教徒纠纷的毒辣手段。根据印度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英国统治集团完全保持了自己在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它都没有规定在印度实行任何的社会经济改革。人民仍旧没有起码的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它在省自治问题上给了印度资产阶级某些让步，但它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新法案公布后，遭到除了一小撮土邦王公外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抵制和强烈反对。甚至国大党的右翼，也认为法案中的联邦只是加强了印度的封建势力和专制制度，企图以此来镇压全印人民的意志。国大党的左翼，对它的批评更为激烈。尼赫鲁写道："组织法加强了英国政府和印度王公、地主以及其他反动分子间的联盟。它增加了分别选举区，这一来，就增加了分裂的倾向。"他分析了联邦机构的性质后说："这一来，这机构既是带反动性的，因此若不采取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它甚至连自我发展的根芽都不存在。"①

印度共产党，伊斯兰教联盟也谴责这个法案，它遭受到印度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483页。

人民的一致反对。只对土邦封建势力有利的这个法案，根本不能解除英国与印度的矛盾。对印度人民来说，未能满足他们的丝毫要求，因此这个法案公布后引起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人民群众痛骂它是"奴隶的宪法"。印度各大城市，首先是在孟买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奴隶宪法"。从1935年起，印度人民的反帝斗争，大部分是围绕反对"奴隶宪法"进行的。

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公布，推动了印度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促进了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全印工会团结工人群众，注意建立新的基层工会组织，在1936年会员已增加到26.8万人，在斗争中排除右派改良主义全国工会联盟的影响，为争取独立和改善生活与劳动状况而斗争。全印工会大会第十五次会议表示坚决拒绝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保证工人积极参加反帝运动的决议。把工会变成群众性组织，动员工人群众为争取实现政治和经济要求而斗争。工人阶级掀起规模浩大的罢工斗争，1936年共发生了157起罢工，有16.9万人参加，损失工作日240万个，比1935年损失量增加1.4倍。工人运动发展到新的地区和更广泛的阶层。1936年大部分罢工斗争以获得胜利而结束。

农民运动也大大发展。1936年在许多省份发生了饥荒，地主更加压榨农民，加甚了逐赶佃农，追回土地的迫害。农民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全国各地的农民协会联合成区和省的组织。农民协会在农民中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反封建和反帝的斗争。1936年4月在联合省的勒克瑙举行了第一次全印农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全印农民协会，选举了全印农民委员会。规定9月1日为农民日。在左派力量的影响下，排除了改良主义者的干扰，8月全印农民委员会制定了新的纲领"农民权利宪章"，指出农民的基本要求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提出消灭各种地主土地占有制，给农民以土地权。当前要求减低地租1/2，废除反工人和反农民的法律等。

这个纲领，无疑地起了推动农民运动的作用。1936 年 12 月第二次全印农民协会会议，通过决议拒绝印度政府组织法。

印度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广泛地发动，进步的知识分子组织也广泛地建立起来。1936 年大学生成立了全印学生联合会，作家成立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1936 年 7 月举行了全印各土邦人民代表会议。所有这些组织和活动，都对反帝运动的发展起了应有的作用。

劳动者的群众组织的发展和国大党内部左派力量的加强，导致国大党内部斗争的尖锐化。在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形势下，国大党力量的重新配备和党内斗争更为明显。左派的势力在 1936 年 4 月勒克瑙的年会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贾·尼赫鲁在甘地推荐下，担任国大党主席。他组成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吸收了左派集团参加，人数占 1/3。左派仍在国大党领导机关保持了统治地位。尼赫鲁反对印度政府组织法。国大党的会议批准了否决印度政府组织法，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处于地下状态的印度共产党，失去了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在国大党内部开展活动，争取国大党采取广泛的反帝纲领。印度共产党提出了劳动者群众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建议，并号召工人农民加入国大党，以便把国大党变成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但是这个建议被国大党否决。相反，国大党修改了党章，规定扩大农村和城市街区基层组织网。其目的是争取劳动者群众，使他们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制定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时，完全置印度人民的愿望与利益于不顾，同时也拒绝印度资产阶级的要求。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压迫殖民地印度的反动措施有增无已，印度人民的状况愈来愈恶化。印度人民和印度资产阶级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显著地尖锐起来。印度人民持续的反帝斗争，

使英国殖民者更加处于困境。印度人民群众反对新宪法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斗争，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鼓舞和支持。他们的斗争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斗争的组成部分。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印度

第一节　大战前夕印度国内的政治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战前，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着激烈的矛盾。作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印度也陷于矛盾的旋涡。印度人民的斗争形势更为复杂，印度人民的政治斗争水平和组织性也有了提高。印度共产党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克服宗派主义也作了极大的努力。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印度共产党采取了与印度各种反英力量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依照印度共产党的意见，1935 年 4 月实行了全印工会大会和红色工会大会的重新合并，并规定承认阶级斗争为合并的政治基础。1938 年，全国职工联合会也合并进来，在印度出现了指挥整个工会运动的统一的中心，在团结工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增长了工人阶级在反对剥削阶级和殖民当局斗争中的地位，促进了反帝运动的发展。

国大党的策略也有了发展，在 1936 年年会上，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政治上，国大党提出要求印度立即独立，反对“奴隶宪法”，把实行这部宪法的那天定为全国志哀日，并提出由自己制定宪法的主张。在经济上，提出了一个减少地租 50%的土地纲领；要求全部豁免农民所欠的地租；禁止强迫劳动；规定了佃农工资最低限额等等。印度共产党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大党左派力量占居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同国大党内的社会党签订了

共同反对“奴隶宪法”的协定。国大党的威望提高了，大战前夕，到1938年党员增加到400多万，工农出身的党员占80%，工农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帝国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侵略战争。30年代初，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在欧洲、非洲、亚洲进行了大规模侵略战争，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印度全国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工农运动的锋芒，除了反对英国钦定的1935年“奴隶宪法”外，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对于英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是至关重要的。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国际事件，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和印度各政党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的备战直接触及了印度。英国采取措施改编扩充军队，重新装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随着军备的扩大，军费大大增加，转嫁到印度人民身上的负担更加重了。英国当局面临着印度日益高涨的反帝情绪以及印度一些政党的反对立场，英帝国主义要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解决政治危机。

在新的条件下，英帝国主义者主要是利用印度的封建反动势力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1938年12月召开了全印地主代表会议，第二年4月，成立了全印地主联盟。公开表示赞成实行英国殖民当局提出的“联邦机构”，在英殖民者的卵翼下，以图取得殖民联邦机构的一部分席位。

英帝国主义还依靠“穆斯林联盟”来瓦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20年代末期开始，“穆斯林联盟”的领导权完全落到地主和买办伊斯兰上层阶级手里，在这里工作的国大党伊斯兰教徒被排斥。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8—1948年）掌握了“穆斯林联盟”领导权。他出生于卡拉奇的伊斯兰教徒商人家里，在英国受过法学教育。他代表伊斯兰上层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他们的主要目的是

按教徒选举单位制，参加英国提出的选举。穆斯林联盟的领袖加强了自己的宗教宣传，声称：印度的伊斯兰教遭到危险，如果不保障穆斯林的权利，那么印度将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两个国家。尼赫鲁对此曾写道："穆斯林联盟执行这条路线，就不可避免地一天比一天走上歧途，到后来就公开反对在印度实行民主，甚至主张瓜分印度"。[①] 由于宗教团体宣传的加强，北印地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加深了。冲突非常频繁，并具有公开政治冲突的性质。甘地、尼赫鲁和鲍斯等国大党领袖一再向真纳提出谈判的建议。真纳要求把承认穆斯林联盟代表印度全体穆斯林和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自然，国大党的领袖不能同意国大党只是印度教徒的政党。

英帝国主义者顽固地拒绝印度人民民族独立的要求，群众性的反帝运动继续发展和扩大。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的威胁，加剧了印度的政治形势。在战前的年代，国大党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不同，表示反对把印度拖入帝国主义战争之中，这个主张得到了印度各阶层的广泛支持。1939 年 4 月，根据国大党的号召，在印度举行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战日"。

国大党的领袖不敢发动群众性的运动来争取独立。他们的行动计划只规定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独立的最后通牒。国大党主席苏巴斯·昌德拉·鲍斯在 1938 年末宣布："我们愿意尽快地取得'完全自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自己需要表现主动。"[②] 所谓的"主动"，即当最后通牒遭到英国拒绝后，就开始公民不服从运动。

在国大党内部左翼和右翼的斗争也很激烈，在 1939 年 1 月的

① 《尼赫鲁自传》第 694 页。

② 《新世纪》马德拉斯版，1939 年 1 月第 289 页。

国大党选举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两个主席候选人，右翼提出帕达比·西达马拉亚；左翼则提出苏巴斯·昌德拉·鲍斯。结果鲍斯再次当选国大党主席，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尼赫鲁、苏巴斯·昌德拉·鲍斯和萨拉特·昌德拉·鲍斯等国大党左派获得了40%的席位。而右派领袖对鲍斯的当选表示强烈地反对，甘地声称坚决反对鲍斯当选，在他的压力下，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除了萨拉特·昌德拉·鲍斯外，都拒绝和鲍斯合作而辞职。在这种形势下，国大党于1939年3月10日在阿萨姆的特里普拉土邦举行了第52次年会。国大党主席鲍斯声明要求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因他患病，会议只通过了尼赫鲁提出的关于民族的要求的决议。而右派却引导国大党人不去注意迫切的政治问题，提出了关于信任甘地的决议。决议中说："由于在当前的一年可能形成的危机形势，由于只有甘地才能在这种危机时刻领导起国大党和把国家引向胜利这一事实，会议认为必须使国大党的执行机构享有信任，所以要求国大党主席按照甘地的愿望指派工作委员会。"①

国大党特里普拉会议上，右派占了优势。右派领袖利用甘地的威信，扩大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右派进而转入进攻，他们要求执行上述决议，拒绝与鲍斯合作。鲍斯声明：上述决议是非法的，要求行动自由，但是没有结果。1939年4月，举行了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在会议上鲍斯被迫辞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当选为国大党主席，他组成了右派领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尼赫鲁和鲍斯拒绝参加工作委员会。

右派通过了非经国大党省委会的批准不许国大党人参加农民和其他群众的坚持真理运动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禁止举行类似的

① 《印度民族报》1939年3月12日。

运动。并通过省政府脱离国大党省委会的监督，而服从国大党中央议会委员会的决议，以加强右派在中央的势力。在这种形势下，英印反动派在全国展开了进攻。各省政府加紧镇压工人和农民运动。在旁遮普和比哈尔，成千上万的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被关进监狱；在孟买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孟买、那格浦尔、坎普尔和加尔各答等城市的工厂主拒绝履行以前对工人所承担的义务。各土邦也加紧实行对群众的恐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帝国主义者为镇压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大肆玩弄政治手腕。它利用印度的封建反动势力，特别是宗教团体党派，来为其殖民统治效劳。利用宗教和社会煽惑性宣传，穆斯林联盟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吸引过来，它由上层分子的政党变成了群众性的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共产党的影响有所增大，但发挥的作用甚微，国大党的影响和威力大大超过它。国大党和社会党等政团，极力抵销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党曾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把国大党看作统一战线的唯一形式，共产党指示其党员参加到国大党的各个机构中和基础组织中工作。印度共产党与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结果，国大党的势力扩大了。

战前，印度工农运动处于高涨时期，人民群众身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压迫，强烈要求民族独立，摆脱殖民地状态。同时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残酷剥削，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极为壮观。1937 年孟加拉黄麻业工人的总罢工，是印度工运史上最大的罢工之一，参加人数达 22.5 万余人，要求恢复被削减的工资和定出合理的工资待遇。罢工一直坚持了 5 个月，最后得到胜利而结束。1937 年孟加拉、那格浦尔铁路的罢工，参加的人数达 4 万余人，同年，坎普尔组织工人举行罢工，也有 4 万多

人参加。1937年“五一”节，各地工人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成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标志，集会的工人群众支持国内黄麻业工人和其他行业的罢工运动，同时也声援国际上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工人罢工和示威对印度工会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进工会组织的统一，1938年统一的全印工会大会建立起来了。战前印度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罢工次数增加到397次，为1935年的两倍半以上。

农民运动战前也有很大发展，印度各省都建立了全印农民联合会的组织，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6年6月在勒克瑙举行，有2万多农民参加，有些是步行数百里赶来出席的。会上选出了全印农民委员会，宣布所有的农民同盟都团结到全印农民联合会中。它以后通过的《农民权利宪章》提出消灭各种形式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全印土地转交给农民。在斗争中，农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在农会组织的领导下，过去自发的分散的农民斗争，逐渐发展为有觉悟 的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到1939年参加农民联合会的农民已达80余万。战前，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但软弱无力的印度共产党却没有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印度的左派力量本身软弱。内部的意见严重分歧。印度共产党并未能改变国大党的政策，也不可能把它变成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

1937年4月1日，英国殖民者强行宣布“奴隶宪法”开始生效，并在各省举行立法会议的选举。为了利用选举运动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国大党决定参加选举。国大党是抵制1935年公布的“奴隶宪法”，因而他们的竞选宣言中提出：“决非与该法案合作；而是对抗它并设法置它于死地”。国大党在竞选中提出了政纲：主张改革土地租佃制度，削减田赋和地租，国家给予农民低息贷款；保证工人合适的生活条件，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保护女工；取消贱民制度，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等

等。不解决国家与民族的完全独立问题，所有这些无疑画饼充饥。

国大党较之其他政党和教派组织，是一个全国唯一的拥有较大势力的组织。选举的结果是国大党以压倒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在1585个省立法会议的席位中，国大党获得了714席。在11个行省中，国大党在马德拉斯、比哈尔、联合省、中央省、奥里萨等七省取得了绝对优势，穆斯林联盟获得了108席。

国大党竞选胜利后，在他们占有多数席位的省份是否组织省政府，这对国大党来说，又是一个严重的步骤。如果同意组建省政府，那不意味着同意"奴隶宪法"吗？反之，又失去了掌握权利的机会和条件。真是踌躇不定。一直到英国印度总督应允省长将不干涉各省的日常事务，不会和属于任何那个党派的厅长发起冲突。这是一个虚伪的表态，表明了英国殖民当局对国大党的拉拢策略。而国大党却感到是最大的胜利，决定组成和参加政府。1937年7月，在国大党拥有多数席位的七个省份成立了省政府。这七省的人口众多，占全印度人口的2/5以上。到1938年，在信地和阿萨姆成立了国大党的联合政府，国大党人并担任了阿萨姆的省长，这样一来国大党的势力控制了9个省份。

国大党的省政府，为了履行竞选时的诺言，在公民自由权利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例如，释放了被囚禁了16年的曹里——曹拉事件的被捕者，其他很多政治犯恢复了自由；取消了很多的政治组织禁令；新闻和出版自由适当地放宽。在农村实行了某些改革，取消了农民的一部分旧债，限制了债务的利率，在孟买通过了租佃法，禁止增加地租，有些地方豁免了田赋。这些措施，使农民的情况有一定的改革，但这些点滴的改革只涉及部分农民，只能解决他们局部的困难。有关触及地主阶级利益及殖民统治基础，从而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土地立法，国大党的省政府则无能为力。对于工人阶级，他们只是对工资要求和工会组织及部分的罢工，表

示支持。在社会改革方面则集中在禁毒禁酒，从事教育改革及社会卫生福利事业等。

国大党省政府的工作是困难的。统治实权仍操纵在总督和省长手里，省政府的立法必须由省长批准。国大党的一些改革法令能得以通过，是因为英国在一些没有触及到统治基础的问题愿作一些微少的让步。其目的是一方面平息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也借以拉拢国大党的省政府逐步为殖民者服务，充当帝国主义的行政机关。事实上，国大党的省政府后来的发展趋向也正是如此。

国大党省政府执政期间，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同时国大党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特别表现在“奴隶宪法”中联邦制的问题上，国大党曾通过拒绝联邦制的决议，但国大党的右派领袖仍与英国谈判，企图与英妥协。他们在党内极力排斥左派的领导权和影响，最后掌握了国大党的领导大权。

在省政府的竞选活动中，穆斯林联盟遭到失败，与国大党摩擦增加。在国大党省政府成立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后来国大党在省立法机关中，又占了绝对多数的席位，更引起穆斯林联盟的不满。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和支持下，穆斯林联盟在各省成立支部，煽动群众，发动反对“国大党暴政”的运动。国大党提出制定新宪法时，穆斯林联盟也坚决反对，指责这是国大党企图加强对全印度统治的行动。1939 年，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便热烈支持过去有人提倡过的巴基斯坦思想，提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离。主张两者是两个民族，两个民族不应当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为以后巴基斯坦脱离印度而独立，埋下了伏因。

印度国大党内部的分化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分裂，是大战前夕印度政治局势的特征。在这样的形势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了。英国把印度拖进了战争。英帝国主义力图推行保持印度殖民地落后状态的政策，在反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印度的潜力远远没有被充分发挥和利用。英帝国主义只是把战争的负担强加在印度人民身上。在战争的年代中，英国殖民者利用印度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不统一，对印度人民的独立要求坚决不作任何让步。国大党所领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则极欲利用战争的时机，想通过非暴力的方式，首先获得国家的独立，以便掌握独立后的全部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和领导权。这就是战前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者与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的原因。印度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走上了民族独立斗争的新阶段。

第二节　大战期间印度人民的反帝斗争与民族独立运动

1939 年 9 月 3 日英法对德宣战的同一天，印度总督林立兹哥宣布印度参战。殖民当局没有听取任何舆论的反响，甚至也没有正式咨询中央立法议会的意见，就把印度拖入了战争。英国帝国主义者想重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旧梦，把印度成为它在战争期间的兵源和物资供应地。它在宣布印度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同时，急忙地通过印度政府修正法案，及限制省政府权限法案。英国政府授权总督当紧急事变时，可以立刻解散省政府，独揽大权，并颁布了“印度防卫法令”。为了确保印度的国防、治安及公共秩序，使战争有效进行，殖民当局组织军事法庭，有权审理有害国防的罪行，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处罚判决；并授权警察可无须拘票，有权任意逮捕一切有碍战争进行的人；禁止集会及各种宣传活动。随后就连“奴隶宪法”中规定的联邦制的实施也中止进行。印度恢复到由英国赤裸裸的独裁统治的地步。

英国帝国主义这种蛮横的殖民主义暴行，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也加深了与国大党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同，印度国大党已感羽毛丰满，欲意分庭抗礼。国大党在英国总督宣布印度参战时，当即宣布："印度的宣战与媾和必须 由印度人民决定"。国大党拒绝"在这次战争中提供任何合作，这次战争是按照帝国主义的路线进行，而且是为了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巩固帝国主义制度"。国大党要求英国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词句宣布，在关于民主，帝国主义和他们所重视的新秩序的问题上，他们的战争的目标何在"。主要的是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必须宣布印度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地位必须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立即付诸实施。"①

战火烧身的英帝国主义对国大党的要求根本不予置理。英国只是搪塞应付，只有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才能与印度各党派、宗教团体及各土邦王公协商适合于印度的方案，以便给予印度以自治领地位。国大党对此极为不满，决定号召在各省政府中工作的国大党人全部辞职，以示反抗。于是，孟买、马德拉斯、联合省、比哈尔、中央省等五省的国大党省政府提出辞呈。英帝国主义是寸步不让，这些省份立即处在英国的省督的独裁统治之下，一直到 1946 年国大党的省政府复职时为止。而在另外一些省份则支持穆斯林联盟的省政府。在西北边省和阿萨姆都组织了穆斯林联盟的省政府，而在信德和孟加拉穆斯林联盟的势力处于统治巩固的地位。

国大党的反战争政策是无力的。在省政府辞职以后，国大党除了要求召开立宪大会以草拟印度新宪法以外，根本没有做妨害殖民政府的事情。而国大党内部对战争问题也是存在着分歧。甘

① 引文见《印度通史》第 4 册，第 1068 页。

地就是支持英国战争的。他声言“我们并不想要从英国的废墟中寻找我们的独立。”而积极支持英国在战争中获胜。在此期间甘地以支持对言论自由的适度要求而发动了不合作运动，他决定不得扩展成为“群众行动”，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抗议”，以免会妨碍政府。印度总督在召见甘地时，甘地声明完全支持英国对德国作战。

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一派，反对与英国政府合作参加战争。国大党的这一派也谴责过法西斯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侵略罪行，同情反抗侵略为自由民主而战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人民，但他们拒绝和英国政府合作。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曾发表声明说：“印度无法使自己和这样的政权合作，也无法被要求将它的资源用于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上，而这种民主自由是已经被剥夺，并且看来大概是被出卖的。”[1] 自然，在这里也表现出国大党对英国的讨价还价。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声明：如果英国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国作战。尼赫鲁为此写道：“印度人民已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他们甘愿付出重大的牺牲来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从而在印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同情心是整个站在民主与自由这一面的。但是印度不能在正当它剥夺了自由、并且连它所获得的那样有限的自由都要从它手中夺去的时候，却去参加号称是为了民主自由的战争！”[2]

英国政府是不能自动答应印度独立的要求的。国大党这种温和的要求也不会得到满足。英国政府 1939 年 10 月 17 日发表了《白皮书》只是宣布不实现“联邦机构”，重复宣布在战争结束后，召开各政党、宗教团体和王公代表会议制定印度新宪法。英国政

① 引自《印度的发现》第 552 页。

②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 565 页。

府宣扬的这种让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行“联邦机构”的计划，早在战前就破产了。英国只应允，在战时只能吸收新的印度顾问来扩大总督控制下的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内成立由印度各政党各王公的代表组成的咨议委员会这样形同虚设的机构。

国大党的领导随即于10月23日发表声明：国大党要求成立责任政府，并坚决主张宪法不应当由各党派和团体的代表组织委员会制定，而应当由全民选出的立宪会议来制定。同时警告英国政府，国大党将发动公民不服从运动。

在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加强的形势下，英国政府才被迫以有限的条件，拉拢国大党的领袖站在英国政府一边。1940年1月10日印度总督林立兹哥发表演说，指出英国准备战后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权利，同时保障各王公和各少数派的权利和要求。给予印度自治领后，英国将对印度的国防负责30年。

国大党领导中有着同英国政府妥协的强烈的愿望，甘地就是代表人物，他对总督的演说极为称颂，说什么“包含着对双方都光荣地解决的萌芽”。[①] 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仍有坚持原来主张的人，认为如果不成立独立的印度政府，就必须拒绝同英国当局合作。

国大党还有另一派，这就是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他于1941年逃出印度，居住在柏林，他先后去过西贡和仰光，他一再发表反英演说。他认为，与英国敌对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客观上都是印度的同盟者。他甚至把德国、日本法西斯国家也当成了朋友。

1943年6月，鲍斯来到日本活动，在日本法西斯的支持下，他在缅甸建立了所谓自由印度政府，还在新加坡等地，在被日本俘虏的印度官兵中组成所谓印度国民军。自然，国大党的领袖是不

① 《美亚》杂志（纽约）1940年5月号。

支持鲍斯的反英策略的。鲍斯企图得到法西斯国家的支持取得民族独立，无疑与虎谋皮，最终只能是与法西斯国家同流合污，成为它们的走卒。鲍斯的这个历史错误是无法洗刷的。

在战争期间，印度向英国供应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英国垄断资本家把印度视为自已的军事和经济基地。众多的印度人被征召服役，为英国帝国主义者充当炮灰。大战年代，英国为了保持英印籍军人的优势，在印度驻扎有50万英籍军人，比平时增加了约6倍。战争的庞大开支，沉重地压在印度人民身上。印度供应了在印度境内增加10倍以上的英印军队的粮食，同时印度还要供应在北非作战和其他地区的印度军队和英国军队的粮食。英国许多殖民地和中近东许多国家对印度的谷物的需求也增加了。印度不得不输出大量谷物，因而供应国内消费的粮食数量大大减少。同时，军事工业的发展，农村居民从事各种国防工作，城市人口增加，国内对粮食的需求也增加，在大战年代，印度发生了粮食危机，造成严重的饥荒。1942年印度居民缺少粮食达400万吨。加之，1942年秋，孟加拉等地发生水灾，粮食产量大大减少。在印度殖民当局没有粮食储备，他们对人民的死活是漠不关心。饥荒袭击着印度人民，很快蔓延到孟加拉、马德拉斯，比哈尔、奥里萨和阿萨姆等省，1亿多人处于饥饿状态，约占全国人口的1/3。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仅孟加拉一个管区就达200万人。英国殖民政府未采取任何救灾措施。贾·尼赫鲁写道："每一个人都承认所有那些有关当局都表现着一种可惊的漠不关心、无能和自满。直到最后关头，当每天都有几千人路毙的时候，饥荒的事还在被否定，而且对这类消息的披露也被检查员扣住了。"①

战火烽起，造成印度对外经济联系的中断，技术作物的出口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658页。

量急剧减少。大战爆发不久，印度对欧洲的棉花出口锐减，对英国的出口也减少了，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日本的输出完全停止了。1943—1944年度，棉花的输出量只是战前的1/16；黄麻的输出量也剧减，只及战前输出量的25%。其他农作物的输出也大大减少。由于降低了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农民和小生产者因而带来的灾难是苦不堪言。捐税、间接税和地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增加。工业品价格的飞涨，投机活动的猖獗，日益加重的高利贷剥削，所有这一切而造成的饥荒，使得农民丧失土地，贫困化日益加剧。农民群众债台高筑，孟加拉负债农民的人数多达66%。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印度的工业有了广泛地发展．大战年代，英国商品的竞争削弱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印度的商品输出停止了。在战时，供应英印军队对工业品特别是武器装备和服装的需要，亚洲与非洲大陆国家对印度工业品需求的增长等等，所有这一切，客观上刺激了印度工业生产的发展．同时英国限制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英国不仅减少对印度机器的输出，而且严格限制其他国家对印度输入机器，印度本身又缺乏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的基础也很薄弱。在这种条件下，印度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完成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是十分恶劣的。

在战争期间，印度的一些重工业，如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等有了发展。印度重工业比重略有增加，但轻工业仍占优势。重工业的发展水平仍然很低。钢年产量只有140余万吨。

印度资产阶级由于战争而积累了大量的金钱。生产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过程加剧了。垄断集团，如塔塔、比尔拉和达尔米亚等集团都在战时膨胀起来。印度银行资本的集中以及与工业资本的联系都加强了。垄断集团的发展是印度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殖民地的印度又有着它的特点，印度的一些垄断

组织都依赖英国财政资本。英国垄断资本与印度资产阶级仍有着严重矛盾，殖民主义者严重限制了印度工业主的利润和阻挠了它们的发展。英国阻碍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苏联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此转入第二阶段。苏联人民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战斗，鼓舞了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争取解放而斗争。英、美、法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严重威胁，不得不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这样的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对印度也发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推行南进政策。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公开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趁势南下，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在日本法西斯的进攻下，土崩瓦解。1942年3月8日，日本攻陷仰光，大英帝国殖民制度的腐朽，更加暴露无遗。美国此时的武装力量以盟军的姿态，已摆在印度大门，企图趁英帝国的危机而渗入印度，宣称支持印度的独立。

美国垄断组织利用英国的困难时机，加强了它在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国际上的压力，以及想利用国大党人的反法西斯情绪，促使英国统治集团于1941年12月释放了在战时逮捕的国大党领袖和成员。

1942年1月初，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举行了会议，通过全部批准国大党以前的政策的决议。这次会议根据群众的情绪，通过决议，对苏联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表示同情，还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日本占领缅甸后，战争接近了印度国境。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加强自己在印度的政治地位。1942年3月，为了同印度各政党领袖举行谈判，英国政府派战时内阁阁员斯塔福

尔德·克里浦斯来印度，带来关于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这个宣言包括以下内容：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给予自治领的地位；战争结束后，将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机关来制定新宪法，各省举行立法会议的选举，土邦代表由王公指派；不愿加入印度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政府旧有的关系，或成立单独的自治领；在战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做任何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国防责任应由英国政府担任。

英国提出的这个宣言草案是包藏祸心的，它提出在战争结束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权利，只是一种遥遥无期的许诺，甘地也称它为“一张远期支票”。而提到某些省份可以不加入印度联邦，则是为了鼓励各王公和穆斯林联盟的分立主义倾向，是对成立巴基斯坦要求的直接鼓励。

国大党的领袖拒绝了英国内阁的建议。贾·尼赫鲁在抨击克里浦斯计划时写道：“现有的政府机构将和以前完全一样地继续着，总督的至上权威依旧保留着，而我们之中很少的几个人将成为他那穿着制服的侍从，照管酒食之类”。[1] 国大党明确表示，在没有建立对印度立法机关负责的印度政府以前，印度人民群众不会像在国民政府下那样支持反法西斯同盟加强军事力量。

1942年8月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举行了会议，要求印度独立，否则不可能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们不希望削弱盟国，只是英国当局妨害印度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反对法西斯集团。

英国当局对此非常恼火，准备镇压国大党的不羁行为。1942年8月，在阿拉哈巴德突然搜查了国大党总部，制造国大党与日本勾结的舆论。8月9日，英国当局逮捕了国大党包括甘地在内的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612页。

全部领袖。国大党领袖们被捕后，国大党的活动就被官方正式禁止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做出贡献的是印度的广大工人和农民。印度的工农群众是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力量。在大战年代里，日本军队已经抵达边境的曼尼普尔土邦的英帕尔城；日本空军轰炸了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省的一些城市。印度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苦难，英国政府不是组织保卫印度的战争，而把印度作为支持英国战争的基地。英国把很大一部分军事重担转嫁到印度劳动者身上。印度为英军供应了大量的食品和服装。在大战时期，有 250 多万印度人被招募入伍，印度士兵被派往国外作战。征兵的人数之多和战况之苦，致使英国继续在印度招募士兵都发生了困难，印度人民对英帝国主义仇恨加深，有着激烈的反战情绪。在全国各地时常爆发抗英运动。为了镇压群众运动，英国政府把大量英籍军队调到了印度各地。

工人阶级在战争年代斗争更为英勇。1942 年的罢工次数增加到 694 起，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 77.2 万人，损失了 570 万个工作日。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工厂，如塔塔公司和其他许多工业中心，罢工规模特别大。农民的反英斗争也很激烈和顽强，他们组织起来，进攻地主和高利贷的庄园，攻击殖民政府的警察局。反饥饿斗争促进了农民组织的发展，1944 年印度全国的农民协会达 55.3 万会员。在东孟加拉，农民协会领导了在战时爆发的佃农争取把地租减低到收成的 1/3 的运动。大战期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是工农群众，他们的斗争，直接打击了英国殖民者，震动了殖民统治的基础，推动了印度历史发展到新的阶段。

第三节　印度工人运动及其组织的发展

印度历史的发展，孕育着印度工人阶级的成长。由于在战时印度工业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在战争的岁月中发展壮大起来。战时的产业工人，数量上大大增加，其中铁路工人增加了25万人，矿工增加了5万，总人数增加了70万，比战前增加了30%。到战争结束时，印度工人总数达600余万，这是一支庞大的革命队伍，是推动印度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他们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战时印度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性，有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工会组织的数量，从1938年的420个，增加到1943年的693个，会员数量同时期由39万人增加到70万人。工会活动的地区更加普遍。全印总工会所属组织大大增加，受其领导的会员达到50多万人。

在大战年代，大多数工人的状况急剧恶化，劳动强度加强了。在许多部门，劳动日正式延长到10至12小时，实际上还要长。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大地下降了。战时的物价津贴，只为战前平均工资的50%，而生活费的上涨率却达到150—200%。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加恶化。在大战年代，由于工业的发展和遭受饥荒的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工业城市的人口剧增，无家可归的工人流离失所，流浪街头。在英国和印度资本家在战时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的比重都逐渐下降，印度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加深了。

英国把印度拖入战争，激起了印度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1940年，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并于国大党所采用的传统的独立日——1月26日，举行了一天的抗议性罢工。在孟买有50多个企业停了工，加

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印度许多其他城市都展开了群众性的反英运动。

有很大影响的“红旗工会”领导的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是1940年最大的罢工。这次罢工从3月4日开始。孟买的65个纺织厂的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罢工的工人提出增加15%工资的要求。纺织女工也积极参加了罢工。孟买其他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和马哈拉施特拉工业中心的工人，为了表示支援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都在1940年3月10日举行为时一天的罢工。1940年3月18日，全省工会代表大会决议，抗议殖民当局逮捕罢工领袖。号召工厂和商店联合举行抵制。大学生也积极支援了罢工工人的斗争。殖民当局的市政府支持的工厂主，采取一切阴谋和措施，来破坏罢工。由于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获得了增加工资10%的胜利，1940年4月13日罢工结束。

在整个1940年内，印度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投入到反对殖民统治和反战的斗争。孟加拉和比哈尔的烟草工人，加尔各答的清洁工人，比哈尔省的制糖工人，贾里亚的煤矿工人和其他许多工矿企业的工人都举行的罢工。1940年3月，印度铁路工人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并进行罢工斗争。1940年共发生了322起罢工，有45.2万工人群众参加。使英国和印度资本家遭受了757.7万个劳动日的损失。殖民政府逮捕了工会的积极分子和参加罢工的骨干分子，对工人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但它阻止不了广泛兴起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1940年的斗争表明，印度无产阶级的发动和斗争，更有组织性和顽强精神。

在战时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英国和印度资本家主要是依靠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印度工人阶级没有停止争取改善自身状况的斗争。资本家为了维持不间断地生产，防止工人的罢工，往往对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作些让步。工人阶级组

织的罢工斗争，很大部分获得了一定的胜利。

印度工人阶级在战争年代，反法西斯情绪日益增长，同时反英情绪也在发展。因为在战争年代，英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压迫更加深了。工会运动在战争年代大大发展起来。到1945年初，会员已达60万的全印工会大会，虽然遭到英国当局的分裂破坏，仍成为工人阶级中组织最大和最有威信的工会组织。早在1939年，机会主义分子M·N·罗易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建立了全印劳工联盟，分裂印度工人运动。尽管有少数工会组织加入了这个联盟，但它对印度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不大。1944年来，国大党企图建立自己的工会联合会，根据甘地等人的建议，国大党建立了“工人服务会”，它的中心是阿迈达巴德的纺织工人联合会，把以前未加入任何一个工会联合会的某些工会，吸收到这里来。

印度工人阶级及工会组织壮大、发展的同时，印度共产党也发展壮大起来。印度共产党在1933年成立后，人数只有2千人，在英国殖民者的迫害下，一直处在秘密的地下状态。苏德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同苏联一起参加了反法西斯同盟，在世界进步人类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对共产党活动的禁令。1942年夏，英国当局宣布印度共产党为合法政党。英国的这一措施，是企图利用共产党出来号召印度人民支持盟国作战。同时藉以制造印度各政党之间的矛盾，在禁止国大党活动的同时宣布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企图把共产党和追随国大党的广大劳动阶层对立起来。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则借机攻击共产党支持英国作战，而把他们自己说成是印度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公开对共产党进行攻击。破坏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英国当局在宣布印共合法后仍然逮捕印度共产党员，拒不释放狱中的被捕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活动受到战时的重重迫害性的法律限制。但是共产党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合法活动一年中，党

员人数已增加到1.6万人。

1943年5月，印度共产党举行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139名代表，代表了近2万名党员。代表大会决议，动员全国人民力量反对法西斯侵略集团。代表大会号召群众为争取印度独立，成立国民政府，释放全部政治犯而斗争。代表大会号召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反对饥饿和投机的斗争，并组织农民进行反饥饿的斗争。

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党在工人、农民群众组织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扩大了。共产党也加强了宣传鼓动工作，出版了自己的公开刊物《人民战争报》。后来又用印度的各种文字如印地文、乌尔都文、泰卢固文等出版了报刊。

印度共产党并没有执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印度共产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与英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共对英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更没有认清英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目的，以致在战争末期仍一直保持着支持英国的路线，没有随着战争的发展，及时地把支持英国的策略改变为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便意味着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解放。印共在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同时，没有揭露英帝国主义者一向在印度所实行的分裂主义，以致无形中支持了印巴分治。他们在论及战时饥荒时，只着重揭露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而没有指出它的根本原因是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由于这些路线上和理论上的错误，印度共产党在战时未能争取更多的群众到自己周围，从而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仍掌握在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手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没有朝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发展是毫不为奇的。

工人阶级的重要同盟军农民，在战时的反英斗争也特别激烈。

反饥饿斗争促进了农民组织的发展，农民协会的会员逐年增加。1943年印度全国的农民协会约有30万会员，1944年增加到55.3万人，而在1945年发展到82.5万人。

1945年3月，全印农民委员会在东孟加拉的奈腊特腊科纳村举行了会议。共产党的活动家穆扎法尔·阿赫马德当选为会议主席。农民协会的影响日益增长，印度的一些省份里，都有几百万农民在农民协会周围，在一些省份，农民协会领导佃农和农业工人反对地主高利贷剥削，反夺佃斗争，表现的很有力。在大战时期，农民运动的目的是反对饥饿和投机，争取减轻租佃条件。国大党对农民运动有着重要影响，印度共产党也没有把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起来。

印度共产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力量是逐渐加强，组织上也得到发展，到1944年，党员已增加到3万人。英国殖民当局自然要开始考虑，这是一支不可忽视，而且是难于驾御的力量。权衡利弊，不能不依靠国大党，不能把国大党领袖长期关押起来，让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走。

英国殖民当局对待国大党的策略是一打一拉，这正适应了国大党所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的特性。当国大党领导集团决定对英印政府施加压力时，1940年10月甘地宣布开始公开不服从运动。在这个运动前，甘地曾与印度总督林立兹哥举行了谈判。甘地要求允许发表和平主义的文章，要求取消言论自由的限制，印度总督拒绝了这些要求。在这次不服从运动中有2.5万至3万名国大党人被殖民政府逮捕，以违犯“印度国防法”的罪名交付法庭审判。几乎国大党的全部领袖都被关进了监狱，国大党组织的活动大大削弱。

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法西斯集团已瓦解，苏联红军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解放区开始对日寇反攻，给予

了日本侵略者以巨大的打击，所有这一切，大大的影响了印度群众运动的高涨。英国在这种形势下，急于寻求与国大党的妥协，以便借以分化和瓦解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同甘地一起坐牢的甘地夫人此时病死狱中，这一消息激起国内外对英国当局的愤恨、掀起了要求释放印度政治犯的高潮。英国殖民当局也担心重病在身的甘地在狱中的不测事件，会引起印度人民群众更大的愤怒，而影响其在印度的统治。这些因素促使了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释放狱中的国大党领袖。1944 年 5 月 6 日，新上任的印度总督魏菲尔释放了 1942 年被捕的甘地和国大党的一些领袖。

国大党的活动又恢复了生机，在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反帝斗争的基础上，他们承担与英国政府谈判的角色，取得了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果实，为在印度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演出了历史的活剧。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印度革命高涨的形势日趋形成。在大战期间，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始终没有中止。1943—1944 年，印度国内发生了多次反对英国统治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仍然是自发的，英国当局镇压了这些运动。1944 年末到 1945 年初，印度国内局势非常紧张，新的反帝运动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形势。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都鼓舞着印度人民群众掀起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而结束。战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特别广大的规模。工人阶级、农民、

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都投入了这一运动。广大印度人民在战后，强烈要求自己国家独立，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英国殖民统治已岌岌可危。印度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已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形式。1945 年 11 月，加尔各答的工人和大学生拿起武器，直接反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们同英国警察和军队展开了巷战。加尔各答劳动人民的武装反英斗争被镇压下去了，但在其他城市如孟买、德里等都爆发了反英的武装斗争。

英国当局决定在这个紧张的时期，举行立法会议选举，以便借此削弱反帝运动。英帝国主义同时企图在选举时期煽动宗教狂热，以达到分裂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目的。国大党和共产党提出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反对把国家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争取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等口号。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的企图。国大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共产党员也得到了一些选票。可是印度的殖民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1946 年初，反英的气氛笼罩全国。军队中的骚动和起义，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起义首先在飞行员和机场机务人员中爆发了，接着从空军蔓延到海军。1946 年 2 月 19 日孟买地区舰队的水兵举行了起义。英国当局想用步兵来解除水兵的武装，这又引起了军队的骚动。

孟买的工人、市民、大学生同水兵汇合起来。有 20 多万人参加了罢工，许多人拿起武器与殖民者斗争，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武装冲突和巷战。英国殖民当局坐在火山口上，穷于应付。同时，海德拉巴和孟加拉农民起义的浪潮也风起云涌，激烈地开展起来。

在印度人民的反帝风暴的冲击下，英帝国主义感到，使印度永远处于殖民地地位是不可能的。英国所谓的铁的殖民管理制度，经不起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冲击，已处于瓦解的边缘。英国当局懂

得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统治印度的方式了。为了避免英国在印度利益的全部破产，保存住英国垄断资本的经济阵地，英国当局需要作出重大的让步。1946年2月19日，工党首相艾德礼宣布，决定派遣政府特使团到印度去。以印度事务大臣帕锡克·劳伦斯为首的特使团启程时，艾德礼宣布说："把过去的公式运用于目前的形势是没有用处的。1946年的气温，不是1920年、1930年、甚至1942年的气温"。[①]艾德礼声称，"如果印度根据自治领的权利留在英帝国范围内，不仅对英国，而且对印度都有利"。[②]

英国特使团于1946年3月第279页底到达印度，在4月间同印度各政党主要是国大党的代表举行了谈判。国大党的领袖们对艾德礼的声明表示欢迎。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未来的宪法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英国人建议国大党人组成临时政府。这就更引起了要求立即分裂国家的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印度的两大政党的领导者的意见分歧加深了。为此，特使团于1946年5月12日在西姆拉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建立印度教徒区和穆斯林区的计划，作为和解的基础。

1946年5月16日，特使团发表了英国政府的声明。提出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印度组成各省和土邦的联邦，获得自治领权利；省和土邦政府拥有广泛的自治权；立宪机关代表的选举，按宗教选举单位进行，各土邦的代表由王公指派。

同一天，印度总督魏菲尔在广播演说中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建议；印度教徒占40%的席位，候选人由国大党提出；伊斯兰教徒占40%席位，候选人由穆斯林联盟提出；其余20%的席位分配给锡克教徒、印度的基督教徒、不可接触者和波斯人。

---

① 萨拉夫：《印度社会》第330页。

② V·P·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伦敦1957年第234页。

经过会谈以后，国大党领袖们声明同意把特使团的建议作为制宪基础，拒绝参加临时政府的限制条件。穆斯林联盟的领导宣布它准备承担组织临时政府的责任。

在1946年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国大党获得192个席位，穆斯林70个，其他各党派获得11个，印度共产党得到1席，是孟加拉的代表。立宪会议代表主要是资本家，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1946年6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上，选举贾·尼赫鲁为国大党主席。7月间，印度总督魏菲尔以书面形式建议国大党主席组织临时政府。预定由印度总督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尼赫鲁担任副总理。在临时政府中国大党占6个席位，穆斯林联盟占5个席位，其他党派占3个席位。

穆斯林联盟的领导者拒绝参加临时政府，而要求展开建立巴基斯坦运动。他们宣布：1946年8月16日，为争取建立巴基斯坦的直接斗争日。规定在这一天在加尔各答举行示威游行。英国殖民者派遣奸细、警察来挑拨教徒之间纠纷，以转移群众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的视线。

伊斯兰教徒的游行者，在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者煽起的宗教狂热的支配下，开始捣毁印度教徒的一些商店和房屋。国大党领袖巴德尔则号召"以剑还剑"。为了进行报复，在"印度教大斋会"和其他一些印度教政党领导下的队伍，开始进攻穆斯林，双方发生了流血事件，约6000人死亡，2万人受伤。印度人民的血没有洒在反帝的战场上，而是流在自家兄弟的惨杀上，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他们为此拍手称快。

但是印度人民在走自己的路。在农民武装斗争和军队起义的同时，工人、学生、职员的斗争也进入了新高潮。劳动人民在战争结束后，生活更加困难。由于军事生产的缩减和停顿，许多工

人失业。工资降低了，劳动强度却增加了。日用品价格上涨，劳动人民的困难状况更加深起来。工人罢工的浪潮，战后一直处于高潮，1946 年举行了 1600 多次罢工，1947 年则有 1800 多次。约有 200 多万工人、职员参加了罢工。

农民运动也蔓延全国各省和各土邦。孟加拉的佃农要求把地租降低到收成的 1/3。农民运动不仅提出经济问题，而且提出社会改革问题，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地区，农民运动都是同民族问题和土邦的民主改革问题紧密相连的。他们要求取消邦政权，不这样就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喀拉拉邦的农民提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要求。农民运动不仅反封建势力，而且同民族运动密切联系，是反帝斗争的重要力量。

在印度革命史上，特仑甘纳的农民斗争占有显著的地位。海德拉巴是印度的一个多民族的土邦。这个地区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比其他土邦发展得更快。统治者依仗殖民当局的支持，肆无忌弹地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并公开实行没收处在饥饿状态中的农民粮食的政策。

农民的怒吼爆发了。1946 年举行了席卷 3 千个村庄有 500 万农民参加的特仑甘纳起义。农民赶走地主，占领了被地主掠夺去的土地。他们组织了武装自卫队，建立了人民政权委员会。特仑甘纳的农民游击队，英勇地打击了统治阶级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这次起义给予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及其走狗土邦王公与地主的打击非常沉重。这次起义从 1946 年到 1947 年持续了两年之久，在印度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6 年克什米尔的革命高潮，声势也很浩大。工人阶级，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提出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克什米尔滚出去!"的战斗口号，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土邦王公哈利·辛格。英国殖民当局和土邦政权以军警镇压群众，并没有摧

毁克什米尔人民的斗争精神。斯利那加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小业主关闭了商店，学生停止上课。人民拿起武装，和统治者战斗，城里到处发生巷战。农民在农村开展广泛的斗争，支持了城市工人的运动。直到 1947 年克什米尔的运动还没有平息。

印度的天空弥漫着起义的气氛。全国到处沸腾动荡。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开始动摇着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大大削弱，促使了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毛泽东主席指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和更加现实的道路。"①

印度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力量，是印度的工人农民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工农反帝反封建斗争规模如此强大，从根本上震动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在印度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阻止党去领导汹涌发展的人民反帝革命运动。迫使党去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把工农革命运动置于资产阶级领导之下。

受到沉重打击的英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再不允许印度独立，就会引起革命的爆发，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权益，将完全付之东流。英驻印英军参谋长伊斯梅说："1947 年 3 月的印度，像一艘在大洋中间正在烧燃的弹药船。当时的问题是这时最主要的是在火烧到弹药之前扑灭它。事实上在我们面前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做我们所已做的"。②

印度人民的革命运动、工人的罢工斗争，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城市群众的反帝斗争，暴风雨般地发展起来。殖民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它的实权已大大动摇。没有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样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0 页。

② 贝艾伦・坎普贝・约翰逊：《与蒙巴顿一同出使》的报道。

有影响的党派的合作，它无力对付运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英帝国主义采取极力拉拢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允许印度分割为两个自治领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统治，迫使印度在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度过了190年。现在印度将向何处去呢？

印度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印度的革命历程，需要印度人民自己的奋斗来达到目的地。

第十章　印度的独立

第一节　印巴分治与印度联邦自治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声势非常浩大。几乎所有工业部门和地区的工人、农民、职员、教师、学生都参加了运动。印度民族解放斗争规模和威力，使英帝国主义越来越恐慌。印度的王公和地主也惶恐不安。运动可能越出非暴力的范围，这也形成对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威胁。

国大党在战后的印度政治生活中，极为活跃，牢牢地掌握了印度政局的控制权。印度共产党和社会各党派，完全支持国大党的政治口号。这样，英帝国主义和国大党关于印度政权移交的交易就完全可以拍板了。由于资产阶级的鼓动宣传，印度的劳动者把成立临时政府看作是印度已经接近获得完全独立的胜利。国大党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是独占鳌头。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独立法案开始生效，即建立印度联邦自治领。英国认为在印度建立一个有主要政党支持的临时政府极为重要。国大党成为它的移交政权的对象。1946 年 7 月举行的立宪议会选举，在 296 个议席中，国大党控制了 211 个席位的绝大多数。国大党的这种支配地位，使真纳感到吃惊和不快。1946 年 7 月 29 日，穆斯林联盟决定撤销它对英国特使团计划的同意，而要用直接行动来建立巴基斯坦。

尼赫鲁组成了包括国大党提名的临时政府，在 1946 年 9 月 2 日就职。真纳拒绝同它合作。印度总督屈座迁就，继续和他谈判，

结果穆斯林联盟提名的5个人于1946年10月26日加入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中的国大党集团和联盟集团不能进行合作，而是把它做为争夺权利的场所。

穆斯林联盟加入临时政府后，仍坚持不肯参加制宪会议。英国政府为此组织的印度总督，国大党代表，穆斯林联盟代表等的伦敦谈判，仍没有达成协议。制宪会议于1946年12月7日在新德里召开第一次会议，穆斯林联盟没有参加。会议通过了尼赫鲁提出的关于宣布方针的主要决议，规定了印度将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共和国”的原则。

1947年1月，国大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与各王公谈判。国大党放弃了以前提出的各土邦代表必须民选的条件，同意50%由王公指派。穆斯林联盟却坚决拒绝和国大党合作。印度的政治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和尖锐。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于1947年2月20日，发表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声明，这个声明是不可捉摸，但却产生了他们预期的效果，声明宣称：“在不迟于1948年6月实行把权力转移给负责的印度人手里”。由于穆斯林联盟不参加制宪议会，致使英国政府“考虑英属印度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应该交给谁，届期不知是整个交给某种形式的英属印度中央政府呢？还是在某些地区交给现存的省政府，还是用另外看来最合理而且最有利于印度人民的什么办法进行移交。”[1]这一份绝妙的文件，公开鼓吹印度的分裂，支持巴基斯坦的建立，使本来已经复杂化的印度局势，更加处于纠乱纷争之中。

穆斯林联盟的领导权掌握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手里。伊斯兰教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同英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帝国

① 见《印度通史》第4册第1090页。

主义利用穆斯林集团的支持，进行反印度教的活动，以宗教纠纷来冲淡和瓦解反对英国统治的印度人民的统一斗争。在20年代，真纳进入穆斯林联盟领导集团后，很快成为这个宗教组织中决策人物。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出生于卡拉奇的一个古吉拉特族伊斯兰教徒商人的家里。他曾在英国受过法学教育，和老一代国大党人士有密切联系。他曾长期担任国大党创始人之一达达拜·瑙罗治的秘书，1921年他本人也成为国大党党员。这时他代表那些和国大党人站在一起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观点。他们只是殖民政府的反对派，同样反对一切争取自治的群众性的斗争方式。英国帝国主义极力扶持和利用宗教政党团体的力量和作用，达到其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在几次圆桌会议中，英国都是作为一个重要政党，邀请穆斯林联盟代表参加，对它极为重视。在这几次圆桌会议上，穆斯林联盟代表很容易地与不可接触者的代表、英印混血种和印度基督教徒的代表达成协议，把宗教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尼赫鲁曾明确地说过："政治反动势力阻碍了一切进步而将它自己隐藏在教派问题的后面"。①

战前，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宗教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减弱。穆斯林群众的反帝情绪同时增长，1937年4月1日总罢业时，穆斯林不顾真纳的禁止，积极参加了总罢业。穆斯林联盟也不得不在1933年10月的勒克瑙会议上，首次宣布"赞成印度完全的民族和民主自治"。②同时，穆斯林联盟的领导集团，扩大了对有产阶级的影响。他们促使"农民大会党"与穆斯林联盟合并。旁遮普的统一党、联合省的国家农民党等也加入了穆斯林联盟。穆斯林联盟的领袖利用穆斯林群众的宗教偏见，来加深

---

① 《尼赫鲁自传》第333页。

② 引自C·W斯密士《印度的现代伊斯兰教》第250页，伦敦1946年版。

宗教团体纠纷，并提出印度教徒民族和伊斯兰教徒民族的两个民族的“学说”，断言国大党是印度教徒的政党，而穆斯林联盟是伊斯兰教徒的政党。穆斯林联盟经常攻击国大党，指责国大党的活动是为了反对穆斯林。声明如果不保障穆斯林的权利，印度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两个国家。当然，这些活动是和英国的支持分不开的。尼赫鲁曾指明：“英国官员想利用穆斯林联盟和其他一切破坏力量，以图削弱国大党的影响”。[①] 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穆斯林来扩大自己党的队伍，利用他们的反帝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帝国主义一方面推行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矛盾纠纷尖锐化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袒护穆斯林联盟而把责任推到印度教徒身上。在英国殖民者的挑唆指使下，“印度教大斋会”、“民族服务联盟”以及其他反动的印度教团体也展开了反宣传。宗教冲突成为非常频繁的现象，冲突也具有公开的政治性质。

1947 年 3 月，蒙巴顿继魏菲尔担任印度总督。6 月 3 日他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一个解决印度政治问题的宣言。根据这个宣言印度被分割为两个国家，印度包括联合省、比哈尔、中央省、阿萨姆、奥里萨、马德拉斯和孟买；巴基斯坦由东西分散的两部分构成，东巴基斯坦由孟加拉省的大部分和阿萨姆的一个区组成，西巴基斯坦由西旁遮普、信德、西北边省和俾路支斯坦等省份组成。印度两个最重要的省份，孟加拉和旁遮普分别划归两个国家。划分是按宗教信仰进行的，大多数信奉印度教的居民归入印度，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加入巴基斯坦。有些地区如克什米尔则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归属。土邦有权决定加入那一个自治领，如果不愿意加入任何自治领，可以保持同英国旧有的关系。

---

① 《尼赫鲁自传》第 694 页。

英国政府分裂印度的蒙巴顿方案，遭到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普通成员的反对。但是国大党的领导者却认为必须接受这个方案。穆斯林联盟的领导者表示接受这一方案，但同时要求把整个孟加拉整个旁遮普都划归巴基斯坦版图。

6月间，开始划分孟加拉和旁遮普的活动。在两省的立法议会关于分治的表决中，因在两个不同教徒议员的小组中分别表决，而且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如果一组赞成分治，即使另一组反对，也要求实行分治。分治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孟加拉分裂以后，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教大斋会"的反动分子，展开了印度教徒迁出巴基斯坦的宣传。有些地方开始了仇杀，印度教徒手工业者和农民蒙受了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印度教徒地主资产阶级也受到物资损失。大批印度教徒难民由东孟加拉逃到加尔各答，更增加了政局动荡的印度的困难。

在旁遮普准备分治时，穆斯林联盟疯狂地展开了加入巴基斯坦的宣传，而锡克教徒和印度教的教派组织又进行反对并入巴基斯坦的激烈宣传，双方的敌对情绪加深。群众被吸引而离开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悲惨的是，由于英国的奸细和当地反动分子的挑拨离间，在分裂旁遮普时发生了印度空前未有的流血冲突和仇杀。50多万人丧生，大量的物质财富遭到毁坏，丧失亲人和无家可归者达到1200万人。由于仇杀，拉合尔、阿姆利则、拉瓦尔品第和木尔坦等地的许多市区全被毁坏。劳动人民流离失所。1947年8月和9月，仅两个月的时间，由巴基斯坦逃往印度联邦，和由印度逃往巴基斯坦的难民人数，即达到200万人。

一个事件的目击者，作了这样的讲述："8、9、10和11月是旁遮普历史上灾难的月份，也许是全体印度人民历史上的灾难的月份。任何一个（甚至一群）历史家都不能完全估计到分裂给几

百万无辜的人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所带来的空前灾难。旁遮普，西北边省和信德经历了人类文明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恐怖。人们有时候被迫真正名副其实地吃自己亲人的肉，喝自己亲人的血”。作者在讲述拉合尔的惨状时接着写道：“1947年8月开始了恐怖世界。拉合尔变成了一座死城。从1947年8月12日起，这座居住着和平的居民，拥有二十所高等学校和几十所中小学，拥有许多宫殿和公园，拥有工业企业和手工业者街区的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墓地和恐怖与死亡的世界。人们的活动和外界的联系像魔术一般突然停止了。有一个时候，火车站变成了战场，那里的伊斯兰教徒职员杀死了他们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伙伴，那里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居民与想杀死他们的伊斯兰教徒流氓展开了搏斗，那里的俾路支团的士兵和罗哥尔团的士兵互相射击。”①

互相残杀的事件蔓延全国。旁遮普的冲突和仇杀引起了德里的城市和地区，以及拉吉普坦各土邦的报复行动。愤怒的难民对西北部各地区无辜的伊斯兰教徒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进行报复。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穆斯林联盟成立的军事化组织穆斯林民族近卫军，屠杀了在8、9月未及逃走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国大党和“印度教大斋会”的领导者们也发表了反穆斯林的言论来鼓励印度教徒对伊斯兰教的仇杀。印度分治前后，发生了教派互相残杀的事件，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流血，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00万人被杀，400万人受伤，2500万人遭受物质破坏。结果是尸体遍地，难民络绎不绝，生计断绝，流落街头。仇杀的大破坏和难民的云集，使印度和巴基斯坦本来就很困难的粮食供应

① M·S·法尔阿纳皮莱：《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是两个民族吗?》第21—22页，科达卡纳尔1948年版。

状况更加恶化。

英帝国主义者感觉到，印度早就存在着的革命风暴终将席卷殖民主义的一切特权。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默许、支持下，迅速地把蒙巴顿方案付诸实施。1947 年 7 月，蒙巴顿方案被英国议会匆匆忙忙地通过，它受到所有英国政党的支持，这个方案的主要特征是将印度分割为两个自治领，英国将以最快的速度实施这个方案。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被分为两部分，同时分别成立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国家。在英帝国范围内形成两个新的自治领。通过帝国主义的实行宪政的阴谋，英帝国主义退居幕后，蒙骗印度人民接受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印巴分治，是英帝国主义给印度历史留下的不可治愈的伤痕，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英帝国主义一直吹嘘它在印度的统治有助于其政治统一，印度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也卑躬地吹捧在英国统治的最高权力下，印度国家的政治统一。现在真相大白于天下，分而治之是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一贯政策，印巴分治则使这种政策达到了高峰。

英国工党分子把印度的分治，称颂为“不流血革命”。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巴德尔等把印度自治作为英国的恩赐，当作无比光荣和不流血的革命而吹捧，穆斯林联盟的领导更是欢喜若狂，对英帝国主义感激涕零。可是为了分治而引起的残杀，夺去了印度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这比任何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以及保持印度完整统一的革命战争所可能经受的牺牲都要大得多！“非暴力运动”、“不流血的革命”等等，成为印度历史上绝妙的讽刺。

1947 年的印度自治说明什么呢？历史已经证明，现代任何殖民地国家，为了取得真正独立，必须结束帝国主义对人民的掠夺，打破和根除它们对社会结构的控制，消除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和

其他劳动人民的压榨，根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这些任务不完成，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在印度的整个反帝斗争中，人民群众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甘地和国大党的领导者则以“非暴力运动”来束缚人民的手脚。他们主张工人和农民只能乞求帝国主义的善心，以求减少身受的苦痛，麻痹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斗志。当敌人屠杀印度人民时，他们便宣传要用爱、人道主义和非暴力的信条对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把人民限制在这条路线上，以便敌人垄断暴力。他们一面为帝国主义者的暴力辩护，一面给斗争的人民开出手工纺织的药方，使他们脱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抑制群众的主动精神和革命斗志。人民斗争一超出殖民当局规定的范围，他们就立即进行劝导和阻挠。

长时间以来，英帝国主义教育下的印度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附庸。他们的成功在于人民的不觉醒。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等和印共机会主义分子正是在这个实质问题上帮了帝国主义忙。英国授予印度的“独立”，是一个欺骗人民的政治手段，只是导致了上层建筑的某些变化，而未影响印度社会基础的改造。印度人民群众依旧遭受着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巴分治的手续已告结束。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在印度建立起来，即印度和巴基斯坦，每一个自治领有一个总督。蒙巴顿留任为印度的总督，只是不再称为副王，而英国国王则成为印度的国王，国王任命总督。总督是自治领的实际统治者。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各地区的划分，是按宗教原则进行的。巴基斯坦由东西两部组成，这两个地区为印度联邦的领土相互隔开。在划分时，丝毫没有注意地理、经济、民族和文化的联系，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印度分裂后，英国立刻开始挑拨印巴之间的冲突，

在许多问题上，包括财产、铁路、国营企业，存款和债务等方面，发生了摩擦，进而演变成军事冲突。尽管有大批难民逃走，但是建立清一色的宗教成分的国家的目的并未能实现。在印度仍留下了 3500 多万伊斯兰教徒，而在巴基斯坦留下的印度教徒也达 1200 万人。

印巴分治造成经济资源分布的极端不平衡，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受到了削弱。巴基斯坦成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矿藏资源也很贫乏。工业比重大大低于印度，划归巴基斯坦的加工工业企业不过 10%，其中大企业都属于印度资本。重工业几乎完全没有，仅有几家水泥厂和铁路工厂。巴基斯坦在农业原料和粮食方面则较印度有利。这种人为的分治，破坏了两个国家的经济，破坏了早已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全部黄麻工业和几乎全部棉纺织业都留在印度，可是，出产黄麻和长纤维棉花地区都划归了巴基斯坦。

印度获得了自治领地位，接着以后获得了独立，英国结束了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资产阶级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印度和世界各国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英国给予“有色”殖民地以自治领地位。在英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机的加深，同时也向印度人民提出了维护民族独立，发展国民经济，消除国内封建残余的历史新任务。正如尼赫鲁 8 月 14 日夜在印度制宪会议上庄严宣告的：“很多年以前，我们曾发誓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到了我们实现誓言的时候了，虽不是完全实现，也是基本上实现。在夜半钟声敲响之际，当世界还在酣睡中，印度即将醒着迎接生活和自由。”“一代之不幸，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①] 印度的独立，结束了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统治，开辟了印度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它

① 尼赫鲁：《独立和独立以后，1946—1949 年演说集》第 3—4 页，新德里 1949 年版。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重大事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的结果。印度的独立是印度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点。印度从此开始走上政治逐步独立，外交方面逐步实行自主，经济上发展民族工业，取消土邦，实行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道路。

第二节　印度共和国的成立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取得了独立，印度历史走上了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英国在将近 200 年的漫长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纠纷复杂的现实政治、经济又给印度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长期统治决定了印度经济的落后性，印度成为英国的农业原料的附属国。整个经济部门都处于对英国资本完全依属的地位。第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头几年，英国资本主要是通过贸易的途径，急剧地侵入印度。英国在印度入口中的比重扩大了两倍，在出口中的比重扩大了一倍。印度独立后，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在印度经济中仍占绝对的优势，控制着印度的经济命脉，在一些重要经济部门他们占有着绝大的比重。对外贸易也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里，90%以上的外贸货物是由英国船只装运。外国垄断组织从印度继续榨取了巨额利润，其中大部分都运出了印度。外国垄断组织千方百计地阻止印度工业的独立发展。

印度的农业也是处在落后的状态，在印度获得独立后，封建残余的势力在国内仍然十分顽固，70%的耕地被地主占有，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他们被迫在以 1/2 或大部分收成作为地租的条件下去租种土地。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束缚，生产力低下，粮食

不足，印度人民经常遭受饥饿的苦难。

印度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是十分困难。英国人把印度分裂成两个自治领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两部分之间散布纠纷，制造矛盾，借此尽可能在这两个国家里延长英国的统治。印度分裂后，造成了印度接踵而来的困难。首先是难民这个问题的沉重负担，因而带来动荡不定的政局。在 1947 年短短数月的过程里，有 470 万人从西巴基斯坦迁入印度，有 250 万人从东巴基斯坦流回印度，而由印度逃往巴基斯坦的也达 400 万人。无论是印度或巴基斯坦，每年都要花费巨额资金来安置那些失去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难民。印度政府采取了修筑难民营，供应他们饮食和为他们安排工作的措施。尽管难民的生活特别低下，只是简单地苟延生命，但这也给印度的财政支出造成了额外的负担。同样，印度并未能完全解决安置这 900 万无家可归的难民问题。英国资产阶级舆论就曾指出："这次移民规模之大，是文明世界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它造成了经济紊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1] 大批难民流落街头，栖息在帐蓬或露宿，无计度生，行乞、偷盗和抢劫，成为印度多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1947 年秋，在英国的煽动下，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土邦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继而双方爆发了战争。英国极为重视这个土邦的战略基地的重要地位。蒙巴顿曾以"休养"的名义亲自到克什米尔活动，以便影响和控制克什米尔。他劝说和威胁克什米尔的马哈罗阇："用一切方法表现当地人民的意志，加入两个自治领中的一个"。[2] 克什米尔 3/4 的居民是伊斯兰教徒，根据蒙巴顿的见解，作为穆斯林国家的居民加入巴基斯坦。但是，克什

---

① 《英国和东方》伦敦 1945 年 8 月第 36 页。

② A·海勒：《分治以来的印度》第 56 页。

米尔的马哈罗阇没有立即执行总督的建议，因为他信仰印度教，同时他在经济上与印度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甘地也到克什米尔活动，在他的促使下，克什米尔马哈罗阇于1947年9月29日释放了1940年夏逮捕的克什米尔的资产阶级国民议会的领袖萨赫·阿布杜拉。英国帝国主义者唯恐克什米尔不乱，决定采取直接军事行动。1947年10月22日，阿福利德、互济尔和马赫苏德部落的几万部队，从西北边省侵入克什米尔，军事进攻得到了当时的西北边省督英国的乔治·肯宁汉的支持。10月26日这支军队进抵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附近。马哈罗阇逃往査谟，国民会议组织了义勇队，进行抵抗。10月27日印度一批军队从德里空运到斯利那加，这支军队开始压迫部落的部队。同时，巴基斯坦的正规军队也开进了克什米尔，印巴持久的互相残杀的战争开始了，英国则是策划者和操纵指挥者，这次流血战争的印巴双方的最高总司令当时都是英国将军奥金列克。1947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任命英国将军罗伊·比尤克尔为印度联邦的总司令；英国将军杜格拉斯·格莱西为巴基斯坦的总司令，双方更可放手撕杀，战争继续进行。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插手克什米尔问题，在联合国调查团的活动下，双方停火，印度联邦政府下达了在克什米尔的印度军队停火的命令。自1949年1月1日起停战协定生效。停火线是以当时实际控制线为界。印度占据了克什米尔约3/5的地区，人口约400万；巴基斯坦控制了西部2/5的面积，人口约100万。这次战争给双方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人员伤亡，财物消耗。克什米尔战争使印度每周需要支出10万以上的英镑。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决定举行克什米尔的全民投票，决定其归属问题，但在帝国主义者的影响下，印巴各自提出自卫的要求，克什米尔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除了克什米尔问题以外，印巴双方还有许多争执的问题；各

地区不同教徒的地位问题，河水上下流灌溉渠的水利问题，难民的财产问题等等．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姊妹国家的关系特别紧张。

印巴彼此敌对，既有利于帝国主义，也为反动的宗教组织所利用。当甘地访问继续流血仇杀的地区，以他的非暴力主张排解纠纷时，遭到谋杀，1948 年 1 月 30 日，正在为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宗教仇杀而奔走呼号的甘地被刺身死。凶手被捕获，他原来是“印度教大斋会”的成员，是普纳出版的党报编辑。“印度教大斋会”和“民族服务联盟”一样，是极为反动的教派主义的组织。他们刺杀甘地的目的是由于他们对甘地提出的教派纠纷中的非暴力主张不满，而极力主张教派仇杀。同时打算把刺死甘地的罪行转嫁给伊斯兰教徒，煽起宗教敌对，加深对巴基斯坦的仇恨。刺死甘地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引起了甘地信徒们的极大愤怒，他们开始摧毁“印度教大斋会”和“民族服务联盟”的房舍，甚至杀死它们的成员，使印度社会更加呈现混乱状态。1948 年 2 月初，印度联邦政府禁止了“民族服务联盟”的活动；“印度教大斋会”的领导人也声明，他们的党，已停止政治活动，将从事研究文化教育问题。刺杀甘地的凶手被判处死刑。尽管如此，印度的复杂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仍图采取一切措施，来保留自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统治和权益。印度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后，却仍继承了旧的国家制度，首先是保留了总督的几乎是没有限制的权力，国内人民群众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卡斯特制度和种姓的分离状态，依然如旧。

英国将军们仍然是印度空军和海军的首领。印度国家仍然处在不列颠君权统治之下。在印度国会大厦上仍飘扬着英国的国旗。1947 年英国给予印度的某些自治权利是虚幻的，徒具形式的。

关于各民族的发展问题，也是独立后的印度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不彻底改革旧日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按语言原则建省，并给予各省以自治权。1948 年 12 月在斋浦尔举行的国大党的会议上，成立了行政制度改组委员会，西达拉马亚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尼赫鲁和巴德尔等为委员。但是，委员会认为成立民族省会加深分裂主义的倾向，而延缓民族省问题的解决。

印度人民和联邦政府面临着复杂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特别是当自治领的土地上仍驻有英国军队的时候，还谈不上国家的完全的政治独立。印度人民不能容忍这种损害印度人民民族利益的现象继续下去。联邦政府正是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威力，迫使英国政府撤离了驻军，1948 年 2 月 28 日，驻在印度的最后一批英国军队在孟买乘船离境。

1948 年 6 月 21 日，国大党的领袖之一，印度人拉贾戈帕恰雷，接替了英国人蒙巴顿担任印度自治领的总督。这是近二百年来，印度国家政治生活中第一次由本国人任国家首脑，英国帝国主义者结束了在印度称孤道寡的殖民者的主宰地位。

1948 年 8 月 25 日，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总理的国大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政治上的独立，引起了印度人民大众的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希望。刚刚独立的印度，国家遇到了许多经济困难，这是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的严重后果和独立后执政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意图所造成的。

独立后的印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问题。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印度资产阶级也很关心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不解决，国内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可能获得发展，可是他们又害怕土地革命。农业极端严重的落后状况。农

民的悲惨处境，以及国内粮食的严重不足，等等，一系列的燃眉问题，迫使尼赫鲁政府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为了消除国内的饥荒，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还在1947年，新自治领的印度就不得不实行固定的谷物价格和配给制度，对粮食收购和分配实行了监督。这些临时救急的措施，并没有解决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

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农业方面没有实行过任何重大的改革。政府只规定了如下的任务：在国家的帮助下，如供给肥料、新农具等提高现有土地面积的收获量；开垦荒地；建造灌溉设备等。显然，这些微小的改造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农民群众进行了争取土地、争取大量缩减地租、反对被赶出土地和反对高利贷剥削的斗争。马德拉斯省农民运动尤为激烈，一连几年遭受歉收和饥荒的农民。要求把缴纳地主的地租由原来的收成的一半降到1/3，并要求取消其他一些中世纪的剥削。农业工人在农民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比哈尔的农业工人展开了积极的罢工斗争，孟加拉的农业工人同农民一起行动，举行政治罢工。联合省的农业工人于1948年同卡拉格普尔区的1500多名雇农，为贴补低微的工资而斗争，宣布将土地收为他们所有。1950年初，联合省召开贫农雇农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有2万5千农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闭幕式。在1949年内，在印度中央省、联合省和其他省的许多地区，发生了农民反对地主压迫的起义，在半年时间内，联合省就发生了地方性的农民起义2057次之多。

印度独立后，联邦政府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利益，限制外国资本的竞争，却并没有抵制外国资本。印度政府规定：外国投资必须在有印度拥有规定数量的股票和对生产的有效监督权的条件下进行，企业中必须训练印度技术专家以逐渐取代外国人。国大党

政府还提出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的主张，主要在军事工业、铁路和水路交通业有所进展。1950年前，政府建立了机车制造厂、机床制造厂和化肥厂等企业。印度独立后工业有所发展，煤、钢、铁、电力的生产都有了增长。

印度工人阶级的处境依然没有改善。外国资本的压迫依旧惨重。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印度政府采取了改良和镇压的两手策略。1948年印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劳动立法：把童工的最低年龄从殖民地年代的12岁提高到14岁；规定工时为每天9小时，每周48小时，比1934年工厂法规定的每天10小时每周54小时，是前进了一步。通过了工人和职员国家保险法，规定了疾病、妊娠和生产伤亡事故保险，经费来源主要从工人职员工资中扣除；还通过了最低限度工资法。这些法律只是很小一部分付诸实施。

同时，印度政府也制定了若干限制和镇压人民的法律。1948年2月，印度议会通过禁止国营企业和机关（包括铁路和邮电企业）的工人和职员举行罢工。同时，在印度全国实行《社会治安保护法》，授权警官无需拘票即有权逮捕任何正在或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人。接着，印度当局于3、4月份在全国许多省份搜查了共产党和左翼工会机关，实行大逮捕，政府并以反对共产主义的藉口，压制打击任何对政府不满的行为。当局可根据《社会治安保护法》第4条，对任何敢于批评政府的报纸予以查封或处罚。

印度独立后，殖民主义势力的严重存在和大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压榨，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要求未得到满足，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的实际工资远落后于战前水平。外国资本家和印度资产阶级依靠压榨工人而获取巨额利润，生活费用的指数不断上涨。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则是连续不断。1948年在印度发生了1634次经济罢工。参加罢工人数150余万，1949年发生了926次罢工，损失了660万个劳动日。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也不断

发展，为争取国家民主化而斗争。

人民群众的斗争，推动了印度国家政权的建设和巩固独立的进展。印度独立后，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保证国家沿着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于1948—1949年期间即着手准备实行新宪法。1949年11月26日印度立宪会议通过了《印度宪法》，新宪法宣布印度为独立的共和国。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生效。这一天定为印度共和国成立日，自1930年以来，1月26日一直被认为是国大党所制定的“独立日”。立宪会议同时宣布，1949年5月17日所通过的印度加入“英联邦”的决议仍然有效。

宪法宣告印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虽然，根据1949年4月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的决定以及后来印度议会的批准，印度仍然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但是，在宪法条文中未载入关于承认英王是英联邦统一的象征的保留条件，也根本未提印度和英帝国的关系问题，宪法表明：印度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950年的印度宪法，是在人民群众反帝运动高涨的条件下通过的。这个宪法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了普遍选举权，全体公民不分宗教，种族性别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平等自由。宪法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不得根据宗教、人种、世袭阶级、性别、家世、出生地点、住所或语言等理由而取消此种权利或予以歧视。宪法还规定人民有言论、思想、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禁止种族种姓歧视，废除并禁止在任何方式下实行“贱民制”，违者依法惩处。宪法规定“在印度领土内，国家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法律上之平等，或法律上之平等保护。”[1] 这些规定在后来并未真正付诸实施，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宪法的

① 见《印度宪法》，世界知识社1951年版。

民主精神，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在国家法权方面，宪法规定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权属于人民院和联邦院组成的全印立法议会。总统由从两院议员和各邦立法议会议员选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任期5年。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统又是印度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在议会两次会议之间可以颁布和废除法律，停止宪法生效。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推荐任命中央政府各部部长，以及从各邦立法议会提出的候选人中委派邦的首席部长和邦君。由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内阁，执行国家职务。议会则由总统、联邦院及人民院组成。联邦院议员由各邦及各省立法机关选出，每两年改选1/3，共有议员250人，其中12人由总统在文学、艺术、科学或社会活动方面有专门知识或实际经验的人中直接任命。人民院议员不得超过500人，由全国所有成年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议员每5年改选一次。一切法案须由两院批准才能生效。这样的政治制度，大致和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中议会制度相似。

宪法规定了印度在行政方面包括28个邦，分为三类，即归日的英属印度各省、归日的大土邦和土邦联盟与归日英属印度专员管辖的一些土邦。前两类拥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权，后一类行政权利由总统任命的官员行使。归日的行政区划被保留下来，各邦邦界基本上和英国统治时相同，没有成立民族邦。这种行政划分是殖民地时期的残余，不适合于印度各族人民的分布，阻碍印度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直到1956年1月，印度政府才决定改变印度的行政区划。

宪法宣布英语仍是国会的主要语言，即官方语言，因为英语是唯一的来自各邦的所有代表都能听懂的语言。宪法规定印地语为印度国语，1965年以后印地语作为正式共同语言。议会有权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期限再延长15年。

宪法规定，印度是各邦的联邦。所有有关财政、国防、外交政策、国内安全等问题都归共和国中央政府管辖，加强了中央集权。

印度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一样，宣布私有制应加以保护和巩固。宪法第七章财产权第三十一条明文规定："如果法律未规定对私有财产的补偿，如果未规定补偿额或未指明确定和支付补偿金时所应遵守的原则和方法，那么，任何私有财产（动产或不动产），包括任何公司、商业或工业企业的投资，一律不得为了公用的目的而占有或收购"[①]私有制的不可侵犯，在印度宪法里特别明确，这是印度独立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最明显的标志，它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作为一部维护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宪法，其中有许多条文大大限制了人民的权力。例如第352条规定："如总统认为有严重紧急状态之存在，不论系由战争或外来侵略或内部骚乱，致威胁印度或其领土一部之安全时，得作紧急状态之宣告"。在"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可以颁布法律限制民主权利的使用。这就为印度政府滥用职权，禁止人民行使民主权利镇压人民，提供了法律根据。

1950年1月26日，即1930年定为"独立日"的这一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印度联邦共和国宪法颁布及宣布印度联邦共和国成立典礼"，正式宣布印度共和国成立。立宪会议选举了国大党最老的领袖之一的拉金德拉·普拉沙德为共和国总统，当天他宣布就任总统。总统任命贾·尼赫鲁为政府总理，并兼外交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赫鲁是国大党的实际领袖，也是印度政府的实际上的领导人。印度的国家大权实际上是由以尼赫

① L·S·萨斯特里：《印度宪法》第23页，阿拉哈巴德版。

鲁总理为首的印度内阁掌握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共产党有所发展。印度宣布独立时，印共领导权掌握在约希集团手中，他们继续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对于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政府，约希宣称，“全心全意地热情地拥护它们并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是我们全体的责任。”印共领导人既迷信甘地，也迷信尼赫鲁，称尼赫鲁是“人民的喉舌”，希望他成为“引导印度走上社会主义和富强之路的第一位总理。”他们不支持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甚至缄口不提“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1947年12月印共中央全会上，约希的投降主义路线受到了批判。1948年2—3月，印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集中批判了党中央在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时期所犯的错误。表现在，战时在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党中央没有负起暴露帝国主义与它作斗争的责任；对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斗争重视不够；同时忽视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和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反而作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大会选举了以兰那地夫为总书记的新领导。但印共新领导并没有执行正确路线，他们在报告和决议中不提正在开展的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极力缩小其政治意义。他们鼓吹左倾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不加区别地对待一切资产阶级，认为二战后各国资产阶级统统“公开参加反动的和帝国主义的阵营”。[①] 认为“民主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了”。[②] 实际上是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甚至喊出了“现在就起来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极左口号正好给了当局一个镇压党组织的口实。印共二大闭幕半月后，西孟加拉邦政府即宣布禁止共产党活动。随后迈索尔、印多尔等几

① 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印度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综述》1948年3月。

② 兰那地夫：《关于政治提纲草案的初次报告》1948年2月。

个邦也宣布印共非法。到 1948 年底，一些印共领导人相继被捕。印共的组织和它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

印共领导的“左”倾错误路线给印度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它使党逐渐孤立于群众之外，在政府镇压面前党毫无抵抗能力。印共原决定于 1948 年 3 月 9 日举行全国铁路工人罢工，但未得到群众响应而完全陷于失败。事实上，一直到 1950 年 5 月，印共在城市中并没有发动过任何略具规模的群众斗争，只是鼓动党员个别或成群地进行恐怖活动和要求狱中同志进行不断的绝食斗争，这是十分无力的。由于二大后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以后，“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又很盛行。印度共产党在争取印度的独立的斗争中，在每一个决定性的关头，都支持印度资产阶级的领导，将印度的独立，视为“英国移交权力”。在印共给英国内阁使团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认为最好的途径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就在政府中的权力均等问题和给各少数民族以适当代表的问题达成协议”。[①] 把一切国家政治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政党，印共把印度资产阶级看成反帝的领导力量，缩少农民作为印度革命基本力量的作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印共的路线，大大地失去了群众的信任，降低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1948 年—1950 年间，印度共产党员人数显著地减少，由 1948 年的 9 万人降到 1951 年初的 2 万 5 千人。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全印工会大会会员，由 80 万人减至 18 万，各地农民协会，实际上大部分已经消散。印度共产党把反帝斗争的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使印度革命蒙受损失。印度共和国的成立，由资产阶级决定了它的性质，同样资产阶级也决定了它的发展道路。

---

① 萨拉夫：《印度社会》（附录一）第 509 页。

第三节 印度独立后政治状况与经济发展

随着印度共和国的成立，印度政府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重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日益引起印度人民的严重不安。印巴的分治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相反，由于分治的纠争，两国关系更加紧张。1950 年春，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发生了流血冲突。逃出东孟加拉的印度教徒难民日益增加，1950 年 3 月底，每天多达 2 万人。难民问题给印度增加了极大困难，带来了社会上的动荡不定，因而也加深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1950 年夏，印度同巴基斯坦发生了边界事件，克什米尔境内双方的军事冲突尤为激烈。印巴分治的恶果，给印度带来了一时难以治愈的严重伤痕。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长时间的恶化，必然严重地影响印度国内政治形势。

印度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在独立后没有什么变化，生活条件却比战前时期恶化了。印度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政策与英国殖民政策是相同的。1950 年 3 月，东印度铁路和阿萨姆铁路工人和职员举行罢工，1950 年的“五一”节时期，印度工人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群众性运动。印度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对工农群众的迫害并没有停止。1950 年 2 月 25 日，印度议会根据国大党领袖巴德尔的提议，通过了“预防拘留法”，依此可以逮捕和不经审判而关押 1 年以下的有可能妨害国防、对外关系和社会秩序等嫌疑的人。这项法律明显地和 1 个月前刚通过的印度宪法的规定相违背，印度宪法规定凡是在监狱关押 3 个月以上未经审判的一切政治犯都必须重新审理。可见印度政府在镇压群众运动方面已不择手段了。

1951年底到1952年初，根据印度宪法，印度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普选。选举前夕为了装饰民主，印度政府从狱中释放一批印度共产党人，但狱中仍关押2千多名，而且还时常发生新的逮捕事件。在印度9个主要党派中[①]，共产党也登记参加全印议会的选举。每一个候选人应当缴纳1千卢比的保证金，这对工农群众来说是难以支付的，如果候选人获得的票数少于当选人票数的1/3，不得领回保证金，真正的民主选举又怎么谈得上呢！

在普选中，应当选出全印议会人民院和22个邦立法议会的议员，除了当时处于冲突中的克什米尔和没有立法议会的5个小邦外，印度的所有邦都进行了选举。国大党对所有席位提出了自己的全部候选人。国大党的候选人对选民发表演说时说，他们的党用非暴力方法取得了国家的民族独立，然后又允诺用同样的方法解决印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显然是欺骗，以非暴力的手段肯定是维持不了印度资产阶级的统治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进一步控制了国大党。1951年在普选前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撤换了普鲁沿塔姆达斯·坦顿的主席职务，他是瓦拉巴伊·巴德尔的拥护者。他所领导的右翼反对派在印度政府和国大党的领导机关中有很大势力。1950年巴德尔死后，坦顿的地位开始不大稳定。国大党选举尼赫鲁为主席，明显地巩固了尼赫鲁及其拥护者的地位，从而也加强了国大党在普选中的地位。在这次竞选中，尼赫鲁乘飞机和其他交通工具旅行了1.8万多英里。[②]为国大党拉票而奔波，极力宣传投国大党候选人的票。

---

① 这九个主要党派是：国大党、共产党、社会党、农工党、印度教大斋会、人民协会、康乐协会、低级种姓联盟、独立人士等。

② 1英里＝3.219华里

印度的社会党和农工党等也展开了紧张的竞选活动。竞选的角斗错综复杂，除国大党分化出一些争权夺利的派别外，农工党和社会党也分化出一些派别投靠到国大党和共产党。"印度教大斋会"等教派组织，这时也死灰复燃，乘机积极活动起来，它们宣传对伊斯兰教教徒的仇恨，要求在印度教徒的政权下"恢复印度的统一"。他们主要是在难民方面拉选票。利用宗教纠纷而达到他们的目的。印度共产党也加紧进行了竟选活动，他们的竞选纲领是实行土地改革，印度退出英联邦，废除预防监禁法和恢复公民自由等，并声明准备同主张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和在印度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的任何政党，尤其是国大党结成竟选联盟。

普选从1951年10月25日开始，1952年2月24日结束。参加人民院选举投票的选民占总数61%，参加邦立法会议选举投票的占59%。在许多地区，选举变成了争取土地改革，提高生活水平，争取公民自由和争取按民族特点建邦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广大印度人民群众关心这些问题比选举更为迫切，数百万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产阶层参加了这个运动。

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选举结果表明，它获得选票总数的44.5%，在人民院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占74.3%，在邦立法会议获得22个邦中的18个邦的绝大多数席位。这表明，国大党在印度有很大影响，执政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印度共产党在印度南部有些影响，但在比哈尔、中央邦、北方邦、索拉什特拉邦、拉贾斯坦邦等地区，他们提出110个候选人，结果连一个也没有当选。在印度工人运动最大的中心孟买，共产党在选举中也没有获胜。印共只处于议会中的反对党的地位了。

印度政府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中，关于各土邦的问题尤为突出。英国统治时期，印度存在着大小不等的560多个土邦，在印

度分治以前，英帝国主义者特别注意对土邦的控制权，在克什米尔、海德拉巴、迈索尔和特拉凡哥尔等建立了军事基地和飞机场网。蒙巴顿方案给印度各土邦以自行决定加入印巴自治领或者与英国保持旧有关系的权利。这是英国分裂印度的阴谋最充分的暴露。印度政府是力图使这些土邦加入自治领，在行政上服从印度联邦。印度政府极力要把土邦的势力统一起来。它不承认“在印度的任何土邦有宣布独立、并脱离印度的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的权利。”它要求各王公使他们的土邦成为“印度联邦中的民主单位，从而为他们自己的人民和印度这个整体事业而服务。”[①] 国大党政府对土邦王公作出某些让步，以换取土邦加入印度联邦，条件是王公仍保有自己的财产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在制宪会议中，土邦的代表一半由王公任命，一半由民意选举。这些有利条件对王公是有吸引力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各土邦人民纷纷要求国家统一，并开展反封建斗争，从而促使了各土邦加入印度联邦的浪潮。这样，除了在朱纳格、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 3 邦外，国大党政府较顺利地实现了对各土邦的合并。印度政府大力拉拢土邦王公，与土邦的交换条件就是保持各土邦的现存制度。

各土邦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公的企图。例如，查谟和克什米尔举行了反对王公哈里·辛格及其外国支持者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支持国民会议推翻专制政权的形势，势不可挡。尽管由于英国的干涉和印巴战争，问题极端复杂，至今仍未解决，但克什米尔的专制政权，却被人民群众推翻。

特拉凡哥尔和柯钦等民族要求废除王公政权和建立喀拉拉民族省的斗争，具有更加激烈的性质，主要是工会组织领导了这个斗争。朱纳格土邦的纳瓦布是伊斯兰教徒，他表示愿意加入巴基

① 《印度通史》第 4 册第 1093 页。

斯坦，这个土邦大多数居民的印度教徒却坚决反对。印度联邦也采取军事行动，1948年2月，当印度军队开进这个土邦时，纳瓦布逃走了。根据全民投票的结果，大多数居民表示该土邦加入印度联邦。

海德拉巴为英国凯觎的军事基地，这个土邦的人口达1700万人，其中13%是伊斯兰教徒，其余是印度教徒。在英国支持下，海德拉巴政权特别紊乱，土邦王公的势力举行骚动，对抗印度联邦，又残酷地镇压农民，正是在这个土邦的农民，1946年爆发了印度历史上著名的特仑甘纳农民起义。这次坚持了两年多的农民起义，在海德拉巴土邦1/6的土地上，没收了地主120万英亩[①]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农民建立了武装，推翻了土邦王公尼柴姆的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委员会和人民法庭。起义者不仅争取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争取废除土邦制度，把泰卢固人、马拉塔人和卡纳尔人居住的地区和各相同的少数民族的人民居住的省份实行合并。

海德拉巴的尼柴姆勾结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独立活动，印度联邦政府同尼柴姆提出恢复和平和秩序的最后通谍。海德拉巴尼柴姆拒绝了它。1948年9月13日，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海德拉巴，占领了土邦的全部土地，海德拉巴加入印度联邦。

到1949年末，除克什米尔外，各土邦都加入了印度联邦。最初予定各王公只把外交、国防和交通问题交由联邦政府管理。随后，联邦政府在加入印度联邦的各土邦实行了许多改革。各土邦的政权转归中央政府，而给各王公支付巨额的养老金，由国库开支。各土邦成立立法议会，各小邦组成特殊省，例如由卡提阿瓦各土邦组成的索拉什特拉省，拉其普特各土邦组成的拉贾斯坦省，

---

① 1英亩＝6.07市亩。

巴地阿拉和在旁遮普各小土邦组成的佩普苏省，由瓜廖尔和印度尔两土邦组成的中央印度省等，有些土邦并入邻近各省；有些土邦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保留下来或并成联盟。它们都必须服从中央政府。旧日土邦王公大多数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由于实行改革而摧毁了。合并土邦和实行行政领土改革对于削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一印度和发展民族经济，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是尼赫鲁政府在印度历史上的一大功绩。但是王公的经济地位和土邦的土地关系却很少变动。

印度过去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印度独立前是一个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摆在印度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印度人民为了推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同英国资产阶级和印度的地主阶级有着血缘关系的印度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阶级利益，曾经参加了印度人民的反英运动。但是，它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在反英运动中一开始就有明鲜的妥协生。印度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一方面对英国殖民地进行过不合作运动，一方面用所谓“非暴力”口号来麻痹人民的斗争，限制人民的革命运动。

印度大资产阶级是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一个阶级。在印度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英国殖民主义者同它们取得了妥协。在基本保留英国殖民者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把统治权转让给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这样，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果实，就被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吞占了。印度宣布独立以后，曾经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过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尼赫鲁，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一步一步地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尼赫鲁政府用反动的民族主义代替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且同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军事上，虽

然英国军队于1948年2月从印度撤走，但印度的军队、军事机构、战略计划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印军总司令仍旧是英国人，1948年夏，还有三百余名英国军官在印度任职。在政治上，英国直接统治时的全套行政机构，仍旧维持下来，还有几千英国人在印度政府机构中担任官职。

印度宣布独立以后，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它在印度的经济势力，外国资本仍然控制着印度的许多重要经济部门。1951年印度内阁秘书处向印度总理提出的一份报告中统计，外国资本控制着印度石油工业的97%，橡胶工业的93%，火柴工业的90%，黄麻工业的89%，制茶工业的86%，煤矿的62%，即使一向被称为印度民族工业的棉纺织业，外国资本也控制了21%。虽然在独立初期，印度政府曾用付出大量补偿金的办法，把某些英国资本的企业收归国有，但是并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根本利益。

印度的独立对于印度经济的发展，比在殖民地时期具有更有利的条件。英国垄断资本由于丧失了在印度的国家政权，也就丧失了原先它在印度掌握的国民经济命脉。印度政府接管了印度的土地、矿藏、森林和水利资源等财富，以及税收权利。接收了铁路、水利工程、通讯设备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殖民当局向英国私人铁路公司购买了印度的全部铁路，现在直接为印度政府所掌握。原先掌握在英国殖民当局手中的兵工厂和某些其他企业也都成了印度国家的财产。印度政府就是在继承了殖民地时代的封建残余占统治地位的落后的农业和不发达的工业的基础上，走上发展自己经济的道路的。

普选后组成的尼赫鲁政府，制订了发展国家经济的计划。为了这个目的，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决定发展重工业并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属，决定通过国营、私营和外国资本的共同合作在五年

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

后来，执政的国大党于 1955 年 1 月通过决定，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国大党的领袖和印度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标榜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在印度人民中间是深得人心的。在印度这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生活面前，尼赫鲁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很清楚的。美国的哈里曼曾说过：“我认为他们用这个词儿是一件好事情。在亚洲人民中间，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词儿。在那里，资本主义几乎等于殖民主义，或者说几乎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印度人从共产党手里把这个词儿拿了过来”。[①] 哈里曼的话为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作了注解。

1951 年印度政府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它实际上是已经开始的基本上是农业和水利灌溉设备的基本建设和其他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汇集。印度政府实行利用外国资本来发展国家经济的方针。政府声明，将实行在互利的条件下促进外国投资的政策。并表示，政府不准备对外国资本家从印度汇走利息作任何的限制；一旦对某一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时，将给企业主支付适当的补偿金。[②]

印度政府鼓励外国投资籍以凑集资金的结果，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外国的新投资有所增加。1955 年底外国私人长期投资增加到 48 亿多卢比，比 1948 年增加 60%。英国仍然是最大的投资国，占印度私人投资总额的 80%。英国垄断资本家的投资主要来源是在印度榨取利润的再投资，占投资总额的 50%。

印度政府实施 1951—1956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发展工业的支出，占支出总额的 7.6%。国营经济成分的新投资主要是重

① 引文见《中印边界问题》第 71 页，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② 《印度财政委员会报告》新德里 1949 年第 417 页。

工业。计划建设10多个大中型企业，包括年产生铁80万吨和产钢35吨的钢铁厂。五年计划后期决定建设总生产能力年产300万吨的3座国营钢铁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国营经济成分的工业企业的投资额增加了。尼赫鲁政府建立了一些由国家经营的企业。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实际上是印度的官僚垄断资本。

政府在实行发展私营工业的方针下，扶持私营资本企业。政府还给某些大垄断组织支付补助金。例如，给塔塔公司拨款1亿卢比，来帮助改建钢铁厂。

从1951年起，印度工业的总产量开始增长，重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有所增长。独立后的印度工业发展速度比殖民地时代加快了。但是印度的工业还很薄弱，1955—1956年度工厂工业产值约占国民收入的8%，工厂产业工人只有270万人。重工业产品的地位很微弱。印度还不生产重型机器制造业产品。某些重工业产品，如机车，汽车等，是利用进口零件制造的。

印度国内市场狭小，基本居民群众购买力很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印度工业的发展。同时，在外资偿还中，要付出年利率最高达6%的债务。外国资本家从印度汇走了很大一部分利润。印度重工业部长夏阿断定，1952—1955年间，汇走利息总额达到8亿零5百万卢比。[1]印度人民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美国和苏联对印度的渗透与掠夺越来越突出了。

印度国内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印度联邦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连极有限度的土地改革的实行都遭到阻挠而拖延不前。在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政府为了资产阶级集中权力的

① 《经济评论》第26页，新德里，1956年12月15日。

需要，曾经取消了一些地方的土邦封建王公的政治特权和某些地主的包税特权，但是印度的整个封建土地制度并没有根本触动，而仍然保存着。随着殖民制度的消除，垄断土地的印度王公和封建地主已经丧失了依存的靠山。国大党政府在印度独立后，为了解决印度土地问题，也着手进行土地改革。1948 年，许多省政府着手制定土改方案。1950 年，印度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开始实施这项工作。自 1953 年起印度大部分邦都开始实行土地改善。由于印度国内，封建制的地主势力相当顽固，印度资产阶级和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必定大大限制和延缓了实现土地改革的速度和彻底性。

根据土地改革法，原柴明达尔地税制度地区的很大部分地主的领地收归国有，并归国家支配。农民遭受的多级制的租佃形式，予以取消。农民直接向国家租佃土地，向国家缴纳地税。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国家支付补偿金，其数额各邦有所不同，相当于地主每年所收地租的 5—20 倍不等。土地补偿金总额约为 61 亿 5 千万卢比。

封建剥削并未消灭，印度还存在着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地主很大一部分土地，以有建筑物的庄园和佃农没有继承租佃权等等理由，并没有收归国有。而在一些地区内，并未实行土地改革，只实行了一定程度上限制地主权利的法令，如降低地租率等。

从地主手中收归国有的土地没有无偿地分给农民。只有交纳赎金后才能获得土地。绝大部分农民是无力交付赎金的。印度农民无地和少地的现象仍十分严重，1951 年约有 3/4 的农民没有土地。

印度农村的上层分子获得了比殖民地时代更多的土地，建立更多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农场，以新的形式对印度人民进行剥削。地主为了保持一部分土地，利用“自耕”权从租出的土地上撵走农

民。

印度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封建地主阶级的地位受到冲击，同时农业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但是印度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民仍然受着地租和高额利息的重压，状况十分困难，这是印度独立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一项重要原因。

50年代初，印度农村的土地分配情况是，占75%的贫雇农，拥有全部耕地的17%，而占4%的封建地主，则拥有全部耕地的34%。而随着封建地主夺佃的加剧。土地更加集中。

尼赫鲁的国大党政府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联邦政府的施政方针和国大党的纲领，都标榜实行土地改革。各邦几乎都通过了法律，这些法律形式上废除了大地主和封建主的领地，并赋于耕种土地者以租用土地的权利。印度地主顽固地反抗实现土地改革，因为实行土地改革必然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消灭封建残余势力。

海德拉巴邦和佩普苏邦，允许佃农在缴纳一定数量补偿金的条件下把地主土地赎为已有。在马德拉斯个别地区内实行了规定地租额的租贷法，等等。这些法律并未解决土地方面的根本问题，农民没有无偿地得到土地。只有马德拉斯一个邦从1950年起开始实行土地改革。而海德拉巴、西孟加拉、阿萨姆和其他各邦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特仓甘纳地区的农民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土地，为印度农民开创了斗争的道路，树立了榜样。甚至1951年当印度军队占据了全部起义地区时，特仓甘纳的农民游击活动还在陆续进行。直到1951年11月，在为了给普选创造正常局势的借口下，由于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和劝阻，特仓甘纳农民才停止了武装斗争。印共为了选票而背叛了农民的利益。但是，地主未能完全收回被农民夺取的土地。

国大党和联邦政府为了反对农民的土地革命，大肆宣扬“献地”运动，正式承认它是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

1951年，甘地的密友和信徒、国大党人阿卡里亚·维诺巴·巴维，来到农民起义的特仑甘纳地区，倡议“献地”运动。早在1948年他即创建了“共同繁荣运动”的宗教团体组织。巴维到各村庄号召由地主把一部分土地自愿地捐给无地农民，以解决土地问题。巴维在农民运动激烈的地区，开始宣传关于甘地的非暴力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就是为了削弱农民的斗争，其目的和手法都是十分明显的。列宁说过：“谁以为用一个说服一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①

“献地”运动首先在农民斗争蓬勃发展的海德拉巴开始，并不是偶然的。尽管在官方的支持下，最初并没有显著的结果。地主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自愿捐献土地的。可是尼赫鲁支持这种“献地”运动，1951年他亲自邀请巴维去德里会面。他的女儿，后来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又亲自跑到巴维的所谓“净修院”向他提出纪念“献地”25周年。十分明确，国大党政府把“献地”运动当着土地改革的重要形式和成果看待的。这个运动的吹捧者宣称：他们似乎用这种方法已经征集了300多万英亩土地。而实际上一些被政府把多余荒地收归国有的柴明达尔，捐献了他们已没有任何所有权的多余土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巴维在最初几个月收集的土地80%不是来自地主的土地而是农民自己的土地。

印度独立以后，在实行限制封建地主地产的某些措施的同时，印度也实行了改善农业技术水平的措施。在东旁遮普完成了新的灌溉系统的建筑工程。在全国扩大了灌溉面积。建设了化肥厂，增加了肥料的生产。印度的收获量有了相当的增加。1953—1954年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9页。

比1950—1951年度增加18%，使印度有可能在1954年取消了粮食配给制，并比1951—1952年度减少了5/6的粮食进口。为了发展农业，印度政府相当努力以实现所谓社会与民族发展的纲领。拟定建立成千的农业发展联盟，来推行先进的农业技术，并鼓励建立农业合作社，它基本上是供给农民各种农业资金的信贷合作社。

印度的粮食状况仍然很严重，经常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粮食产量一直不高。粮食不足，首先受害的还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印度农民的状况仍很贫困。地主的逐佃行为，有增无已。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展。

工人运动也有所发动。孟买工人1952年6月6日举行大罢工，抗议政府取消粮食补助金，抗议物价上涨。50年代初，印度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此伏彼起，声势浩大，工人阶级加强了斗争中的互相支持。

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增长，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和要求土地的斗争，连续不断。印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尼赫鲁的政治危机更加深重。尼赫鲁也抛弃了“非暴力”的信条，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印度官方发表的数学，从印度独立到1950年8月的三年内，印度军警向群众开枪共达1982次之多，打死3784人，打伤1万人，监禁5万人。印度前总统普拉沙德1960年11月9日在德里举行的邦长会议上也承认。印度联邦政府统治下发生的警察开枪事件超过了英国统治时期。

1955年印度政府在内政方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完成了改组各邦的工作。全国重新划定为十六个邦，按民族语言划分，取消了把邦分三类的作法。这个方案符合印度各民族的民族感情。虽然有些民族，如马拉塔人、古吉拉特人和旁遮普人建立自己民族邦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邦的改组和国大党为它所做的决议，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大党执政的政治地位。

第四节　印度的对外政策和中印关系

印度独立以后，为了摆脱殖民地统治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克服长期以来的殖民地落后状态，发展民族工业，达到国家经济独立的目的，印度联邦需要和平发展的条件，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印度联邦政府一成立，就宣布了不结盟政策和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印度政府宣布，印度将捍卫给与附属国以自由的原则，并反对殖民主义。

根据印度的倡议，1949 年 1 月在德里举行了国际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会议。尼赫鲁在宣布召开这次国际会议时，抨击了西方帝国主义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援助。由于英国等帝国主义的压力，会议没有作出对荷兰实行制裁和对印尼实行援助的决议。但是，召开这个会议的事实本身仍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印度的外交政策起初还是非常摇摆不定的。这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和军事因素决定的。1947 年 12 月，尼赫鲁在制宪会议上的一次演说中说道："归根到底，外交政策乃是经济政策的产物。在印度没有很好地制订它的经济政策以前，它的外交将是相当含糊的，不成熟的，在黑暗中摸索的。"① 由于印度政府当时尽力想从英美方面取得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和支持，在外交方面虽然基本上执行一种中立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倾向西方。1949 年 4 月，在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印度决定留在英联印内，成为英联邦的一员。同时印度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访问了伦敦和华盛顿。

印度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最初基本上是不卷入一切军事冲突的原则出发，甚至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援助时，通常是

① 尼赫鲁：《独立及独立以后》第 201 页。

不承担军事政治义务。英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极力拉拢新独立的印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以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策的破产，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印度变成它在东方的据点。正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的同时，1949年10月间尼赫鲁应邀访美。近一个月的访问，尼赫鲁在美国受到了隆重接待。但由于美国的垄断组织不相信印度国内状况的稳定，对不愿对美国承担义务的尼赫鲁的政治立场没有把握，美印两国未达成协议。

印度联邦政府是最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天，尼赫鲁当众发表演说时说："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国新政府，是相信中国新政府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它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①] 印度联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代表权的正义要求的斗争。

尼赫鲁政府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进步人民有益的事情。它曾经拒绝参加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拒绝帝国主义在印度建立军事基地，宣布实行"不结盟政策"。印度政府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1954年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规定：1. 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2. 互不侵犯，3. 互不干涉内政，4. 平等互利，5. 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是一次沉重打击。五项原则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1954年10月尼赫鲁访问了中国。他在中国访问了两周，对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尼赫鲁政府在发起第一次亚非会议

① 《印度斯坦时报》1950年1月1日。

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54 年底科伦坡五国会议决定，为扩大地区的和平合作，采取新的步骤，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亚洲和非洲其他 25 个国家，于 1955 年 4 月在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聚集了 29 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代表了约 15 亿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万隆会议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它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极其重要的事件，万隆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十点内容的会议宣言，具有重大历史影响。会议严厉地谴责了殖民主义制度，并号召全面禁止生产、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决议。作为发起国的印度尼赫鲁政府，在会议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印度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团结一致和印度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促使和推动了印度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1951 年 5 月，印度政府拒绝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建议，派军队作为联合国部队，并声明，“印度军队只能用于国防的目的，印度军队中没有到海外服务的远征部队”。

尼赫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祖国的事业。一再指出，台湾应当归还中国。提醒美国政府，如果不顾以前的国际协定，会导致问题悬而不决。印度人民和政府正确评价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意义，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

各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普遍高涨的形势下，亚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对印度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印度资产阶级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垄断组织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印度民主力量的加强等有力因素，都影响和决定了印度政府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性质和发展。在印度国内，人民群众的情绪普遍受到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鼓舞，痛恨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群众情绪的压力推动了尼赫鲁政府在国际活动中“不结盟”政策的推行。尼赫

鲁曾提出关于印度建成“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方案，并提出效仿中国。他说：“他们在成功地增加农业生产，步伐比我们的快，毫无疑问，中国能做的事情，我们也应当做到。”[①] 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印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赫鲁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影响的存在而表示敬佩和效尤。

印度独立初期，它的对外政策是中立政策。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偏向西方国家的。1949年尼赫鲁在新德里发表演说中说：“当我说我们不愿参加任何联盟的时候，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我们不愿比接近其他一些国家更接近某些国家。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比接近其他一些国家更接近西方世界某些国家”。[②] 尼赫鲁政府接近帝国主义的事例是，印度往朝鲜“联合国部队”派遣医疗队，允许招募廓尔喀人到马来亚进行殖民战争，允许往印度支那载运武器和军队的法国飞机利用印度机场。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印度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国际形势的激烈变化，尼赫鲁的对外政策更加明确地倾向反动。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之外，主要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为了抑制社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抵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阻挡民族解放运动，而明显地改变了对尼赫鲁政府的政策，从反对尼赫鲁政府的“不结盟”政策，转而大力援助尼赫鲁政府，经济上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帝国主义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实行了高价收买的政策。

尼赫鲁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逐渐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

① 弗兰克尔：《1947—1977年的印度政治经济》第141页，普林斯顿1978年版。

② 尼赫鲁：《独立和独立以后，1946—1949年演说集》第245页。

主义的旗子，甚至派遣印度军队公开充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尼赫鲁所标榜的“不结盟”政策，越来越变成空洞的口号。

中印两国自1950年4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是友好的。1954年4月29日，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写进了中印两国政府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国际事务发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印度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对中国怀有扩张主义的野心。正是从这种扩张主义出发，印度统治集团，把我国西藏地方看作是印度的势力范围。1950年，尼赫鲁政府曾经干涉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1959年3月，印度政府又策动和支持西藏地方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阴谋和叛乱活动。叛乱中心就设在印度的噶伦堡。同年3月22日，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无理地向中国提全面的领土要求，不仅提出在中印边界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属于印度，而且提出在中段和西段属于中国西藏和新疆的大片地区也是印度领土。从这以后，印度军队和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和领空，并在边界地区挑起武装冲突。

中印边界纠纷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虽未正式划定，却早已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印度政府企图要中国接受所谓“麦克马洪线”，完全是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1913年10月，在英帝策划下，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了一次所谓“中英藏会议”。参加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用秘密换文的文式，画出了这条臭名昭彰的“麦克马洪线”。把历来属于中国的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麦克马洪线”是非法和无效的，历届中国中

央政府从未承认它。过去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期，不断向西藏地区吞食，因而存在着边界争端。印度独立后，印度统治集团居然把英国所侵占的或想要侵占的中国领土，当着印度的领土。他们强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中印边界的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和西段的3.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划归印度。西藏叛乱后，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而且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

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统治集团，蓄意挑起中印边界纠纷，向中国挑衅，以至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是他们的整个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走向反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坚持扩张主义政策，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印度人民的视线，以便加紧对人民的压榨，打击国内进步力量，以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

中国政府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避免边境冲突，争取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和谈的建议。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访问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会议。尼赫鲁却蛮横地坚持要中国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的态度，不容许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并对中国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冲突。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是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0月20日清晨，印度军队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给予印度扩张主义者以沉重打击。中国政府为了停止边境冲突，于同年10月24日发表声明，重申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并主动为创造谈判条件将武装部队以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建议两国总理再一次举行会议。11月21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中国

分批释放被俘的印度军队，把战斗中缴获的印军武器交还印方。中国的正义行动，给了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气焰以应得的教训。

对外政策总是对内政策的反映和延续。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同它的对内政策一样，都表现了它的阶级本质。在印度宣布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代表着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继承和竭力保持英国殖民主义者所留下的遗产，越来越露骨地实行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早在1944年尼赫鲁就暴露了这种扩张主义的野心，他写道："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那些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马来亚、暹罗、爪哇等等，有一个区域性的集团组织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①]

印度在殖民地时，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扶植，印度大资产阶级势力有了发展，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大资产阶级经济势力进一步发展，英帝国主义一直把印度当作它的东方的殖民体系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印度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接受了这份遗产。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继续做着他在独立前的大印度帝国的迷梦。他说："就我的好恶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印度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英国人"。[②] 事实上，尼赫鲁继承了英国对印度邻近小国的一些特权，力图干涉周围的一些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力图控制它们的经济和贸易。而对我国领土的无理要求，进一步表现了尼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712页，

② 米歇尔·布莱切尔：《尼赫鲁政治传记》伦敦1959年版。

赫鲁所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扩张主义的愿望。中国人民的自卫反击，打破了尼赫鲁的扩张主义迷梦。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一蹶不振，直到 1964 年 5 月 27 日忧郁地死去，他的扩张主义哲学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印度政府为了反华，又加紧了对苏联投靠。1959 年以来，苏联逐步全面支持印度政府，在这年 9 月，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1960 年，印度在中印边境制造武装冲突后，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1962 年，印度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后，苏联给印度的"军援"也急剧增加。苏联为印度建造飞机工厂和建设海军基地。苏联派出大量的军事顾问和军事技术人员到印度帮助训练军队。印度极力推销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为其效劳，以换取苏联的"援助"。1971 年 8 月，印苏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这个同盟的条约，使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发生变化。同时，苏联加速对印度的经济渗透和掠夺，按规定，苏联给印度的贷款必须百分之百用于购买苏联商品，苏联借以高价倾销劣质商品，同时向印度索取种种权利。

在印度人民争取人民民主和经济发展的斗争路程上，仍然存在着困难，道路是很艰难的。但从长远观点看，印度历史发展的道路无疑是光明的。周恩来总理指出："在伟大的甘地和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印度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欢呼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胜利。……我们两国取得独立的道路并不一样，但是我们维护独立，建设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却是一致的。"[1] 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是历史的进步。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这一重大进展，为彻

---

①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1 期第 20 页。

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建设独立、繁荣的现代化国家，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着悠久历史的友谊。中印两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印度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必将取得成功。不管印度人民过去的斗争经历过多么严峻的考验和经历了曲折道路，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印度人民！

大 事 年 表

年代	事件
1498 年	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经过好望角发现通往印度的航路。
1510 年	葡萄牙人占领果阿。
1526 年4 月 21 日	第一次帕尼帕特战役。
4 月	巴布尔占领德里夺取王位，建立莫卧儿帝国。
1530 年	巴布尔死，其子胡马雍继位。
1555 年	胡马雍被阿富汗人驱逐而流亡 15 年后，回到了德里恢复了王位。
1556 年	阿克巴继承了胡马雍的王位。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
1562 年	22 岁的阿克巴同信奉印度教的拉其普特公主阿姆培尔结婚，标志着莫卧儿帝国宽容的宗教政策的推行。
1564 年	阿克巴废除印度教徒的人头税。
1600 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5 年	阿克巴逝世，查罕杰即王位。
1608 年	霍金斯率一艘英船到达苏拉特，并到德里向查罕杰递交英王书信。
1612 年	英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设立海外商馆。
1615 年	英王使者托马斯·罗到达印度，英取得贸易特权。
1627 年	查罕杰死亡，沙·贾汉继承王位。

1658 年	奥朗则布在德里即皇帝位。
1661 年	英国商馆从苏拉特迁到孟买。
1664 年	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66 年	沙·贾汉死于囚禁的亚格拉古堡中。
1668 年	孟买割让给英东印度公司。
	法国在印度第一个商馆于苏拉特建立。
1674 年 6 月 6 日	西瓦吉宣布为独立的马拉塔国王。
1679 年	废止人头税的一百多年之后，对印度教徒重新征收人头税。
1690 年	英国建立加尔各答市成为贸易中心。
1707 年	奥朗则布死去。
1742 年	马拉塔侵征孟加拉。
1744—48 年	第一次英法战争。
1756—63 年	七年战争。
1757 年 6 月 23 日	普拉西战役。
1761 年	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马拉塔人的军队被阿富汗击败。
1765 年 5 月	克莱武成为孟加拉总督。
1767—69 年	第一次英国迈索尔战争。
1773 年	英国议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
1774 年	哈斯丁斯出任印度第一任总督。
1775—82 年	第一次英国马拉塔战争。
1803—05 年	第二次英国马拉塔战争。
1817—19 年	最后一次英国马拉塔战争。
1826 年	印度孟买地区农民起义。
1831 年	迈索尔罗阇被废，它兼并入东印度公司。
1833 年	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

1837年	巴哈杜尔·沙二世即傀儡皇帝位，1862年死于仰光。
1843年	英国征服信德。
1845年12月14日	锡克教徒第一次抗英斗争。
1848年—49年	锡克教徒第二次抗英斗争。
1853年	铁路从孟买通往塔纳；电报从加尔各答通到亚格拉。
1859年2月	孟买第一座纺织厂投产，加尔各答创办了第一个黄麻工厂。
1857—59年	印度民族大起义
1858年8月2日	英国议会通过《关于改善治理印度的法案》，内阁设立印度事务大臣，直接管理印度，取消东印度公司的权力。
1859年	孟加拉靛蓝起义。
1864年	英侵不丹战争。
1865年	奥里萨饥荒。印与欧洲电报联系开始。
1868年	铁路修到德里。《甘露市场报》出版发行。
1877年1月1日	维多利亚女王宣布为印度女皇，印度各土邦成为英国的属国。
1878年3月	印度爆发第一次罢工运动。
1885年12月28日	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
1886年1月	英国兼并上缅甸。
1890年	孟买建立了第一个纺织工人的职工会。
1905年	印度人民反对英国分割孟加拉的斗争。
1906年	穆斯林联盟成立。
1907年	国大党分裂。
1908年7月	孟买工人抗议英印当局对提拉克判刑举行大

	罢工。
1909年	实行莫尔利—明托改革法案。
1912年	首都从加尔各答迁至德里。
1913年	西姆拉会议，英国秘密炮制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1月	甘地回到印度。
1916年	国大党、穆斯林联盟要求自治。
1917年	英国发表《孟太古宣言》。
1918年11月	一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了苏俄。
1919年	英国殖民当局提出《罗拉特法案》。
1919年4月13日	发生阿姆利则惨案。
1920年	国大党通过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1921年	印度人民举行抗议英王太子巡视印度的总罢业。
1922年2月	国大党决定停止不合作运动。
	联合省曹里曹拉村农民火烧英印警察局。
1923年	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拉合尔、坎普尔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4年	殖民当局以坎普尔共产主义者诉讼案进行逮捕。
1924年4月	印度伟大诗圣、作家罗·泰戈尔访问中国。
1925年	孟买纺织工人总罢工。
1926年	英印殖民当局颁布监督工会活动法。
	孟加拉出现第一个工农党。
1927年	贾·尼赫鲁出席布鲁塞尔殖民地人民大会。
1927年11月	英国政府派出西门调查团。

1928年2月3日	西门调查团到达孟买，印度人民举行抗议。
1929年12月29日	国大党拉哈尔大会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1930年4月—5月	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白沙瓦等地人民反英斗争。
4月14日	国大党首领被殖民当局逮捕。
11月12日	在伦敦召开第一次英印圆桌会议。
1931年3月4日	《德里协定》签订。
9月	第二次英印圆桌会议。
1932年1月4日	英殖民当局宣布国大党非法，实行大逮捕，甘地等人再次被捕入狱。
1932年	第三次英印圆桌会议。
1933年12月	印度共产党成立。
1934年5月	国大党宣布停止非暴力运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宣告结束。
1934年7月	英殖民当局正式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
1935年8月	英公布《印度政府组织法》。
1936年4月	国大党勒克瑙会议上甘地推荐贾·尼赫鲁担任国大党主席。
4月	全印农民联盟成立。
1937年2月	国大党在各省选举中获胜。
4月	缅甸从印度划出，成为英单独殖民地。
1938年1月	印度成立工会组织全印工会大会。
	孟买省政府通过法案限制工人罢工权。
1938年9月	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
1939年1月	国大党选举左派领袖鲍斯为主席。
1939年	尼赫鲁访问重庆，会见过中共代表，并计划

	访问延安，因欧战爆发急于回国未能成行。
9月3日	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参战。
1940年2月	穆斯林联盟提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的要求。
3月23日	在拉合尔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上通过建立巴基斯坦决议。
7月	国大党浦那会议通过，战后给予印度独立，在战时支持英国的决议。
1941年1月	国大党领袖苏巴斯·昌德拉·鲍斯逃出印度后，在日本支持下成立所谓自由印度政府。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	英殖民当局释放被捕的国大党人。
1942年4月9日	英印开始会谈印度独立问题。
7月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印度立即独立。
8月9日	英殖民当局逮捕了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全部领袖。
1942年夏	英当局宣布印共为合法政党。
12月9日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柯棣华以身殉职，长眠在华北抗日战场上。
1943年2月	甘地开始在狱中绝食斗争。
5月	印度共产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8月	日本占领缅甸后宣告缅甸“独立”。
1944年5月	甘地等国大党领袖获释。
9月	甘地与真纳在孟买谈判。
1945年5月8日	德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8月14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1月	加尔各答工人与学生同英警察、军队发生了巷战。

1946 年 2 月	印度孟买地区舰队水兵起义。
2 月	英首相艾德里宣布派遣政府特使团去印度。
9 月 2 日	印度组成临时政府蒙巴顿、尼赫鲁分别担任正副总理。
12 月 9 日	印度制宪会议在德里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成立“独立自主的共和国”的决议，穆斯林联盟和土邦未参加这次会议。
1947 年2 月 20 日	英首相艾德里发表声明：至迟在 1948 年 6 月前把印政权交给负责的印度人手里。
6 月 3 日	英宣布《印度独立方案》。
8 月 14 日	巴基斯坦自治领宣告成立，印巴分治。
8 月 15 日	印度独立成为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领，蒙巴顿任总督，尼赫鲁任总理。
10 月 27 日	印巴爆发第一次克什米尔武装冲突。
1948 年1 月 30 日	甘地在德里被刺身亡。
3 月	国大社会党人脱离国大党成立独立的政党。
6 月 21 日	拉贾戈帕恰雷继蒙巴顿为印度总督，这是第一个印度人任印度总督。
7 月	印巴双方同意联合国的克什米尔停火线。
9 月	海德拉巴土邦镇压特仑甘纳农民运动。
1947—48 年	552 个印度土邦并入印度自治领。
1949 年3 月 8 日	印总理尼赫鲁宣布退出英联邦，成立独立的印度共和国。
6 月 2 日	印度派兵进驻锡金首都，甘托克接管了锡金政权。
8 月 8 日	印度把《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强加给不丹，规定不丹对外关系受印度指导。

11月26日	印度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印度成为联邦制共和国。
12月	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建交。
1949年	人民同盟成立。
1950年1月26日	颁布印度宪法，印度共和国正式成立，拉金德拉·普拉沙德为第一任总统。
1950年	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
12月5日	印度锡金签订《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保护国。
12月	副总理巴特尔逝世。
1951年	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1年4月	甘地主义者巴维在特仑甘纳发动献地运动。
1951年	社会党与农工人民党合并成立人民社会党。
	印美签订1.9亿美元的紧急粮食贷款协定。
1952年2月	第一届大选，国大党在人民院得票48%。
5月6日	普拉沙德当选印度总统。
1952年	各邦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提出废除柴明达尔。
1953年	印苏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
1953年12月13日	印中友好协会在新德里成立，森德拉尔任主席。
1954年1月3日	印共三大闭幕，阿·高士当选总书记。
6月28日	周恩来总理访印期间与尼赫鲁会谈，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
10月19日	尼赫鲁应邀来华访问抵达北京。
1955年1月	国大党六十届年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

1955年4月	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中印等29个国家代表团出席。
12月16日	宋庆龄副委员长应邀赴印度访问。
1956年4月	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
11月	按语言重组印度各邦。
1957年2月	印度第二届大选。
4月5日	印共在喀拉拉邦选举获胜，组成邦政府。
12月1日	印度援华医疗队长爱德华教授来华访问时病逝于北京，一半骨灰撒在他战斗过的中国土地——黄河。
1958年4月	印共五大提出“以和平方法实现充分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方针。
1958年	西孟加拉邦、北方邦爆发反饥饿斗争，村社自治制度在全印范围内实施。
1959年3月	达赖喇嘛叛逃印度。
7月	普拉沙德总统宣布接管喀拉拉印共邦政府。
9月	苏对印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30亿卢比援助。
8—10月	印度一再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
9—11月	塔斯社和赫鲁晓夫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反华。
11月	印共通过“印中关系”决议赞许尼赫鲁立场。
12月	美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印。
1960年4月	周恩来总理访印谈判中印边界问题。
8月	那加邦成立。
1960年	孟买邦分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
1961年12月18日	印度武装收复葡属果阿殖民地。
1962年1月	印共总书记高士逝世，丹吉任主席。

10月20日	印度在中印边界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被迫自卫反击。
11月22日	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在中印全线停火。
12月	国防部长梅农辞职，尼赫鲁地位削弱。
12月	美英首脑拿骚会议各向印提供军援6千万美元。
1963年	印粮食减产220万吨出现粮荒。
	在森巴火箭中心发射第一枚火箭。
1964年	人民社会党与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
1964年5月27日	尼赫鲁病逝，夏斯特里继任总理。
5月	苏对印军援达1.3亿美元，超过美英两国提供的数字。
7月	粮食部长帕蒂尔去美谈判要求五年援助粮食2千万吨。
10月	印共分裂为印共和印共(马)。
1965年2月	统一社会党分裂。
5月、8月	印巴边界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1965年—66年	印从墨西哥进口约2万吨优良麦种开始实行“绿色革命”。
1966年1月11日	夏斯特里在塔什干病逝，英·甘地继任总理。
2月	英·甘地在国会宣称准备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
1966年	粮荒严重进口粮食1千多万吨。
	旁遮普邦分为旁庶普和哈里亚纳邦。
1966年12月	苏对印第四个五年计划贷款25亿卢比。
1967年2月	第四届大选。

3月	印共（马）联合政府在西孟加拉邦执政，11月被解散。
5月	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
1968年1月	柯西金访印签订“军援”协定，苏帮助扩充海军。
12月	安得拉邦斯里卡库兰爆发武装斗争。
1969年4月	印共（马列）宣告成立。
6月	14家私营大银行被收归国有。
11月	国大党分裂为执政派和组织派。
1970年3月	印度提出第四个五年计划。
5月	印共（马列）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宗达任总书记。
1971年2—3月	第五届大选提前举行，国大党执政派获胜。
8月18日	印苏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12月	印度出兵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成立。
1972年5月	喀拉拉邦农民开展占地斗争，要求实施土地限额法。
7月	印共（马列）领导人在加尔各答狱中牺牲。
1973年4月	英·甘地解散国大党内“社会主义论坛”派。
1973年	粮食减产1千万吨，能源短缺物价飞涨。
1973年11月	勃列日涅夫访印，签订印苏经济和贸易合作协定。
1974年2月	五个邦、区举行邦议会选举，国大党在两个邦失败。
5月18日	印度在地下爆炸一个核装置。
1975年1月	印度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4月	印度吞并锡金为第22个邦。
6月	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裁决英·甘地选举舞弊而无效，反对党发动倒英·甘地运动。
7月	英·甘地宣布20点经济纲领。
1976年3月	印与斯里兰卡和印尼签订海域疆界条约。
11月	人民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印度为“社会主义的世俗共和国”。
1977年1月	组织派国大党、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和社会党合并为人民党。
3月	举行第六届大选、执政三十年的国大党惨败。总理英·甘地落选并辞职；人民党领袖莫·德赛任总理。
6月	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选举获胜并组织左翼政线政府。
10月3日	印政府在新德里逮捕前总理英·甘地，不久释放。
1978年 1月	美总统卡特访问新德里。
1月	印共（马）在特里普拉邦选举获胜。
1月	国大党再次分裂为英迪拉派和雷迪派。
5月	印度承认阿富汗喀布尔政权。
8月	美国恢复对印度的财政援助。
1979年2月	印外长瓦杰帕依访华。14日邓小平会见印外交人员。
5月	为审讯英·甘地等成立特别法庭。
7月15日	德赛辞去总理职务，查兰·辛格任总理。
8月	总统解散国会，查兰·辛格任看守政府总理。
11月	印度孟加拉国边界发生交火事件。

1980年1月14日	第七届大选国大党英迪拉派获胜，英·甘地任总理。
5月	印苏签订协定，苏提供130亿卢比军火援助。
6月	国大党英迪拉派在中央邦、北方邦等重要邦选举获胜。
6月23日	英·甘地继承人、次子桑贾伊·甘地飞机失事身亡。
1980年7月	印度自制火箭成功发射了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七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12月	勃列日涅夫访印，苏对印第六个五年计划提供贷款52亿卢比。
1981年4月	邓小平会见访华的印反对党领袖苏·斯瓦米。
6月	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
1981年	印度从粮食进口国成为粮食出口国。
	印度正规军总兵力110万，国防支出44亿美元。
1981年12月10日	中印在北京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
1982年1月	印度人士成立印中协会。
1982年5月	印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印第二轮会谈发表声明：印度在“领土”问题上不能妥协。
9月20日	英·甘地访问苏联。
11月	印度举办第九届亚运会。
1983年1月	印卫生部长宣布：印度人平均寿命从32岁提高到50岁。
3月	楚图南率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访印。
3月4日	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共产党（马）重新恢复两党关系。

3月26日 英·甘地儿媳玛尼卡成立“全印桑贾伊党”，拥有80万党员。

1983年 印度拍摄740多部影片创世界纪录。

1984年6月3日 印度军队进驻旁庶普邦锡克教金庙。

1984年10月 印度民众党、民主社会党及人民党的一部分等反对党合并组成“被压迫工农党”一度担任过总理的查兰·辛格为领袖。

1984年10月31日 英·甘地遇刺逝世，其子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

11月2日 拉·甘地当选国大党（英迪拉派）议会党团领袖。

11月3日 英·甘地遗体火葬，中国特使、副总理姚依林参加葬礼。

1985年7月 印度政府与旁遮普邦达成协议，结束了历时四年的与锡克教冲突。

12月7-9日 拉·甘地出席在达卡举行的第一次南亚七国首脑会议。

1986年10月2日 拉·甘地遇刺未遂而幸免。

1986年10月12日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比·库·巴苏医生因病在加尔各答逝世，终年74岁。

1986年12月8日 反对党国大党（社会主义派）同执政党国大党（英迪拉派）合并。

1986年12月9日 印度将“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它的区域建制，议会批准“阿鲁纳恰尔”为正式邦，成为第24邦。12月11日中国外交长发言人发表谈话：印度这一作法严

重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印度议会通过这一法案完全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后　记

自 1959 年，在王澡教授指导下，我完成毕业论文《印度资产阶级的特点》时起，到这部《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的付梓出版，已整整 38 个年头了。在我一生中绝大部分时光里，与印度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印度是我国的邻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大影响。我国研究印度文化及历史的学术活动源远流长。在史料的占有方面，使一些西方国家望尘莫及，即是印度本国也无法与中国比拟。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我国是落后了。

50 年代建国初期，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我国史学界把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历史研究作为重点，以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观念。那时史学界生机勃勃，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印度史的研究也处于热点，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老一代的学者季羡林、丁则良教授等，率先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历史研究》等刊物，登载了他们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他们也分别出版了一批专著。

正是在这种浪潮中，把我吸引到印度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征途上。我以印度史作为研究课题，是时代需要所然。但是，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印关系的风浪也时起时落，两国的友好气温乍暖还寒。伴随着我国政治运动的激烈动荡，也不可能集中的深入进行研究。然而，我研究印度史的情趣，没有减弱，只是举步艰

难，途程坎坷，经费捉襟见肘，研究工作无以为继。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在教育、学术界吹拂着春风，一切才重新走上正轨，并有了新的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一批印度史的论文与专著，并多次在大学开设了《印度近现代史》课程。

印度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困惑程度也不是局外人所相知。专业人才中只有极少数的建国前赴印留学人员，建国后只有少数印地语的外派留学生。改革开放后，我们同行去印度留学，有的要从美国取得奖学金才能成行。南亚学会组织编写的大型史书十卷本由季羡林、王藻主编的《印度通史》，因经费等原因迟迟不能完稿出版，后因王藻教授的谢世而搁浅。季羡林教授撰写的《印度简史》，建国初期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出版问世，至今已逾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简明印度史》（湖南出版社）系国家教委规划的高教教材，作者参入了该书的写作。辽宁大学历史系崔连仲教授撰写的印度古代史专著《从佛陀到阿育王》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出版问世。这部印度近现代史专著，可与崔著古近贯连、配套成龙，构成印度史的一个完整的系列的学术体系。

在印度独立50周年庆典即将来临之际；在1997年7月1日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前夕，这部印度近现代史得以付梓出版，作者怀有无限的欢欣与极大的快慰。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和英国最后一块海外领地——香港，两者先后沦陷的遭遇和厄运，作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商务印书馆出版）中，阐述了两者苦难联系的源头。

这部书的出版，得到辽宁大学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诸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谢意。

长子、留学英国的博士生李声远，提供了英国、印度的资料，

并资助了出版费用，书此志念。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稿存在的问题和疏漏谬误之处，实属难免，敬希专家学者，史学界同仁，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以企修正提高。

李文业

1997年3月10日于辽宁大学